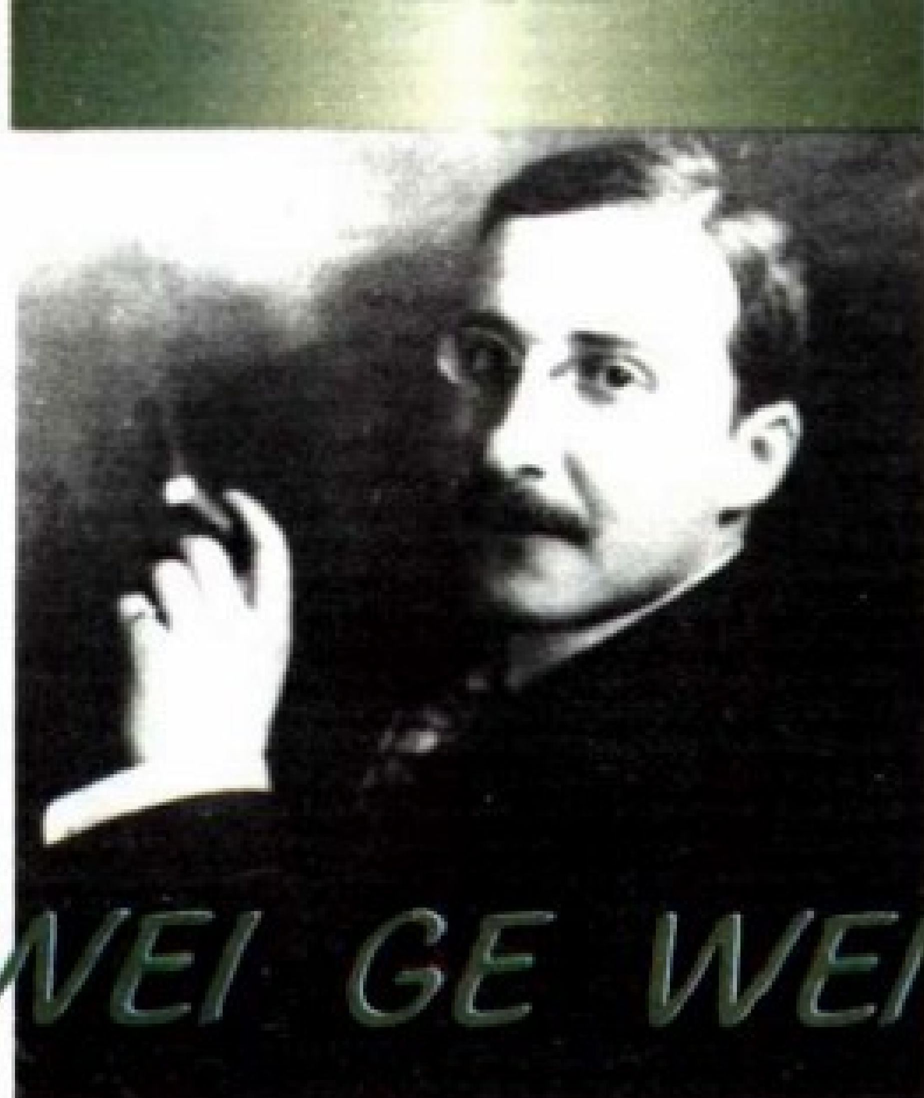


CI WEI GE WEN JI

茨威格文集

高中甫 主编　7　自传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文集

7

自传卷

高中甫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和绿蒂·阿尔特曼
1938年



1

1 在彼得罗保利斯寓所，茨威格在口授，右为妻子绿蒂。

2 茨威格与绿蒂自杀后由警察局拍摄的照片。

3 茨威格与绿蒂在奥地利的合葬墓。



2



3

卷首语

这一卷是茨威格的自传:《昨天的世界》，它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

1940年茨威格开始写他的自传，那时他流亡在英国的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使业已失去了祖国的茨威格陷入深深的悲观和绝望之中。这一年的5月18日，他在给马克斯·海尔曼-纳依斯的信中写道"当我们失去了像荷兰这样的自由国家（最终也许还有瑞士）时，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要陷到何种地步！甚至我这个老悲观主义者对这样的深渊也难以想象得出来。"他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着手写他的自传；在上面援引的一封信里，他就这部自传的写作意图做了这样的披露:"出于绝望我写我生活的历史。我不能集中精神工作。这样我至少要留下一份文献，说明我们相信过什么，我们

为什么而生活过；在今天，一份证词也许比一部艺术作品更重要。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我们这一代受到如此的考验，遭到如此的折磨。我们应当把这些告诉给后人，作为警示。”在1941年的9月，他在致另一友人基多·福克斯的信中，在谈及他这部业已完成——《昨天的世界》杀青于1940年的10月——的自传时，对写作的目的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为古老的奥地利所能做的，首要的是去使一幅图像活起来，让人们知道它曾是什么样子，它对欧洲的文明有什么样的意义。”正因如此，在这部自传中，他主要写的是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不是他自己，他提到的和描述的是那些参与塑造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的进程做出过贡献的、而非与他私人生活有关系的人；对通常意义上的自传中的内容，诸如家世、双亲、家庭，他并没有在书中做过多的叙述，对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的相遇、相爱、结婚、分手、离婚，对他与他的第二个妻子的结识、共同工作、共同生活，他很少提到，甚至根本没有触及。从这种意义上，茨威格的这部自传有着比通常意义的自传更多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上的价值，因为它描绘出的是20世纪头四十年奥地利和欧洲精神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幅全貌。

茨威格本拟给这部自传标上《我的三种生活》的题目，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做为三种生活的标志，显然这个题目并不符合他写这部自传的构思和意图，也缺少更大的概括力。他还曾考虑过其他一些标题，如《我们，被考验的一代》《一去不复返的年代》《那些日子已经逝去》等，但他在完成了这部自传并把它终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时，他意识到了，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60岁

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他的全部生活都已成为过去，他所认识的世界已成为昨天，于是他给它冠上了恰如其分的题目：《昨天的世界》，他用这部作品向过去告别。

前 言

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作那么重要，以致诱使我不得不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讲述不可。在我鼓起勇气写这本以我为主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灾难和考验，这远远超过前一代人所经历的。我让自己站在前面，仅仅因为我是位放幻灯时的解说员；时代提供了图景，我不过是对这些加以解释而已，因为这些并非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经历——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的命运这样负担如此沉重。我们中间每个人，不论是年纪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荡所震撼过；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

平主义者，恰恰站在最激烈地震的地方。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存的条件，使我彻底脱离与过去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震荡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背井离乡的人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他人失去任何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及。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作品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成见。

由于我脱离原来的根系，甚至脱离了养育根系的土地，——像我这样正直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是罕见的。一八八一年我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王朝帝国①，可是现在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它无声无息地被冲刷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多个国家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之前，我像罪犯似地离开了它。我在这里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被烧成灰烬，但就是在这个国家里，我的书成了上百万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人，到处是陌生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朋友；就是我心中选择的故乡欧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残杀自相咬碎之后，在我心中已经消失。与我愿望相背，我在理性方面遭到最可怕的失败是编年史上野蛮时代最残暴者胜利的见证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从没有过，道德从如此的精神高度坠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这样说，绝非出于高傲，而是饱含着耻辱。从我刚萌发胡须到胡

①哈布斯堡王朝帝国，欧洲历史上的王朝，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1804—1867）、奥匈帝国（1867—1918）及其他一些小国。第一次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

须变白这段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转换和变化，远远超过以往平常十代人所经历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中每个人感到：变化有点太大了！居然，我一会儿攀登向上，一会儿节节衰落，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么不同啊！有时我认为，好像我的生活不仅有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许多种。因为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我提到"我的生活"时，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我还不时地感到，当我想到"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知道，是在巴思① 的那个家？还是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那个家？或是维也纳的我父母的家？当我说起"在我们这里"时，我不得不惶恐不安地提醒自己；对我的家乡人来说，我早已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像我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与他们亦无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还没有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给我越来越多的感觉，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同年轻的朋友谈话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时，我从他们惊异的发问中发现，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些已经成了历史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潜藏的内心本能认为他们的发问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拆除。甚至我在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能把如此庞大纷飞的事情压缩在我们这代人短促的时间里而感到惊奇，特别是我把这种生活——诚然充满极度难堪和不安——与祖辈的生活方式相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

①巴思，英格兰埃文郡的一个城市，茨威格一度居于此地。

们看到过什么？他们一生始终过着单调的生活，一种生活方式自始至终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动，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觉察不到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城市里，甚至一直住在老屋子里；至于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仅仅停留在报纸上，更不会来敲他们的房门。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定在什么地方发生战争，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仗，发生在遥远的边境上，听不到大炮声，半年之后就云消雾散，被人忘却，成为历史上干枯的一页；一成不变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点也不会重复，过去了的生活再也不会回来，也留不下任何痕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经受过数不清的苦难，比过去落到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纪的苦难还要多。以往，第一代人经历过革命，下一代碰上暴乱，第三代遭到战争，第四代遇到饥馑，第五代赶上国家经济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他们根本没碰到这些事。而今天，我们这些六十多岁和比我们略微大一点的人，什么事情没见过？没经历过？没遭受过？凡是能想象出来的灾难我们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苦难至今尚无尽头）。我自己就是两次人类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有两次不同战线上的经历，一次站在德国一边，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战前我享受过最高度的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战后却尝到了数世纪以来最大的不自由。别人赞美过我，也曾责备过我，我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经很富有，也曾贫穷过，

《约翰启示录》① 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② 全都闯入我的生活，这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暴政，以及疾病和政治流亡。我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③ 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个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欧洲文化的繁荣局面。我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想象不到的倒退到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时代中去，这是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在我们经历了若干世纪以后，又看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和集中营，看到了严刑拷打和大肆掠夺，以及对不设防城市的狂轰乱炸。所有这些兽行是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以前的人所未曾见过的，但愿后人不再容忍这些暴行的发生。但是，十分荒谬的事是，我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反而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在一处说话，一秒钟传遍全球，从而缩短了世界空间的距离；原子分裂，战胜了最险恶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们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绩。

为我们所经历的紧张、惊奇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次大变动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们这一代人，用不到逃避，也不能像前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技

---

①《约翰启示录》属《圣经·新约全书》。

②苍白大马系指战争、瘟疫、饥饿和死亡等。

③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的全称。

术（电报、电话），使我们与时代联系的更紧密了，一刻也脱离不了。比喻说，炸弹把上海的一些房子炸毁了，在受伤者还没有抬出房屋之前，消息就传到我们的房间里了。一千海里以外大洋发生的事，很快就印成图片，我们如亲临其境。这种不断地彼此沟通和互相参与，再也没有安全和保险的地方了。现在无一处可逃避的地方，没有可以用钱买来的安宁。命运之手无时无刻不在抓住我们，把我们拖进没完没了的戏弄之中。

另外，一个人必须永远地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让他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永远与同路人的命运联在一起，尽管他满腔愤怒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抗拒的把他卷进去。自始至终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或者可以说，被驱赶的、被追逐的人——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他们所经历的比前人多得多。就在今天，我们正处在旧的结束新的开始的转折关口。所以，我让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结束。这样做并非没有意图，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某一天标志着造就培养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见证给后代留下那个分崩离析时代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非常清楚，我是在一个极不利的条件下，在那个富有特征色彩的环境下写这些回忆的。在我写回忆时正值战争，客居异乡，缺乏帮我记忆的各种材料。我在旅馆房间里，我手头上没有样本、没有记录、也没有朋友的信简。我无处可以问询，因为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检查制度的阻碍。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好像数百年以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一样。所以，关于我过去的一切，仅仅凭我脑中的记忆。记忆以外的其他事情眼下找不到，或者已经

散失。我们这一代人学到了一种极好的技巧：对失去的绝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正是我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记住，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机理，而是知道整理和具有明智剔除差错的能力。人们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忘却的，这是人的内在本能早已决定了的。唯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才能为别人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的和选择的，不是我的回忆录，而是为他人所作的回忆，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目 录

前言 ……………………………………………………（1）

昨天的世界

安全世界 ……………………………………………（3）
上世纪的学校 ………………………………………（31）
萌发爱情 ……………………………………………（68）
大学生活 ……………………………………………（92）
永葆青春的城市——巴黎 …………………………（126）
我的崎岖道路 ………………………………………（162）
走出欧洲 ……………………………………………（181）
欧洲的光彩和阴暗 …………………………………（196）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初期 ………………………（219）
为崇高的情谊而奋斗 ………………………………（242）
在欧洲的心脏 ………………………………………（259）
回到祖国奥地利 ……………………………………（286）

又回到世界上 …………………………………… (308)
日落 …………………………………………… (329)
希特勒的开始 …………………………………… (362)
和平的濒死状态 ………………………………… (393)

[**附录**]

1. 绝命书 …………………………… (高中甫 译) (439)
2. 茨威格1936年用英文写的简历
……………………………………… (高中甫 译) (440)
3. 茨威格年表 …………………… (高中甫 编写) (442)

后 记 …………………………………………… (446)

昨天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

徐友敬　徐　红　王桂云　译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莎士比亚：《辛白林》

安全世界

我们在一片寂静安宁中长大成人，
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
无数波浪四面向我们击来，
我们对一切都兴趣盎然，
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
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
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
却被各种尘世的纷乱冲散。

——歌　德

如果我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亦即是我长大成人的那段时间作一个简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如此说：这是一个安全的黄金时代，是最确切不过了。我们那个几乎有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它的一切会天长地久地延续下去，国家本身就是这种延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公民的权

利，是由人民自由选举出的议会以书面形式确认的，每项义务都有严格的限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闪发光的金币形式流通的，因此它的价值是不会改变的。人人都知道，他有多少钱或者他挣多少钱，能干什么或者不准干什么，都有一定的规范、标准和法度。拥有财产的人，他可以精确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务员和军官从日历中可以找出他哪一年定职和升职或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确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吃住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钱，此外要留下一小笔，以防生病和意外之需。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给后代人最好最安全的家园；农场、商店则代代相传。就是襁褓中的婴儿，也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他的将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蓄金”。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所有的一切都紧紧依靠国家和那个至高无上的白发苍苍的皇帝。谁都知道，(也这样认为)一旦老皇帝死了，新皇继位，旧的一切原封不动地继续下去。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会有革命，会有颠覆政权的行动。看来一切暴力的激烈的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的。

这种安全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共同生活的理想。安全感使生活才具有价值，越来越多的阶层人民渴望从这份宝贵的财富中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最初只是那些有钱的人对这种优越社会感到欢欣鼓舞，以后逐渐扩展到平民百姓。这个安全的世纪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把房子保了火险和防盗险；为自己的耕地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作了意外事故和疾病的人身保险；为晚年买了终生养老金券；将一张保险单放在女儿摇篮上，作为将来的嫁妆费。最后，工人也组织起来了，为自己争得应得的工资和疾病保险；佣人们自己储蓄了养老保

险金，他们预先存入一笔安葬保险费。只有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无忧无虑的人，才能享受到眼前的好生活。

当时人们认为，人们的生活能够完全阻止厄运的侵入，这种感人的信念，是一种巨大的危险的自负，尽管他们对生活的态度谦虚又正派。在十九世纪，对自由的理想主义深信不移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一条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们用鄙视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满战争、饥馑和暴乱的年代，认为这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所致。而现在，所有的祸害和暴政似乎已经全部消灭，这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人们对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的坚定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的信仰力量。人们对“进步”的信念超过《圣经》，他们的神圣信念看来正被每天的科学技术的奇迹雄辩地证明着。事实上，在这个和平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普遍的繁荣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丰富多彩。街道夜晚通明，已不再是昏暗灯光，而是耀眼的电灯。从主要街道到市郊的沿街店铺灯火辉煌。用电话能与远方的人对话。乘坐的车辆已不是马车，速度就快得多啦。人们已实现了伊卡洛斯① 的梦想，在空中遨游。舒适的设备从富裕之家进入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从井里或河里汲水。炉灶生火简便多了，人人讲卫生，肮脏不再存在。人们进行体育锻炼以来，自己的身体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畸形者、甲状腺肿大者及残疾者在街上越来越少见。所有这些奇迹都是科学和“进步”的天使创造的。还有，社会也在不断

①伊卡洛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父亲一起关在克里特岛的迷宫里，为逃脱，两人身上装有用蜡贴制的羽毛翼膀。他忘了父亲的嘱咐，飞近太阳，蜡融化，坠海而死。

进步：每年都赋予个人新的权利，司法变得更加温和与人道；甚至那个最棘手的问题，即广大群众的贫困问题似乎不再难以解决。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有了选举权，从而可能合法地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学家和教授们竞相为无产阶级生活得健康和更加幸福而出谋划策——因此，如果不为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荣耀，不觉得每隔十年社会就向前迈一大步，那才怪呢？人们不相信还会有欧洲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世上还有鬼怪一样。我们的父辈坚信宽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诚地认为，各个国家及各个教派之间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将会在人们的友善中逐渐化解，从而整个人类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和平和安全。

被理想主义蒙蔽的那代人，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人类道德的迅速提高，这同我们今天把“安全”这个词，早就幻想着把它从词汇中抹掉一样，是十分可笑的。我们这一代人在这个新世纪里已经学会了对集体残暴行为的爆发不再感到惊奇，总有一天将会出现更残酷的暴行，所以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教育持怀疑态度。我们不能不承认弗洛伊德①的正确，他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层纸，随时都会被邪恶力量冲破的。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逐渐习惯这个没有立足点、没有权利、没有自由和没有安全的世界。我们早已为了自己的生存摒弃了父辈们的坚强信念，他们认为人道主义会持续不断地飞速提高。一场灾难使我们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们这些有深刻教训的人看来，轻率的乐观主义是十分陈腐的。尽管这只是一种幻想，却是我们父辈为之献身

①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的，这比那些空洞口号更有人性，更有内容。时至今日我内心深处仍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幻想，虽然我对它已充分认清和完全失望。一个人童年时耳濡目染，时代气息已溶入他的血液，是难以磨灭的。不管，不管每天在我耳边鼓噪些什么，不管我及我的众多同代人遭受过什么侮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否认青年时代的信仰：总有一天会好起来，尽管来之不易。今天，我们怀着心神不宁和破碎了的心情，像个半盲人似在恐怖的深渊中四处摸索，我依然能从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昔日星辰，用这种继承下来的信念，认为这种倒退只是“前进”过程中的一个间歇，以此来安慰自己。

今天，巨大的风暴把世界击得粉碎，我才完全明白了，安全世界不过是梦幻中的宫殿。我的父母就是住在这个宫殿里，就像住在一幢石头房子里一样。从来没有什么风暴或者是一阵强烈的穿堂风闯入他们温暖的舒适的生活；当然他们具备防风雨的特殊手段：他们是有钱人，他们是逐渐发迹的，已经变成富豪。但在他们那个时代抵挡风雨的全靠窗户和墙壁。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属于所说的那种典型的“上流犹太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而所得到的报答却是被彻底消灭。我在这里叙述我父母安闲自在和无声无息的生活，其实讲的并非个人的私事，因为在那个重视一切价值保障的世纪里，像我父母这样的家庭在维也纳有一万或二万家之多。

我父亲的祖籍在摩拉维亚①。在那个方圆不大的乡村住着犹太人社团。他们于当地的农民和小市民相处得非常融洽，所

①摩拉维亚，捷克摩拉瓦河一带的旧名，当时属奥地利。

以他们完全没有压抑心理，也没有东方加里西亚① 犹太人随时都出现的急躁。由于他们生活在农村，个个体魄健壮，走起路来迈着稳健、从容不迫的步伐，像农民穿越田野一般。他们早就从正统的教派分离出来，成为“进步”这个时代宗教的狂热追随者。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时期，他们选出了自己最尊敬的议员进入国会。当他们从自己的故乡迁居到维也纳以后，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适应了较高的文化生活。他们的发迹是和时代的普遍繁荣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经销售过手工纺织品。上个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的工业开始发展。从英国进口织布机和纺纱机，由于合理的机械化生产，使纺织品的价格大大低于手工业品的价格。犹太人具备天才的商业洞察力和全球的眼光，认识到率先在奥地利实行工业化生产的重要性。唯有工业化才能获得厚利。他们以最少的资金最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些临时搭造的工厂，先是以水力作动力。这些工厂以后逐渐发展成控制整个奥地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强大的波希米亚纺织工业中心。如果说，我的祖父是一个经营成品的中间贸易商的早期典型代表，那么我父亲已决定跨入一个新时代。他三十岁时在波希米亚北部创办了一个小型的织布作坊，经过多年的细心经营，它已逐渐发展成一家规模相当大的企业。

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十分诱人，可我父亲依然采取那种小心谨慎的扩展方式，这完全是那个时代的观念。再说，这也非常符合我父亲那种克制而不贪婪的性格。他坚持那个时代的信条：“稳妥第一”。他觉得依靠自己的资本“扎扎实实”——那

①加里西亚，旧地名，在现在的波兰东南。

个时代最喜欢说这个词——办起来的企业，比利用银行贷款或实物抵押建成的企业更伟大。在他一生之中，从未签发过一张债券，也从未签发过一张期票。他立户的银行，毫无疑问是最可靠的信贷银行：罗斯柴尔德银行，该银行始终处在贷方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骄傲。他从来就讨厌投机生意，哪怕有一点冒险他也不干。他一生从来没有参与过一笔生疏的交易。当他渐渐有钱和越来越有钱时，他从不把这些归功于大胆的投机，也不归功于他眼光的长远，而是归功于自己处的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小心谨慎的作法：始终只用收入的极小部分作为日常开销，把逐年递增的巨额收入投入经营，扩大再生产。我父亲像他同辈中大多数人一样，如果看到一个人把收入的一半毫无顾及的花光，而不顾安全时代常说的一句话——"为将来想一想"——这样的人肯定被看作是一个靠不住的败家子。其实，对一个有钱人来说，这种变利为本不断积累使自己富起来的方法，在经济腾飞的时代仅仅是一种保守的生财之道，因为当时国家还没有想到从巨额收益中多征收百分之几的税。再者，国家的有价证券和工业股票在当时也能带来很高的利息。不论怎么说，这种保守的生财之道也是值得称赞的。当时，通货膨胀时代还没有到来，克勤克俭的人家容易遭偷盗，规矩正派的人会遇到诈骗。可是，恰恰是最有耐心的人和不搞投机的人得利最多。我的父亲由于顺应了他那个时代的一般规律，在他五十岁时，纵然用国际的标准来衡量，也称得上是一位巨富了。但是，我们家庭生活的开销，与财产骤增相比，依然是十分节俭的。我们只是逐渐买点方便生活用品；我们从一幢较小的住宅搬到一所较大的寓所；只是在春天，到了下午才租一辆出租马车。我们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卧铺车厢，我父亲五十岁时才享受了一次

豪华生活：同母亲乘车去尼斯① 度过冬天的一个月。总之，我们家持家的基本原则始终不变：克勤克俭，绝不挥霍，绝不挪用款项。我父亲成为百万富翁以来，从未吸过一支进口雪茄，只吸普通国产的特拉布克牌雪茄，就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② 只吸廉价的弗吉尼亚③雪茄一样。他玩牌时，只下很少的赌注。他坚定不移地坚持他的克制作风，坚持过一种舒适又不惹人注意的平静生活。虽然他比他大多数同行体面得多，有教养的多——他钢琴弹得出色，书法清秀，会讲法语和英语——却坚决拒绝任何荣誉和荣誉职位。他一生中从未追逐或接受任何头衔和地位，而像他这样的大工业家理应获得头衔和地位。他从未向别人求过什么，所以他从未向别人说过“请求您”或“多多道谢”之类的话。他觉得这种隐藏在内心的自豪感，比显露出来更加重要。

的确，每个人的一生总会出现一段和父亲的本性相同的时期。我父亲不声不响又不愿抛头露面的生活个性，现在开始影响我，一年比一年明显。在职业上，我同父亲迥然不同，我的职业不能不宣扬自己的名字，不能不抛头露面。我同父亲一样，内心里的自豪促使我拒绝任何形式上的荣誉。我从未接受过一枚勋章、一个头衔或任何一个学会会长职位；我从未担当过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一个评奖委员会的委员；甚至我觉得，坐在丰盛的宴会桌旁是折磨自己，一想到要同人攀谈或向别人祝酒，还没等说出一句话，我的嘴唇就先感到干了。我知道，在

①尼斯，法国东南部城市和港口，法国疗养胜地和旅游中心。

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19 世纪中叶奥地利帝国皇帝。

③弗吉尼亚，美国东部的州，盛产烟草。

世界上延滞和拘束是多么不合乎时宜，只有耍手段或者逃脱现实才能保全自己，正如歌德老人的名言："勋章和头衔可免于在窘境中遭冲击"。但是，父亲遗传给我的那种内心的自豪，我无法违抗，这也许是我唯一的可靠的财产，我之所以今天内心里还感到自由，应当归功于父亲留给我的宝贵遗产。

我的母亲，婚前的姓叫布雷陶尔，是另一种出身，出身在一个国际性的大家族。她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安科纳，所以意大利语和德语她从小就会说。每当她同我的外祖母或者同她姐妹说些不让佣人知道的话时，就说意大利语。我从孩提时就十分熟悉意大利式烩饭和当时还十分稀罕的洋蓟，还有许多其他的南方菜。所以，我以后到意大利去，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过，我母亲一家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有意成为国际性的大家族；布雷陶尔家族最早开银行——他们以犹太大银行世家① 为榜样，但是规模小得多——他们很早就从瑞士边境上一个叫霍海内姆斯的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迁到圣加伦，另一部分迁到维也纳和巴黎，我外祖父到了意大利，我的一位舅舅到了纽约。这种国际性的联系使这个家族更加体面，视野更加开阔，从而带来了整个家族的自豪感。在这个家族里，不再有小商人、掮客等，而是银行家、经理、教授、律师和医生。每人都会说几国话。如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巴黎姨妈家的餐桌上，我看到他们从一种语言轻松自如地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是一个谨慎"自重"的家族，每逢一个穷亲戚家的姑娘要出嫁，这个家族就筹措给她准备一份可观的嫁妆，目的仅仅是防止姑

①犹太大银行世家，指罗斯柴尔德家族。

娘“低就”成婚。我父亲是一个大工业家，虽然备受尊敬，但是我母亲从不允许我父亲的亲戚和她的亲戚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的结合极其美满幸福。这种出身“名贵”的自豪，在所有姓布雷陶尔的人身上根深蒂固。若干年以后，他们中间的一员对我表示特殊的好感，并怀着优越感对我说：“你才是真正的布雷陶尔的后代呢！”他这句确认的话似乎是想说：“你投胎投得准。”

还有一类贵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发迹的犹太家族就是这一类。我和我的兄弟从童年起，对他们的作为一会儿感到有趣，一会儿感到讨厌。我们老听他们说，这些人是“高雅”的人，那些人是“粗鲁”的人；对每个朋友都要审查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上流”，甚至对他的家庭成员和亲戚的出身以及经济状况都要详细调查。一直把人分成等级的议论成了家庭和社交中的主要话题，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觉得极可笑，认为是故作高雅的表现，因为犹太家族之间出现的贫富差别，不过是近五十年或近一百年的事，犹太家族都是在那个时候先后从一个犹太集中区迁移出来的。一直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上流”家庭的概念在我们男孩看来，完全是假贵族的一种装模作样的闹剧造出来的，体现了犹太人的精神实质上最秘密的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通常认为发财致富是犹太人根本的、典型的生活目的。没有比这个看法更错误的了。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不过是阶梯，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不是他们的核心目标。犹太人真正的愿望，他们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才智，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精神高于物质，他们认为这是至理名言，这反映了整个犹太氏族——其中包括正统的犹太人的——优点和弱点，比喻说，一个虔诚信徒，一个研究圣经的学者，他们的

身份在犹太人看来，要比一个富翁高一千倍，就是最有钱的富豪宁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穷得像乞丐似的知识者为妻，也不嫁给一个有钱的商人。对知识的敬重，在犹太各阶层中都是一样的。就连扛着背包、冒着雨淋顶着日晒又拖着双腿沿街叫卖的小贩，也愿意付出最大的牺牲让儿子去上大学。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一人算得上有知识的，又当了教授、学者或音乐家，那么，他就把这种荣誉和头衔归功于全家，好像他通过他的成就使全家都贵族化了。不言而喻，在犹太人中间，他们竭力防止自己成为一个道德不可靠、令人讨厌，小里小气、把一切都看作交易、只会做生意而无知识的人；而是努力争取跻身于较纯洁的、不计较金钱的知识者范围中。说得直率一点，好像把自己和整个犹太民族从金钱的灾祸中解救出来似的。因此，一个犹太家族往往经过两代最多三代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就枯竭了。而恰恰在家族鼎盛时期更出现了不愿接受父辈的银行、工厂及巨大规模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罗·罗斯柴尔德勋爵① 成了鸟类学家，华伯② 成了艺术史家，卡西德尔③ 成了哲学家，赛松④ 成了诗人，这都不是个别现象。他们想摆脱那种只知冷酷地赚钱的犹太人小天地，成了他们不外露的共同渴望。通过进入知识界，从而使自己摆脱纯粹犹太人的狭隘气质，获得普遍的人性。换言之，一个“名门”世家的涵义远远高于这个称呼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犹太“名门”家族

①罗·罗斯柴尔德，是犹太族大银行家罗斯柴乐德家族的后裔，在英国封为男爵，并成为议员，著有动物学论文。

②艾·华伯，系大银行家华伯家族的后裔，是德国艺术史家。

③艾·卡西雷尔，德国哲学家。

④西·赛松，是西班牙犹太巨富的后裔。

不仅适应一种文化，而且多半要兼容其他文化，以便使自己摆脱或开始摆脱犹太社团留给他们的一切缺陷、狭隘和小气。后来由于犹太族从事知识分子职业的人猛增，在犹太人中占很大比重，这种进入知识界的现象，也像从前重视物质利益一样，也给犹太民族带来了灾难。这种永远自相矛盾的现象，大概是犹太人命中注定的吧。

在欧洲，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像维也纳那样热衷于追求文化。正因为奥地利君主国数百年以来既无政治野心又无军事行动，稳定带来了全面繁荣，全面繁荣必然引起对艺术的最强烈的追求，这就是奥地利民族的自豪感。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欧洲那段时间，那些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地区，像德意志、意大利、弗兰德①、瓦龙② 都已衰落，唯有维也纳闪耀着古老的光辉，它是王朝的宝都，是千年传统的保护神，罗马人为这座城市建造了第一座石头城墙，对防御野蛮人、保护拉丁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一千年以后，奥斯曼③ 人西侵，摧毁了这座城墙。尼伯龙根人④ 也到过这里。这里出现了七位不朽的音乐大师——格鲁克⑤、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他们在这里生活过，从这里向全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欧洲的各种文化潮流都聚集在这里；在宫廷里、在贵族中、在民间，奥地利德语的文化传统同斯拉夫的、匈牙利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法兰西和弗兰德的文化有着血肉的联系。这

①弗兰德，法国和比利时的北海沿海地区。

②瓦龙，比利时南部瓦龙人住的地区。

③奥斯曼人，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

④尼伯龙根人，原出自德国传说，这里指德国南部的人。

⑤格鲁克（1714—1787），德国作曲家。从1750年卜居维也纳。

座音乐之都的真正天才表现在能把一切有巨大差异的文化熔为一炉，成为一种新的独特的奥地利文化、维也纳文化。这座城市具有博采众长的欲望，对那些特殊的事物特别敏感，它吸引各种类型的人才到自己身边，逐渐使他们融洽相处。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生活，使人备感温暖。这个城市的每个市民在不知不觉中被培养成超民族主义者、世界主义者和世界公民。

这种兼收并蓄的艺术，犹如音乐上的柔和的过渡板，你从该城市各类建筑物的外貌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经过数百年缓慢发展，从内向外有计划的扩展后，现在已是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城内居民的一切消费和各方面的需要，早已配套成龙供给。维也纳之大还没有大到像伦敦、纽约那样脱离大自然的地步。维也纳边缘的排排房屋，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辽阔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园和田野之中，有的分布在树木葱郁的阿尔卑斯山余脉之端的缓缓的山岗上。人们几乎觉察不到哪里是自然景色，哪里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从市郊走进市区，你会看到城市的发展轨迹，像树干的年轮那样层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旧址上，现在是一条环形大道，大道上的华丽楼阁环抱着城市最中间，最珍贵的核心，这便是朝廷和贵族的古老宫殿，它们在诉说着过去的沉重历史。贝多芬曾在这里的利希诺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过；海顿曾在这里的埃斯特哈齐侯爵府上做过客，当时，海顿的《创世纪》在这里那所古老的大学① 首场演出。维也纳最著名的胡浮堡宫几代皇帝在这里居住；拿破仑住过香布伦宫②。基督教

①古老大学，系指维也纳大学。

②香布伦宫，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极富丽堂皇。

团的诸侯们联合起来，在斯特凡大教堂① 里下跪，为欧洲从土耳其的人手中解救出来而祈祷谢恩。在那所大学的校院里，有无数科学名人在任教。在这些宫殿之间，一些新派建筑高傲地屹立着，灯火辉煌的商店和光彩夺目的林荫大道组成一幅壮美的图画。旧的建筑物并不抱怨新的建筑物，就像敲下来的石头并不抱怨岿然不动的大自然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绝妙无比的，它好客地接纳任何外国人，愿意为他们奉献一切。这里的气氛是那么轻松愉快，就像巴黎一样到处充满快乐，不过在这里能享受到大自然的气息。所以谁都知道，维也纳是一座享乐者的城市。但是，所谓的文化难道不是用艺术和爱情编织的精品给粗鲁的物质生活蒙上一层最美好、最温情和最精纯的色彩吗？享受美食，喝一瓶上等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鲜啤酒，品尝精美的甜食和大蛋糕，在这座成市里算是一般享受。从事音乐演奏、跳舞、演戏、社交活动、讲究仪表风度，才是这里的一种特殊艺术。不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头等重要的事，不是军事，不是政治，不是商业，而是文化生活。一个普通的维也纳市民，每天早上读报时，第一眼看的不是国会的辩论或世界上发生的大事，而是皇家剧院上演的节目，这家剧院在公众生活中的地位，是其他城市几乎不能比拟的。因为皇家剧院亦称城堡剧院②，对维也纳人和奥地利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演员在上面演戏的舞台，而是反映大世界的小天地，从它五光十色的反射光中可以看到社会本身，它是真正的唯一的具有高尚

①斯特凡大教堂，指 1137 年建的著名的圣斯特凡大教堂。

②维也纳城堡剧院，又译皇家剧院，建于 19 世纪，是维也纳的国家剧院。

情趣的“宫廷侍臣”。观众从皇家演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应该怎样穿戴，走进房间的姿态，怎样谈吐，一个情操高尚的人该说哪些言词，不该说哪些。舞台不仅是娱乐的场所，而是一本教人正确发音，学习优雅风度的有声有色的教科书。那些不太光顾皇家剧院的人，也好像头上有了神圣光圈似的，散发出令人敬重的光辉。总理、大臣和豪富巨头在维也纳的大街上四处行走，行人不会回头仰望；可是，一位皇家男演员或一位歌剧女演员在街上走，所有的女售货员和马车夫都认识他们。当时我们这些男孩子看到一个演员（照片和签名我们都收集）在我们身边走，我们洋洋得意地同他说个没完。这种近乎宗教式的个人崇拜不仅是青年学生，连周围的群众都影响了。索嫩塔尔① 的理发师，约瑟夫·凯恩茨② 的马车夫，都是观众暗暗羡慕的体面人物。年轻的公子哥以穿同演员一样的衣服为荣。一位著名演员诞辰聚会或葬礼能压倒一切政治大事。自己的作品能在皇家剧院上演，这是维也纳作家梦寐以求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他从此一生高贵，享受一系列荣誉；他一生不用再买戏票，他会收到参加一切首演的请柬；也有可能成为某个皇室成员的宾客。我还记得我亲身受到一次隆重的接待。一天的上午，皇家剧院的经理请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先来一番祝贺之后，郑重地向我说，我的剧本皇家剧院已经接受；我当晚回家时，在自己的房间里看见他留给我的名片，他正式回访了我——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我本人，作为皇家剧院的作者，一举成了一位“上流人物”；剧院经理对待我像对待皇家学院院长那样。皇

①索嫩塔尔，著名奥地利男演员。

②约瑟夫·凯恩茨，著名奥地利男演员。

家剧院里发生的每件事，好像都和大家有关，甚至同一个与剧院毫不相干的人也有关系。我想起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我家的厨娘饱含眼泪跌跌撞撞冲进房间，向我们说，她刚听人说，夏洛蒂·沃尔特（皇家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目不识丁的厨娘这么悲伤使我们都深感意外，因为她从来没去过那高贵的皇家剧院，在舞台上或日常生活中她从来没见到过她。但是，在维也纳，一位全国有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大家的，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牵动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厨娘的心。任何一位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艺术家去世，顿时就变成全国哀悼。当曾经首次上演过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的“老”城堡剧院拆毁的时候，维也纳整个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大厅里，前幕刚落下，人们就冲到舞台上，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地板的碎片——他们知道艺术家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带回家去，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几十年以后，我还看到这些木片装在精致的小匣里，竟有数十户人家这样做，就像教堂里收藏神圣的十字架碎片一样。当那座伯森多尔夫音乐厅拆除时，我家的举动也不见得理智。这座小型音乐厅是专供演奏室内音乐用的，是一座平平常常毫无艺术价值的建筑物，原本是利希滕斯坦爵士的一所早期的骑马术学校；为适应演奏音乐的需要，进行了改建，四壁镶上了木板；虽然它并不华丽，却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样很有价值，是音乐爱好者的一块圣地，因为肖邦、勃拉姆斯、李斯特、鲁宾斯坦①在这里演出过，许多著名的四重奏在这里首场演出。而现在却为一座新建筑物让路，我们这些在这里曾度过美好时光的人怎

①鲁宾斯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

么也想不通。我在这里度过最后难忘的几小时。这次，红玫瑰四重奏小组在这里演奏贝多芬的乐曲特别精彩，当最后的旋律渐渐消逝后，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我们鼓掌、欢呼，有一些妇女激动得哭起来，谁也不愿相信是最后的告别演出。大厅的灯灭了，为把“我”们赶走，但是四五百狂热的歌迷没有一个人离开座位；我们在这里呆上半小时、一小时，好像我们这一行动会把这座神圣的大厅拯救下来似的。我们是大学生的时候，要把贝多芬的临终房子拆掉，我们是怎样的用请愿书、游行、写文章等方法进行斗争的啊！在维也纳，每座有历史意义的房子被拆除时，就像抽了我们的一条筋似的。

这种对艺术尤其是对戏剧艺术的狂热，遍及维也纳社会各界。维也纳本身就是一座社会阶层分明而互相之间十分融洽相处的城市，已有百年历史传统——如我以上所述。社会舆论始终属皇家控制。皇家城堡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心，而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超民族的文化中心。城堡四周是奥地利、波兰、捷克、匈牙利大贵族的宫殿，可以说它们构成第二道围墙。在这道围墙以外则是那些“社会名流”，诸如小贵族、高级官员、大工业家、“名门世家”的府第；再向外是小市民阶层和无产阶级。每个阶层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区域。大贵族住在城市核心区自己的宫殿里；外交使团住在第三区；工业家和商界人士住在环城大道附近；小资产阶级住在第二区至第九区之内；无产阶级住在最外层。但所有的人在皇家剧院和盛大节日中可以互相交往。在普拉特绿化区举行鲜花彩车游行时，十万人热情地向坐在马车里的“万名上流人士”山呼三次。在维也纳，凡事都可成为庆祝的理由，如宗教游行、基督圣体节、军事检阅、“皇家音乐节”等盛大节日，就把平日的音乐会

或彩旗游行挤掉了。就是出殡，也是一件盛事。每个维也纳人都讲究习俗，重视“壮观的葬礼”：豪华壮观排场，送葬人众多。维也纳某个人物辞世，甚至成为维也纳人大饱眼福的机会。人们对声响色彩的感觉，对表演生活、反映生活的兴趣，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现实中，维也纳全城的人都是一致的。

维也纳人对“戏剧的偏爱”，如果按大多数戏迷的生活条件来说，有时可谓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与我们刚强的邻国德国相比，我们奥地利人淡漠政治，经济落后，其中部分原因是我们过于讲究享受。不过，这种对艺术过分的重视倒是我们的长处。因为，我们对每一种艺术都抱着崇敬的态度，经过几世纪的艺术熏陶，才有无与伦比的鉴赏力，而正因如此，最终才使我们在一切文化领域中达到超群的水平。艺术家只有在备受推崇、备受尊重的地方才能感到最舒畅最受鼓舞；艺术只有在全民族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时才能达到顶峰——文艺复兴就是有力的佐证。当时的佛罗伦萨和罗马吸引了大批画家，并培养出数个巨匠；每个画家都感到必须面对全体市民和其他画家，在市民的鉴赏言论中，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不断超越自己的水平。同样，维也纳的音乐家和演员们都清楚自己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不论在维也纳歌剧院还是在皇家剧院，来不得半点马虎。任何一个错音符都会立刻被发现，一旦进入合声部的时间不合拍或者音符略短，都会立刻受到指责。这种监督不仅仅是首演时的专业评论家，而且也是当场观众的监督。他们的耳朵非常灵敏，通过不断的比较使他们的听觉越来越敏感。维也纳的政治、行政管理方面顺理成章，社会风纪已成了人们的习惯，没人再去想它，所以在这些方面出现点什么“纰漏”人们都会包涵，有点违反常规也能宽容谅解。但在另一方面，在艺术方面出现了

差错，可绝不容忍，因为这关系到全城的荣誉。因此，要求每位歌唱家、演员、音乐家必须竭尽全力，不然就会被淘汰。能够在维也纳成为明星已属不易，要始终保持明星的地位实在更难；任何松懈都不可原谅。在维也纳的每位艺术家都清楚这种长期的、严格的监督，促使他们锲而不舍，才使他们的艺术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我们从年轻时候起就习惯于在平时用严格，甚至苛刻的标准要求艺术家的每一场演出。一个当年非常熟悉古斯塔夫·马勒尔①领导的歌剧里铁的纪律细节的人和非常熟知把交响乐团乐师调动起来自觉熟练地演奏的人，在今天也很难对一次戏剧或音乐会的演出感到十分满意。这样也使我们学会了对自己的每件艺术作品也要严格要求。当时的水平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世界上能培养出一代一代的艺术家，才会有高水平的作品，除了维也纳，能达到这么高水平的城市世上没有几个。人民大众的知识和情绪有时能节制，有时也迸发，即便是坐在“酒馆”里的小市民也会要求乐队演奏出高水平的音乐，如同要求掌柜的给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一样。就连普拉特区周围的居民们也都清楚地知道，哪家的军乐队演奏得“最带劲”，不论是“德国的音乐大师”还是匈牙利人；好像住在维也纳的人从空气中就能获得音乐节奏感似的。如同我们这些作家们在一篇特别精致的散文中表现出优美的音乐性一样，而其他人则在社交场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满温良恭俭让的精神。在“上流”社会里，出现一个没有艺术感和不尚礼仪的维也纳人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在下层社会，一个最贫穷的人也有一种对美的本能的要求，

①古斯塔夫·马勒尔，奥地利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著名指挥家。1897—1907 担任维也纳皇家歌剧院院长。

这种本能是由于自然景色、人生的乐趣对他的生活长期熏陶造成的。对文化不热爱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维也纳人；同时，不会享受安逸舒适生活和审美意识的，也不是一个地道的维也纳人。

对犹太人来说，适应居住国民族的环境，适应自己居住的国家，这不仅是一种对外的保护措施，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需要。他们要求有自己的国家，渴望安宁、养息、安全，渴望消除外来陌生感觉，这就促使他们自己与周围环境存在的文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除了十五世纪西班牙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比奥地利做得更出色更有成效。自从犹太人在这座京城定居二百多年以来，他们遇到的是轻松自在、喜欢和睦共处的人民，虽然看起来这些人有点放荡不拘小节，可是内心里饱藏着追求精神生活和追求美的价值的强烈本能；同样，犹太人认为追求美的价值对自己也十分重要。犹太人在维也纳确实遇到了不少机会，其中他们在这里找到一项个人的任务。上个世纪的奥地利艺术曾一度失去了自己的传统保护人和赞助者：皇室和贵族。十八世纪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① 让格鲁克来指导她女儿的音乐；约瑟夫二世② 作为一个行家同莫扎特讨论过莫扎特的歌剧；利奥波德二世③ 自己就作过曲。但后来的皇帝弗朗茨二世④ 和弗迪南一世⑤ 对艺术丝毫没有兴趣了，而皇帝弗

①玛丽亚·特蕾西亚，奥地利女皇，1745—1765 年在位。

②约瑟夫二世，奥地利皇帝，1765—1790 年在位。

③利奥波德二世，奥地利皇帝，1790—1792 年在位。

④弗朗茨二世，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1792—1806 年在位，1804—1835 年为奥地利皇帝。

⑤弗迪南一世，奥地利皇帝，1835—1848 年在位。

朗茨·约瑟夫在他八十年的生涯中除了阅读军队的花名册以外，就没有读过一本书或者手中仅仅拿着那本花名册，他甚至流露出对音乐的反感。同样，那些大贵族也放弃了赞助。以前埃斯特哈齐侯爵请海顿到家并奉为宾客；洛布科维茨侯爵、金斯基家族、瓦尔德施泰因家族间竞相争取在自己的府第首演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图恩还恳求这位伟大的精灵——贝多芬——不要把三幕歌剧《菲岱里奥》从歌剧院的保留节目中撤销。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就是瓦格纳、勃拉姆斯、约翰·施特劳斯，还有胡戈·沃尔夫①，也得不到他们的半点资助。于是市民阶层②为了把交响音乐会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为了让画家和雕塑家能够维持生计，他们挺身而出代替皇室贵族支持艺术家们。犹太市民阶层站在维护维也纳古老灿烂文化荣光的最前列，这是犹太人的自豪和远大抱负。他们一向热爱这座城市，一心一意地住在这里，但是他们觉得，只有热爱维也纳艺术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维也纳人，才不愧于这片土地。本来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产生的影响极其微小。皇室的显赫使个人的私有财富黯然失色。领导国家的高位是世袭的，外交界由贵族把持，军队和高级官吏的职务均由名门世家掌握；犹太人从未有过想钻进这个特权阶层的奢望，他们服服帖帖地尊重这种传统的特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些事，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比喻说，我父亲一生都不愿意到扎赫尔饭店去吃饭，并不是为了节约——它比其他的大饭店价格稍微高一点——而是有一股敬而远之的想法。他觉得，和施瓦岑贝格亲王或是和洛

①胡戈·沃尔夫（1860—1903），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②市民阶层，是指城市里除贵族和僧侣外的一切居民。

布科维茨侯爵邻桌是很难堪的，也是不得体的。在维也纳，唯有对艺术，大家是平等的，都有相同的权利；爱护艺术是大家的共同义务。犹太族资产阶级用资助和促进的方式，对维也纳文化所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他们是真正的观众，充满剧院和音乐厅的观众购买图书和绘画，参观各种展览；他们受传统束缚较少，思想活跃，各领域到处出现新事物，他们是新事物的促进者和先驱战士。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艺术品收藏都经他们之手；几乎所有的艺术试验通过他们才得以实现。如果没有犹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单纯依靠皇室、贵族和那些热衷于赛马打猎而不愿促进艺术进步信奉基督教的百万富翁，那么维也纳在艺术方面就会落后于柏林，就像奥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后于德国一样。谁想在维也纳做出点新成绩，外来客人想在维也纳与别人友好相处或想找到知音，那就要依赖犹太资产阶级。记得反犹太主义的时期，仅有的一次尝试，建了一座所谓的“民族剧院”，可剧院找不到编剧，找不到演员，更没有观众，不到几个月，“民族剧院”可鄙地垮台了。恰恰是这个实例第一次公开揭示出内情：被世界人民称颂的十九世纪维也纳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维也纳犹太人促成和哺育的，甚至是他们自己创造的。

正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年，维也纳犹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异常活跃，这时的西班牙犹太人在艺术方面正面临着可悲的没落。诚然，犹太人创造的文化不能以特有的犹太人原来的文化形式出现，又是以与奥地利文化交融的形式出现，体现了奥地利及维也纳的特点——这是一个奇迹。在音乐方面，戈德马克①、古

①戈德马克（1830—1915），奥地利作曲家，著有多部歌剧和交响乐，祖籍奥地利。

斯塔夫·马勒尔和舍柏格[①]成了国际性的人物；奥斯卡·施特劳斯、莱奥·法尔[②]、卡尔曼[③]使圆舞曲和轻歌剧的传统获得新的繁荣。霍夫曼斯塔尔[④]、阿图尔·施尼茨勒[⑤]、贝尔-霍夫曼[⑥]、彼得·阿尔滕贝格[⑦]等人使维也纳文学达到欧洲水平。这是格里尔帕策[⑧]和施蒂弗特[⑨]所代表的维也纳文学从未达到过的。索嫩塔尔、马克斯·赖恩哈德[⑩]使这座戏剧城再次誉满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学界名流使早已闻名的维也纳大学举世瞩目——这些身为作家、学者、艺术名流、画家、导演、演员、建筑师和新闻工作者的犹太人，在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中享有无可争辩的崇高地位。因为他们热爱这座城市，所以他们能与其他维也纳人融合在一起，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他们认为，为奥地利服务是一种光荣，也是一种幸福。他们觉得，为自己的奥地利做贡献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确，应该实事求是地再次指出这一点：当今美洲、欧洲在音乐、文学、戏剧和工艺美术

---

①舍柏格（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十二音体系写作法创始人。

②莱奥·法尔（1873—1925），奥地利新轻歌剧的重要作曲家。

③埃梅里希·卡尔曼（1882—1953），匈牙利著名轻歌剧作曲家。

④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著名诗人·戏剧家。

⑤阿图尔·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著名剧作家，小说家。

⑥夏里德·贝尔-霍夫曼（1866—1949），奥地利著名作家，犹太复国主义的参加者。

⑦彼得·阿尔滕贝格（1859—1919），奥地利著名作家。

⑧弗朗茨·格里尔帕策（1791—1872），奥地利著名剧作家。

⑨阿达尔贝尔特·施蒂弗特（1805—1868），奥地利著名小说家。

⑩马克斯·赖恩哈德（1873—1943），奥地利著名导演，1900年任柏林德意志剧院院长。

诸多方面的发展，都受到奥地利文化的滋养和熏陶，而奥地利文化，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相当一部分都是维也纳犹太人创造的；犹太人在与当地人融合的过程中，达到千年以来追求精神的最高点。几百年以来，犹太人的文化发展本无目标，在这里与逐渐形成的传统相结合在一起，产生了新的生气和蓬勃的活力，使旧的传统也获得了新的生命，焕发出新的青春。只是最近几十年来，这座城市强调民族化和地方化的作法，给维也纳带来了极大的坏处。因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和文化是多种要素的融合体，所以其精神和文化完全是超民族的。维也纳的天才——特别在音乐方面——从来就是把各民族的对立因素及各种语言的对立因素融合在一起；维也纳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合成体。凡是在维也纳工作过和生活过的人，都觉得自己摆脱了狭隘和偏见。不会有任何地方比在维也纳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学会把欧洲共同联合起来的思想作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并加以热爱，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感谢早在马可·奥勒留① 时代就维护着的罗马精神，即包罗一切的精神。

在古老的维也纳，人们生活得好，生活得轻松愉快，生活得无忧无虑。北方的德国人带着轻微的恼怒和藐视的眼光望着我们这些住在多瑙河之滨的邻居。这些邻居并不“能干”，并没有严格的纪律，只要享受生活：吃得好，在节日里和剧院里寻快乐，促使了音乐向最高处发展。维也纳人很不喜欢德国人给其他民族的生活带来无比痛苦和彻底破坏民族生存的“能干”；也不喜欢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野心和追逐。在维也纳人们喜

①马可·奥勒留（121—180），161—180年古罗马皇帝。

欢愉快的聊天，习惯于和平共处，每个毫无嫉妒的人和那些与人为善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和睦相处，平安无事。穷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国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在维也纳都能和平相处，尽管偶尔出现互相嘲弄。就是出现政治和社会运动，也不带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已浸入时代的血液循环中。以前的奥地利，人们互相攻击时，尚存豪爽侠气。那些国会议员在报纸上互相责骂，在经过西塞罗① 式长篇大论之后，仍会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讲话时以“你”相称。就是反犹太主义政党党魁卢埃格尔② 当维也纳市长期间，他与别人私人来往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个人必须承认，我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上中学还是上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没有遇到一点点麻烦和歧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的仇恨，还不常见报；还没有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彻底分类；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情绪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激烈，令人厌恶。个人的所作所为是自由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今天的人把宽容视为一种软弱，而那时的人把它看作是一种道德力量。

我出生和受教育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激情纷纭的世纪。这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等还没有把人的生活节奏提高到一个新的速度。岁月和年龄也没有影响到另外一种速度，人们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今天我尽力回想我童年时那些成年人

①西塞罗（公元前 106—前 43），古罗马政治家，擅长演说。

②卡尔·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会党人，反犹太主义者，1897—1910 年任维也纳市长。

的形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些人过早的发福了。我父亲、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师、商店的营业员、乐谱架旁的交响乐演奏员，他们刚四十岁，就成了大腹便便、受人“尊敬”的人。他们步履艰难，谈吐斯文，谈话时用手捋着他那注意保养的、开始灰白的胡须。而灰白的头发仅仅是庄严的一种新标志；一个“稳重”的男子需要有意识地避免青年人那种不太得体的举止和自负的神气。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我孩提时代曾看到过父亲急匆匆地上下楼，或者是其他的慌慌张张的举动，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呢。在那个时候，匆忙不只被看作不礼貌，况且在行动中也没有必要这样，因为市民阶层生活在稳定的世界里，生活有保障，行动上有措施，从来没发生突然事件，所以没有必要匆忙。即使外面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滋养得好的“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英布战争①、日俄战争②、就是邻近的巴尔干战争③，对我父母的生活毫无任何影响。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随便一扫而过。事情就是这

①英布战争，也叫“布尔战争”或“南非战争”。英国对南非布尔人的战争。布尔人是荷兰在南非移民的后裔。为掠夺南非矿产，英国1899年发动战争。布尔人战败，1902年媾合，布尔人统治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被英国吞并。1910年并入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

②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中国东北和朝鲜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1904年2月8日，日本袭击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舰队。10日，日俄宣战。战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

③巴尔干战争，巴尔干同盟（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和门的内哥罗四国）对土耳其的战争（1912—1913），此为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是巴尔干之间各国的战争，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四国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土耳其也参加反对保加利亚一方。保加利亚战败，失去大片土地。

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他们的奥地利，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什么变革，货币不会突然贬值。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会断定该企业“破产”了，人人都要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论这场“灾难”。那时候，有人抱怨“高额”税收，这种抱怨如其说他真是这样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他一种习惯罢了。实际上，当时的税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税收相比，只不过是给国家的一点小费。那时候，人们时兴立详尽的遗嘱，好像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孙子和曾孙免受财产损失似的；以为用一张看不见的债券就能一劳永逸地保证子孙们的安逸生活。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就悠哉悠哉，即使出现一点点担惊受怕，也只不过像抚摸着又好玩又听话的家畜时那种根本不用害怕的心情。每当我偶然得到一张那个时候的报纸，读到那篇描写小小的区议会选举的激动文章时，或是又想起我们年轻时代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争辩得脸红脖粗，或想起皇家剧院的演出中，为微不足道的事议论纷纷时，我一定会忍俊不禁。所有的忧虑加起来也不过那么一点点，恰似风平浪静的世界不会有忧虑！我的父母和曾父母两代人遇到了好时代，他们平静、顺利和清白地渡过了一生。但是，我并不知道，我是否羡慕他们。他们像生活在天堂里，对人间的真正痛苦、尔虞我诈及命运多舛等没有认识，使人焦虑的危机和问题他们看不到、也想不到，可是这些危机和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他们陶醉在安宁、富裕和舒适的生活里，所以很少知道生活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使人异常紧张；生活中还会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或天翻地覆的事。他们沉湎于自由主义和乐观主义之中，所以料想不到任何一天，也可能是熹微之时，我

们的生活会遭到彻底破坏。就是在最黑暗的深夜里，他们也不会想到，人会变得凶险无比。从而，他们也不可能知道，人有多少战胜险恶和经受考验的力量。我们这些被驱赶着经历了一切生活激流的人，我们这些完全脱离了与他人联系的人，我们这些常被驱赶到尽头又要重新开始的人，我们这些是不可知的神秘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又甘心情愿为之服务的人，我们认为舒适安逸只是一种神话，认为安全盛世只是一种梦想的人——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极端对立的紧张关系和使我们每根神经都颤抖的新恐惧。我们一生中无时无刻都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经受着时代和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以前他们只限于自己的小圈子。因此，我们坚定地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纵然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对现实的认识要比我们祖先中圣贤的认识，高过千倍。不过，我们从中并没有占到便宜，而是为此付出了代价。

上世纪的学校

我从国民小学毕业后被送到中学，这不过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每户有钱的人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都精心培养“受过教育”的儿子，要他们学法语和英语，让他们熟悉音乐，先请家庭女教师，后请男教师管教他们的举止礼貌。在那个“开朗”的自由主义时代，只有进入所谓的“高等学府”受教育，即进入大学，才完全有真正的价值。每个“上流”家庭都贪图功名，希望自己的儿子里有一个名字冠以博士头衔。可是这条通向大学的路却相当漫长又使人感到不愉快。国民小学五年，人文中学八年，坐十三年的硬板凳，每天坐五至六小时，课余时间完全被作业占了，而且还要接受课堂以外的“常规教育”，除了学古希腊、古拉丁语外，还要学习“活”的语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也就是说，除了几何、物理和

学校规定的其他课程外，还要学习五种语言。学习负担已超重，几乎没有体育锻炼和散步时间，更谈不上消遣和娱乐。我好像记得，我七岁的时候，非要学会并合唱一首叫《愉快，幸福的童歌》的歌曲。这首曲谱简单朴素的小歌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但它的歌词我当时唱不好，它的内容并没进入我的心田。老实说，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学校生活，我始终感到乏味又无聊，不耐烦一年比一年厉害，渴望早日结束像水磨一样转的求学生活。今天，我记不得当时那种枯燥无味、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有没有过“愉快”和“幸福”。学校生活彻底破坏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无拘无束的时代。我看到本世纪的儿童比我们当时幸福、自由、独立得多，我真有点嫉妒呢。当我看到，现在的儿童无拘无束地几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那时始终对学校怀着一种隔阂的感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在学校和在家里那样以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人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他们是自由、独立、自然的人；而我们那个时代，在没有踏进那幢可憎的学校大门前，我们就全身紧缩，以免前额碰到大门的横梁上。对我们来说，学校意味着强迫、沉闷、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这里去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经院式或装扮成经院式的材料中感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的兴趣毫无关系。这种毫无生气、枯燥无味的学习，不是为生活而学习，而是为学习而学习，是旧教育制度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学习。而唯一真正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时刻，就是我们永远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为此，我必须感谢学校。

这样并不是说我们奥地利的学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学

校的教学计划是根据一百年来的经验认真制定的。倘若教学方法生动活泼，确实能够奠定一个富有成效的相当扎实的学习基础。正是因为计划刻板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堂死气沉沉，枯燥无味；课堂成了冷冰冰的一架学习机器，它又不根据学生的要求而转动，仅仅是一台标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动装置，以此来表示学生适应教学计划的“要求”达到什么程度。正是这种缺乏人性、抹煞个性、兵营般的生活，肯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我们必须学习规定的课程，学完的课程要通过考试。中学时期的八年中，老师从来没有问过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想学些什么知识——这正是每个年轻人内心的强烈愿望，老师从来不表示鼓励。

学习气氛死气沉沉的样子，从我们学校建筑物的外表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座典型的符合宗旨的建筑物，是五十年前低价、仓促、马马虎虎建立起来的。粉刷得十分粗糙的阴冷的墙壁，低矮的教室没有一幅画或其他赏心悦目的装饰，整个楼房都能闻到厕所的气味。兵营似的学校用的家具是旅馆里用的那种旧家具，这些家具以前被许多人使用过，以后还会有许多人无可不无可地继续使用下去。楼房里那股在奥地利所有官方办公室比比皆有的霉气味，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当时我们称之为“国库”味。凡是堆满杂物、供暖过高和空气不流通的房间皆有这股霉味；气味先沾染衣服，然而再沾染心灵。学生们两人一排坐在低矮的长木板凳上，像在划艇上摇橹的囚犯一样。板凳矮得足能使人成为鸡胸。一天坐下来骨头都疼。冬天，没有灯罩的煤气灯发出蓝色的光，在我们的书本上闪耀；夏天所有的窗户都经心地装上窗帘，为的是不让学生看到一点蓝色天空而想入非非。那个世纪还没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需要

空气和运动。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上休息十分钟就足够了。一星期两次把我们带到体操房，在房里的地板上毫无意义地来回踏步走，体操房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每踏一步，尘土就扬起一米多高。就是这样，也算作是有足够的卫生措施了，国家也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的“责任”。许多年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零的楼房时，我还有一股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再也不用踏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在这所显赫的学校举行五十周年校庆时，我作为以前的高材生应邀参加，要我在部长和市长面前致贺词，但我婉然谢绝了。因为我对这所学校没有什么可感激的，因为每句感激的话只是谎言而已。

就是那种懊丧的学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师。对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官方规定的教学计划束缚着他们，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也清楚地感觉到，每逢中午校铃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快乐，同样感到获得了自由。他们不爱我们，也不恨我们，原因是他们不了解我们。过了几年，老师们只记得起我们中间极少数几个同学的名字。在当时的教学法指导下，他们除了批改“学生”在上次作业中有多少错误外，再也不关心学生什么事了。他们高高地坐在讲坛上，我们坐在台底下，教师提问，我们回答，除此之外，老师与学生再也没有任何联系。因为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在讲坛和课桌之间，台上台下之间清晰分明地有一道看不见的“权威”之墙，它阻碍彼此的任何接触。老师对待学生，应该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还必须深入了解这个个体的特点。老师有责任把观察到的学生情况写成“报告”，这在今天

已习以为常。可在当时，这大大超过了他的权限和能力。另一方面，写出与学生的谈话会降低老师的权威；学生同老师谈话，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学生”与“前辈”平起平坐——在那时这些是行不通的。我觉得，最能说明我们和老师之间在思想上感情上毫无交往的例子是，我早就把他们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的记忆中，清清楚楚的记得是那座讲坛和我们始终都想偷看的班级记事簿，里面记着我们的分数；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师的那本用来评分的红色小笔记本，还有记分用的那只黑色短铅笔，记得自己那些被老师用红墨水笔批改的作业本，可是，我怎么也记不起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面孔，也许是我们坐在他们面前时总是低着头或从来不看他们一眼之故。

对学校的这种反感并非是我个人的成见；我记不得在我们同学中有谁对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不反感；像水磨一样的生活，压抑和磨平了我们最好的兴趣和志向。过了很久，我才明白，对青少年的教育采取冷漠无情的方法，并非出于国家主管部门的疏忽，而是包藏着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我们面临的世界，或者说，主宰我们命运的世界，它的一切想法，集中在把安全无事的世界视为一种偶像，希望它万古长青。这个世界是不喜欢青年一代的，说得透彻一点，它怀疑青年一代是否会打碎这个偶像。市民社会对自己有条不紊的“进步”和秩序沾沾自喜，并宣称，在一切生活领域中适度和平稳有节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任何急忙推向前进的事，都应避免。奥地利是由一位白发苍苍的皇帝统治着，由年迈的大臣们管理着这个古老的国家。这是一个没有上进心的国家，它只希望能防止任何一种激烈变革，从而保住自己在欧洲范围内牢不可破的地位。而年轻人，其天性就是不断进行迅速、激烈的变革。因

此，青年人成了令人忧虑的因素。这种因素必须尽可能的被排斥在外或者压制下去。所以国家根本不让学生生活过得好。所以我们应该耐心等待，何时才能提拔我们。由于奥地利不断向后退，因此年龄的大小具有不同的价值，像今天一样。那时候，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被当作孩子，如果当场抓住他在吸烟，他就要受到惩罚；如果他想解手，就得毕恭毕敬地先举手，得到许可，才能离开桌椅。但是，纵然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也同样被看作是羽毛未干不能独立的人；即便到了四十岁，也被认为不足以担当重任。所以，当三十八岁的古斯塔夫·马勒被任命为皇家歌剧院院长时，全市大哗，这个首屈一指的艺术机构竟交给一个"如此年轻的人"（他们完全忘了，莫扎特三十六岁，舒伯特三十一岁就已经完成了自己主要作品），使得维也纳全城为之诧异，人人都在议论。这种不信任感——认为每一个年轻人都"不完全可靠"——遍布当时所有的社会阶层。我父亲在他的商行里从未接收过一个年轻人。如果有人长得特别年少，那他到处都会碰到这种不信任感。若是这样，今天必然会产生一个令人不能理解的事：提升年轻人处处有障碍，年长的反而条件优越。而在我们今天完全变了样的时代，四十岁干事的人扮成三十岁的样子，六十岁的愿意自己像四十岁的。今天，到处推崇年轻、活力、干劲和自信，而在那个安全年代，任何有进取精神的人，为了使自己看起来老成一些，不得不打扮一下自己。报纸上介绍能使胡须快长的药品。刚刚从医学院毕业的二十四五岁的大学生，从医时留起大胡须，戴上金边眼镜，尽管他们的眼睛不需要戴眼镜，为的是要打扮自己，这样在病人面前显得自己是有"经验"的老医生。男人们都穿长长的黑色大礼服，步履从容稳重，如果可能的话，挺起微微凸起的圆肚子，

刻意表示自己的老成持重。追求功名的人，都竭力打扮自己成为脱离靠不住的青年时代的样子，至少在外表上下功夫。我们在中学六七年级的时候，就不愿意再背初中生的书包，而愿意用公文包，为的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我们不是初中生。青年人的朝气、自信、大胆、好奇、欢乐——这些在今天是我们羡慕的素质，但在那个一味追求"持重"的时代，却被看成是靠不住的表现。

在我们了解了这种特殊的观念以后，才会理解。国家充分利用学校作为它维护权威的工具，学校首先教育我们：现实的一切是完美无缺的，教师的话是完全正确的，父亲的话是不可反驳的，国家的一切设施是绝对有效的，与世永存的。这种教育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应该让青年人舒服。这一原则也在家庭中得以贯彻。在给予青年某些权力之前，他们应该首先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而主要是尽完全服从的任务。从一开始就要我们记牢，我们至今尚未做任何贡献，没有丝毫经验，对给予我们的一切永怀感激之情，而没有资格提问题和要求。在我那个时代，从孩提时起人们采取吓唬人的笨方法。女仆和愚蠢的母亲吓唬四五岁的孩子，说什么他们再闹，就去喊"警察"。当我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如果把分数不高的副课成绩单拿回家，我们就会受到恫吓，说再也不准上学了，送去学一门手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是最可怕的恫吓了，因为它意味着退步到无产阶级中去。当年轻人怀着最真诚的学习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释重大的时代问题时，遇到的是盛气凌人的训斥："这些事你还不懂。"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或国家机关里，到处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不厌其烦地恳切劝导，他还没"成熟"，还什么也不懂，他应该恭恭敬敬听别人说话，而没有资格插嘴或反驳。基

于这种观点，学校里的这些可怜虫高高地坐在讲坛上，俨然像一尊不可接近的呆呆的泥菩萨。我们的全部心思集中在“教学计划”之内。我们在学校里是否觉得舒服，是无关紧要的。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的百依百顺地去维护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能力之间的差异。

对青年一代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或者说，更多的非心理上的压力，只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不是使他们瘫痪，就会使他们兴奋不已。不妨查阅一下精神分析学家们的文献，看看这种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造就了多少“自卑情结”。这个“自卑情结”恰恰是那些经历过奥地利教育的人士所发明创造的。或许这并不是巧合吧。我本人也要感谢这种压力，它使我很早就露出对自由的酷爱，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人无法理解的。还有，我对一切权威，对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所有“教训口吻”的谈话恨之入骨；对一切不容质疑的说教我反感至极——多年来，这已成了我的一种本能。这种反感如何产生，我早已忘记。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在旅游讲演会上，有人让我在大学的大礼堂讲演。这时我突然发现，我要从台上向台下说话，而坐在下面的听众，就像我们当学生时老老实实、不言不语的坐在那里，顿时我感到一阵不快。我想起了中学阶段，那种从上对下的、权威的、非同伴式的夸夸其谈的说教，使我遭了多大的罪。想到这里我一阵害怕，怕我在台上讲话会像当年老师对我们在教训的那样，令人讨厌。正是这种思想顾虑，使我这次演讲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岁之前，我觉得学校生活还不错。我们开老师的玩笑，怀着冷静好奇的心情学习课程；但是，以后我们感到在学校里越来越沉闷无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我们十岁上中学，中学八年，在前四年我们就全部学到了中学阶段的知识。我凭直觉感到，在后四年我们已经没有正经东西可学了，甚至在感兴趣的课程上我们知道的比可怜的老师还多。那些老师在自己念完专业以后，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再也没有打开一本书。同时，我们越来越感到又有另一种矛盾：我们在课堂上埋头读书已得不到什么新知识和有价值的东西，而在学校外面却是另一番景象，繁荣的城市，剧院、博物馆、书店、大学，处处有音乐，每时每刻都有意外的欢乐。我们的求知欲被压制，对知识世界、艺术世界、人生享乐的好奇心在学校里无法满足，便一股脑儿转向校外的精彩世界。起初，我们同学中间只有两三人发现自己对艺术、文学、音乐有强烈兴趣，接着是十几人，最后几乎是全体。

青年人的热情从来都是互相感染的，它在一个班上，像麻疹或猩红热一样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由于新感染者天真的虚荣心在作祟，促使他尽快在校外的知识方面超过别人，所以他们之间互相促进，尽早适应新天地。至于他们的热情向哪个方向发展，一般都是偶然的。如果这个班里出现一个集邮者，那么不久就会有十几个人同样痴爱集邮；如果有三个人爱慕女舞蹈演员，那么每天就会有一些人站在歌剧院舞台门旁，一睹她们的风采。比我班低三年的一个班，完全被足球迷倒；而比我们高一年级的一个班就热衷于社会主义和托尔斯泰。而我正巧进入一届对艺术发生狂热兴趣的班级，或许正是这样决定了

我一生的道路。

对戏剧、文学和艺术的热爱，就其本身来说，是维也纳的天性。维也纳报纸为文化界发生的事例排在特别的版面上。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随时都能听到两旁的成年人在谈论歌剧院和皇家剧院的事；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里都挂着著名演员的画像；体育被看作是粗鲁的事情，中学生羞于参加；有广泛观众的电影那时还没发明出来。我们的这种热情，也不要担心在家里会遇到什么阻碍，因为这与打牌、与女孩子交朋友都不一样，戏剧、文学属于“无害”嗜好。就是我的父亲也像维也纳其他父亲一样，他们年轻时也曾对戏剧如醉如痴，怀着同我们类似的热情去观看里查德·瓦格纳① 的歌剧《罗恩格林》，就像我们去观看里夏德·施特劳斯②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③的戏剧首场演出一样。我们中学生挤着去看每场首演，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要是有人第二天在学校里不能叙述首演的每一个细节，那么他在那些看过首演的同伴面前不知有多么羞愧呢。假如老师们不是那么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们会发现在每次盛大的首演前一天下午，会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神秘的生病了——因为我们必须三点钟去排队，以便买到我们唯一可能买的站票。倘若老师们十分细心注意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我们的拉丁语法书的封皮里夹着里尔克④ 的诗。而我们的数学练习本则用来抄录

①里查德·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作家。

②里夏德·施特劳斯（1864—1949），德国作曲家、指挥家，曾任维也纳歌剧院乐队指挥。

③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著名剧作家。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人物。191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④勒内·玛利亚·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著名诗人。

借来书籍中的那些优美的诗歌。每天我们都想方设法利用无聊的上课时间，偷偷看我们自己带来的书。当老师在讲台上念他那不知念了多少遍的讲稿——关于席勒的《论质朴和感伤的诗》时，我们在课桌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这两位的名字是台上那位循规蹈矩的老先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们渴望了解和认识在艺术和科学所有领域里发生的一切。每天下午，我们混在大学生中间，到大学去听课。平时我们参观各种艺术展览会，走进解剖学教室里去看尸体解剖。我们用好奇的鼻孔去辨别一切气味。我们偷偷溜进交响乐队排练场；到旧书店去翻古书；每天都浏览一遍书店的陈列品，以便立刻知道昨天又有什么新书。我们主要的事是看书。凡是到手的书，我们全部都看。我们从公共图书馆借书，同时将借来的书互相交换着看。但是，我们了解一切新事物的最好教育场所则始终是咖啡馆。

要了解这一点，必须知道维也纳咖啡馆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家咖啡馆能与此相比。它实际上是一个只花一杯咖啡钱，人人都可以进去的民主俱乐部。每个顾客只要花上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在里面坐上几个钟头，可以讨论问题、写作、玩牌、阅读自己的信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免费阅读无数的报刊。有一家较好的维也纳咖啡馆，摆着维也纳所有的报纸，不仅有本地的报纸，还有德国的报纸，以及法国的、英国的、意大利及美国的报纸；还有世界上重要的文学杂志和插图杂志，如《法国信使报》、《新观察》、《创作室》、《伯林顿杂志》等。我们可以从第一手材料——每一册新出版的书，每一次首场演出中，知道世界上新发生的一切，并且把第一手材料与各种报纸上的评论加以比较。一个奥地利人能够在咖啡馆里广泛了解到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并且能够随时和朋友

们进行讨论，再也没有别的地方能使人头脑那么灵活，再也没有任何地方能迅速掌握如此多的国际动态了。我们每天坐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竟什么都知道了，因为我们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体力量。不是用两只眼睛去看全球的艺术动态，而是用二十只或四十只眼睛看。一个人疏忽了另一个人会提醒他。我们青年人幼稚，爱显露自己，像运动场上的运动员一样，竭力去争第一。我们也想用最新的知识超过别人，所以我们竞相先要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比如说，当我们讨论时有人贬低尼采，那会突然从我们这些人中间冒出一人，带着故作姿态高人一等的神气说："不过就自由思想而言，克尔恺郭尔①还超过他（尼采）呢。"听了这话，我们感到惊奇不安。"克尔恺郭尔何许人，只有他知道，而我们却不知道？"第二天，我们挤进图书馆，也追踪这位丹麦哲学家的著作。因为我们觉得，别人知道的事，我们若不知道，这就是一种自我贬低。我们的热情促使我们去发现和预先知道那些尚不为人涉及的最近、最新、最怪、最奇的事中——首先是正经的日报官方文学批评尚未涉及的事——(这种热情在我们身上持续了多年)去认识那些尚未得到又普遍承认的事，去认识那些难以理解、异想天开、新鲜和激进的事，是我们的特殊爱好。因此，没有事情能够离开人世，没有什么事情会隐藏得那么妙，总会被我们竞赛似的集体好奇心把它从隐藏处发现。譬如，斯蒂芬·格奥尔格或者里尔克，在我们中学时代，他们就出了两百或者三百册书，可是最多有三册或者四册书到了维也纳。没有一个书商的仓库里存着他们的书，官

①索伦·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神学家、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

方批评家中没有一个提到过里尔克的名字。而我们小组的人凭着意志，奇迹般地找到了他的每一行和每一节诗。我们这些尚须坐在教室里、嘴上没毛、尚未完全长高的小伙子，确是每位年轻诗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读者。我们既好奇又会鉴赏，还有倾心喜爱的热情。因为，我们那股狂热劲是无限的。我们这些半成年的大孩子在学校里，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在咖啡馆和剧院里，在散步的时候，除了讨论书籍、绘画、音乐、哲学外，什么也没干。不论是男演员还是乐队指挥，谁经常登台，谁出了一本书，谁在报纸上发表了文章，都像星辰一般出现在我们的天空。好多年以后，当我在巴尔扎克的书中读到他描写他青年时代的一句话："我总以为名人像上帝一样，他们不像平常人那样说话、走路、吃饭。"时，我几乎大吃一惊，因为他的描写和我们的感觉一模一样。当我在大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马勒尔时，我像取得胜利一般感到非常骄傲，第二天早上就会向同学们报告。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有一次被介绍给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简直受宠若惊，神魂颠倒了好几天，虽然我是个十二岁的男孩，一点也不知勃拉姆斯有多少成就，仅凭借他享受的荣誉之高，影响之大，就足以使人颠倒。当盖尔哈特·霍普特曼的戏剧准备在皇家剧院首演，在排练前，我们全班同学激动了几个星期。我们悄悄溜到演员和跑龙套演员的身旁，为的是先了解到剧情的发展和演员的阵容。我们到皇家剧院理发部去理发，以便探听到一些关于沃尔特或索嫩塔尔的秘闻（我在这里并不羞于写出我们当年的荒唐事）。如果低年级中有个学生是歌剧院灯光监督的外甥，他肯定会受到我们高年级同学的宠爱和各种各样的笼络，因为我们通过他能够偷偷溜到舞台上看他们排练——刚登上舞台时心里害怕，七

上八下的心情，比维吉尔[1] 登上神圣天国时还要厉害。在我们看来，演员的声望所具有的威力其大无比，即便是中间转了几个弯，我们离他很远，仍然会使我们肃然起敬。某个贫穷的小老太太，仅仅因为她是弗朗茨·舒伯特的外甥女，我们才把她看作是超凡脱俗的人。纵然是约瑟夫·凯恩茨的一个男仆，一旦被我们在街上看到，会怀着崇敬的心情注目着他。因为他很幸运，可以呆在这位最受爱戴、最富有天才的演员身边。

我今天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在盲目的狂热中包括着多少荒唐的行动；我们有多少次互相模仿演员的动作，随之带来多少身体上的乐趣，变着法儿胜过别人，这包括着多少幼稚的虚荣心。我们趾高气扬，觉得自己艺术的鉴赏力已凌驾于周围不懂艺术的亲友和老师之上。不过，时到今日，我始终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凭借过分的文学热情能知道多少事呢！我们通过不断地讨论和分析竟这么早就具备了批判鉴别的能力！我十七岁时不仅知道波德莱尔或者沃尔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诗，而且还能背诵重要的名篇。我觉得在我全部的岁月中，再也没有像我中学和大学时那样的勤奋好读。理所当然，那些通常要十年以后才被人重视的作品名字，在我脑海却是相当熟悉的，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暂的作品，因为我们莫大的热情是搜罗一切。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2]，我和他的作品打交道有许多年了。我还告诉他，在三十年前，我就喜欢他的诗

[1]普布利乌斯·维吉尔·马洛，古罗马诗人。但丁在《神曲》中，以维吉尔为老师和引路人，经历地狱、炼狱。

[2]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

歌，并拜读过。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你别胡说了，老朋友！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我当场分毫不差地向他叙述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登载的那本文学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感到惊奇万分，说："那本刊物在巴黎几乎没人知道，你在维也纳又怎么搞到的呢?"我只能这样回答："正如您当中学生时在自己的省会能读到马拉梅①的那些当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表示赞同："是啊，年轻人总想发现自己的诗人。从而他们想从中发现自己。"事实上，这股风还没有越过边界来到奥地利之前，我们已闻到了风向，因为我们始终是带着灵敏的鼻孔过日子的。我们能够找到新知识，因为我们需要新知识，我们如饥似渴地寻找那些属于我们的和只属于我们——而不属于我们父辈和我们周围的人——的东西。青年人就像某些动物对自然现象的变化具有特殊的敏感一样，那么我们这一代就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的师生们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有些艺术见解也将随之告终，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的改变业已开始，而其他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父辈们喜爱的那些艺术大师——文学界的凯勒，戏剧界的易卜生，音乐界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绘画界的莱勃尔②，哲学界的爱德华·冯·哈特曼③——我们觉得，他们属于那个安全世界，缓慢节制是他们的特征，尽管他们艺术性和思想性方面十分卓越，但使我们不再感兴趣。凭直觉我们感到，他们那种冷静的、中庸的节奏和我们好动的气质不相协调，也

①斯特凡·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

②威廉·莱勃尔（1844—1900），德国画家。画风写实，形象质朴。

③爱德华·冯·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与加快了的时代速度不相合拍。而恰恰在维也纳，住着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机警的天才——赫尔曼·巴尔①，这个思想界的闯将，正为所有的变革和未来披荆斩棘。在他的帮助下，在维也纳创建了“直线派”②，这一分离派为了震惊旧的学派，展示出了巴黎的印象派和点画派③画家的作品，展览了挪威的蒙克④，比利时的罗普斯⑤，以及其他我们想到的激进画家的作品，从而为不受重视的先驱格吕内瓦尔德⑥、格列柯⑦和戈雅⑧开辟道路。这一展览，使人突然见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在音乐方面，由穆索尔斯基⑨、德彪西⑩、施特劳斯、勋伯格带来了快节奏和突出的音色。在文学方面，由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开创了现实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斯拉夫的魔力。魏尔兰⑪、兰波⑫、马拉梅使抒情诗的语言艺术达到前所未有的纯粹和精炼。尼采使哲学发生了革命。一种大胆的、更自由的建筑艺术风格代替了繁文缛节的古典风格。舒适平稳的旧秩序突

---

①赫尔曼·巴尔（1863—1934），德国诗人、文学批评家。

②直线派，19世纪末德国一艺术流派；又称分离派。

③点画派，亦称点彩派。兴于印象主义以后，故亦称新印象派。

④爱德华·蒙克（1863—1944），挪威表现主义画家。

⑤费利西安·罗普斯（1833—1898），比利时版画家，画家。所画裸体女性特具肉感。

⑥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1455—1528），德国画家。

⑦艾尔·格列柯（生卒年不详），西班牙画家。所作多宗教题材。人物形象多冷色。

⑧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⑨莫台斯特·穆索尔斯基（1839—1881），俄罗斯作曲家。

⑩克劳德·德彪西（1861—1918），法国作曲家，印象派音乐创始人。

⑪保尔·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

⑫阿尔图尔·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然间遭到破坏。迄今为止对这种标榜着“美学上的美”(汉斯力克① 语)的规范提出了挑战。资产阶级“正统”报纸的官方批评家对我们常常是大胆冒失的实验感到吃惊，并且试图用“颓废堕落”或“无法无天”的罪名阻止这种不可抗拒的潮流。而我们年轻人则热烈地投身到这股潮流的汹涌波涛中去。我认为，一个由我们开创的，最终我们将在其中获得权利的时代——我们自己的时代开始了。我们并不安分，四处寻找探索新东西的那股狂热，一下子获得了新的意义。我们这些上中学的年轻人，能够为新艺术的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的常常是粗暴的战斗中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我们的狂热获得的新意义。凡是进行试验的地方，我们必定到场。例如，魏德金德② 戏剧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诗的朗诵会，我们不但必定到场，而且全神贯注，双手用尽力气鼓掌。记得有一次首演阿诺尔德·勋伯格青年时代的一部十二音体系的作品，就有一位绅士使劲吹口哨和发出嘘声，我亲眼看到我的朋友布施贝克同样用力打了他一耳光。我们是每一种新艺术的突击队，也是它的开路先锋。只是因为它是新的，只是因为它为我们要改变那个世界，现在轮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了。因为我们觉得，“那是与我们有关的事。”

我们这些年轻人所以对新艺术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新的作品几乎全部是青年创造的。在我们父辈那个年代，一位诗人、一名音乐家，只有他经过了“磨练”和适应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艺术趣

①艾杜阿尔德·汉斯力克(1825—1904)，奥地利音乐评论家。他先后在布拉格大学及维也纳大学讲授音乐史和音乐美学。

②弗兰克·魏德金德(1864—1918)，德国表现主义剧作家。

味之后，才能出名。父辈教导我们应该去尊敬所有这些男士们；他们的举止仪表想让我们尊重他们。他们留着漂亮的灰白胡须，衣冠楚楚不可一世。例如维尔布兰特①、埃贝斯②、达恩③、保尔·海泽④、伦巴赫⑤——这些早已销声匿迹，却是父辈和那个时代的宠儿。他们在拍照时总是目光沉沉，一副“高贵”、“诗人”的姿态。他们一行一动，俨如枢密顾问和红衣主教，而且像他们那样佩带勋章。而认为年轻一代的诗人、画家、音乐家，最多不过是一个“有希望的人才”罢了。如若想得到他的首肯，目前还办不到。在那个小心持重的年代，他们不会在某个人尚未取得“卓越”成就之前就承认他。可是新涌现出的诗人、音乐家、画家，又都那么年轻。盖哈尔特·霍普特曼从默默无闻突然变成名人，是因为他三十岁时就统治了德语的戏剧舞台。斯蒂芬·格奥尔格和莱纳·玛利亚·里尔克二十三岁时，比奥地利法定的成人年龄还低，就已经有了文学声誉和众多的狂热追随者。在我们这个地区，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由阿尔图·施尼茨勒、赫尔曼·巴尔、里夏德·贝尔—霍夫曼、彼得·阿尔滕贝格等人组成的“青年维也纳”派。他们把自己的各种艺术作品精炼加工，给维也纳文化以全新面貌，第一次在欧洲范围内产生影响。不过，使我们迷恋和大力崇拜的，主要还

①阿道尔夫·冯·维尔布兰特（1837—1911），德国作家。曾任维也纳皇家剧院院长。

②格奥尔格·埃贝斯（1837—1898），德国埃及学研究者，作家。

③费里克斯·达恩（1834—1912），德国作家、历史学家、法学家。

④保尔·海泽（1830—1914），德国作家，191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⑤弗朗茨·冯·伦巴赫（1836—1904），德国写实主义肖像画家。

是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非同凡响的人物。我们青年人不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崇高志向，而且也在这个同龄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诗人形象。

年轻的霍夫曼斯塔尔的出现，是一件莫大奇迹，他很年轻就有大的成就，使今天和以后的人无不称道。在世界文学中，除了济慈和兰波以外，我还没发现有谁能比上他，像他这样的语言天才。年纪这么轻，就能驾驭如此完美无瑕的语言，想象力那么丰富，即便是草草写成一首诗，也都充满诗意。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和无人能写得如此好的散文，从而使他载入德国语言的永恒年鉴。他的突然出现，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完全成熟，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在这代人中间不会出现第二个。他的出现，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议的事，使所有最早知道他的人无不为之惊讶。赫尔曼·巴尔常常向我叙述他当时是怎么样的惊讶。有一次他的刊物收到一篇文章，是从维也纳寄来的，作者是一个不见经传的名叫“洛里斯”的人——当时不允许中学生用真名发表作品。他从世界各地收到的众多稿件中，唯有这篇极不寻常；语言典雅富于想象，内容蕴藏丰富，落笔娴熟飘逸。这位“洛里斯”是谁呢？他问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见解琢磨了多年，并且在神秘的隐居中用纯净精辟的语言冶炼成一篇几乎是魅力无穷的文章的老人。这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巴尔立刻给这位不相识的人写了一封信，约定在一家咖啡馆——著名的格林斯坦特尔咖啡馆，文学青年的大本营里——会面。突然，一个穿着童装童裤的、身体修长、尚未留胡子的中学生，迈着轻松又敏捷的步伐走到巴尔面前，微

微一鞠躬，简短又坚决地说道："我是霍夫曼斯塔尔！也就是'洛里斯'。"嗓音还没有完全变为成年人的低音。事情虽然过了许多年，每当巴尔想到这件事时，他仍然十分激动。他说，他开始简直不敢相信，一个中学生竟会创造出这样美的艺术，有这样的远见，思想这么深刻，在他自己尚未有亲身经历前，对生活就有鞭辟入里的认识，实在令人称奇。阿图尔·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讲过类似的事情。施尼茨勒当时还是个医生，他最初的文学成就还不足以维持生计，不过，这时他已是"少年维也纳"派的领袖。一些比他年轻的人喜欢向他请教，倾听他的建议和看法。有一次，他在相识的熟人中偶然认识了这个细高身材又年轻的中学生。这个中学生巧妙的机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个中学生请他听他自己朗读诗剧中的一段，他高兴地把这个青年人引到他的房间，尽管他没抱什么希望。他想，这无非是中学生写的剧，不是感伤主义就是假古典主义，所以他只请来了几个朋友。霍夫曼斯塔尔穿着童装进来了，显得有点紧张，接着他开始朗诵。施尼茨勒告诉我说："开始没瞧起他，听了几分钟时，耳朵全竖起来了，洗耳恭听。大家交换着赞许和惊奇的目光。诗句是这么完美，形象是那么动人，音乐性多么鲜明。我们还没有听到过至今世人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也可以这么说，自歌德以后几乎不会有这样的诗句。而且除了诗的形式以外，在内容上也是无人可比的（在德语里至今没人达到过），令人赞叹不已，他对生活的认识，对一个整天坐在教室里的中学生来说，是不可能的，只能说他具有神秘的直觉。"当霍夫曼斯塔尔朗读完后，我们呆呆地坐在那里。我"觉得"，施尼茨勒对我说，"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一个天生的奇才；在这以后，我再也没遇上这样令人激动的场面。"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开始就这样或者

说还没有开始，而是说一开始就这样完美——必然成为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一个兄弟。实际上，这种完美越来越成熟：继第一部诗体剧《昨天》之后，接着的最雄伟壮阔的《提香① 之死》的片断，在这里，他用德语体现了意大利语的优美音调；然后就是诗作。他每发表一首诗，对我们来说是件不寻常的大事。数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逐行地背诵那些诗，后来他又写短剧和散文。他的散文把丰富的知识，对艺术的精辟见解，对世界的瞭望，神奇地浓缩到十几页的稿纸上。总之，这位中学生，以后又成为大学生所写的所有作品，像水晶似的从里向外放射光芒，同时，表现出深沉和炽热的情感。诗歌、散文，在他手中将犹如海米托斯山② 上芬芳的蜂蜡轻轻地糅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诗作，不长也不短，恰到好处，不落俗套。我们始终觉得，在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定有一种不知不晓和不可理解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他。

我几乎无法重复这个奇特的人物在当时是如何使我们入迷的，那时我们已学会追求真正的价值。对年轻人来说，知道在我们身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间，就有这么一位卓越、纯正、崇高的诗人，对他，我们只能用荷尔德林③、济慈、莱奥帕尔迪④的传奇色彩来想象：可望而不可及，半梦半醒，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使人陶醉的呢？所以，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霍夫曼斯塔尔的那一天。当时我十六岁，我非

①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

②海米托斯山，希腊神话中人格化了的自然物。

③弗里得利希·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

④可莫·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著名诗人。

常注意我们这位理想的良师益友的一行一动，因此，当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简讯：他要在“科学俱乐部”作关于歌德的报告时，使我们非常激动（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这位天才竟在这么个小地方作报告，我们中学生如此崇拜他，以为霍夫曼斯塔尔一定会在大地方露面，大厅里一定爆满）。在那次报告会上，再次证实，我们这些小小的中学生判断力和对富有生命力事物的敏感力，远远超过广大公众和官方的评论。因为他讲演的地方太小，总共才装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提前半小时就去占位子，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只等了片刻，忽然有一个不惹人注意的瘦高个青年，匆匆穿过我们这一排座位，向讲台走去，接着讲演开始。他行动之快，以致我们没有仔细打量他的时间。霍夫曼斯塔尔身材灵活、蓄着尚未成形的柔软的上髭，看起来他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他的脸轮廓分明，有点像意大利人那样黝黑的脸，绷得紧紧的，显然有点紧张。他那双深色的柔和的又高度近视的双眼流露出来的不安，也证明他比较紧张。他一下子就投入演说的洪流中，像一个游泳者一下子入水一样。他越向下讲，举止越灵活，态度越镇静；一旦思路展开，开始时的拘束全部消失，只见他轻松自如，侃侃而谈，简直像一位灵感丰富的人平时说话一样（以后在我与他私下谈话时也常常发现如此）。他讲演时，头几句话，我觉得他的嗓音并不好听，有时近乎假嗓，很容易变得尖锐刺耳。不过，当他讲得我们眉飞色舞和忘乎所以时，也顾不上注意他的嗓音和面孔了。他讲演时没有讲稿，没有提纲，甚至可能没有详细的准备，然而，由于他具有天生的讲究形式的神奇感觉，所以他的每句话都十分完美。在讲演中，他提出最大胆反命题，使人一时迷惑，接着他便用清楚而又使人惊奇的论证加以解答，这不禁使听众感

到，他讲的仅仅是从他的丰富多彩的知识中信手拈取的一部分。他轻松自如地驾驭讲演的内容，如果要深入展开，他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也不会使内容贫乏和水平降低。以后几年，我与他私下交往中，依然感到他谈吐的魅力，正如斯蒂芬·格奥尔格赞誉他是："气势磅礴诗歌的发明家，是火热机灵对话的首创者。"他的性格易躁、易动、敏感、有点压力就发火，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动和怏怏不快，不易同他接近。他碰到感兴趣的问题时，他会变成一团火，迅速又热烈地将它辩论一番，再引入他自己的和只有他才能达到的知识范围中。与想问题比较开明稳重的瓦莱里和脾气比较急躁的凯泽林① 谈话，我感到水平已经比较高，可还不及与霍夫曼斯塔尔谈话时那样的思想水平，当他的灵感完全横溢的时候，他接触过的一切：读过的一本书，见过的一幅画和每一处风景，都会在他那精灵般的记忆中复活。他用的比喻是那么自然、生动，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一样；他的观点是那么突出，就像屹立在地平线尽头的背景——在那次讲演会上和以后几次的私人来往中，我真正感到他身上的这种"气息"，是一种令人振奋，但又难以用理性理解，不可捉摸的气息。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霍夫曼斯塔尔再也没有超过他在十六岁至二十四岁这个阶段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奇迹。虽然我对他后期的作品同样赞赏，如他的优秀散文，长篇小说《安德烈亚斯》的片断——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或许是德语中最美的长篇小说——及戏剧的部分段落，但是，随着他日益看重现实戏剧和时代趣味，随着他的创作具有明显的意图和功利目的，那些充满童稚

①赫尔曼·凯泽林（1880—1946），伯爵，德国哲学家。

自然的早年诗歌创作中的纯净的灵感消失了，梦游者模糊不定的描写消失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我们这些爱挑剔的青年人的魅力。我们这些尚未成年者的神秘知觉预先就知道，在我们这一代，像他这样的奇迹可能只出现一次，在我们一生中也不会重演。

巴尔扎克曾以无可比拟的方式描写拿破仑这个人物是怎样把法国年轻一代振奋起来的。一个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登上了风云世界的皇帝宝座，这不仅意味着是他个人的胜利，也是青年人思想上的胜利。这是因为，一个人要早早获得权势，并非要生在官宦之家，非是王子和侯爵不可；一个人不论生在哪个小户人家，甚至一个贫困之家，同样可以在二十四岁时当上将军，三十岁成为法国的统治者，随而成为全世界的统治者。这种举世无双的成就，促使数以百计的人离开自己微贱的职业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个青年一代头脑发热，使他们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伟大军队的将军们和英雄，以及人间喜剧的主人公和烈士。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旦他在自己的领域中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功，仅仅这一点，就永远鼓舞他周围或他身后的年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对我们这些更年轻的人来说，是对我们这些能力尚未成熟的人的一次不同寻常的推动。我们并不希望在我们中间有人会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是只要他存在，就会给我们增加力量。因为他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城市里，在我们的环境中，同样可以产生诗人。霍夫曼斯塔尔的父亲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像我们一样，出身于犹太市民阶层，因此，这位天才诗人是在一幢和我们住的差不多的房子里长大的，里面的家具是一样的，从小接受同样的道德教育，进入一所同

样死气沉沉的中学，学的也是同样的课本，也在同样的木板凳上坐上八年，像我们一样感到不耐烦，像我们一样热衷于一切精神财富。你看，他可成功了，当他还必须坐硬板凳而磨破裤子，在体操房里来回踏步走的时候，却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狭隘的小圈子，跳出了使人窒息的城市和家庭，一下子飞入无限的世界中去。可以这样说，霍夫曼斯塔尔这个实例，向我们显示了，即使我们这个年龄和在一所奥地利中学牢笼般的气氛中，要创造富有诗意的作品甚至完美的诗歌，原则上是可能的。甚至他在家里或者学校里尚属未成年、毫无功名可谈的时候，他的诗作出版了，带来了荣誉和名声。这对一个童心是具有多大的诱惑力啊！

而里尔克对我们来说又是另一种类型的鼓励，这是一种以安慰人的方式，补充了霍夫曼斯塔尔的那种激励。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要和霍夫曼斯塔尔比高低，实属大逆不道。我们知道，他至善至美的早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这种奇迹是不能再现的。我们这些十六岁的人把自己的诗句和他在同样年龄写的诗加以比较，我们会羞愧满面，无地自容。我们同样感到，我们的知识在他面前相形见绌，他念中学时就已经博学多才。而里尔克不同，他也是十七岁或十八岁开始写诗发表，但里尔克的这些诗与霍夫曼斯塔尔同时写的诗相比较，从绝对意义上说，还是不太成熟、幼稚和简单了一点。唯有退一步看，才能看到几分天才的光芒。这位诗人是逐渐成名的，直到二十二三岁才开始成为一位受我们无限爱戴的杰出诗人。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安慰。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尔那样在中学阶段早熟成才；一个人也可以像里尔克那样，一步一步地成才。所以有的人因为暂时写了一些不像样、不成熟、缺乏责任心的作品，马上就认定自己没有指望了，这是毫无根据的。一个人很

可能不会再现霍夫曼斯塔尔的奇迹，但可以走里尔克走过的那条比较平稳和比较寻常的成才之路。

我们所有人早已开始写文章或写诗，有的玩乐器或喜欢朗诵，这是很自然的事。青年人的每个被动的激情观点，就其本身来说，是不自然的，因为，就其青年人的本性来说，他们不仅要获得许多表象的东西，而对表象的东西批判、消化和吸收，并作出新的回答。譬如说，热爱戏剧的青年，至少希望和梦想亲自登上舞台，或者为戏院做点什么。青年人热烈崇拜各类天才人物，必然会导致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尚未清楚的躯体里，或者在半阴半阳的心灵中找到那种优良本质的苗头和可能。于是，艺术创作的欲望在我们班上十分盛行，当时维也纳的气氛和那个时代的条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身上寻找天赋，并试图发挥它。有四五个人想当演员，他们摹仿皇家剧院的演员腔调，精心地练习和朗诵台词，悄悄地去听表演课；学校休息时，各自当一个角色，即兴表演古典戏剧家的整场或片断；而其他人则是怀着好奇又爱挑剔的观众。班上还有两三个人相当有音乐素养，他们还没决定，是当音乐家、演奏家、还是乐队指挥。最初我得到的有关新音乐的知识，应归功于这几个人。新音乐在当时的交响音乐会上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们也向我索取他们喜欢的歌曲和合唱歌词。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人，他是当时一位著名画家的儿子，上课的时候，他在我们的练习本上画满各种图画，同时为我们班所有未来的天才都画了肖像。但是，我们班上最喜爱的还是文学。通过彼此之间的互相激励，在文学方面我们成熟得越来越快；我们彼此切磋每一首诗，使我们这些十七岁的人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业余爱好者；而且我们每人都做出了真正实际的业绩，这

一点为下面的事实所证明：我们的作品不只仅被不知名的地方小报所采纳，而且也被新一代所创办的杂志接收、刊登，甚至拿到了稿费——这是最令人信服的证明。我班有个叫 Ph. A. 的同学，我过去称他为天才，他的名字在当时最出色的豪华杂志——《潘神》① 上居然和戴默尔②、里尔克的名字一起并排在最前面。还有一个叫 A. M 的同学，用“奥古斯特·厄勒”的笔名找到了进入当时所有德语杂志中最难入门和最古板的文艺刊物——《艺术之页》大门的途径。这本杂志是斯蒂芬·格奥尔格专为自己神圣的成员而保留的园地，而这些成员是经过文艺团体严格挑选出来的。我的第三个同学，在霍夫曼斯塔尔的鼓励下，写了一本有关拿破仑的剧本；我的第四个同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理论，并写出意念深远的十四行诗；我的名字则进入现代人的主要报纸《社会》和马克西米里安·哈尔登③ 的《未来》周刊——一份关于新德国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德语刊物。今天，当我回首往事时，我必须客观地承认，当时我们知识的渊博，文艺技巧的娴熟，艺术水平之高，对这些年仅十七岁的人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对霍夫曼斯塔尔那种神奇的早熟的例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恰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鼓舞人心的例子，促进我们奋发努力，互不示弱。我们掌握各种艺术的技巧，也掌握语言的大胆夸大的手法，我们熟悉每种诗体的技艺，在无数次的习作中，尝试过各种不同的风格，从品达

①《潘神》，潘是古希腊神话中牧神、宙斯之子，用此作为刊物之名称。

②里夏德·戴默尔（1863—1920），德国诗人。

③马克西米里安·哈尔登（1861—1927），德国政治家，作家。1888年当新闻记者，1892年创政治周刊《未来》。

罗斯[1] 诗歌的庄重，到民歌的质朴，一一尝试过。我们之间每天都交换自己的作品，提出其中的疏忽和不足，讨论每一个韵律的细节。我们迂腐的老师在用红笔判改我们的作业时少了几个逗号，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早对自己的作品互相展开批评，要求之严、审查之细、见解之高，是那些大型日报上官方文学评论权威在分析古典大师们的作品时，也无法做到的。由于我们专心致志地对待文学，到了中学最后几年，我们在专业的判断和风格的表现力方面，甚至超过了那些著名的专业评论家。

对我们在文学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实的描写，也许会引出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是个特殊的神童班，但绝非如此。当时在维也纳的十几所邻校中，同样可以看到学生对文学的狂热和文学早熟的现象。这不可能是偶然现象，这是由于有个特殊有利的环境决定的，维也纳这个城市是艺术的沃土，正处在非政治的时代，在世纪之交出现了思想和文学突飞猛进的局面。有这样适宜的环境，加上我们内在的文学创作愿望，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在我们那个年龄做出了巨大的业绩。每一个年轻人总有一股诗兴和写诗的冲劲，但是大多数人出现的冲动不过是心灵中泛起的微小浪花。青年人心中不出现这种冲动是极少见的，因为这种想写诗的冲劲本身就是青春焕发的表现。后来，我们班上那五个想当演员的同学，没有一个登上舞台；在《潘神》和《艺术之夏》[2] 登过名字的那几位诗人，没有坚持下去，

---

①品达罗斯（即品达尔，约公元前518—公元前442或438），古希腊的著名诗人。

②斯蒂芬·茨威格在这里记错了，奥古斯特·厄勒已经死亡。——原书注。

在锋芒初露之后当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师和官员。也许他们对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会忧伤地或自嘲地付之一笑。我是我们那些人当中唯一始终坚持创作热情的人，而且这种热情成了我一生中的核心思想。但是，我今天仍怀着感激的心情怀念我们那一伙人。他们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啊！那种火热的讨论，你追我赶的狂劲，互相之间的表扬和批评，提前锻炼了我的手和大脑，大大开阔了我的精神世界。我们是如何鼓起勇气摆脱单调无聊的学校生活啊！每当我听到舒伯特那首不朽的歌："你，迷人的艺术，总是在无比空虚时刻……"时，往事历历在目，我仿佛又看到我们垂着双肩坐在冰冷的板凳上，然后放学回家一路欢笑，伴着充满兴奋、激动的目光，评论和朗诵着诗歌，兴致所至，狭隘的小天地全抛脑后，如舒伯特歌曲说得那样，我们"沉湎在一个美好的世界。"

这种对艺术过分的酷爱，这种对美学近乎荒唐的过分推崇，必须牺牲我们那个年龄的通常兴趣，才能实现。今天，当我问自己，我们当学生时，白天上学，还有必要的起居、用餐时间，哪有时间看那么多的书籍呢？回想一下，我才明白，我们是以大大缩短睡眠时间，损害精力充沛的身体为代价的。虽然我早上七点起床，可是我从来没有在半夜一两点钟前就不看书的习惯，从那时起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到了深夜，我还要看一两小时的书。所以，每天早上我总是最后一分钟匆匆忙忙奔向学校，睡眼惺忪，匆忙洗脸，一边疾步向前，一边嚼着抹上黄油的面包片。我现在记不起，有哪一天不是这样。我们这群小学究，看起来满脸菜色，像一个未成熟的水果，身体像丛树枝似的，此外，衣着也不整——出现这些绝不奇怪。另外，我们的

零用钱中每个赫勒① 都用在看戏、听音乐会和买书上了，根本顾不上陪年轻姑娘；我们并不在乎姑娘是否喜欢我们，不同她们交往，一是怕浪费宝贵的时间，二是要给学校当局一个良好的印象。体育活动我们无暇顾及，甚至瞧不起它。要让今天的青年人了解这一点，恐怕不大容易。体育浪潮在上世纪尚未从英国冲击到欧洲大陆；当时也没有现在这样的体育场，更没有过多的体育活动；今天，当一个拳击手向对手的下颚频频出击时，上万名观众激动得狂呼乱叫；报馆还设有派出记者，用通栏篇幅像荷马史诗似的报道一场曲棍球比赛。在我们那个时代，摔跤、田径赛、举重等都是在郊外举行，参加者是屠夫和搬运夫等下人；赛跑才是一种高雅的比较贵族气的运动，一年有几次把“上流社会”的人吸引到赛场，可不是我们这些把任何体力活动视为纯粹浪费时间的人。我十三岁时开始染上了对学问和文学的嗜好，我就不去滑冰，把父母给的学跳舞的钱全买了书。我十八岁时不会游泳，不会打网球，也不会跳舞。一直到现在，我既不会骑自行车，也不会开汽车。在体育方面，任何一个十岁的男孩都可以讥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还分不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马球的区别。每张报纸上的体育版，我觉得是汉语写的，怎么也看不懂。我对所有体育运动的成绩——速度和评分，就像那位波斯的沙阿②，一样不开窍。有人鼓动这位沙阿去参加赛马大赛，他却表现出东方人的智慧：“赛什么马？我本来就知道总有一匹马跑得最快，哪匹跑得快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也像波斯国王一样轻视锻炼自己的身体，觉

①赫勒，奥地利货币名称。一克朗为一百赫勒。

②沙阿，波斯语“国王”之意

得这是浪费时间。只有下棋我还有几分喜欢，因为下棋要动脑筋。更加荒谬的事是，虽然我们觉得正在成为诗人或者有可能成为诗人，可是我们很少关心大自然。我的头二十年，几乎没有好好看看维也纳周围的美丽景色。最美最热的夏天来临，城里的人外游，显得空荡荡的，我觉得这时的维也纳城更加迷人，因为可趁机在咖啡馆里读更多的报刊杂志，这里的种类丰富，还没有人争抢着看。后来，我用几年时间甚至十几年时间寻找平衡——青少年时的过度劳累的做法——来弥补我不好好运动造成的身体笨拙。不过，总的说来，我对中学时的狂热对这种只用眼睛和脑子的生活，从来没后悔过，这种狂热精神把我的求知欲注入了我的血液中，使它永远不会失去。以后我读的书和学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学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上的。一个人的肌肉误了锻炼，以后还可以补上；而智力的飞跃，心灵中内在的理解则不同，只有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心扉的人，以后才能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里。

我们年轻一代亲身经历的，正是艺术中的新事物酝酿发展的阶段，这些新事物远比我们的父母及其周围的人要求更为热烈，更难解决，更有诱惑力。但是，由于我们被那段生活所迷惑，致使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学领域中的变革，它促进了社会上的一切变化。这变化是新事物的先导，是旧事物的掘墓人。这种变化正在动摇和最终毁灭我们父辈们的安全世界；一场触目惊心的社会大变革，正在我们这个衰老的、昏昏入睡的奥地利国土开始酝酿。几十年来，广大群众心甘情愿不声不响地把统治权让给了自由资产阶级，可是现在他们突然变得不安分守己，

并且组织起来，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正是在上世纪后十年，政治像暴风骤雨冲进平静安逸的生活。新的世纪要求有一种新的制度和一个新的时代。

在奥地利兴起的各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首先兴起的是社会主义运动。至今，被我们错误地称之为“普遍”的选举权，实际上只赋予了交纳一定税款的有产阶级。从这个阶级选举出来的律师和农场主都十分相信，自己在国会里是“民众”的代表和发言人。因为他们受过教育，甚至大部分人受过高等教育，所以感到非常自豪。他们仪表庄严、体面，谈吐高雅，因此，国会开会就像一家高级俱乐部的晚间讨论会。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由于他们对自由主义的信仰，所以完全相信，宽容和理性必定促进世界的进步；他们认为采取小的妥协和逐渐的改善，以促进全体臣民的福利，并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是，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只代表这座大城市里的五万或十万富裕的人，而并不代表整个国家的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这期间，开始了机器化生产，过去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业中去了，在一位杰出人物维克托·阿德勒博士的领导下，在奥地利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实现无产阶级的各种要求，争得真正的普遍的人人平等的选举权，是该党的宗旨。可是这种选举权刚一行施，或者说刚一被迫实行，人们立刻发现备受推崇的自由主义是何等的脆弱。随着自由主义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处不见了，现在，处处都是利益与利益的激烈冲突，斗争开始了。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还是幼童的时候，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确定了决定性转折的一天，工人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和众志成城的决心，提出口号，宣布五月一日是劳动人民的节日，并决定在普拉特区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决定通过那条主

要的林荫大道，而这条美丽、宽阔、两旁栽满栗子树的大道，从来都是达官贵人的马车和华丽车辆行驶的。善良的自由派人士听到这一宣布时，吓得不知所措。社会党人这个词，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有一股血腥气和恐怖主义的味道，就像以前听到雅各宾派和以后听到布尔什维克一样。人们刚听到工人的宣布，绝不会相信，这些从郊区游行来的赤色分子进入市区会不烧房子，会不抢劫商店和干出其他的不可想象的暴行。全城一片惊骇。全城和郊区的警察都集在普拉特大街值勤，军队处于警戒状态。那一天没有一辆私人豪华马车或出租车敢靠近普拉特街，街边的店铺早已放下铁制的防护板。我还记得，当时父母严厉禁止我们这些孩子在将会发生大火的这一天上街。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工人们带着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队伍，秩序井然地走进普拉特大街，每个人的纽扣别着一朵红色丁香花，这是党的标志。他们一路行进，一路唱着国际歌；但是，当孩子们第一次走进诺贝尔林荫大道的绿草坪时，无忧无虑地唱起了校园歌曲。没有人挨骂，没有人遭打，也没有人挥拳头，警察和士兵向他们报以友好的微笑。这种无可指责的行动，使资产阶级也不好再称他们是“革命的痞子”，最后互相作了让步——古老智慧的奥地利总是这个态度。当时还没有发明今天的大棒殴打和灭绝的政策，在那些党魁身上尚且活生生地保持着（显然已褪色）人性的美好理想。

这种以红色丁香花为党徽的事刚出现，马上就把白丁香花挂在纽扣上，这是基督社会党党员的标志（当时用花作为党的标志，而现在用翻口皮靴、短剑和骷髅，在今天看来，怎不令人感动呢?）。基督社会党是一个彻底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原来它是与无产阶级政党相伴相随的一种对抗运动。从根本上说，它

也同样是机器战胜手工业的产物。机械化的大生产一方面把大批劳动者集中到工厂里，工人聚成团，有了势力，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大机器生产威胁着小的手工业。大商店和大规模生产，促使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企业的师傅处于破产的境地。有一位机灵受人欢迎的领袖卡尔·卢埃格尔博士，他用“必须帮助小人物”的口号，吸引小市民和愤怒的小资产阶级到自己身边；他们怀着沦为无产者的恐惧，这种恐惧感远远超过他们对富有者的嫉妒。这使人想起，与现在相同的这个忧心忡忡的阶层，后来成为希特勒周围的第一批群众。从这个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滥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而这一口号给怀着不满和恼怒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明显的敌人，从而不知不觉地转移了小资产阶级对大地主、封建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完全庸俗和野蛮的地步，这个世纪已倒退到可怕的地步，从这点上讲，这两个人有很大的不同。卡尔·卢埃格尔满腮金黄色柔软的胡子，仪表堂堂，维也纳人称他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他没有辜负这个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他的讲演通俗又浅显，性格爽朗又诙谐，即便在作最激烈的演说时——是那个时代最激烈的演说——从来没有失去本来的风度。他有着像一个弦乐演奏家的一条弦，也握着机械裁缝的一把剪刀，用这根弦和那把剪刀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可他却万分小心地控制着。他对待对手始终保持君子雅量，他的私生活简朴得无可非议，他公开的排犹立场，从来没有人阻止他，对他以前的犹太朋友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照顾。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维也纳市议会，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对排犹主义倾向十分反感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曾两次拒绝这一任命——以

后，他一直公正廉明，政绩卓著，无可指责，他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的政党胜利以后，全市的犹太人非常害怕，可是犹太人的生活像以前一样，享有平等权力和受到尊重。这个时代，仇恨的毒素和互相之间彻底消灭的愿望尚未浸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之中。

但是这时出现了第三种花，矢车菊花。这是俾斯麦最喜欢的花，也是德意志民族党的标志。该党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党——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它。该党的目标是，猛烈地冲击并彻底摧毁奥地利君主制，建立一个在普鲁士和新教徒领导的大德意志国——比希特勒还早的梦想。当时，基督社会党的势力主要在维也纳和农村地区；社会党扎根在工业地区；而德意志民族党的成员几乎完全在波希米亚和阿尔卑斯山的边缘地区；该党人数少，势力单薄，但它采用野蛮的攻击和极端的暴行弥补了那种被人瞧不起的地位。该党的几个议员是暴政的代表(从旧的意义上说)是奥地利国会的耻辱。希特勒——一个同样出生在奥地利边远地区的人，在这几个议员身上找到了自己在思想上、在策略上所需要的东西。他从格奥尔格·舍纳雷尔① 接过“脱离罗马!”的口号。——该口号是当时数千名讲德语的德意志民族党党员坚决、忠实遵循的。他们从天主教皈依新教，目的是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们。希特勒从他们那里搬来了反犹太主义的种族理论。——他们突出的杰作是“犹太民族是最下流肮脏的”。希特勒又从他们那里首先学会建立一支肆无忌惮的、盲目服从的、大

①格奥尔格·舍纳雷尔(1842—1921)，奥地利大庄园主、政治家，俾斯麦的信徒，奥地利德意志民族党的激进领袖，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他从经济上排犹到政治上民族上反犹，他的思想对希特勒有很大影响。

打出手的冲锋队；从而他发现了一个原则，用少数人制造暴行来恫吓在数量上比它大得多的那些人，这些人既老实又诚实，不敢抗争，逆来顺受。冲锋队为国家社会主义党干些什么勾当呢？他们用橡皮棍驱散群众集会，夜里袭击反对者，并把他打倒在地！德意志社会党的头头还利用学生的单纯和狂热，掀起大学联合会会员的偏激冲动为他们服务。这些大学生在大学豁免权的庇护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殴打恐怖暴行。他们采取的每次政治行动，都像军队一样组织严密，高呼口号吹着口哨，在大街上列队前进。那些大学生自己组成了所谓的"大学生团"，他们脸上带着击剑时留下的伤疤，经常酗酒闹事。他们占据着学校大礼堂，他们不像普通学生仅带着袖章和学生帽，而是拿着粗重的木棒，他们一会儿殴打斯拉夫大学生，一会儿猛击犹太族大学生，一会儿围攻信天主教的大学生，把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赶出校门。"大学生团"的学生每次"闲荡"（他们把每个星期六举行示威活动称之谓'闲荡'）都发生流血事件。当时的大学仍享有古老的特权：警察不得入内。警察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流氓欺负凌辱别人；警察能够做到的仅仅限于，这帮民族主义流氓把被打成遍体鳞伤的学生从楼梯口扔到大街时，立即把他们抬走。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党党徒虽然极少，可是却能大造声势，每逢这个党计划做些什么事，总是派"大学生团"的学生打头阵。当巴德尼伯爵① 在皇帝和议会的同意下颁布一项语言法令时——他原以为这项法令的实施，会给奥地利各民族之

①卡西米尔·弗里克斯·巴德尼伯爵（1846—1909），奥地利政治家，曾任奥地利总理，1897年提出语言法令，从国会到社会，从维也纳到其他城市抗议示威连续不断，皇帝不得已下令解除巴德尼的总理职务。

间带来和平，也许还可延长皇朝几十年的寿命——一小撮被煽动起来的大学生团的年轻人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这项法令。他们占领了环城大道，当局不得不出动骑兵，用军刀和步枪来镇压。在那个讲人道和懦弱得可悲的自由主义时代，人们憎恨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也十分害怕流血冲突。政府不得不在德意志民族党面前退却，总理下台，完全合法的语言法被撤销。在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中，野蛮的暴力行为第一次取得了胜利。在那个容让迁就的时代，辛辛苦苦地把各民族和各阶级之间联合起来了，这一下子全破裂了，彼此之间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深渊。实际上，新世纪开始前的最后十年，一场全面的内战在奥地利已经开始了。

但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已完全沉浸在对文学的偏爱之中，很少注意我们的国家所发生的危险，我们眼睛只盯着书籍和绘画。我们对政治、社会问题毫不感兴趣，我们生活中的刺耳争吵有什么意义呢？全城为选举激动不已，而我们去图书馆。当群众爆动时，我们正在写诗并且讨论诗文。我们没有看到墙上着火的信号，而像古时的伯沙撒① 国王一样，无忧无虑地品尝美味佳肴一样，正在欣赏艺术作品，而不抬头向前看一眼。直到几十年后，当房顶和四边墙倒塌压在我们头上时，我们这才明白，地基早已挖空。随着新世纪的开始，个人自由已在欧洲没落。

①伯沙撒，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国王，卒于公元前538年。

萌发爱情

在八年的高中期间，发生了一件纯是个人的事：我们从十岁的孩子逐渐长到十六岁、十七岁和十八岁具有男子特征的年轻人，自然的本能开始宣布自己的权利。好像青春期的性成熟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每个成长发育的人，都用自己特别的不同方式，自己为自己解决问题。情窦第一次萌发时完全不适于在公共场合中谈论。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青春发育期已超过它本身的范围，它必然同时促成另一种意识的觉醒，这使我们第一次学会批判地观察这个社会世界和社会习俗，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成人的。一般说来，孩子甚至年轻人自己本身就愿意，首先体面地适应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法规。当他们看到，要他们遵守的那些社会习俗，只有大家都坚决遵守，他们才能遵守。只要年轻人看出老师和父母身上有一点

点不真实的行为，必定促使年轻人用怀疑的和更为尖锐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人。我们不需要多长时间就会发现，我们过去一直信任的学校的、家庭的和社会道德的权威，在“性”的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极不真诚，甚至可以说他们也要求我们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要保守秘密，不可告人。

三四十年前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们今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许没有一个领域像两性关系那样，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发生这么巨大的变化，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妇女解放运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体育运动的发展、青年的独立自主等。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维多利亚时代①的道德。如果试图区别十九世纪的市民道德与今天流行的不同，今天流行的是更为自由，更为无拘无束的道德观，那么也许在我们身边今天首先出现一个具体不同情况：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个时代的人胆战心惊地回避处于内心不平衡中的性的问题。更早一些时候，也就是真诚信奉宗教的时代，特别是严格的清教徒时代，性的问题反而容易解决。中世纪的权威们，像迷信那样深信不移，认为性欲的要求是魔鬼促使的，肉欲乃是罪恶和猥亵。他们用粗暴的禁令和残酷的惩罚，强行贯彻他们的无情的道德观——特别是加尔文教的中心日内瓦。到了我们的这个世纪就完全不同了，是一个不再相信鬼神的宽容的时代，再也不敢用逐出教门的严厉手段。不过性问题使人觉得仍然是一个乱世的因素，进而使人理解为破坏伦理道德的因素，与伦理学相悖，因此，性问题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除了婚姻形

---

①维多利亚时代，系指英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统治的时代（1837—1901）英国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黄金时代”。

式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性爱，都有悖于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由于这个矛盾，在我们那个时代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折衷办法：那时的道德规范并不限制青年人过性生活，却要求不引起别人注意的情况下做这种难堪的事。既然性问题是天经地义的存在于地球上，那么最好是让它不为人所见和不超出社会风气的范围之外。于是形成了一种默契：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家庭里、或者在公共场合，都不谈这个令人恼火的麻烦事；把一切能引起性欲的杂念全部压制下去。

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我们知道，有意识地试图去压抑自然的性冲动，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是进入危险的潜意识之中罢了。现在我们很容易对那种无师自通的天真的隐瞒手法为之一笑。可是，整个十九世纪囿于一种妄想：认为人们能够用理性主义的明智解决一切冲突；以为把人的自然本能隐藏得越深，他那烦躁不安的劲头会越来越缓和，以为不向年轻人提性的问题，他就会忘却身上存在的自然本性。当时，社会上各个方面都是以不谈性问题来控制性欲的妄想。抱着置之不理就能解决问题的幻想，社会所有的部门组成了一个对外密而不宣的联合抵制阵线。学校和教会的牧师、沙龙、司法机关、报刊、书籍、时尚和风气，原则上避免谈任何性的问题。至于科学——本来它可以对任何事情进行彻底的研究和探讨——也以卑鄙的方式参与“明显的不光彩的事”。生理科学认为研究这些污秽的课题而失去了科学的尊严，向世俗低下了头。如果我翻翻那个时候的书籍，如哲学、法学，甚至医学方面的书，大家会一致发现，凡是涉及性问题的地方都有所顾忌地闪开了。刑法学者在学术会上讨论监狱中的人道主义作法和牢房中有失道义的内容时，对这个最敏感的最本质的问题，胆怯地避开了。同

样，一些神经科医生，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歇斯底里病状的原因，却又不敢说出真相。我们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仍然可以读到，就是他所尊敬的老师夏尔科①也曾私下里向他承认，他虽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原因，却从未敢公诸于世。就是当时所谓的“美”的文学，压根儿不敢如实描写，写这种文学正是以体现美学的美为己任的。在前几个世纪里，作家不羞于提供那个时代的真实的广泛的文化图画。我们仍可以在笛福②、普雷沃神甫③、菲尔丁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⑤的作品里看到那种真实的不加歪曲的描绘。可是到我们那个时代，只允许描写“充满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许写那些羞愧难言的真实事。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对大城市青年的所有危险、黑暗和困惑的描述。即使一个作家写到卖淫，他也必须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式的英雄。那么我们现在正面对着一个特殊的事实，如果当今的年轻人要知道上一代或上上一代的青年人是怎样奋斗一生的，而去翻阅纵然是那个时代的大师们的作品，如，我们读狄更斯、萨克雷⑥、戈特弗里

①让·马丹·夏尔科（1825—1893），法国著名神经病学家。

②丹尼尔·笛福（1660？—1731），英国小说家。《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

③安东尼·费朗索·普雷沃（1697—1763），法国作家。文学史上通称“普雷沃神甫”。

④亨利·菲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⑤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1734—1806），法国作家。

⑥威廉·马克匹斯·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名利场》的作者。

德·凯勒、比昂逊[1]的作品——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因为他们是俄国人，站在欧洲假理想主义的对立面——也只能发现，书中写的尽是经过加工升华、温和适中的事情，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作家受时代的压力而无法表达自己的自由见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祖辈的道德观几乎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和使今天的人所不能想象的时代气氛，而不是文学本身的退让宽容态度。要不，我们怎样理解一部完全写实的小说，如《包法利夫人》被法国一家法院判作淫书禁止发行？同样，我们怎样理解，我年轻时候左拉的小说被看作色情文学，一个古典主义叙事文学家，一个心平气和的托马斯·哈代，竟在英国和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呢？因为这些书尽管写得很有节制，还是暴露了不少现实。

我是在这种不健康的、令人窒息的、又加杂着浓郁香味的空气中，和不愁吃穿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的。那种虚伪的反心理学的道德观，一直对"性"保持沉默和藏匿的伎俩，像一座魔山重重压在我们头上。作家们屈服于这种非人性的道德观，所以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缺少符合当时实情的真实文献资料，也使人很难将那些不真实的东西恢复其本来面貌。这个论据还是能确立的，只要看看时装的样式就可断定这个论据的正确性。因为每个世纪的服装从外观情趣上看，自然而然的反映出当时的道德观念。在一九四〇年的今天，当电影院的银幕上出现现代人穿着一九〇〇年的服装参加社交活动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洲的城市和村庄的观众准会笑个不停——这种事不是偶然

①比昂斯藤·马丁纽斯·比昂逊(1832—1910)，挪威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的。就是今天一个最憨厚的人对过去那种特别的打扮——不自然、不方便、不合乎卫生——看作者漫画上的人物，简直像乔装打扮的小丑。就连我们自己家的母亲、姑姨、女朋友等都穿着古怪的夜礼服和自己儿童时同样也令人可笑；整整一代人都顺从这个潮流，竟无人提出异议，简直像一场梦。当时男人打扮的样子是又高又硬的衣领，一动也不能动，燕尾长长的黑礼服，加上那顶像烟囱样子的大礼帽，活像个“弑父者”的形象，够可笑了。但是，那个时代的“女士”穿着打扮既费力又繁琐，每个细节都违反自然，那才是个怪打扮呢！在腰部系着一件用鲸鱼须骨做的紧身衣，把腰勒得像马蜂腰一样；下身穿着鼓成了钟形的大裙子；脖领扣得又紧又高，直到下颚处；双脚完全遮盖着；头发梳成无数小卷，再编成螺旋发辫，高高地盘在头上，头发夹满珠玉宝石；双手总是戴着手套，就是炎热的夏天也不摘下来。这种女士，满身香气，戴着各样的首饰，全身精装，带着花边、流苏之类，都已成为历史了，女士乃是一个令人同情又无人帮助的不幸的人。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凡是装扮成骑士那样全副武装的女人，她再也不能自由活动，再也没有活力，再也体现不出优美的身段；有了这副打扮，每个动作、每个姿态、以及她整个体态的表现，无不矫揉造作，不自然，无不违反自然。要把“女士”打扮成这样——还不用说参加社交活动时如何困难——只是夜礼服的穿上和脱下，其程序就非常复杂，没有别人帮忙，根本无法穿上和脱下。穿衣的程序是，首先把背后的衣扣从腰部扣到脖颈处，接着侍女用尽力气将紧身衣拉紧，每天来伺候的女理发师用许许多多的发针、发夹、梳子、烫发钳、卷发筒等，把长长的头发卷成形，梳理整齐后，做成高耸的发型——我提醒今天的年轻人注意，三十年前，除几

十名俄国大学生外，欧洲的每个女人的头发都长到腰部——然后再给这位女士像洋葱一样穿上一层又一层的衬裙、紧身内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得没有一点女人味和一点也不像人样为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打扮还有一种秘密的含义：一个女人的线条按风俗经过复杂的加工完全掩盖起来，使新郎在婚宴上无法预料自己身旁这个未来的伴侣究竟长得什么样子，长得是挺直还是驼背，是丰腴还是干瘪，是直腿还是弯腿。这个“重道德”的时代根本不认为把女人的头发、胸脯和身体其他部位乔装打扮一番有什么不对，也不承认这种人工的美就不是理想的美，也不承认有什么欺骗性。那时，一个女子要成为真正的女人，只有不显示出原来的自然美才行。其实，这种具有明显目的的时尚，仅仅是为当时一般的道德观效劳的，那个时代主要关心的是掩盖和隐藏性爱。

但是，这种智慧的道德观完全忘记了，如果把魔鬼关在门外，那么魔鬼十有八九会从烟囱和后门进来。今天我们用客观的眼光来看，那时候的服饰是把露在外面的丁点皮肤和真实的身材尽量遮掩起来，使人看不出她有何德性，恰恰相反，这种时尚反而突出了使人难堪的女人的刺激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名年轻姑娘在一起，他们身体修长，留着短发，面部没有胡须，从外貌上看，觉得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可是在以前那个时代，异性之间尽量拉开距离。男人为了美，留着长长的胡子，故意地不停地捻弄很浓的小胡子，显示着自己的阳刚之美；而女人用紧身衣突出女人的主要特征，乳房突出，故意显耀。在举止仪表方面，特别突出刚强的男性和纤弱的女性。那时要求男子豪爽、好斗，具有骑士风度；而要求女人羞怯、腼腆、小心谨慎；要求男人像猎手，女人像猎物，两者是如此不

同。在仪表上人工造成的区别差异，反而增加了异性内在的吸引力，即性爱必然更加强烈。所以，当时用那种非理性的方法来遮盖和压制性爱，非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走到它的反面。那时，唯恐在文学、艺术、穿着等方面出现伤风败俗之事，以防范任何性冲动的刺激，反而使人的思想总想着那些不道德的勾当。那个社会一直不间断地研究可能发生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陷于窥探色情的环境之中。对那个世界来说，“正派作风”始终处于极度危险之中：每个姿态、每句话都不成体统！今天人们肯定会理解，女子在运动中或打球时只穿裤子，而那个时代认为这是大逆不道。那些歇斯底里的假正经，它深刻理解，当时的女人难道敢启齿说女人穿“裤子”这件事吗？如果非要说出引起性欲的“裤子”时，必须找出另外的词汇来代替，用一个纯洁又无刺激性的“下装”这个词来代替“裤子”，或者用那个为忌讳特意发明的词：“难以启齿之物”。从前，几个身份相同而性别不同的年轻人，在无监护下想一起去郊游，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确切地说，首先想到的是可能会“出事”。这样的聚会，只有监护人——母亲或家庭女教师——形影不离地监护下，才能实现。一个年轻的姑娘在最炎热的夏天打网球，想穿件露出双脚的衣服或者裸出双臂，那简直是荒唐的丑行。如果一个有教养的女子，在社交生活中交叉着双脚，会被认为是大失体统的事，因为这样裙下露出了肉体。就是自然要素，如阳光、水、空气也不能触及女人的皮肤，何况别人的眼睛。在辽阔的大海上坐船，女人们必须穿沉重的衣服，步履艰难地走动，寄宿在学校和修道院里的年轻姑娘们，必须从脖项到脚后跟包得严严实实，为的是忘掉自己还有躯体；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着长长的白衬衫。妇女年长直到去世，她的肉体，除了

接生婆、丈夫和洗尸体的人以外，再也没有其他人能看见过她肩膀的线条或膝盖，这绝不是故意夸张说玄话。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觉得这些“规矩”简直像童话或者滑稽的扩张。然而，在那时候，从社会最高层的人士到最底层的黎民百姓，无一例外，都得了一种神经病似的，害怕所有的肉体和自然。不了解这些，我们怎能想象如下的一些事呢？——在本世纪之交，当第一批女人勇敢地骑上自行车或者像男人似地跨鞍上马，农民向这些冒险家大扔石头。当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维也纳的几家报纸曾连篇累牍地讨论那件标新立异令人恐怖的伤风败俗的革新：皇家歌剧院的芭蕾舞女演员光着脚而不穿长袜跳舞。当伊莎多拉·邓肯①第一次穿着古希腊式短袖的身长到膝的白色长衣，没穿绸缎舞鞋而是赤着双脚跳舞，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成为头号新闻。我们设想一下，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目睹世事的年轻人，一定会感觉到，为那个一直受到威胁的正派体统而惶恐不安是多么可笑，一旦发现那件遮盖一切的类似大衣的道德遮盖物上满是裂缝和洞孔时，一定会大笑不止。这些都是欺世盗名的勾当。五十个中学生终究会有一个碰上他的老师在阴暗的小胡同干那种有伤风化的事；从东邻西舍那里偷听到这个或那个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尽管他们在我们面前装得一本正经。事实上，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就越引起我们强烈的好奇心，有时好奇心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因为社会道德不准许人们让自己的自然本能自由地、公开地流露出来，在大城市里这种自然本能找到了地下的和多半不干净的发泄渠道。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感到，由于对青年人性的压抑，一种隐藏的性兴奋便以一

①伊莎多拉·邓肯（1878—1927），美国女舞蹈家。现代舞派创始人。

种幼稚的、笨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乎没有一座栅栏或厕所没有涂上下流的字画；游泳池里用来隔开女游泳区的木板壁，凡有树节子的地方都捅成了洞。从整个工业看，由于不合乎今天的习惯而走下坡路，另一些行业却兴隆起来，特别是裸体照像业，写真照像业。不管哪家酒肆饭店里，都有小贩在桌下向青年兜售裸体照片。还有地下出版色情文学的行当，印的这些书粗制滥造，纸张极差，语病甚多，可销路甚好；那些“淫秽下流”的杂志，销路同样很好，书刊中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写，在今天找不到第二份。而严肃文学不得不坚持理想主义和小心翼翼的态度。属于严肃艺术的有皇家剧院，表现高贵思想和纯洁如雪的剧作。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门演出最粗鲁下流的滑稽戏的剧场和歌舞场。这说明，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那么，说到底，假正经地不准谈性的启蒙和不准许同异性无拘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这一代享有自由恋爱的青年人更好色。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更引起人的强烈欲望要去得到它；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总之，加在我们青年一代的社会压力，不过是引起我们内心对各有关当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罢了，并没有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平。从我们的情欲萌发的第一天起，我们本能地感觉到，那种非理性的道德观用掩盖和沉默从我们身上夺走本该属于我们这个年龄所需要的东西；为了保存早已腐朽的习俗，而牺牲我们正直的愿望。

这种“社会道德”，一方面承认性的存在，还给性的发泄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在公开的场面下又不敢承认性的存在，这

种阴阳脸式的“道德”完完全全是一种欺骗。对青年人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它以眼相逗，要青年人变得“圆滑一些”，像当时人们在家庭隐语中善意地戏说那样，遇到女人就害怕，紧闭双眼，装成瞎子。甚至习俗也不得不默认，一个男人有性欲冲动是应该有的冲动，也应该坦诚地承认，一个女人也能被性欲征服，人类的繁衍生息，同样需要女性，这就触犯了“女人圣洁”的观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时代，作为公理协定就是这么定的，一个女人不可能有肉欲的要求，男人也不许引起女人性的要求，只有结婚以后才被许可。这就是那个讲究道德的时代，空气中充满了危险的引起色情的传染物，维也纳尤甚。一个上流社会人家的姑娘，从她诞生的那天起，一直到她与丈夫走出教堂为止，这段时间必须在绝对消毒的气氛中生活。为了保护年轻姑娘，不让她单独离开家人的眼光。给她请来家庭女教师，就是为了照料她，绝不能让她没陪伴踏出家门一步，无论是上学还是去上舞蹈课和音乐课都有人接送。她们读的每本书都要经过检查，主要目的是让姑娘们一天到晚学习，使她们无暇产生非分之想。她们得练习钢琴，学唱歌，学绘画，学外语，学艺术史和文学史，她们受到各种教育，甚至有些过分。但是，在把她们教育成为非常有文化非常有教养的同时，人们又不安地担心，她们对所有的自然事物一点也不知，对男女之间的事一无所知的程度是我们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一个上流家庭的姑娘，不准她想象男子的身体结构，也不许她知道，孩子是怎样来到人间的，因为这个天使在结婚前不仅自己的肉体没有被触及过，而且她的心灵也要保持得绝对“纯洁”。一个姑娘，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当时成了对生活毫无所知的同义语；有时，那个时代的一些妇女一辈子对生活都无知透顶。我有一

姑妈，她曾发生了一件荒唐透顶的事，至今我仍然忍俊不禁。在她结婚的午夜一点，她突然返回娘家，大吵大嚷，她说再也不愿意见到这个下流的男人，说他是个疯子和妖魔，因为他一本正经地要脱她的衣服。她费了不少力气，才摆脱了男方显然是病态的要求，救了自己。

当然我不能不说，那时姑娘们的无知，反而会给她们带来神秘的魅力。这些羽毛未丰的女孩子预感到，在她们旁边，在她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她们一无所知的和不许她们知道的世界，这使她们会感到好奇、向往、醉心，还有一种吸引人的心绪不宁。她们走在大街上，一旦有人打招呼，她们会脸红——现在的年轻女孩子会脸红吗？如果姑娘们单独在一起，她们就会唧唧喳喳，交头接耳，嘻嘻哈哈笑个不停，像微微喝醉似的。她们怀着对不熟悉的与她们隔绝的世界的各种期待，她们做着罗曼蒂克梦，但是她们又怕被别人发现。她们要求肉体要达到那么温存多姿，连她们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这样。思想上稍有一点混乱，她们整个举止会不断失态。她们走路的姿态也与现在的姑娘不同，现在的姑娘经过体育锻炼，身体动作像男孩子一样轻松自如，而那时的女人走上几百步就可以从步履和姿态上断定她是姑娘还是媳妇。她们的姑娘气比现在的要大得多，已婚妇女就不是这样了。从本质上看，她们恰似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没有经过任何风霜，娇滴滴的，她们是特定文化和教育精心培养出来的产物。

而那个社会就希望年轻的姑娘，既傻又顽固，既有教养又毫无所知，既好奇又害羞，既无把握又无实际。这种脱离实际生活的教育，必然使她们在婚后失去自己的意愿，任凭丈夫摆布。当时的社会风尚似乎是要把一个姑娘作为最秘密理想的标

志，成为品行端庄、纯洁无瑕、超脱世俗的象征。如果一个年轻的姑娘二十五岁或者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那是多大的不幸啊！因为这种习俗毫无怜悯地要求三十岁的姑娘不能有性经验，也不能有性要求，要求她们是个性盲，这些要求与她们年龄是多么不相称呵！还要求她们为“家庭”和“习俗”就这样继续坚持下去。未结婚的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处女”，那些滑稽报刊把她们当成讥讽打趣的对象，只要谁翻翻老版的《散页画报》① 或别的一份幽默刊物，就会发现，每期都有对老姑娘们的低级无聊的嘲讽；这些老姑娘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打击，出现精神失常，不知掩盖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们为了自己的家庭和个人的好名声，不得不压制自己内心的生理要求：要求得到爱情，要求成为母亲；然而人们非但不体谅她们牺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剧，反倒拿她们开玩笑，这些不通人情的人，可恶之极。由于虚伪地反对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公诸于世的人。

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风俗试图极力维持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只要她没结婚，就不该有性欲和不准有性欲，否则，她就是一个“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门；但是又不得不承认，男子身上确有性欲冲动这回事。凭经验毫无办法去阻止性成熟的男子的性生活，所以人们不求奢望，但愿他们的不体面享乐要在神圣的社会习俗大墙之外进行。一座城

①《散页画报》1844—1944 年由布劳恩和施奈德出版社出版，是带有插图的幽默杂志。

市，地面上是打扫干净的道路，两旁是豪华的商店和优美的公园，而地下是泄泻污水的排水系统。青年人过性生活的地方，像城市一样，只能在“社会”道德下面的“阴沟里”进行。当青年人过性生活时遇到什么危险或落入他人之手，则眼不眨心不跳。而学校和家庭过于谨慎而耽误了对青年性启蒙的教育。只是到上世纪最后几年才间或有远见卓识的父亲，用当时的话说，是位“思想开明”的父亲。他们在发现自己的孩子第一次长出胡须时，就想帮他们走上正路，先把家庭医生请来，随后医生找机会把青年人请进屋，先慢条斯理的擦眼镜，才慢慢开始看他的报告，谈性病的危险性，并劝告年轻人要节制性生活和不要忽视安全措施，其实这个年龄的青年人早已对此无师自通。另一些当父亲的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他们聘一个漂亮的使女到家里，她的任务就是教会男青年在这方面的实事。因为父亲们觉得这个办法挺好，让青年人在家里干这种勾当，外表上就不会失去礼仪，而且也免得青年人落入“骗子”之手。但是，这种公开的、露骨的启蒙方法，始终为社会各界所唾弃。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一个青年人究竟有哪些泄欲的途径呢？这个问题在下层社会的各个层次是根本不成问题的。譬如，在农村，一个十七岁的长工与一个女工睡觉，一旦这种关系有了孩子，那么以后就成了一对。在我们的大多数阿尔卑斯山农村里，未婚者生的孩子远远大于已婚者。在无产者中间，一个工人在他结婚以前就同几个女工已结成“野婚”。在加利蔡恩信奉正教的犹太人，刚刚成熟的十七岁男孩就娶妻成婚，四十岁时就当了祖父。只有我们资产阶级社会里才鄙视这种解欲的方法——早婚，因为没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愿把自己的女儿托付给一

个二十二岁或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人们把他看作是“年轻”人，还没有成熟。这里同样又暴露出一种内心的虚伪，因为资产阶级的年历与自然年历根本不一致。从自然发育来看，一个人十六岁或十七岁就成熟了；从社会角度来说，年轻男子只有获得“社会地位”才算成熟，可是二十五六岁以前能获得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身体的实际成年和社会上的成年之间产生了六年、八年，甚至十年的人为间隔。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男人不得不为自己泄欲寻找“机会”或寻求“风流韵事”。

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给年轻人泄欲提供很多机会。只有极少数人，特别是富家子弟才能享受这种奢侈，“赡养”一个姘头。也就是说，给她准备一套住房和负担她的生活费用。和一个已婚妇女发生关系，这是当时长篇小说中描写风流韵事的唯一文学典型。这种事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才能碰上。而另外大多数人是与小店子里的女售货员或饭店里女招待厮混解决一时的快乐。因为那个时候妇女解放运动尚未开展，妇女尚未独立参加社会生活，所以只有那些出身最穷的无产者的姑娘，一方面她们没有任何顾虑，另一方面她们在萍水相逢、不打算结婚的两性关系方面拥有充分自由。她们穿着简朴，工作十二小时后已疲备不堪，不可能修饰自己（那个时候私人浴室尚属富有人的特权），工资又少得可怜。贫穷的姑娘们成长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子里，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们大多数人自惭形秽而不愿与情人在公开场合露面。虽然当时预先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以解决她们面前的难处，即所说的单间餐室，在这里一个姑娘和情人吃晚饭，免得别人看见，至于那件事，可以到阴暗偏僻小街上的小旅馆去干，这些小旅馆是专为这种情人幽会而开设的。这种幽会是在仓促害怕中进行的，所以一点

美感都没有，纯粹是为了发泄性欲，因为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干那种被禁止的丑事。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同两栖动物，一半是资产阶级另一半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搞两性关系，诸如女演员、女舞蹈家、女艺术家，她们是那个时代唯一“解放了”的妇女。但是，总的说来，构成婚外性生活的基础是娼妓。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的大厦地下室阴暗的顶棚，而在地下室的上面竖立着纯洁的、豪华的、精彩的门面。

关于卖淫在世界大战前广泛扩展的情况，当今的一代青年几乎很难想象，今天我们五大城市的街道上很难碰到妓女，就像在行车道上很少看到马车一样。可是过去在人行道上不乏油头粉面花枝招展的卖淫者，要躲避她们比找到她们还难。于是又出现一系列的“非公开的房舍”，如夜间游艺所、滑稽剧场、跳舞场、备有舞女和歌女的舞厅，还有应召性感女郎的酒吧。那时卖身的女人纯是商品，有着不同的价格，也有按时间长短付钱的。一个男人不用花多少钱费多大劲，就可以买来女人，像买一包香烟或一张报纸那么简单，可以享用一刻钟，一个小时或一夜。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比今天的生活方式和爱情方式更为自然更为正直了，今天的青年几乎都是这么理解的。曾是不可缺少的场所妓院逐渐变得不必要了。把卖淫的行当从世界上清除出去，不是靠警察，也不是靠法律，而是由于对它的需要日益减少。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产物，尽管还有一些残余，毕竟在自行消亡。

国家及其道德的官方立场，对那时候不光彩的事情，从来就觉得不舒服。按照社会的道德，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

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角度上看，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的行当，因为它能排解令人烦躁的未婚性欲。于是，那些权威们模棱两可地试图将卖淫分成两种：一种国家视为不道德、危险的应该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的，给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姑娘，决心当妓女，必须得到警察的特别许可和一个准许营业的证书。当她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每周两次医生检查，这些义务尽到后，她就取得了正式营业的权利，她的肉体出租，她觉得应该有合适的价格。合法的妓女像其他行业一样，被看作是一种职业，但又不完全这样——这里暴露了社会道德的马脚。举例来说，一个妓女是商品，她把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妓女却无法控告他，因为她正当的要求一下子变成不道德的，得不到政治当局的保护，法律提出的论据是，这种案件是可耻的，不予受理。

从这些细节中可以觉察到这种观点的矛盾性：一方面把这些卖身妇女纳入国家允许的职业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又把她们看作是置于普通权利以外的弃儿。但是，实际上的不公正是旧习俗一手造成的。所有的一切限制只是针对贫苦阶级的。一个芭蕾舞女演员在维也纳以二百克朗一小时的要价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愿出此价的男人；而流浪在街头无执照的少女每小时只两克朗。至于那些名交际花，在一篇关于跑马或跑马大赛的报导中，将她们的名字与出席观看赛马的显贵人物并列在一起，因为她们早已跻身于“社交界”。同样出现了几个最富有的女经济人，她们把“奢侈品”介绍给宫廷、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法律通常对拉皮条的人要判重刑的，而她们却受法律的庇护。严格的纪律、无情的监督、社会的谴责，不过是针对成千上万的

妓女大军罢了，而她们却用自己的肉体和被凌辱的心灵去维护那个反对自由和自然爱情的已早腐朽的旧道德观。

这支卖淫的庞大队伍分成不同的种类，恰似一支正规军分成骑兵、炮兵、步兵、要塞炮兵等各类兵种一样。最早当妓女的那些人好似要塞炮兵，她们占据几条固定的街道作为自己的营地。这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纪的刑场，或者是麻风病区，或者是墓地。这些地方是无业游民、刽子手和其他一些被剥夺公民权的人的藏身处。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早就躲开此处远远的。有关当局在这里的几条小巷内开辟公开的色情市场，就像日本东京的吉原街和开罗的鲜鱼市场一样，青楼座座，倚窗可望。一直到二十世纪，这里还有二百或五百个妓女，一户挨一户，在平房的窗前招徕客人，这种廉价商品还分昼夜两班。

还有一种流动性的妓女，就像骑兵和步兵，她们在大街上寻找顾客。在维也纳通常把她们称为“游动的姑娘”，因为警方给她们划了一条无形的固定区，只允许她们在这里招揽生意。她们白天黑夜在大街上游荡，从深夜到黎明，不管是大雪纷飞还是淫雨连绵，她们强粉饰脸面，拖着如铅的双腿走街串巷，强打精神向过路的人报以诱人的微笑。她们没有欢乐，却把欢乐给了别人。无尽头地从这个角落荡到另一个角落，最终不可避免地她们都要走到一条路上：走进医院之路。我觉得，自从变得大街上没有这一群饥寒交迫、愁眉苦脸的女人以来，所有的城市更加美丽更加慈善了。

即便有这么一大群妓女，仍然不能满足日常的需要。有些人希望过一种更加舒服更加隐蔽的生活，而不愿意在大街上追逐漂浮不定的蝙蝠和飞来飞去的极乐鸟。他们想享受更加幸福

的爱情：要有灯光和温暖，要有音乐和跳舞，还要有一副豪华的派头。这样的嫖客可到“不公开的房舍”——妓院去。这里有一间假冒豪华所谓的“沙龙”，一群姑娘聚集在这里，她们有的穿着富贵人的长礼服，有的穿晨服。男男女女在一块饮酒、跳舞、聊天，旁边还有一个钢琴师在弹奏乐曲供他们消遣，玩够了，就成双成对的悄悄地溜进卧室。一些高级的妓院，特别是巴黎和米兰具有国际声誉的妓院，到了这里，就会产生一种天真的幻觉，好像走进了一个生活有点放纵的贵妇人的内室。这里的姑娘与在大街上拉客的姑娘相比，脸蛋漂亮一些。她们不受日晒雨淋，也不受满是污泥的小巷里游荡之苦，坐在温暖的房子里，穿着时兴的服装，有丰菜佳肴，酒随便喝。可说到底，她们又是老鸨的俘虏。老鸨供给她们衣服，以提高她们的身价，供给她们膳宿，是为了给她赚大钱。这样以来，即便是最勤劳、最有毅力的姑娘也会背上一身债，她们将永远无法按自己的意愿离开这所房子。

要把某些妓院的秘史写出来，一定很精彩，而且也能成为当时文化的一种实在的文献记录，因为这些妓院隐藏着最为特殊的秘密，就是严厉的官府对这些秘密自然是很清楚的。高级妓院，都有秘密的入口和专用楼梯，最高层社会人士——像私下传说的，甚至有宫廷的人物，可以从此进入妓院，而不会被那些该死的人看到。这里有四面镶镜子的房间；有能够看到隔壁房间里一对男女正在作销魂之事的房间；那里还有专为性变态者迷恋异性服饰而准备的最奇特的服饰，在衣箱里，在衣柜里，从尼姑的长袍到芭蕾舞女演员的剧装，应有尽有。就是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社会，就是这种道德风尚，当一个年轻姑娘骑上自行车，它们就会愤怒地斥责这种有损于科学的尊严；当

弗洛伊德用冷静的、清楚的、透彻的方式说出真相时，这样的社会和道德风尚还不想承认。恰恰是这个如此慷慨激昂地维护妇女纯洁的世界，竟允许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组织并统管这种行业，从中渔利。

但愿今天的人们不要被那个时代感伤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所迷惑；对青年人来说，那个时代是个糟糕的时代，一个年轻姑娘在家庭严格管束之下，完全与实际生活隔绝，身心的自由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而年轻的小伙子也受到这种道德的限制，但他们并不相信这种道德，谁也不遵守这种道德，所以他们秘密的去干那些不可告人的事。男女青年无拘束地正常交往，恰是自然法则决定的，应当是幸福的，快乐的，可正常的交往只是凤毛麟角。那一代的青年，谁也记不得他与一个女人最初的接触中，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欢乐和留恋而值得怀念。因为除了社会压力迫使他们随时都要小心翼翼，生怕做错事。此外，当时还有一个罩在心灵上的阴影，不论出现任何情况甚至是最温柔的瞬间，也不会忘记这个阴影：即害怕染上性传染病。在这一点上，那时的青年与现代的青年相比，要不幸得多。因为不要忘记：性传染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现在重一百倍，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险和可怕一百倍。这是因为当时医院对性传染病实际上毫无办法，没有今天这样的又快又方便的科学治疗方法。现在治疗性传染病已不困难。在一般医院、大学的大中型医院，用保尔·埃里希[1]的疗法只需几个星期就把性

①保尔·埃里希（1854—1915），德国著名医生、化学家，因发明治疗梅毒的药品“六〇六”而闻名于世。

传染病治好了，以致一位教授无法向他的学生展示刚染上梅毒的初期症状，因为初期的都治好了。在当时，根据军方和大城市的统计，十个年轻人中至少有一两个人成为性传染病的牺牲品而丧命，所以有人不断提醒青年人要注意这种危险。当时你若在维也纳城里行走，每隔六七栋房子，就会看到这样的招牌：“皮肤病、性病专科医生”。另外，不只是害怕传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那种令人生畏和有失人格尊严的治疗方法，现在世界上的人已不知道这种方法了。一个染上梅毒的病人，先把他的全身涂上一层水银，要连续几个星期，其副作用是牙齿脱落，身体其他部分也受到损害。一个偶然沾染上这种恶疾的不幸牺牲者，感到不仅是身体被玷污，而心灵上也受到创伤。纵然经过这样可怕的治疗，患者自己也不能保证，可怕的梅毒是否不会从包囊中随时复发，其结果是脊椎神经麻痹致使四肢瘫痪，前额部脑组织软化。因此之故，当时有些年轻人一旦发现自己被诊断患上梅毒，就会立刻拔出手枪自杀，因为他们认为，得上这种病会连累亲人被怀疑也有此病，由此形成的思想压力在感情上是无法忍受的。不但如此，一种只能在暗处过性生活的还会带来其他烦恼。如果我尽力追忆过去发生的一件件一桩桩事，我依然记得起我年轻时代的伙伴，他们个个都是面色苍白和心神不宁地来到学校，其中一个得了病就怕自己得的是梅毒；第二个因为要求对方堕胎而受到敲诈；第三个是背着家人去治病，又没有钱；第四个是他不知道如何支付女招待给他留下那个孩子的赡养费；第五个是因为他的钱包在妓院被盗，但他不敢去告发。总而言之，在那个假道德的时代，青年人所经历的比那些御用文人写的小说和戏剧更激动人心；另一方面，也更加不清洁，更加紧张，更令人苦恼。在学校和在家里一样，在

青年人性生活这个范畴内，没有自由和幸福可言；而性生活的自由和幸福正是青年人这个年龄所要求的。

这是一幅反映时代风貌的真实图画，对画中的一切我们必须反复强调，因为我常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青年聊天，我几乎是强迫他们相信，我们这一代与当今一代人相比，根本不具备优越的条件。当然，从为国家尽义务这方面说，我们比现在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他们服兵役、服劳役，在许多国家服兵役和服劳役是百姓应该为国家做的，其根本就是愚蠢世界政治的飞扬跋扈，百姓不得不服从。然而，那时的我们没有这些兵役和劳役，专心致志地钻研自己的艺术和其他精神爱好，使私人的生活更加个性化。全世界都向我们开放，所以我们的生活更富有世界主义色彩。我们没有护照和通行证依然可以到处旅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没有人检查我们的思想、出身、种族和宗教信仰。我从来不否认，事实上我们享有比今天更多的个人自由，我们不仅爱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①曾说的，他说得好："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皆美的事是稀少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而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而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过去我们曾过得挺好，经风雨见世面，而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丰满，更自觉地度过青年时代。今天我看到年轻人从中小学校里、从大学里走出来，昂头挺胸，目光如炬，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学生欢快地聚在一起，随随便便，毫无顾及，十分友好，没有虚伪的羞涩和腼腆，在一起学习，在一起运动，在一起滑雪，像古希腊古罗马人那样

①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德国戏剧家。

在一个游泳池里自由地互相比赛，男女两人同在一辆小轿车里穿过田野兜风，他们像亲兄弟姐妹似地过着健康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没有任何内在的和外在的负担，这件件事情使我感觉到，我同他们之间的时间距离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当时我们为了表达爱情或接受爱情，总得找个僻静之处，偷偷摸摸进行。我十分高兴看到，有利于青年一代的社会风尚的变革是多么巨大啊！我们在爱情上、生活上获得了多大的自由啊！这种自由大大地促进了人的身心健康。自从妇女举止不受限制以来，穿着随便，举止自然，我觉得她们更漂亮了。她们走起路来，腰挺得直直的，眼睛明亮有神，谈吐更为自然。这新的一代人根本没有监督他们，包括父母、姑姨和老师们；他们从来不知道曾经阻碍我们发展的种种阻力、恐惧和不安情绪。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了对自己和自己的良心负责外，无需向任何人解释，这是他们有自信心的表现。他们不会知道，当年我们为干一件男女之间的违禁之事，必须找个无人去的角落，偷偷地进行。而新一代的年轻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干这种违禁的事是他自己的权利，不必偷偷摸摸。这一代青年人幸福地享受着青春的年华、朝气蓬勃的年华、轻松愉快的年华和无忧无虑的年华，这恰恰是他们那个年龄所需要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幸运的是他们不用在别人面前说谎，可以把自己的自然感情和欲望如实地表达出来，不用自欺欺人。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自由自在的过一辈子，他们心中没有我们那个时候的惧怕的精神压力。他们认识到男女相爱是极自然的事，所以他们不当作一回事。可是，我们当年对男女相爱的事看得十分宝贵，认为最迷人，同时伴随着羞涩和腼腆而引起的秘密心理压抑，也产生了一些温柔中的温存。也许他们根本不会预料到，正是这种忌讳的事造成恐惧

反而带给我们莫明其妙的乐趣。我总觉得与现在的青年人从担惊受怕和消沉沮丧中解放出来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充分享受到无拘无束的感情和自信——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些是不存在的。

大学生活

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可恨的中学大门在我们身后终于关上了。费了不少力气，我勉强通过了结业考试。——究竟我们从数学、物理和经院哲学学科中学到些什么？——我们很荣幸有机会能够穿上庄重的黑礼服，聆听校长一通激昂慷慨的演说，说我们已长大成人，今后就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为国家争光。随着毕业，八年之久的同窗友谊就这样云消雾散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混了八年的伙伴就很少见面了。我们同学中的大多数进了大学，那些不得已找工作当雇员的同学只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

因为奥地利大学在那个时代还具有浪漫色彩的殊荣，所以当上一名大学生就觉得有了一定的特权，这个特权表现在年轻的大学生总觉得比所

有的同龄人优越得多。这种古怪离奇的现象，在德语国家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很有必要对这些荒谬的不合时宜的事作一番解释。奥地利的大学大多是中世纪创建的，在当时研究科学被视为非同一般和特别有意义的事。为了吸引青年人到大学来学习，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不受一般法庭的约束；也不准警察到大学里搜查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别的制服，他们有与别人决斗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人们把他们称作是一个有自己的习俗或恶习的学生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逐渐民主化，中世纪留下来的所有帮派和行会开始瓦解，逐步销声匿迹。此时，欧洲大学的所有大学生失去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唯有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等级观念一直凌驾于民主政体之上。而这些大学生顽强地抱着这些早已失去意义的特权不放，甚至把这种特权变成大学生们自己的法典，成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德语国家的大学生认为自己除了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和荣誉外，还要享有大学生所具有的特殊“荣誉”。谁要是侮辱了一个大学生，该学生必定向他“决斗”，所谓的决斗就是用手枪向对方射击，如果对方证明“有决斗的权利”，那么决斗就立刻进行。所谓“有决斗权利”，充满自豪感的大学生认为，有此权利的人不是商人和银行家之类的人，而是受过大学教育取得学位的人或者军官这些高尚人；这些高尚的人认为与这样不明事理的嘴上无毛的大学生击剑是一种“殊荣”，能有这种“殊荣”的人在数百万人中不见得有一个。另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就必须“证明”自己有着男子的阳刚气概，这种男子气概以他尽可能地参加决斗为标志，甚至在他的脸上留下英雄行为的标志——“剑刺伤疤”——此名天下知。丰润光滑的双颊、口方鼻直，和一

个日耳曼大学生气质极不相称。戴着红袖标的大学生团的学生，一直在寻找“打斗的对象”，他们相互之间挑战，还向另一些和气温顺的学生和军官挑起事端。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在击剑场上都要在“大学生团”的强制灌输下，学会他们这种荣耀的争斗这门主课，要他们恪守“学生团”的规矩。每个“未经调教的小马”，亦即新来的学生，都被分到“学生团”兄长的统领之下，让他们奴隶般地服从他，他进一步去教会新来的大学生高贵的“生活习惯”，要他们成为有英雄气概的人：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啤酒，滴酒不漏，直至狂饮到呕吐方显英雄本色，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或者集聚在一起大唱校园歌曲；或者在夜里成群结队任意喧闹通过大街小巷，嘲笑路边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男子汉大丈夫”，被看作是“大学生气概”，被看作是“德意志精神”。每逢星期六，大学生团的学生们，戴着各色的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走出去“在城里闲荡”。这些思想单纯，恃“德”“才”傲世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才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者。他们蔑视那些看不惯或不理解他们这种大学生文明和德意志男子汉气概的人，认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

我是一个小省份的高中毕业生，到维也纳来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这里开始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快乐的大学生时代”，我把它当作是浪漫主义的集中体现来看。我曾经见过，数十年如一日地住在农村里的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们，他们异常兴奋地仰视着斜挂在房子里的剑和各色袖标；骄傲地显示脸上的创伤，以此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现在见到这些，这种头脑简单以蛮干为荣的行为是多么令人厌恶啊；当我们看到带有这类标志的东西时，我们会明智地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认为，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嗜好侵略和同

时嗜好挑衅生事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民族精神中最糟糕的和最危险的因素。另外，我们还要明白，在这种非自然的，乔装打扮的浪漫行为的背后后包藏着欺诈的实际目的。因为这便可以看出，一个人属于“好斗”团伙的成员，他就会得到该组织“元老”人物的提携，日后得到高官爵位；也容易飞黄腾达；凡在波恩是“普鲁士学团”的人，就得到唯一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可靠途径；在奥地利的大学生，参加信奉天主教学团的人，则能找到在执政党基督教社会党中谋一肥缺的途径。这些“英雄”中的大多数人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彩色袖标是未来的铺路石，它可以替他们补偿在大学里所耽误的一切。前额上有点剑疤比无剑伤在任命和提升上更为有利。只要看看这群军国主义党徒的可恶嘴脸，和脸上带剑伤而无事生非的神气，就使我这个刚跨进大学门槛的年轻人十分扫兴。另外，那些真正埋头读书的人也尽量回避这些“英雄”们。他们到图书馆去，宁愿走不被人注意的后门，也不穿过大厅，就因为不愿碰上这帮可悲的家伙。

我能够上大学，是全家早就商量决定的。但究竟要学习哪个专业呢？我的双亲让我自己选择。我的哥哥已经进了父亲的工业企业，因此，父亲对第二个儿子似乎不那么着忙了。只是关系到家庭的荣耀，非要我取得博士学位不可，至于我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特别是我对学哪种专业也无关紧要。我的心灵早已献给文学，所以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甚至，我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至今这种不信任感依然没有消除。我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① 公理是

①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1882），美国哲学家、诗人、演说家。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尽管一个人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但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曾发现无数个事实，一个旧书商对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比专门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在各领域中，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外行人提出的。因此，我觉得，大学对智商的普遍提高具有实际意义，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而大学对那些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则是无效的，甚至会起阻碍作用。特别像维也纳大学，仅学生就有六七千人，人满为患，老师与学生的有益接触从开始时就受到阻碍。因为保持了学校里的旧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所以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对我有吸引力。因此，让我选择专业范围并不存在。倒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相反的，是这个专业不使我头疼，又能为我的爱好腾出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我最后选择了哲学专业。按旧的观念来说，我们称它为“严密的”哲学。但这实在不是我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纯抽象思维的能力很差。我的思维无不是从具体事物、事件和人物形象中衍生出来的。纯理论和形而上学我是无法学会的。哲学里纯物质的论述是极有限的，所以听“严密”哲学的讲课或讨论是最容易混过去的。唯一要作的是第八学期末要交一篇学术论文，参加仅有的一次考试。因此，我早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头三年大学课程根本不用去管！最后一年全力去攻经院式的教材。草草写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给了我所希冀的唯一东西：我一生中最充裕的几年自由时间，来研究文学艺术，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

当我回想自己的一生时，那种光上学不上课的幸福时刻，在

当时的大学里还不多见。我当时还年轻，还不懂什么是事业心和责任感。不管怎样，我还是做得很成功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基本上都属于我的，我可以看书，也可以创作，一切由自己安排，无需向别人解释。凡是在可见的视野之内，尚没有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我都这么做的。三年时间，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长很长的，是那么充足和富裕，给我带来多少意外的欢乐和意外的收获啊！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我过去写的诗，用我的话来说，要进行一次严格的毫不惋惜地筛选，集成一本诗集。我问心无愧地承认，一个十九岁刚高中毕业的学生，闻着铅字的油墨味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味道，比设拉子① 的玫瑰油还要香。不论哪一家报纸刊登了我一首诗，自然而然地给我脆弱的心灵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难道我不应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部自己的诗集吗？在那些比我还有信心的同学鼓励下，促使我终于下了决心。我大胆地将诗稿寄给了舒斯特尔/勒夫勒出版社，在当时该家是专出版德语抒情诗的有名望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李利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诗集，同时也出版过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德语新抒情诗。不久，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接踵而来，第一次的那种幸福时刻是作家功成名以后再也体味不到的。一封盖有出版社大印的信终于来到了，我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把信拆开。当我看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提出要求出版我今后著作的优先权时，那一瞬间，激动得我透不过气来。又过了不久，第一校样包裹到了，我打开包裹时，心里怦怦直跳，看到铅字校样、版式和书的毛

①设拉子，伊朗西南部城市，位于山间盆地中，盛产葡萄和玫瑰花。

本。又过了几周，寄来了第一批样书，我不知疲倦地查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不久，又像孩子一样，跑到书店里溜达，看看有没有我的书，看看摆在什么地方，是书店的中央呢，还是在角落上。以后呢，就只等来信，等读者的来信，期待第一个批评和评论信，期待某个不相识的人或意想不到的人最初的反映。所有的紧张、激动和兴奋，是一个年轻人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时都会产生这种心情的，也是青年人暗暗羡慕的。但是，这种兴奋是我第一次成功所带来的，并非是沾沾自喜。以后再也没有再版我的第一部诗《银弦集》(这是那部销声匿迹诗集的名称)，不但如此，甚至我没有从中挑选出任何一首列入我的《诗集》。我第一部诗集里的诗，产生于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不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为了引起同行们的兴趣和注意，这些诗至少体现出音乐美和形式美。因此，我不能抱怨没有引起足够的鼓励。当时在抒情诗方面走在前面的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把我列为他们的同行，并衷心盛赞我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诗人里尔克，将他新出版的诗集单行本送给了我，作为对我的“如此美好的书”“答谢”的回赠，我把里尔克赠给的新诗集作为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可能在何处?)。至今我心里总有一股酸楚，觉得里尔克送给我的第一件礼物——是许多礼物中最珍贵的一件——已有四十年了。那些熟悉的字句，再要索取，只有到冥府去讨了。最使我欢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与里夏德·施特劳斯有同样名气的，是当时在世的之中最伟大的作曲家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从我的诗集中选六首诗谱成歌曲，以后我常常在音乐会上听到我的这首诗或那首诗谱成的歌

曲——一些连我都忘记了或遗弃的诗句，却由这位大师用兄弟艺术将其流传下来。

这些意外的赞许和同时伴随着友好的坦率的批评，总算及时起了作用，给我增加了力量，使我有了勇气克服掉了信心不足，克服了过去从来没有至少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的懦弱心理。在中学时代，我除了诗歌以外还有短篇小说和随笔，发表在文学杂志《现代》上，但我从来不敢向一家有影响的大报投稿。在维也纳只有一家大报，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不论是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威望，对整个奥匈帝国产生过巨大影响，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语报纸，没有一家能达到如此卓越的水平，也没有为达到卓越水平而不懈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了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语报纸而竭尽全力，办报像着了魔一样。如果他崇拜某一个作家，他会不惜代价，连续给作家发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预支一部分稿费。每逢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就增加文学版面，刊登当时最有名的作家的全部著作目录。阿纳多尔·法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肖伯纳等这些大师们借此机会在这张报上聚会。这家报纸在指导全城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中做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这家报纸的世界观是“进步”的，是自由主义的，办报的态度是踏实、严谨的，该报代表了老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起了模范带头作用。

在这个“进步”的殿堂里藏有一块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

的文艺专栏“副刊”，像巴黎的名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万变的政治新闻和日常消息有“明显的”不同，它只刊登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只有那些早有定论的权威人士在这块圣地上才有发言权。只要具有精辟的判断力，又有多年的实际经验，还要有炉火纯青的文笔之人，再通过几年的试用期，才能到这座圣殿里担任副刊的主编，就像圣伯夫① 以他的文学评论《月曜日》称霸于巴黎一样。路德维希·斯派达尔是小型艺术大师，爱德华·汉斯利克则是戏剧和音乐方面的权威，他们都是这座圣殿里的主持。在维也纳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一部作品、一出戏剧、一本书的命运，从而也常常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副刊上的每篇文章都成为知识界日常敏感的话题，引起大家的讨论、评议、赞赏或批评和反对。如果在这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冒出了一个新名字，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尔用他的几篇优美的文章才有机会敲开副刊的大门，而其他年轻作家却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送到文学刊物上发表。谁要是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发表文章，就等于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树立了大理石丰碑。

在我父辈眼里，在高层人士的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成了圣贤，而我竟把一首小诗投给了该报，时到今日我仍无法理解，当时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不过这次投稿并没遇到该报的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每周只有一天是对外接待时间，还

①夏里·奥古斯坦·圣伯夫(1804—1869)，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他的文学评论陆续发表在《月曜日漫谈》上，共十五卷；后又出版《新月曜日》，十三卷。

是在下午二点到三点的一个小时之内，他依次循环地接待固定撰稿人，接待自由撰稿人的时间极少。我顺着旋转式的小楼梯走到编辑先生的办公室门前，心里不自主地怦怦直跳。我请人去通报，几分钟后侍者回来，说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名字叫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他是我一生遇到的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第一个人物。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这个人在决定犹太民族的命运中和我们时代发生的事件中，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在那个时候，他的观点充满着模棱两可的矛盾。他以写诗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接着表现出了他办报纸的出色才能，他首先是驻巴黎的记者，以后担任《新自由报》副刊编辑，逐步成为维也纳公众最喜欢的人物。他的文章，由于有尖锐的、智慧的观察力，至今仍具有非凡的魔力。他的文章，风格优雅，高贵而又妩媚，不论是轻松的文章还是批评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风度。在我的记忆中，在当时所有作者的文章中，唯有他的文章最有素养，全城的人为之倾倒，令那些吹毛求疵的人目瞪口呆。他写了一个剧本在皇家剧院上演过，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了一位名人，成了青年人追逐的对象，为父辈们所尊敬，直到发生意外事件的那天为止。命运总是捉弄人的，它把需要的人找来，让他去完成它那件秘密的使命，尽管这个人在命运面前想躲藏起来，但无济于事。

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在巴黎曾经历过一件震撼心灵的事件，改变了他过去的一些看法。他作为记者公开列席贬黜阿尔

弗雷德·德雷福斯[1] 的全过程。尽管德雷福斯的脸色苍白，并高喊："我没有罪!"还是把他的肩章撕了下来。这一举动，大大地触动了赫尔茨尔的心灵。他真切地知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可怕的叛变罪名，因为他是犹太人。正直的、见义勇为的特奥多尔·赫尔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关心犹太人的命运。甚至他本能地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悲惨命运，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事件。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和对世界的了解极为丰富，应该成为一个领袖，他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命运的大胆计划，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一直有一个戏剧性的幻想，有朝一日他率领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进斯提凡大教堂，用这种象征性的示范行动，把这个被驱赶的没有祖国的民族彻底地从歧视和仇恨的厄运中解救出来。不久，他就认识到他的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他工作几年后，对他自认为已经要"解决"的事，不再留心注意了。而眼前，他看到德雷福斯被贬黜，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被歧视，他心如刀绞。他想，如果种族隔离不可避免，那就要彻底隔离！如果我们的命运遭受凌辱，就勇敢地迎上去。如果因为我们没有祖国而受欺辱，那么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祖国！因此，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书中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寄希望于忍让，对犹太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原来的故乡巴勒斯坦重建起自己的新国家。

---

[1]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国军官。出身犹太中产阶级，官至法国总参谋大尉，他被控告将秘密情报出卖给德国，史称"德雷福斯事件"，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排犹阴谋。

当这本小册子出版时，产生了钢箭刺破天空的作用。当时我还上中学，不过至今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在维也纳犹太人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引起了普遍震惊和恼怒。他们怏怏不乐地说，这个有才干、又有风趣、且有文化修养的作家想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些蠢话？干这种蠢事？我们为什么要到巴勒斯坦去？我们说德语，又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下我们的生活不是过得挺好吗？我们不是过得挺体面，地位也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又想帮助犹太教的人将把柄交给我们凶恶的敌人手里呢？现在我们无时无刻都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融合一体，为什么他却要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呢？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犹太教的传教士愤怒地离开了布道坛；《新自由报》的领导人宣布，绝对不准在他的“进步”报纸上出现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①，卡尔·克劳斯，这个恶毒的讽刺能手，写了一本名为《锡安山②上的国王》的小册子，极尽挖苦刁钻之能事。还有一次，当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走进剧院，穿过一排排的观众，观众不但不欢迎他，反而讥讽地喃喃低语：“陛下驾到！”

起初，赫尔茨尔认为可能是被人误解了。他一直受到维也纳人的爱戴，他住在维也纳，感到最安全，他们怎么会离开他，又怎么会嘲笑他！但是对他的回答是如此的严厉和愤怒，这突

①忒耳西忒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此人善言好斗，常比喻尖酸刻薄者。

②锡安山，位于耶路撒冷，常以此喻耶路撒冷城。

如其来的变化简直把他吓坏了。他不过是写了几十页的小册子，竟然在世界上引起惊涛骇浪般的反响，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这些反响，不是来自那些过舒适安逸生活的西方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里西亚、波兰、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尔茨尔没有预料到，他那本小册子居然重新使流落异国他乡的所有犹太人心中快要熄灭的星星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了；广大犹太群众从小册子中看到，圣经中已经是谈了上千年的弥塞亚① 的复国梦想快要实现了，他们热血沸腾，急切返回自己原来的祖国——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是千百万受奴役受欺凌的犹太人心中唯一有意义的精神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先知或是一个骗子的豪言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心震撼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规模如此浩大，并且还有海浪澎湃般的反响。只一个人用几十页厚的小册子把一盘散沙的争论不休的犹太群众团结起来了。

我想，他的这种思想尚处于幻想和尚未确定形式的地步，属于开创的最初阶段。虽然如此，无疑是赫尔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一旦他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目标，聚集力量，这时他一定会看到，犹太这个民族有各个层次，祖先不同，命运不同；有的信教，有的不信教；这里的人拥护社会主义，那里的人拥护资本主义；宁愿操着各种不同语言，互相在激昂地争论，都压不住心中的火气，而不愿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语言。一九〇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处于矛盾之中，也许包括着他同自己的斗争。他不相信能做到：放弃养家糊口的工作，去干自己的事业。他还必须把自己的精力注入小小的记者工作和任

①弥塞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领袖。

务上，这才是他的真正生活。这就是当时接待我的副刊编辑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先生。

我走进赫尔茨尔的办公室，他站起来表示欢迎。这时，我不禁发现，“安锡山的国王”这个具有讽刺味道的浑名对他来说还有几分道理。他的前额高高的宽宽的，面部线条清晰，留着黑浓浓的教士式的胡须，一双深蓝色忧郁的眼睛，看起来真像一个国王。由于他的 神态威严又豪放，所以他有些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也不造作，反而显得自然得体。我一点也没觉得，他在与一个小人物会面时故意摆出一副臭架子。在那间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小房子里，摆着一张旧写字台，上面堆满了纸张，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办公，活像一个贝督因人①的部落酋长。他身着一件贝督因人的白色长衫，非常合身，就像是按着巴黎的样式精心剪裁的燕尾服，他有意识地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喜欢这种小小的间歇，以后我常注意到这一点，他喜欢稍微的停顿产生的效果。他可能是在皇家剧院里学到的。他前倨后恭地把手向我伸来，并示意让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并问道：“我觉得在什么地方看到或听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必须点头承认。于是向椅背一靠，说道：“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大作?”

我说，我很高兴让他看看我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把手稿递给他。他先翻了一下页数，可能在估计有多少篇幅，随后将身子深深地埋进椅背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开始读我的手稿（当着我的面，立刻读手稿，我压根儿没想到），他看得很

①贝督因人，是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的游牧民族。

慢，一页一页翻下去，全神贯注，眼光始终没离开手稿。他看完最后一页，慢慢地把手稿叠好，放进一个文件袋里，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他始终没看我一眼，屋内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我仿佛处于一种神秘莫测的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中。我觉得，过了那么久，他才抬起头来，用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而又严肃的口气对我说："我很高兴我能告诉您，《新自由报》副刊将发表您的那篇漂亮的散文。"顿时，我就感到这气氛像在战场上拿破仑将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中士的胸前一样。

看起来，这是一件微不足道、意义不大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个时代的维也纳人才会理解，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赫尔茨尔的惠爱意味着我将会一下子步入青云。我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将会一夜之间跻入名人行列。特奥多尔·赫尔茨尔同我第一次见面起，对我一直备加关照。同时，他借与我认识的机会，立刻写了一篇文章，告诫人们，不要以为维也纳的文学艺术已趋衰落，恰恰相反，除霍夫曼斯塔尔之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年轻的天才，其中不乏最优秀者，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特奥多尔·赫尔茨尔这样的名人，率先为我能获得显赫的也是责任重大的社会地位而大造舆论，使我感到莫大的荣幸。但是我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参加或共同领导他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这对我来说，是个难以下决心的事，这样看来，似乎我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但是我确实不愿同他紧密联在一起，这是我同他疏远的主要原因。有不少人甚至赫尔茨尔自己党内的人对他采取不尊重的态度，这意 味着分裂。今天我们很不容易理解这种不尊重态度的后果。在东方的同志责备他不懂犹太精神，甚至连犹太人

的风俗习惯都一无所知。那些民族经济学家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副刊编辑。人人都有反对他的理由，而采取的态度都是不礼貌的。我很清楚，当时那些完全献身于他事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热情，曾使他信心倍增，可是这些年轻人极需受教育，在这个小圈子里，缺乏诚恳、友好的态度，彼此争论不休，恶语相加。就这样，我疏远了他的犹太复国运动。出于对赫尔茨尔的尊重，同时也有点好奇。我接近了这个运动，当我们有一次谈到犹太复国运动时，我公开承认，我对他的成员中缺乏纪律性感到不满。他有点苦笑地对我说："请您不要忘记，我们数世纪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是不严肃的，对思想意识的无休止的争吵已习以为常了。两千年以来，我们犹太人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做出实际的或现实的贡献。我们现在不得不学习这种无条件的奉献精神，而我自己今天还没有学会这种精神，因为我还要给副刊不断地写文章，我毕竟还是《新自由报》副刊的编辑，我的职责是在报纸上只能宣传一种思想，而不能散布其他思想。不过，我正处在改变自己现状的过程中。我自己先学习完全的献身精神，这样，或许其他人会跟着一起学了。"我至今记得很清楚，他的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赫尔茨尔久久不能下定决心放弃他在《新自由报》的职位。大家都以为是为了家庭生计的缘故。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他为了自由的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私产——世界上的人很晚很晚才知道这件事。他的这一番话，还有许多他的日记，都清楚地表明，他陷入内心矛盾之中，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自那以后，我同他见过多次面，不过，所有相见之中唯有一次值得回忆，并难以忘怀，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的缘故吧，我

在国外，我与维也纳只有通信联系。回国后的一天，我终于在市公园里遇见了他，显然他是从编辑部走来，他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着，不再像过去那么生龙活虎。我礼貌地向他问好，想匆匆走开。但是他快速向我迎来，一边伸出手，一边说："您为什么老躲着我？您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说我能经常到外国去，这很好。"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他接着说，"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国外学到的。一个人只有到了国外才能自由思考问题。我相信，我在这里永远不会产生建立犹太国的想法。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早被他们扼死在萌芽状态之中了。上帝保佑，好在这种思想是从国外带来的，在外国就把一切想好了，他们对它就无可奈何了。"然后他辛辣地讽刺起维也纳来，他说他在此地受到的阻力最大，而不是来自国外。现在，特别是从东方，又从美国，得到了促进的力量，不过他对自己开创的事业已经十分厌烦了。他又说下去，"总而言之，我的错误是开始的太晚。维克托·阿德勒在他斗志最旺盛的年华，三十岁就已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了，还不用说历史上那些大人物。您会知道的，我为失去青春年华，为我未能早早从事自己的事业，我思想上是多么痛苦啊！如果我的健康状况如同我的意志那么坚强，那以后的事就会好一些。可是，逝去的年华再也赎不回来了。"我陪他走了很长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我伸出手，说道："您为什么从不到我家里来？您从不来看看我。只要您事先来个电话就行，我现在已有空闲时间了。"我答应以后来看望他。实际上我是下定决心不实践自己的诺言，因为我越是爱戴一个人，就越珍惜他的时间。

不管怎样，我还是到他那里去了一趟，那已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当时他病魔缠身，终于突然倒下，我只能陪伴他到墓

地去。那是七月的一天，凡是亲身经历过那一天情景的人都不会忘记这个不寻常的日子。突然间，到达维也纳各车站的每趟列车，不论白天还是黑夜，运载了大批送葬的人。他们来自东方和西方，来自俄国和土耳其的犹太人；还有从各省份和大小城市来的都涌到这里，脸上满是听到噩耗而惊愕的神情。再也听不到过去那种喋喋不休的争吵和流言蜚语的传播。现在他们只有一件事，给自己的领袖送葬。一眼望不到头的送葬队伍，使维也纳骤然发现，去世的不仅是一个作家、一位普普通通的诗人，而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论是在一个国家还是在一个民族，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之后，才会受到犹太民族的如此重视。在墓地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很多不能自控的送葬者像潮水一般涌向灵柩，他们嚎啊啕啊，简直是泣鬼神动天地，长相随、永不离的极度悲哀打乱了当时的秩序。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我从没有看到过如此宏大、如此动人的葬礼。他的死，引起千百万人民内心里巨大的悲痛，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思想威力给世界留下了那么大的激情和希望啊！

我有幸跻身入《新自由报》副刊的作者行列，这对我具有现实意义。从此我得到了家庭的全力支持，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的双亲对文学历来就不怎么关心，也就从来不评论什么。在他们看来，所有维也纳的资产阶级都是一样，《新自由报》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和不理睬什么，它说什么都对。他们觉得在《新自由报》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权威，不管是谁，只要在上面发表篇文章，就会受到尊重。有这样的家庭，每天都以崇敬和期待的眼光注视着这份重要的报纸版面，一旦在某一天早晨他们发现，这个和他们一起坐在桌旁，在学校里并不怎

么规矩的十九岁的年轻人所写的文章居然登在那份大报上（这种“无害”的游戏，总比玩牌或找轻佻的姑娘调情要好），居然在登载大人物的版面上出现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文章（家里的人没有想到这一点），在我们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我能写出像济慈、荷尔德林、雪莱他们那样优美的诗篇，我也不会轰动周围的人，因为文章和诗在报纸上的分量不一样。以前，我走进剧场时，总有人指点着难以捉摸的本亚明①，他曾以令人不解的手段挤进神圣的、值得尊敬的老年人行列。现在，我几乎经常在每期副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也陷入了成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险之中。幸亏我及时地摆脱了这种危险。一天的早晨，我告诉我的父母，下个学期我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他们非常惊喜。全家人都尊重我的想法，或者更确切一点说，由于我有《新自由报》副刊这块招牌，所以他们不好拒绝我的愿望。

显然，我并不想到柏林去上什么“大学”。我在那里和在维也纳一样，一个学期只去了两次大学，一次是取得听课注册证，第二次是让教务人员在听课证上签名盖章。我到柏林寻找的既不是讲座，也不是教授，而是有价值的、完美无缺的自由。我总感到在维也纳受环境的限制，和我有交往的文学界同行几乎都来自犹太市民阶层，像我一样。在这座狭小的城市，彼此之间都非常了解，我毫无疑问是一个“富裕”家庭的阔少爷。可

①瓦尔特·本亚明（1892—1940），德国文学理论家，他对文学艺术提出一系列与传统观点完全不同的新看法，主要著作有《德国悲剧的起源》（1928）、《单行道》（1928）等。

是早就厌烦了这个“上流”社会阶级，甚至我想到“下层”社会阶层中去寻找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到了柏林，我感到一身轻。在这里，我从来不看大学里的课程表，也不知道谁在教哲学课；我只知道这里的“新”文学要比我原来那里的“新”文学更加繁荣、更有活力；我也知道在柏林能看到戴默尔及其他年轻一代的诗人；在这里不断有新的杂志出版，新的小剧场和剧院在落成，总之，用我们维也纳人的话说，在柏林“总有一点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我是在一个很有乐趣的历史时刻来到柏林的。过去柏林是一个相当一般、完全不富裕的普鲁士王国的小小首都，自一八七〇年起一跃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的国都，从此这座位于施普雷河畔的不显眼的小城突然繁华起来，可是文化和艺术的领导中心不在柏林。慕尼黑因拥有大批画家和诗人，自然是艺术的中心；音乐吗，自然是德累斯顿的歌剧；而各个诸侯国家的首府在文学艺术上各有各的特色；尤其是维也纳，凭借它数百年的文化传统和凝聚力，吸引或产生了大批人材集聚在这里，在文化艺术方面远远超过柏林，不过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柏林开始了新的一页。巨大的康采恩、腰缠万贯的家庭纷纷迁入柏林，新的富有伴随着强大的冒险精神，为柏林的建筑业、剧院的建设开辟了任何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光辉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庇护下，各种类型的博物馆进行了扩建；剧院找到了像奥托·布拉姆这样出类拔萃的领导人。正因为柏林缺乏真正的文化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青年人来此闯一闯，因为传统往往意味着是一种阻力。受古老传统的束缚、把过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维也纳，必然对青年人和他们的一切新尝试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在柏林则鼓励这种新

探索，因为它正想迅速为自己塑造一个有个性的形象，所以它在寻找新的东西。因此之故，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甚至从奥地利，一起涌入柏林，就不足为奇了。那些有才能的人自然在这里取得成就。维也纳人马克斯·赖恩哈德为了求得一个职位，不得不在维也纳等上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用了两年就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位。

我到柏林的时候，正是这座城市由一个普通的京都变成世界名城的过渡时期。由于伟大的祖先遗留给维也纳的是一片美景，所以按这个标准来看，柏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失望的。主要的市容应该向西方学习，应该发展新型建筑，而不是过于发展装饰过分的动物园式的房屋，而这种新型建筑在柏林刚刚开始。在市中心建了两条建筑造型单调、粗制滥造的豪华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莱比锡大街。郊区的维尔默村、尼古拉湖及施特格利茨等地，只能乘有轨电车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谁要是想浏览郊区的湖泊等美景，在那时像做一次探险旅行一般。除了那条古老的“菩提树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还没有一条像维也纳格拉本“林荫大道”那样的街道。由于古老普鲁士的节俭精神，柏林缺少一般的时髦打扮。妇女们穿着自己裁剪制作的、毫无装饰的衣服进剧院。不像维也纳和巴黎人讲究奢侈挥霍，即便是钱花得分文不剩，依然摆出阔架子。在柏林人们处处可以感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近乎吝啬的勤俭持家精神；咖啡淡而无味，因为要节约咖啡豆；饭菜不可口，没有汤也没有滋味。在维也纳到处是音乐声和歌声，而柏林唯有到处干干净净和有条不紊的秩序。譬如说，我上大学时在维也纳租房子住，女房东同柏林女房东完全不同，我觉得这个例子够典型了。维也纳的女房东是个活泼、爱说话的女人，

她并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扫干净，粗心大意，丢三落四，但对人热心，助人为乐。柏林的女房东，倒是无可指责，她把一切都整理的有条有理。在第一个月结账时，我看到她用清秀的斜体字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件小事都记在账上。例如，她给我裤子钉上一个纽扣要三芬尼，擦掉桌上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总共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有点可笑。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我不得不折服普鲁士一丝不苟的精神，虽然这样使人也有些不舒服。在我的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详细记载我的现金支出账目。

我到柏林的时候，带了许多维也纳朋友的推荐信，可是一封我也没用上。我之所以不合规律的到柏林来，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资产阶级安逸的生活和束缚人的环境，不再与那个阶层的人打交道，在柏林独立生活。我只想结识和我文学情趣相投的那些人，而且尽可能认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人物。我没有白读“浪漫文人”的作品，刚满二十岁就想亲身体验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我没有花费多长时间，就找到一个放荡不羁、气味相投的社交团体。我在维也纳时，就和柏林一家有影响的报纸《现代人》合作了，他们自嘲地称该报是“同仁团体”。该报的主编是路德维希·雅各博夫斯基。这位年轻的诗人在他早逝前不久，建立了一个名为“后来者”的社团。社团的这个名称对青年人颇富诱惑力。在诺伦多夫广场旁的一家咖啡馆二楼，每周举行一次聚会。在这个类似巴黎“丁香园”式的盛大聚会上，各式各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有诗人、建筑师、充作文人学士者、记者，还有扮作工艺美术家和雕刻家的年轻姑娘，还有为提高德语水平的俄国大学生和满头淡黄金发的斯堪的那维亚女郎，还

有从德国各省来的人物：骨骼强壮的威斯特法伦人，憨厚的巴伐利亚人及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大家聚集一堂，展开激烈的争论，但不受任何拘束。有时朗诵几首诗或剧本的片断，主要的目的是让大家互相认识。在这些自命豪放不羁的青年文人中间，还坐着一位像圣诞老人似的胡须灰白的老翁。这般高龄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实在令人感动。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因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诗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席勒。这位七十岁的老人，眯缝着蓝色的小眼睛，亲切地、真心实意地望着这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们，他一直穿着一件灰色的风雨大衣，用此遮盖周边已磨破了的西装和很脏的衬衫。每逢我们簇拥着他，要他朗诵一首诗时，他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褶褶皱皱的手稿，一边看一边朗诵。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类型的诗，是一个天才诗人即兴写出来的，只是有点松散，情节上有点偶然。这些诗是他在电车上或者在咖啡馆里用铅笔写的，写完了就忘了，所以他在朗诵时总是很费劲地辨认模糊了的字。他从来没有钱，可从不为钱发愁。他四海为家，今天在这家寄宿，明天在那家作客；他忘却尘世，淡泊名利，只知追求感动人的人生真谛。谁也不知道这位善良的林间樵夫是何时是怎么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的，他来这里想作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他不想出名，也不想显赫；他怀着诗人自己的梦想：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柏林生活下去。以后我又遇到像他一样的另一个人。那些吵吵闹闹的与会者围着他，高谈阔论，他总是和蔼地听下去，从不与任何人争论，有时举起酒杯表示敬意，可也几乎不介于别人的谈话。他给别人一种这样的感觉，好像就在这一片喧闹中，正用他那颗头发散乱又有点倦意的头颅在作诗文呢！尽管此时此地根本不具备产生诗文的条件。

这位淳朴诗人的真挚和纯洁——这样的诗人即使在德国今天也几乎被人忘却了——也许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不再关心“后来者”社团选出的理事会。正是这位诗人的思想和语言，后来决定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在柏林我看到了鲁道夫·施泰纳，他是继特奥多尔·赫尔茨尔之后又一个命中注定为千百万人指路的人。施泰纳以后成为人智学的创始人，他的追随者为发展他的学说创办了规模宏大的学校和研究院。他本人并不像赫尔茨尔那样具有领袖的气质，可是他更富有魅力。他那双深沉的眼睛蕴藏着催眠的魔力，听他讲话如果不盯着看他，会听得更好，注意力更集中。他那削瘦的苦行僧似的脸上闪烁着强烈的激情，这不仅使妇女对他着迷，其他人也被他吸引。当时鲁道夫·施泰纳还没有创建自己的学说，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探索者和求知者。有时候他给我们讲歌德的颜色学。在他的讲述中歌德的形象越来越像浮士德和巴拉塞尔士①。施泰纳的讲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他学识渊博，尤其是我们这些只懂文学的人感到他更是博大精深。听他的报告或者有时同他私下交谈之后，我总有一股兴奋的感觉，同时还有一种抑郁的心情，带着这两种情感回到家里。可是，如果我今天扪心自问，当时我是否预见这个年轻人以后在哲学和伦理学方面会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我不得不惭愧地回答：没有。我期待着，他的探索精神会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成功。如果我听到他用直观的方法在生物学上有一个伟大的发现，我决不会感到奇怪的。可是，在多年以后，在多纳赫我看到那座雄伟壮丽的歌德大楼——

①巴拉塞尔士（1493—1541），德国医生、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家。

“智慧学校”，这是他的学生捐赠给他的那所柏拉图式的“人智学研究院”——时，真使我有点失望。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广泛的社会实践中，甚至有的地方对这种理论已家喻户晓尽人皆知。我不敢对人智学妄加评论，因为我到现在还不清楚，人智学是研究什么的，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甚至我这么认为，人智学之所以有诱惑力，主要不在于这个学说，而在于鲁道夫·施泰纳这个富有魅力的人物。他是一个具有特殊吸引力的人，他总是以友好的、不以权威自居的态度与青年人交谈，由于这样，我与他才结识，应该承认，我与他的交往使我获益匪浅。从他那丰富想象力同时又十分深邃的学识中我认识到，真正渊博的知识，绝不是像上中学时所想象的那样，通过泛泛地读书和讨论就会获得，而是持之以恒、日积月累的刻苦钻研。

在那个广泛吸收知识的时代，友谊很容易结成，而社会和政治的差别尚不十分僵化，一个年轻人学习的根本出发点，最好向那些有共同进取心的人学习，而不向已负盛名的人学习。我再次感到，集体的热情合作必然结出硕果，这种感觉比中学时代高得多，是达到国际水平时的一种体会。我在维也纳的朋友，几乎都出身于资产阶级，而十分之九出身于犹太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这些出身于同一阶层的人爱好只能说是大同小异；而在柏林这个天地里的年轻人来自完全对立的阶层，有的来自上层，有的来自下层；这位是普鲁士贵族，那位是汉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是威斯特法伦的农民贫家子弟。我突然置身于这么一个社交圈子里，在这里也有衣服褴褛骨瘦如柴的真正穷人，在维也纳我从来没接触过这种人。我和酒鬼、同性恋者和吸毒者同坐在一张桌旁。我敢于——甚至觉得骄傲——同一个相当有名的，可是判过刑的冒充大人物的骗子握手（后来他把他自己干的勾

当写成回忆录出版，从而加入了我们作家的队伍)。我被引进小酒店和咖啡馆里，与那些我认为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拥挤在一起。并且，一个名声越坏的人，越能引起我强烈的兴趣，想认识他本人。这种对危险人物特殊的偏爱或者说是好奇伴随了我一生。即便到了守规矩又知书达理的年龄，我的朋友经常责备我，不要同这些不讲道德、言而无信和能损害他人名誉的人交往。也许因为我出身于正派的社会阶层，所以对这个阶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感到有点难过，是穷人的苦带来富人的乐。使我觉得这些人才最有诱人的魅力。这些穷人从不吝惜和近乎于蔑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时间、自己的金钱、甚至自己的健康和名誉。这些热情人是单纯为了生存而没有目标的有偏狂症的人。也许有人在我的长篇或短篇小说中会觉察到我对这些本性豪爽的人有一种特别的偏爱，同时他们还有一种异国他乡的魅力。他们中间几乎每一个人对我强烈的好奇心报以异国世界的礼物。画家埃·莫·利林，这个来自德罗霍毕茨的人，是个信奉东正教穷车工师傅的儿子，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犹太人，我从他身上了解到迄今为止尚不明了的犹太人的精神力量和犹太人顽强的信仰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为我翻译了当时在德国尚无人知晓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①中最精彩片断。一名瑞典女青年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蒙克②的绘画；我在那些尚不入流的画家们的画室里来回转悠，

①《卡拉玛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最后一部长篇巨著。

②艾德瓦·蒙克(1863—1944)，挪威油画家和版画家，他的画风是德国和中欧的表现主义形成的前奏。

为的是观察他们的绘画技巧。一位教徒领我到一间圣灵招魂的小屋去看过。所有这一切使我大开眼界，真是大千世界，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在中学时，我所接触的是纯粹的公式、诗韵和诗句，而现在我在这里接触的是人。我被他们所鼓舞，对另一些人很失望，甚至有些人欺骗我。可是我坚信，在柏林短短的一个学期，完全自由的第一个学期里进行的社交活动要胜过以往的十年。

这样广泛地接触现实生活，想必会大大增加我的创作欲望，好像这样才合乎逻辑。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在中学时期我的思想激励起来的强烈的创作欲，现在令人担心地丧失了。我那本不成熟的诗集出版后四个月，我简直不能理解当时我怎么会有勇气出版它。我觉得其中某些诗还是相当优美和精巧的，甚至有的诗还是相当好的艺术品。但是，我总觉得这些诗的伤感情调是不真实的。同样，自从我在柏林和现实有了接触以后，觉得我过去写的中篇小说有股洒过香水的纸张味。这些作品全然不合乎现实生活，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写作技巧。所以我把从维也纳带来的为讨好出版人的那部长篇小说付之一炬。这是因为我在这里看到了现实，把我中学时期判断力的自信心抛到九霄云外。此时的心情就像在学校里连降几级那样的难受。事实上，我第一部诗集出版以后，间隔了六年才出版了第二部诗集，而且又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这期间，我遵照戴默尔的忠告，抓紧时间从事翻译工作，至今我仍然很感激他，因为通过翻译，能使年轻的作家更熟练更精确的运用祖国语言，对写作大有裨益。我翻译波德莱尔的诗，还译过魏尔伦、济慈、威廉·莫里斯的一些诗和夏尔·范·莱尔贝尔

赫① 的一个小剧本及卡米耶·勒蒙尼耶② 的小说《熟能生巧》。任何外语都有自己的独特成语和习语，这是翻译诗歌的首要难题。正因为这样，翻译诗歌需要译者有丰富的表达能力，而在平常人们却不注意这些。如何把外语中的成语译成妥帖入微的母语，需要译者反复揣摸，我把这种反复推敲看作是一个艺术家的特殊的艺术乐趣。这种默默无闻的、无人感激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养，而这种道德修养在中学时期由轻率和鲁莽所代替。我现在特别喜欢翻译工作，因为我从介绍外国艺术作品的平凡工作中，第一次感到这才是做了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不枉我为人世一遭。

我今后的岁月里道路将如何走，现在我心里已经清楚了，就是多观察、多学习、然后再进行创作！不能用仓促写成的作品来见世界，而首先应该了解世界的本质。在柏林就像吃了浓浓的醋渍汁一样，使我思渴难忍，必须频繁进行社交活动。我环顾周围世界，暑假旅游该到哪个国家去，最后我选择了比利时。这个国家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在艺术方面有过不同寻常的飞跃，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超过了法国。像绘画界的克诺普夫③、罗普斯；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里埃④ 和米纳⑤；工艺美术界

---

①夏尔·范·莱尔贝尔赫（1861—1907），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

②卡米耶·勒蒙尼耶（1844—1913），比利时法语小说家、艺术批评家。

③费尔南·克诺普夫（1858—1921），比利时象征主义画家，版画家。

④康斯坦丁·默里埃，比利时雕塑家。

⑤乔治·米纳（1866—1941），比利时雕刻家、画家。

的范・德・韦尔德[1]；文学界的梅特林克[2]、埃克豪特[3]、勒蒙尼耶；这些大师构成欧洲文学艺术的新力量。不过首先使我入迷的是爱弥尔・维尔哈伦[4]，因为他的抒情诗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我暗自发现这位作家——他在德国尚不为人所知——被德国官方文学界长期以来把他和魏尔兰[5]混为一个，就像把罗曼・罗兰和罗斯丹混为一个似的。只要单独爱一个人，就会得到双倍的爱。

也许在这里有必要稍稍加以解释。我们时代瞬息万变、千曲百折，需要好的记忆力才能记住一二。我不知道爱弥尔・维尔哈伦今天是否还有意义。但是他作为法语作家的第一人决心对欧洲做出贡献，像惠特曼对美国做出的贡献一样，既要认识当代，又要认识将来。他早已开始热爱当代的世界，因为当代世界是他诗的题材。有些人认为机器是恶魔、认为城市是丑恶、认为当代不可能有诗意，而他对每一项新发明、对每一项技术成就都感到欢欣鼓舞。他对自己的这种热情感到很高兴，为了使自己感受到更多的激情，他认为必须对周围的事物更加倾心。所以他从开始写一些小诗，到后来写出宏大的赞美诗。他以《相互尊重友好》这首诗向欧洲人民发出号召，号召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友好。当今的时代是个极为可怕的倒退时代，可它不为当代的整整一代乐观主义者所理解，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得

---

①亨利・范・德・韦尔德（1863—1957），比利时建筑家、工艺美术家。

②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法语作家、诗人，象征派戏剧的代表作家，191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③乔治・埃克豪特（1854—1927），比利时法语小说家。

④爱弥尔・维尔哈伦（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剧作家。

⑤保尔・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

到充分的体现。他的一些最好的诗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新的欧洲和人类美好的未来，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我为了结识维尔哈伦才来到布鲁塞尔的。可是卡米耶·勒蒙尼耶这位强壮的，被人不公正地忘掉了写过《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译成德文——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维尔哈伦很少从他的小村庄到布鲁塞尔来，而且他现在也不在家。为了弥补我的失望情绪，他热情地给我引见其他艺术家。于是我见到了老艺术大师康斯坦丁·默里埃，这位英雄的工人和以表现劳动方面著称的雕塑家；在他之后，我见到了范·德·施塔彭①，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艺术史上几乎已经消失。不过这位身材矮小、面颊红润的佛来米人②倒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他与他的夫人，一位高大宽肩、开朗的荷兰人，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年轻人，给我看他的作品。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文学和艺术。他们的善意，打消了我的所有顾虑。我不加隐藏地向他们说，我到布鲁塞尔来就是想见见维尔哈伦，不巧见不到他，很遗憾。

是否我讲的有点太过分了？是否我讲的有点憨直？反正我觉察到范·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开始对视一笑，偷偷使了一个眼色。我觉得我的话引起他俩内心的会意。这时我感到很不自在，想告辞。他们执意留我吃午饭，无条件让我留下。他们之间互相传递眼光，现出神秘的微笑。不过我觉得，如果说有秘密，也是善意的友好的，于是我放弃了去滑铁卢的打算。

很快就到中午了，我们已经坐在餐室里了——像所有的比

①夏尔·皮埃尔·范·德·施塔彭（1843—1910），比利时雕塑家。
②佛来米人，住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操佛来米语（荷兰语）的居民。

利时住房一样，餐厅是在地面一层——透过餐室彩色玻璃可以看到临屋的一条街道，这时猛的一个身影停在餐室窗前，一个手指敲玻璃发出了声响，同时门铃也突然响起来。"他来了，"范·德·施塔彭太太说着就站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他是何人。但门已打开，他迈着沉重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原来是他，是维尔哈伦！我一眼认出是他，我早就从照片上认识他。维尔哈伦是这里的常客，今天凑巧也到这里来。所以当我向他们说我到处找维尔哈伦而不得见时，施塔彭夫妇迅速地使眼色会意：不告诉我，让我意外的惊喜。现在维尔哈伦已站在我的面前，施塔彭夫妇对刚才的小玩笑得意地微笑起来。我是第一次和他那只强健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第一次亲眼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总是这样，不论应邀到谁家，总是带着热情和喜事走进屋。他刚开始吃饭，就接着开始叙述。他刚会过朋友，还去过美术画廊，脸上还显示着那时的兴奋神情。无论他走到那里，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无论碰到什么偶然小事，他会感到深受鼓舞，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崇高的习惯。他说出来的话像火焰一样热烈，用强有力的手势比划着，把讲述的事说活了。他讲第一句话就能抓住观众的心，因为他心怀坦白，平易近人；从不拒绝任何新人新事，任何人他都接待。他对一个初见面的人都会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天我与他第一次见面一样。以后我经历过无数次他善待其他人产生的巨大反响。他并不了解我，仅仅听说我喜欢看他的作品，就同我一见如故。

午饭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件令人惊奇的事，范·德·施塔彭早就有个为维尔哈伦塑像的愿望，这几天他一直忙于塑雕维尔哈伦的半身像，今天是最后一次写真。范·德·施塔彭说，我来的正是时候，正需要一个和这位坐着不动当模特儿聊天的人，

这样就可能塑出一张正在说话和正在倾听的活现面孔。我目不转睛地细细盯着他达两小时之久。这是一张令人难忘的面孔，高高的前额，艰苦的岁月聚成了脸上的皱纹，褐色的鬈发簇拥在深深的鬓角上。他的面部表情严厉，饱经风霜的浅褐色皮肤，峭峻地向前突出的下颚，在窄窄的嘴唇上蓄着两撇长长的浓浓的维钦杰托列克斯① 式的八字胡，一双消瘦的、灵巧的、纤细而有力的手，手的皮下血管在勃勃跳动，显示出兴奋感。他的双肩像农民的一样宽大，肩负着他意志的全部力量。相比之下，他那颗坚强的皮包骨的头颅似乎显得小了一些。只有他大步向前走的时候，才能显示出他的力量。当我今天看到这尊半身塑像时，我才觉得它是那么逼真，那么传神。范·德·施塔彭后来的作品都没有超过这件雕塑品。这是一件表示诗人伟大的真实作品，是永恒力量的纪念碑。

经过这三个小时，我确实爱上了这个人，以后，我的整整一生中始终都喜爱他。他的本性是稳健的，从不自满。他与金钱无缘，宁愿住在乡下，也不愿为生活多写一行字。他不求功名，从不用退让、逢迎或通过熟人关系来追逐名利。他认为，有自己的朋友和他们忠实的友情，吾心足矣。他甚至摆脱了对一个人说来是最危险的诱惑：荣誉。可是，在他年富力强之时，荣誉终于落到他的头上。他一直光明磊落，心中无任何压力，不为虚荣迷惑。他是个自由、快乐的人，是个热情奔放的人，谁要是同他在一起，就会亲身感到他自己的生活理想。

①维钦杰托列克斯（公元前82—前46），他曾率领高卢人民抵抗凯撒的入侵，失败被杀。

这会儿，诗人就在我这个年轻人的面前：我想能成为他那样的人，我做梦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在我与他初次见面的头一个小时里，我就下了决心，为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效劳。我下这个决心是颇有胆识的，因为这位诗人在当时的欧洲还没有多大名气。虽然我知道，翻译他的庞大的诗集和三部诗剧要占去我二到三年的创作时间，但我还是下了决心用全部精力、时间、热情来翻译这几部外国著作。我所贡献出最宝贵的精力，就是为了完成这件道义性的任务。我在过去不断的寻找和探索，今天算有了这个归宿。如果今天我向一位尚不明确自己道路的年轻作家提出忠告的话，那么我首先建议他，他可以先作为演员或者翻译去啃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这样做，虽然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每一个付出辛劳的工作是不会徒劳的。

我从事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和撰写他的传记的准备工作几乎花费两年时间。这两年，我经常外出旅行，有时作公开的讲演。翻译维尔哈伦的著作，看起来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酬谢：维尔哈伦的国外朋友们注意到了我，不久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有一天，有位叫埃伦·凯伊① ——这位非凡的瑞典妇女——到我这里来。她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那个心胸狭窄、阻力重重的时代，为妇女的解放而奋斗。早于弗洛伊德以前就在她的著作《儿童的世纪》里就提出这样的警告：青年人的心理最容易受损伤。我在意大利时是她把我引见给乔瓦尼·切纳② 和他的诗友们的；也是她使挪威

①埃伦·凯伊（1849—1926），瑞典著名女权活动家、作家、教育家。

②乔瓦尼·切纳（1870—191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

人约翰・伯耶尔[1] 成为我的一个重要朋友的。盖奥尔・勃兰兑斯，这位文学史上的国际大师也对我表示出他很浓的兴趣。由于我的宣传，维尔哈伦在德国的名气比在他的祖国名气大得多，最著名的演员凯恩茨和莫伊西[2]在台上朗诵我翻译的维尔哈伦的诗。马克斯・赖恩哈德把维尔哈伦反教权主义的心理剧《修道院》搬上德国舞台。上述诸事，使我感到十分满意。

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忆本来的时代，即除了我担负着维尔哈伦的义务以外，还有别的一项任务。我终于结束了我的大学生活，我必须戴上一顶哲学博士帽回家。也就是说，现在我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把大学四年的教材通通看一遍，往常那些规矩的大学生几乎用四年才能完成这些课。我和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3] ——也是一个文学青年——一起开夜车死记硬背。现在他不愿意回忆这些事，因为他成了官方的诗人，希特勒德国科学院院士。幸好老师没用考试难为我，对我公开的文学活动深为理解的好心肠的教授，他假装严肃吓唬我："你是最不愿意考严密的逻辑学！"而事实上，他有意地要我回答，他知道我能回答出那些问题。所以我是第一次以优等分数通过这门考试，这也是我所希望的，也是最后的一次。现在我外表上是自由的，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岁月，只有斗争才有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斗争变得越来越艰巨。

---

①约翰・伯耶尔（1872—1959），挪威小说家、剧作家。

②亚历山大・莫伊西（1880—1935），奥地利著名男演员，1906 年参加马克斯・赖恩哈德剧团。

③埃尔温・吉多・科尔本海伊尔（1878—1962），德国作家，后来成为纳粹文人。

永葆青春的城市——巴黎

在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为礼物奉献给自己。以前，我曾两次匆匆到过巴黎，对这座极其豪华的城市只有一些粗略的了解。但是我敢断定，如果谁在这里住上一年，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反而怀着莫大的幸福回忆这段时间里没有任何城市能比得上巴黎，有一种饱含青春活力的气氛，这是人们到处都能感受到的。人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没有人去查找根由。

我很明白，我青年时代那个轻松愉快、富有活力的巴黎如今已不复存在。自从世界上最残酷的魔掌——希特勒的铁蹄——傲慢地压在巴黎的城头，那种美妙的、悠然自得的生活，真是一去不复返了。当我开始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德国的军队和德国坦克像南美的灰蚂蚁一样，一起涌向巴黎，要彻底摧毁这座城市神圣的五彩缤纷的、愉

快的生活，连根拔掉这座和谐城市永不凋谢的繁荣。现在终于出现了这种局面："卐"字旗在艾菲尔铁塔上飘扬，身穿黑制服的冲锋队挑衅性地举行阅兵，穿过拿破仑的香舍丽榭大道。我在遥远的地方同样能够感觉到，当占领者的翻口皮靴踏进舒适的酒吧和咖啡馆时，这些原本善良的、亲切的市民会抱着莫大的屈辱感，屋里的人是如何心惊胆战。我自己遭遇的不幸，及任何使我震动、绝望的事，似乎没有像这座城市所遭受的侮辱那样严重。没有一个城市像赋予巴黎那样的天分，使人们易接近，并能给人们提供幸福。它给我们的是明智的学说和最杰出的榜样，同时又给我们自由和创造的天地，给我们越来越深厚的美的享受，难道它还能赋予下几代人的这一切吗？

我知道，我十分清楚，遭受苦难的不只是巴黎，欧洲其他部分也是这样；在今后的数十年中，欧洲不会出现第一次大战前那种安定局面。第一次大战以来，那团乌云在明亮的地平线上一直没有消失，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怨恨和不信任，像一股折磨人的毒液注在残疾身上似的。尽管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五年，不是个别国家而是整个欧洲，在社会和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另一方面，任何国家都失去了原来的生活情趣和田园式的舒适生活。第一次大战前，即使像意大利人在极端贫困的生活中，也像孩子般一样高兴，互相充满信任，又说又唱，一片欢乐，还讥讽那个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几天时间来描绘这些事。可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昂起头来，怀着厌烦的心情，忧郁地去行军。昔日的奥地利，在它善良的气氛中，显得那么轻松和自在，它的臣民是那么虔诚地信赖自己的皇帝，同样信赖赋予他们美好生活的那个上帝，如今奥地利人还敢想这些事吗？俄罗斯人、德国人、西班牙人，他们所有

的人都不知道，“国家”这个凶恶的饕餮妖怪从他们的骨髓中和内心中吸吮了多少自由和欢乐。各民族人民都感觉到，从国外飘来一块宽大的、浓厚的阴影，正笼罩着他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些见识过个性自由世界的人都知道，也能够作证：昔日的欧洲人无忧无虑地生活，对他们的万花筒式的颜色变幻生活异常高兴。我们今天不得不觉得心惊胆战，由于自相残杀的愤怒展开，使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如此暗无天日，到处是奴役和监禁。

可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绝没有任何地方像在巴黎这样过得朴实、愉快、逍遥自在。巴黎的外表美得很，气候温和，有巨大财富和光荣传统，这些都证明了该城市的辉煌。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每个人在这里都享受过轻松自在，同时我们反过来把这些轻松自在再加添到巴黎的身上。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斯堪的那维亚人、西班牙人、希腊人、巴西人、加拿大人，他们都感到在塞纳河畔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这里生活没有任何强制的感觉，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说话、思考问题、欢笑，遇到不满意的事可以责骂，你喜欢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可以合伙生活也可以独善其身；可以阔绰也可以节俭；可以豪华，也可以像波希米亚人那样的俭朴，巴黎对每种特殊需要都留有余地，考虑到各种可能性。那里有豪华型餐厅，备有各种美食佳肴和二三百法郎的各种美酒；还有马伦哥①和滑铁卢时代的十分昂贵的法国康涅克地区产的葡萄酒。但是在旁边拐角处的任何一家酒店里，可以吃到几乎是同样丰盛的饭菜，也可以痛饮，还花不了几个钱。在拉丁区十分拥挤的大学生餐厅里，在吃卤汁牛排前后，花上几个铜板可以品尝到美味小吃，还可以

①马伦哥，意大利地名，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在此大破奥军。

喝到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吃上一个像木棒形的面包。人们的打扮，按其所好。大学生们带着俊俏的扁平帽，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上溜达；那些拙劣的“画匠们”也戴这种帽子；正式画家们却很注意打扮，戴着宽边大礼帽，身着富有浪漫色彩的黑丝绒茄克衫；工人们穿着蓝色上衣或者衬衫，悠然自得地在林荫大道上漫步；保姆戴着法国布列塔尼地区人的便帽；酒吧女招待穿着蓝色围裙。只要不是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任何一天的午夜以后，都有一对对青年男女在大街上开始跳舞，警察在一旁笑着观望；这时大街就属于每个人的了！在巴黎，谁也不会在别人面前感到不自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常和一个黑人手拉手走进旁边的小旅馆，一点也不难为情。在巴黎，有谁关心民族、阶级和出身呢？只是到后来这些才被吹嘘成吓人的东西。当时，谁都可以同自己喜欢的男人或女人在一起散步、聊天或同居。别人的事与我有何相干。可是，谁要真正爱上巴黎，他首先要好好认识一下柏林，他必须用僵化的和经过痛苦的严格磨炼制定的旧等级观念来体验一下德国人甘心情愿的奴性；在德国，一个军官的妻子不愿同老师的妻子“来往”；老师的妻子也不会和商人的妻子“交往”；商人的妻子不会和工人的妻子“来往”。可是在巴黎，法国大革命的遗风至今尚存，所以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觉得自己与他的雇主一样，都是一样自由的、享受充分权利的公民；一个咖啡馆服务员可以同一个饰以金边军衔的将军握手；勤劳的、规矩的、爱清洁的小市民太太们，对住同一个楼道里的妓女不但不会皱鼻子，反而同她在楼梯上闲聊，她们的孩子还向她送鲜花呢！有一次，我亲眼目睹，一群诺曼第富有的农民参加洗礼以后，走进一家高级饭店，马德连教堂附近的拉律饭店。他们笨重的鞋子踏在地板上噔噔作响，一

身家乡服装，头发上抹着厚厚的一层油，连厨房里都能闻到头油香味。他们高声谈话，酒喝得越多嗓门就越大。他们一边放声大笑，一边拍拍自己女人的胖臀部。他们是真正的农民，坐在身着漂亮的燕尾服和浓装艳抹的人旁边，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再说服务员，那个脸刮得净光的服务员也不对他们皱鼻子，而是像招待部长或某个阁下人物同样的礼节，周到地伺候他们。要是德国或者英国，服务员对这些乡下人就会嗤之以鼻了。在巴黎的梅特尔大饭店，甚至以特别热情地迎接这些不拘小节的客人作为一种乐趣。巴黎只认识对立事物的存在，不知道什么是上等、什么是下等。繁华的大街和难行的小巷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到处都是一样的快乐和一样的热闹。在郊外的农舍里，卖唱艺人在演奏乐曲；年轻女缝纫工一边做活一边唱歌，其歌声传出窗外；空气中不时传来欢笑声或亲切的呼喊声。不论什么地方，如果两个马车夫发生了“口角”，事后两个人会互相握手，并一起喝一杯葡萄酒，砸几个牡蛎作下酒菜。在巴黎没有什么难事和棘手之事。和女人的关系，容易接上也容易脱离。任何一个姑娘都容易找到自己般配的男人，任何一个小伙子也都能找到一个对两性关系比较开放的活泼女友。是的，如果想生活得自由自在，就到巴黎去。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就是在这里东游西逛也是一种乐趣，这也是在巴黎生活必然要学习的课程。因为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向人们开放，你可以走进旧书店，看一刻钟的书，店主不会抱怨更不会发牢骚；也可以去几家小型画廊；还可以去旧货商店慢吞吞地挑选自己需要的一切；你可以在德鲁奥特旅馆靠拍卖旅馆的旧物过寄生的生活；也可以在庭院里与女管家聊天。假若你在大街上闲逛，街道两旁欣欣向荣的新面貌和新东西，会像磁铁一样地把你吸引住，使你流连忘返。如

果走累了，就从上千家咖啡馆中找一家有平台的坐下，可以用这里的免费信纸写信，听着小贩们兜售那些过时的多余的小商品的嚷嚷声。春暖花开之际，阳光明媚，塞纳河上碧波微微，林荫道上的树木开始吐绿，年轻姑娘戴着用一个铜板买来的紫罗兰花环。这个时机，谁还能呆在家里，又有谁想回家呢！不过，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舒适自在，不一定非在春天。

我第一次结识这个城市的时候，还不像今天这样，有地铁和各种汽车把城市联接成一个整体。在当时，巴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浑身冒热气、肥壮的马匹拉的厢式马车。这种马车的第二层，即顶层。从顶层上观看巴黎，车速缓慢，是再好不过了。那时候，从蒙马特到蒙巴拿斯① 去一趟，算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可以看出巴黎小市民节俭的传闻是完全可信的。他们舍不得花钱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所以，住在塞纳河左岸的巴黎人，从来不到河右岸去，孩子们只在卢森堡公园里玩。从没有去过远处的图勒里公园和蒙梭公园。马车时代，马车费是小市民必须考虑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市民或者老巴黎人最喜欢集聚在家里，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以大巴黎的形象创造了一个小巴黎——自己的小圈子。所以巴黎的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明显特点，甚至有不同的乡土色彩。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外国人到了巴黎，选择在何处下榻，要费一番脑筋才能下决心。现在拉丁区不再对我有什么吸引力。我二十岁那年，到巴黎作短暂停留，刚下火车我就直奔拉丁区，第一个晚上就坐在瓦歇特咖啡馆里，我怀着敬意让别人指给我看魏尔伦曾坐过的座位，还有那张他喝醉

①蒙马特和蒙巴拿斯是巴黎的两个区，前者在塞纳河北面，后者在南面。

时常用自己粗实手杖敲打的大理石桌，我这样做，也使自己得到尊重。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我这个滴酒不沾的诗坛小卒还是喝了一杯苦艾酒，虽然我觉得这种发绿的劣等酒一点也不好喝。我相信，作为一个敬仰前辈的年轻人，我有义务在拉丁区里恪守法国抒情诗人的仪式。按当年的风尚，我最愿意住在梭尔邦区①的一幢六层楼的阁楼上，以便对拉丁区的风格有“正确”的鉴赏力，在书本里不会有这种亲临其境的感觉。可是我二十五岁时，我不再感到这里是那么质朴和富有浪漫色彩，我倒觉得拉丁区太国际化了，太没有巴黎味了。我主要在这里选择一个永久住所，并非出于文人怀古的心情，而是尽可能地有利于我的工作。安顿下来以后，我立刻向四周瞭望。从有利于我的工作上讲，香舍丽榭大道不适宜，和平咖啡馆周围更不合适，因为那些巴尔干半岛的有钱人都在这里聚会，除招待员外，没有人说法语。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圣绪尔比斯教堂四周的清静区域对我有吸引力，里尔克和絮阿雷斯②也喜欢在这里居住；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连接塞纳河和巴黎市区的圣路易斯河心岛上的住所。可是我到巴黎的第一个星期里出去散步发现一处最美的地方。当我在罗亚尔宫画廊闲游时，我发现十八世纪“平等公爵”③ 建造的外形一样的一批房子中间有一座宏伟的特别突出的显贵宫邸，现在已是一座普通的小旅馆了。我走进旅馆，请他们让我看一看里面的

①梭尔邦区即拉丁区，现在是巴黎的大学区。

②安德列·絮阿雷斯(1868—1948)，法国诗人、剧作家、评论家。

③平等公爵，系指法国波旁王族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约瑟夫(1747—1793)，法国大革命时，他作为贵族代表参加三级会议，支持第三等阶级。1791年他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次年放弃贵族称号，更名菲力浦·平等，故有平等公爵之称。

房间，我惊喜地发现，从窗子里向外望，正是罗亚尔宫的花园，暮色的降临使花园渐渐隐没在黑夜之中。城市的喧闹声在这里隐约可闻，宛如远处海岸波涛不断的拍击声。塑像沐浴在月光之中，清晨的微风阵阵吹来附近“大厅”里浓浓的菜香味。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四方形建筑物罗亚尔宫中，曾经住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诗人和政治家。罗亚尔宫对面是那幢玛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①住过的房子，巴尔扎克和维克托·雨果曾经在这幢房子里攀登上百阶狭窄的楼梯，到阁楼上去拜访这位我也非常喜欢的女诗人。罗亚尔宫是卡米耶·德穆兰②号召人民向巴士底狱进军的地方。那里有条不露天的走廊，铺着地毯，是那些并不十分知书达理的夫人散步的地方。可怜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这些夫人中寻找自己的恩人③。这里的每块石头都诉说着法国历史。再过一条街，就是国家图书馆，我在这里看一个上午的书。离藏有名画的罗浮宫博物馆也不远，离人群川流不息的林荫大道只有一箭之遥。我终于住进我希望住的地方，这里是巴黎的心脏，可以摸到法国的脉搏。我还记得，有一次安德烈·纪德来看我，他对巴黎市中心竟有这么个幽静的地方感到惊讶，他说：“我们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还要外国人向我们指出。”说真的，在市中心除了这间富于浪漫色彩的书房外，我再也找不到一处既有巴黎风味、同时又十分雅静的地方了。

①玛塞利娜·代博尔德-瓦尔莫(1786—1859)，法国女诗人。

②卡米耶·德穆兰(1760—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

③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崭露头角，经巴拉斯介绍，他认识了年轻寡妇约瑟芬，后拿破仑与约瑟芬结婚。传说，约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经巴拉斯提名，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司令，故称约瑟芬是拿破仑的恩人，但历史学家否认此说。

当时，我急不可待地到大街上四处溜达，尽量地地看，尽量地去寻找！我不仅要重温一九〇四年的巴黎，而且用我的全部感官和心灵去体验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仑和革命时代的巴黎，还要去了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和巴尔扎克、左拉及夏尔-路易·菲力浦①的巴黎，要熟悉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我在法国始终坚信，在巴黎也是这样，我感觉到伟大的写实文学扎根于民间，具有永久不衰的力量。我亲眼目睹巴黎过去的一切，因为众多的诗人、小说家、历史学家和风俗画家的艺术创造。我亲眼看到，在我的心中早已熟悉的东西不过更生动一些罢了。只有遇到的东西才是生动的，想象的则是空的；肉眼的观察就是一种再认识，就像希腊悲剧中的人物又“重新认出”亲朋好友来一样，这也是一种乐趣。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赞誉的，这是一切艺术享受中最伟大、最富有魔力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你想最后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不能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的最优秀人物才能解决。要了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只能从活着的人思想脉络中获得；从外部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种真实的草率的概念。

我对待别人始终是友好的，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②的友谊最为深厚。由于我和维尔哈伦的密切关系，我每周两次到圣克卢大街去看望他，这就防止了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陷入由国际画家或作家组成的轻浮的小圈子中去。那些画家和作家一般在教堂和咖啡馆聚会，基本上不变更地点。而在其他地方，如

①夏尔-路易·菲力浦（1874—1909），法国小说家。

②莱昂·巴扎尔热特（生卒年不详），法国翻译家。

在慕尼黑、罗马或柏林，基本上也是这种人。我和我的朋友们与他们相反，我和维尔哈伦一起看望一些画家和诗人，他们住在灯红酒绿、喧嚣不休的市中心，但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寂静之中，就像在一个孤岛上，埋头写作。我还看过雷诺阿的美术创作室和他的优秀学生。印象派画家们的作品今天价值数万美元，可是他们的生活同小市民或领养老金者的生活没什么两样；他们住的小房子还兼作画室，没有“扩建”。他们不像慕尼黑的兰贝赫①和其他名画家们那么讲排场、图阔气，以仿效华丽标准建造的奢侈别墅来炫耀自己。诗人同画家一样生活简朴，不久我就同这些人很熟悉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政府机关有份工作不太多的公务员工作。在法国，从低层到高层，人人都尊重从事文学艺术的人，多年来就找到一个聪明的办法，让那些收入不多的作家和诗人悄悄地干一件清闲自在的差使，如，任命他在海军部或参议院当图书馆员。这种差使收入虽不多，可很清闲，因为参议员们轻易不来借书，这个闲职者就成了格调和谐的老参议院大厅的幸运主人，在这里他利用工作时间舒舒服服作诗，向窗外看去，就是卢森堡公园，也用不着考虑稿费之事，因为这点收入虽不多，但足以够用的。还有的诗人，身兼医生，像以后的杜阿梅尔②和杜尔丹③；有的开一爿小型图画商店，像夏尔·维尔德拉克④；有的当中学教师，像罗曼⑤和

---

①弗朗茨·冯·兰贝赫（1836—1904），德国写实派肖像画家。

②乔治·杜阿梅尔（1884—1966），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③吕克·杜尔丹（1881—1959），法国诗人、评论家，又是医生。

④夏尔·维尔德拉克（1882—1958），法国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

⑤儒勒·罗曼（1885—1972），法国作家，法兰西院士。

让-里夏尔·布洛克[1]；有的坐在哈瓦斯通讯社里混时间，像保尔·瓦莱里[2]；有的帮出版商做事。这一代作家和艺术家不像后一代人那么狂妄自大，认为当图书馆员有失身份。后一代人被电影和书的大量印刷版次给毁了：在艺术方面刚崭露头角，就立刻想过随心所欲的生活。而他们的前辈不慕虚荣，他们自愿从事那种卑微的工作，无非是想使自己的生活能够有些保障，从而使自己的精神劳动不受外界干扰。因为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们就不去理睬腐败的巴黎大报纸；就给自己的小杂志写文章，不取分文稿酬，维持这种小杂志总要作出个人牺牲；他们也能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的剧本只能在文学家的小剧院演出，因此，作者的名字只有圈内人知道。像克劳代尔[3]、贝玑[4]、罗曼·罗兰、絮阿雷斯、瓦莱里，他们的名字在数十年内只有极少数文学中坚分子才知道。在这个繁忙的城市里，他们是唯一没有紧迫感的人。安安静静地生活，安安静静地为那个远离"闹市区"圈子里的人工作，比出风头更重要；能过上一种淡泊的小康生活并不感到难为情，只要在艺术方面能自由大胆地思考问题，其他事情无所谓。他们的妻子亲自下厨和掌管家庭的经济。晚上同事们在一起聚会，主人非常热情，但招待却非常简单。大家坐在填充稻草的简陋软椅上，围着一张随便铺了一块花格布的桌子。他们的房间比不上同一层楼住的装修工家那

---

①让-里夏尔·布洛克（1884—194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②保尔·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

③保尔·克劳代尔（1868—1955），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他曾在中国任职，（1894—1899），写有成诗集《东方的认识》（1898），他学过汉语，译过中国古诗。

④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

样阔气，而他们自己觉得自由和无拘无束。他们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没有秘书；他们避免使用一切技术器械，就像他们不想充当宣传机器一样。他们写书还是用一千年以前的办法：用手写。就像“法国梅居尔”那样的大出版社仍然不采用口授打字，也没有一件复杂的器具。他们不追求外表，也不因追求声誉和排场而浪费时间和精力。所有法国的青年诗人和法国全民族一样，都是怀着对生活的乐趣而生活着，当然作家的生活还有自己最高尚的形式：写作的创造性带来的喜悦。我新交往的朋友，他们的清廉奉公作风，大大修正了我对法国诗人在我心中的形象，对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生活方式和布尔热①的及其一些有名的表达时代的小说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后一代的作家以为“沙龙”就是世界！我在家中看到的读物中给我的印象是：法国妇女只是照镜子的交际花，她们满脑子尽是风流韵事和挥霍浪费。一些诗人的妻子把我改变过来了，纠正了我极其错误的看法。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贤慧、文静的家庭主妇，这些诗人家庭里的妇女是那样勤俭、朴实和快活；即使在最拮据的情况下，也能像变魔术似的在炉灶上创造出小小的奇迹；她们照常看好孩子，并且忠诚地与丈夫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只有作为朋友和同行生活在那个圈子里，才能了解真正的法国。

我的朋友莱昂·巴扎尔热特，他的名字在法国新文学的大多数著作中被不公正地遗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诗人中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把自己最充沛的精力全部倾注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上，他为自己喜爱的人献出了自己全部的风茂年

①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华。他是我的天生“同伙”，我也作过翻译。我从他身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自我牺牲的绝好典型；他真是一个全心全意奉献出自己的人；他认为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任务，就是促使那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作品发挥作用；他是那些作品的发现者和翻译者，他本应得到的荣誉，但他并不追求也不沉湎于这种荣誉。他的满腔热情是他的道德意识自然促成的。他的外表看起来颇像个军人，而他却是一个积极反军国主义者。在交往中，他表现出一个真正战友的诚挚。任何时间他都乐于助人，给别人出主意，待人一直诚恳；交往时像钟表那样准时，凡是遇到的事他都关心备至，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为了朋友，他不吝惜自己的任何时间和钱财。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虽然为数不多，他还是严格选择，分清真假朋友。他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翻译了瓦特·惠特曼的全部诗歌，并写了一篇关于惠特曼的丰碑式的传记，以便让法国人了解这位大诗人。惠特曼是一个自由的热爱世界的人，他以惠特曼为榜样，引导祖国人民的思想超越国界，使国人变得更雄壮、更友好团结，这已成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最优秀的法国人同时也是一个热忱的反民族主义者。

我们俩不久就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因为我们两人并不只想到自己的祖国，因为我们都是翻译外国作品，因为我们都是只知奉献而不要名誉地位，因为我们俩都是把思想自由看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从他的身上，我第一次了解到“幕后隐蔽”的法国。后来我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中读到，奥里维是如何反对德国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我几乎感到，书中描写的这段简直是我和莱昂·巴扎尔热特共同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经常碰到尴尬的局面，从而产生阻力；在一般的情况下必然会妨碍两个作家之间

的真诚、和谐的关系，造成这种尴尬局面是：巴扎尔热特以惊人的坦率态度坚决不接受我当时所写的一切。不过，这正是我们友谊中的最宝贵的、也是我最难以忘怀的一点。他本身就喜欢我，我翻译维尔哈伦的作品的无私奉献精神，他表示最深切的感激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必定到车站接我；总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表示欢迎的人。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尽力帮忙。在一些重大的关键性问题上我们两个的看法总是一致的，关系融洽胜过一些亲兄弟。但是他对我写的作品完全持否定态度。他是在昂立·吉尔坡①(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的朋友，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的翻译中读到我的诗和散文，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我的诗和散文，甚至不顾情面地指责说我的这些作品与现实毫无关系，完全是一种神秘莫测的文学(他对这种文学最厌恶)。他又说，他之所以这样生气，是由于这些作品恰恰是我写的。他为人一贯正直，但对我的作品看法上从不退步，从不讲情面。一次，他领导一家杂志时，曾要求我给予帮助。所谓帮助，是要我替他从德国物色几个胜任的合作人，就是组织一批稿件，要比我的作品好的稿件。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从未要求我写一行字，也不打算采用我的一行字。虽然如此，他还是为一家出版社校订我的一本书的法译本，他不要稿酬，完全是一种真诚友谊的牺牲。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显得特别离奇，但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十年内从未削弱过，这使我更觉得特别可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宣布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废，我以后的作品从思想和形式上都达到了具有深刻的个性时，恰恰是巴扎尔热特首先对我的作品表示赞赏，使

①昂立·吉尔坡（1885—1938)，法国社会党人，新闻工作者。

我万分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赞赏是直率的，就像他以前十年里对我的作品直率地表示否定一样。

在这里我要提到莱纳·马利亚·里尔克这个尊姓大名。尽管他是德语诗人，我却在“巴黎”这一章里提到他，因为我在巴黎同他见面的次数最多，同他的关系最好；因为他非常喜爱巴黎，胜过其他人；在构成巴黎背景的众多古老人物像中，里尔克的面貌特别突出。今天，当我回想他和其他一些对文学有千锤百炼之功的大师们时，当我回想起像可望不可及的星辰一样照耀着我青年时代的那些作家的名字时，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可悲的想法：在我们这个喧嚣骚动和惊慌失措的时代，难道还有可能产生专心致志于抒情诗创作的纯粹诗人吗？我们不胜惋惜的那一代诗人，那不很快就消失了吗？被命运的风暴搅乱的日子里，那一代诗人后继无人了。这些诗人们，不要求外部的生活，他们又不是一般的群众，他们不追求荣誉、头衔、尊严、实利，只追求在安静的条件下苦思冥想，把一节一节的诗完美地联结起来，使每行诗都富于音乐性，充满光彩，富于形象。他们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协会，在我们日常的喧嚣生活中，简直成了一个受教规约束的宗教团体。他们故意疏远日常生活。在他们看来，天底下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优美的、然而比时代的轰隆声更富有生命力的音响；如果一个韵脚与另一个韵脚搭配得恰到好处，作者的心中就产生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这种激动悄然无声，比一片风中的树叶落地还要轻，但它却以自己的振幅触及到深远的心灵。但是，我们这些当代的青年人看来，那些对忠诚于自己事业的、处处为榜样的诗人们是多么崇高；他们是严厉的语言公仆和守护神；他们把自己的爱

献给了银铃般的诗歌语言；他们不迎合当时的时代语言和报纸的语言，而是追求一种持久的更富于生命力的语言。我们看他们一眼就满脸惭愧，因为他们生活得那么平凡，那么朴实，那么温良；他们一些人像农村的农民一样默默无闻的住在乡下，另外有的人从事一种小的职业，第三种人作为一个热情的朝圣者周游全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为人所不知，因此，只有少数人衷心地热爱他们。这些诗人分属不同国家，有德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但是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国度，诗的王国里；在这个王国里，诗人们完全抛弃一切昙花一现的东西，专心于真正艺术的创作，他们自己的本身就变成了一种艺术。在我们这一代青年中间竟然有这么纯洁的诗人，简直不可思议。因此之故，我一再怀着暗自忧虑的心情不时地反问自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新的生活方式之中，却把诗人们从内心的艺术境界中驱逐出去，就像森林失火把躲藏在老窝里的野兽赶出来一样，难道还可能有那些全心致志地从事抒情诗艺的人吗？我很清楚，每个时代会产生一个创造奇迹的诗人，歌德为拜伦写的挽歌中那句动人的话永远是对的："因为世界不断地创造他们，如同他们自古以来创造世界一样。"这样说来，诗人会不断产生，永不枯竭，即使最不体面的时代，不朽的上帝也会给我们留下珍贵的信物：诗人。我刚说的这个时代，不正是今天这个时代吗？我们这个时代，即便是最洁净的人，最不闻天下事的人，也不会得到安宁，这种安宁难道不是酝酿作品、写作品、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宁吗？战前的欧洲，在那个比较善良的和平的时代，诗人们还是能够享受到这种安宁。我不知道，所有的诗人，如瓦莱里、维尔哈伦、里尔克、帕斯科

里①、弗朗西斯·雅默②，今天还有多少价值；我也不知道，他们对今天的年轻一代还会有多大影响；这一代青年满耳不只充斥着不悦耳的音乐，而且还有宣传机器的怪叫和两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我只知道，并且感到有责任，怀着感激的心情说出：当今那些在诗歌艺术上登峰造极的献身者，竟出现在越来越机械化的世界里，对我们有多大的教益，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啊！当回想到我的过去，我觉得我一生当中最有意义的自豪莫过于我有机会和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亲自交往，莫过于我和他们的持续友谊与我早年对他们的景仰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诗人中间，也许再也没有一个人像里尔克那样生活得小心谨慎，更神秘莫测。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勉强的，也不是强制性的或像牧师那样的孤独。而是像斯蒂芬·格奥尔格在德国过的那种宗教生活。不论里尔克走到哪里或在哪儿驻足，在他的周围似乎产生了一种宁静的气氛。由于他拒绝和回避一切嘈杂，甚至一切荣誉——正如他有一次说得好，这种荣誉是"围绕着名字堆集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合"——那种好奇的空洞的滚滚巨浪只打湿他的名字，并没有打湿他本人的身体。要找到里尔克是相当困难的，他没有家，没有地址，不可能找到他，没有住宅，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办公地点；他总是在周游世界的途中，因此没有人能断定他的行踪。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会转到哪里去。对他那颗极其敏感的和多愁善感的灵魂来说，任何死板的决定、任何计划和预先通知，对他都是一种压力。我同他相见，纯属偶然。有一次我站在意大利美术馆里，我仿佛

①乔瓦尼·帕斯科里（1855—1912），意大利诗人。

②弗朗西斯·雅默（1868—1938），法国诗人。

觉得有人向我走来，并向我微笑致意，但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当我看到那双蓝眼睛时，我才认出了他。他那双眼睛看到我时，他那无表情的眼神中也放出了光芒。他那无表情的眼神恰恰表现出他性格中的最深邃的秘密。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个蓄着略微忧郁飘逸的金黄胡须的年轻人旁边走过，谁也不会知道他是个大诗人，我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面部没有明显的线条，多少有点斯拉夫人的脸形，脸上略带忧郁。他的特点是，他内心里有股不同寻常的遏制感，只要与他加深来往，你就会体验到。他的举止言谈有股难以描绘的斯文劲儿。他要是走进众人集聚的房间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然后他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听别人讲话。有时候，他对什么发生兴趣时，会无意识地抬起头。在他自己开始说话时，毫无哗众取宠之心或激昂慷慨之词。他讲得自然又质朴，同时充满着爱，就像母亲给孩子讲童话一般。听他讲话，叫人振奋，即便是一个最一般的题目，他也会说得非常生动和相当有价值。一旦他觉得他成了这个圈子的中心人物，受到众人的注视，他立刻停止说话。他的每个动作，每个姿态，都是那么轻微。纵然发出笑声，他也从不大笑，只是表示一点意思，就立刻收敛。轻声轻气是他本身的需要。再也没有比嘈杂和激动的感情更使他心烦意乱了。有一次，他对我说过："那些表达自己的感觉像喷血一样的人，使我疲惫不堪。因此，我远离俄罗斯人，就像我只喝一点点利口酒一样。"除了举止适度外，条理、清洁、安宁，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有时他必须乘一辆拥挤的电车或者不得不坐在嘈杂的饭店里，这都是他心神不宁的时刻。一切庸俗的东西，都使他不堪忍受，虽然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非常注意衣服穿得至善至美，干净得体。他一身打扮同样是

一件经过精心设计的艺术品，但一点也不惹人注意。他的打扮还有他本身的特点，戴一件心中暗自喜爱的小装饰品，如，他戴着一只薄薄的银手镯。这是因为美学的完美和对称已渗入到他的内心深处和个人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在他的住所，看他准备旅行装箱子的细节，他不让我帮忙，肯定是怕我弄不好。他把每件东西精心地缓缓地塞进事先已留出的空间，真像装嵌玛赛克那样。我这时觉得，倘若我插上一手，定会铸成大错，会破坏他那绣花般的工作。他爱美的天性紧紧伴随他，表现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不仅如此，还有他的手稿，用他的圆熟的书法细致地写在最美的稿纸上，行与行之间空白，好像是用尺子量了一样；就是他写一封最普通的信，也选用好的纸张，通常他都用纯净的丰满书法把字写在空白格里。即便是写一张紧急通知，他也从不允许自己涂改一个字；如果有一句话或一个词有点不恰当，他很有耐心，会立刻重写一遍。里尔克绝不把还没有全部完成的东西出手。

里尔克的慢条斯理，同时又是严肃认真的本性，对每个接近他的人都具有魅力。就像我们能够想象里尔克不可能激动一样，我们也会想到，在他那安静祥和的气质影响下，不会有人大声喧闹和无礼取闹。由于他的举止态度本身就有一股震撼的力量，一种教育的力量和一种道德的力量，它们在秘密地继续发挥作用。我每次与他长时间的谈话以后，在几小时或几天里我总有一股脱离凡尘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一贯重视节制的天性，即控制自己尽兴的意志，反而会过早地限制所有的特殊的真实感情，使它无法发挥出来。我相信，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自豪地称呼里尔克是“朋友”。他出版的六卷通信集，没有一篇是谈心的对话；自他离开中学以来，在交往中几乎从来不用那

个表示亲热关系的称呼——“你”。他多愁善感的性格，不论何人何事过于接近他，他就觉得无法忍受，特别是那些阳刚的男性，都会引起他的不快。他倒愿意同女人交谈。他给女人写了不少信，他倒愿意写这样的信；在女人面前，他感到舒服多了、自由多了。也许由于女人的声音不带喉音，使他听起来舒服，正是那种令人不快的声音使他难受。有一次，我看到他同一个大贵族谈话，只见他全身紧缩在一起，痛苦的双肩抖动着，不敢抬头向上看，为的是不露出自己不满，这个情景至今我历历在目。这个贵族用假嗓说话，使他极不舒服。如果他与自己相近的人在一起，那有多好啊！事后你会体验到里尔克内心的善意。虽然这种善意在他的谈吐中、表情中显露的不多，但是这种透入到他心灵最深处的善意光辉，是多么炽热，是多么神圣啊！

里尔克，在巴黎这座使人心胸开阔、最最开放的城市里生活和工作，是胆怯和压抑的，也许因为在这里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还不为人所知；他觉得正因为隐姓瞒名会使他永远自由、永远顺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住在租来的两间大小不同的房里，屋里摆设简单，没什么装饰；由于他特有的审美感，所以一走进房间，就别有风味，充满宁静。他从来不租嘈杂的楼房，宁愿租几间偏僻的旧房子，虽然有点不方便，可住在这里如同在家一般；不论住在哪里，由于他有条不紊的习惯，他会立刻把房间布置得别有风味，适于他自己的天性。他周围的东西确实很少，而总有一只花瓶或一只碗里插着鲜花在盛开，也许是女人送的，也许是他自己小心翼翼带回来的。在墙壁前总有一些硬壳皮面的书，装订精美，有的仔细地包着书皮。他爱书如命，就像有人爱惜小动物一样。在写字台上，并列地摆放着铅笔和钢笔，还有一叠没有写过的纸整齐地放在右角；房间里还

有一幅俄罗斯正统教尊奉的圣像和一幅耶稣蒙难时的天主教圣像，我相信，这两张圣像，不论他走到哪里，总不会离身。这两张圣像给他住的房间增加了一些宗教色彩，尽管他信教的热忱与那些固定的教义毫不相干，似乎是泛神论者。我从一些细节中发现，他的房间摆设是他精心设计的，并小心谨慎地保持下去。如果我借他的一本他没有看过的书，他要先把书包上一层平平的缎面封皮，再系上一条彩色绸带，像一件节日礼物似的，这才递到我的手中。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里尔克来到我的住处，带来了他的散文诗集《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作为送给我的珍贵礼物；至今我仍保存着，并系着捆手稿的绸带子。但是，最美最美的事还是同里尔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为同他在一起，就意味着仿佛是在用明亮的眼睛去观察那些最朴实的事；所以他特别注意那些细枝末节，甚至公司招牌的名称，如果名称的音律和谐，他便念出声来。我从他身上看出来，能引起他强烈的愿望，去认识一座城市和它的每个角落、它的最偏僻之处，只有巴黎。有一次，我们两个相遇在一个共同熟悉的朋友家里，我对他说，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旧“栏杆”旁，那里埋葬着断头台上最后一批牺牲者的遗骸，其中就有安德烈·谢尼耶①。我向他描述了那块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一座座孤单单的墓头；外国人是很难见到这个墓地的。接着我又向他叙述，我在回来的路上，从道边一扇敞开的大门看到一座修道院里面的情景：有几个半俗尼②拿着念珠串，一声不吭，静静地漫步绕着圆圈。我

①安德烈·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

②半俗尼，即：不发愿的修女。

说到这里，我发现他——平时非常稳重、自制——突然变得急不可待。这样着急的情况，我没见过几次。他急切地对我说，我一定要去看看安德烈·谢尼耶的坟墓，看看那座修道院。问我愿意不愿意领他去；其实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块寂寞的墓地前久久不肯离去，并称这块墓地是“巴黎最有诗意的地方”。但在回来的路上，修道院的门没有开。此时我可以考验他的耐心了。他说：“我们在这里等等，碰碰运气吧！”说着，他就站到了一旁，微微低下头，准备着，一旦大门打开，就能完全看到。我们等了二十分钟，门仍然没开。不多时，一个修女沿着我们向回走的路走过来，拉响门铃。他激动不已轻声说：“运气来了。”这位修女也发觉了他在不声不响地向里窥视。这时我不得不说话了，我早就觉察到他要干什么，所以我向他走去，问他在等谁。他笑脸迎着修女，这轻柔的微笑立刻得到了信任，他坦率地对她说，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里的通道。这时那位修女微笑着对他说，她很抱歉，她不能让他进去。可是她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到旁边的园丁小屋里去，从屋里最上面的窗户去看，同样会看得很清楚。小小的一个主意，仿佛给了他许许多多的东西。

以后，我与里尔克相遇过多次，每当我想起里尔克，我就想起我们在巴黎相遇的情形，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时刻他却没有经历过。

阅历、根基浅薄的人，与大人物相见，必定获益匪浅；但是，对我来说，我应该获得对我一生有决定意义的教益：这种教益却意外地降临在我的身上。有一次，我在维尔哈伦家，与一位造访维尔哈伦的艺术史家辩论起来，他抱怨说，伟大的雕

塑和绘画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激烈地反驳他，并说，我们中间不是还有个罗丹吗？他作为一雕塑家并不比过去伟大的艺术家逊色。我开始数着说罗丹的作品。我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不能自控；每当我反对一种异议事，总是这样。维尔哈伦没说话，却悄悄发笑。他最后说："你那么喜欢罗丹，就应该亲自去与他认识一下。我明天就去罗丹的画室，如果你方便的话，我带你一起去。"

问我方便不方便？我为此机会高兴得不能入睡。当我到了罗丹那里，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我没有向他致意，只是站在他的作品中间，我自己似乎也成了他的作品。奇怪的是，我的狼狈像得到了他的赞许，因为在告别时，这位老人向我发出了邀请，问我是否愿意看看他在默东① 的画室。他甚至请我同他一起用餐。这样，我得到了第一点教益：伟大的人物总是心肠最好的。

我得到的第二点教益是：伟大的人物在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朴实的。在这位享誉世界的伟人家里，他的作品一条线一条线地精心琢磨，把它当作朋友那样对待，可饭菜竟是如此简单，就像一个中等农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一块厚实的肉、几颗橄榄，一道丰足的水果，还有本地产的原汁葡萄酒。我逐渐随便起来，最后有了勇气，说话也不拘谨了，仿佛我同这位老人及他的妻子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吃完饭后，我们又重新进入他的画室。这是一间大厅，里面集中他最重要作品的复制品，另外还有数百件细部作品——

①默东，法国地名，罗丹晚年居住地。并于1917年11月17日在此逝世。

一只手，一只胳膊、一束马鬃、一只女人的耳朵，大多数是用石膏塑成的。今天我依然记得，他自己作练习用的若干件造型草稿。我在他画室里参观不过一小时，今天要我在台上讲那就要讲几个小时。最后罗丹大师领我来到一个基座旁，上面摆放着他的最新作品——一座头上蒙着湿布的女人肖像。他用那双农民似的满是皱纹又厚实的手揭下湿布，接着向后退了几步。“妙极啦！”我情不自禁地从压抑的胸中喊出了这句话，同时我又为自己说出如此庸俗的词语感到惭愧。而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客观态度，打量着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丝自负的表现，对我的话附合了一句：“是这样吗？”接着他踌躇起来，“只是肩膀有点……等一下！”他脱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拿着铲子，在肩部熟练地刮了几下，那肖像女人柔软的肩头皮肤平了一点，显得更加生动。他又向后退了几步，“这里还有点……”他喃喃地说道。他又在细节上作了小小的修饰，而效果却十分明显。然后他不再说话，只是一会儿向前，一会儿退后，还从镜子里观察他这件作品。他一边叨叨咕咕，发出一些别人听不懂的声音，一边修改他的作品。他的眼睛比吃饭时睁得更大更和蔼，闪耀着奇特的光芒，似乎他变得更高大、更年轻了。他不停地工作，顽强地工作，用他全部的热情来工作，用他魁伟的、健壮的体魄全部力量来工作。每逢他向前或向后走时，地板嘎吱嘎吱直响。由于他工作专心，根本听不到这些；他没有注意到他的身后，我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站着。一个年轻人亲眼看到一位盖世无双的艺术大师从事创作，我感到万分幸福和无比的激动。这时，他把我全忘了，对他来说，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那座雕像，还有他那抽象的精益求精的构思。

一刻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不知道有多久了。伟

大的时刻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罗丹全神贯注埋头创作，就是打劈雷，也不能把罗丹的注意力拉开。他的动作越来越用力，甚至有点狂；接着他变得粗野，又进入了陶醉状态之中；这时，他的动作越来越快，之后，他的双手不知做什么好，好像他知道没什么可干了。他向后退了一次，又退了一次，连续后退三次，经过仔细观察，周密思考，认为没有可修正的。接着他轻轻嘟囔几句，把遮布轻轻地盖在雕像上面，就像把一条围巾搭在心爱的人身上一样。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全身才放松下来。他的形象又重新回转过来，激昂的情绪逐渐消失了。他脱掉工作服，换上自己的上衣，转过身要走了。由于他工作时精神过于集中，结果把我忘了。他记不得，他领一个年轻人到他的画室来，让他看看自己的作品。年轻人紧张地站在他的身后，呼吸短促，一声不响，他把我当成了他的一件作品。这时，我心里突然出现一个奇妙的想法：我又获得一次最大的教益。

他朝房门走去，他刚想锁门，就发现了我，两眼有点愤怒地盯着我，似乎在说，这个外来的年轻人是谁？他怎么能偷偷溜进我的画室？不过，他一会儿就想起来了，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走来。“对不起，先生”，他开始说话，可是我不让他说下去。我紧紧握着他的手，表示感激之情，甚至想深吻这只手。在这一个小时内，我看到所有伟大艺术永恒的秘密，也就是说，人世间一切艺术创造的途径：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个艺术家都要忘掉自我，忘掉周围的世界。在这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毕生有用的教益。

我本来打算五月底从巴黎到伦敦去。可是不得不提前两周出发，因为我那个可心的住所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烦，使

我深感不快。这是一件特殊的偶然事件，我觉得挺可笑，同时我从这件事里也了解到法国环境中完全不同的一种思想方法，使我颇受教育。

在圣灵降临节到来的前两天，我要离开巴黎，为了同朋友一起去参观壮丽的沙特尔①大教堂，我从来没去过，这次要去，我感到很高兴。星期二上午当我回到旅馆住处时，要换衣服，发现几个月以来一直放在角落里的那只箱子不见了。我马上跑下楼去找这小旅馆的老板。每天他同他老婆换班，坐在那间狭小的门房里。他是一个健壮的、满腮红晕、矮胖的马赛人。我经常同他说说笑笑，有时和他一起在对面的咖啡馆里玩他最喜欢的十五子游戏②。他听我一说，便立刻激动起来，用拳击桌子，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啊，原来是这样!"他这样说，别人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慌慌张张地穿上外套——他在门房坐着总是穿着衬衫——脱下拖鞋换上鞋子。他边忙边向我解释这个事态的发展。也许有必要回忆一下巴黎住房和旅馆的一大特点，以便弄清事情的原委。在巴黎，一般的住所和旅馆，大门都没有门锁，是由"门房"来守门的，外面有人叫门时，由门房按电钮门自动打开。而一些较小的旅馆和住所，一般只有一个门房，有时由房东、老板、老板娘等看管大门，但不是整夜守在门房里，而是夫妻在床上按电钮将大门打开——这时大多数人还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如果谁外出，就说一声："请开开门。"同样，在进时，要通报自己的姓名，以防夜间混进外来

①沙特尔，巴黎西南的一个小市镇。

②十五子游戏，一种双方各有十五个棋子，以掷色子决定走棋的一种游戏。

人——理论上是这样。凌晨两点钟，在我住的旅馆，有人在外面拉响了门铃，进来后也通报了姓名，听起来像旅馆某位客人的名字，而且这位旅客还在门房里拿走了房间的钥匙。这本来是门房的责任，他应该从玻璃窗证实一下凌晨来的那个人的身份，因为他太困而没有这么做。又在一小时后，又有人要出去，叫了一声："请开开门。"门房把门打开后，突然觉得不对劲，怎么两点进来，三点就出去。他马上起来，看到那个从旅馆里出来的人拎着一只箱子向一条小巷走去。他顾不得穿衣戴帽，只披着睡衣，穿着拖鞋去追那个可疑的人。当他看到那个可疑的人拐了一个弯，走进小田园街一家小旅馆里，他这才不怀疑那个人是小偷了。于是，返回去，重温他的甜梦。

他对自己犯的错误，十分后悔。他带着我急急忙忙地去找最近的站岗警察。随后我们立刻到小田园街那家小旅馆查问，并且证实了我的箱子确在那里。可是那个小偷不在，也许出去了，到一家酒吧喝早晨咖啡。两名便衣警察在门房守候，半小时以后，他果真大摇大摆地回来了，于是他立刻被捕了。

现在我们两人——老板和我——必须到警察局去履行公事。我们被领到警长的办公室，警长是一位非常胖的、留着小胡子和蔼可亲的先生，他穿着的上衣纽扣也没扣，坐在写字台后面，写字台上面都是乱七八糟的文件，满屋子都是烟味，桌子上还放着一大瓶葡萄酒，表明了这位先生完全不属于对生活冷淡和不通人情的那些警察之列。遵照他的命令，将箱子拿到屋里，并要我查看，箱子里缺了几件重要东西。我知道，箱子里最主要值钱的东西是那本总额为两千法郎的信用存折，但是我在这里住了几个月，此款想必花得不少了。而且谁都明白，一本私人存折别人是无法使用的；再说，这本存折一直放在箱子

里的最低下，没有人动过。于是我作了如下口供记录：我确认这只箱子是我的个人财产，里面的东西一件也没少。写完后，警长命令把小偷带进来。出于一点好奇，我倒很想看看这个场面。

这种场面是值得一看的。两个警士押着小偷走进来：小偷体格瘦弱，夹在两个粗壮的警士中间，更显得瘦弱不堪，活像个可怜虫。他衣服褴褛，连衣领都没有，留着一撮稀疏的胡子，由于极度饥饿，他那脸尖瘦得像只老鼠的面孔。如果让我说的话，他是一个不高明的小偷，从他那粗笨的行动足以证明：作案的清早他拎着箱子没有溜之大吉。现在，他站在有很大权力的警长面前，低着头，全身微微颤抖，仿佛是受冻所致。我不得不痛苦地说，他不仅使我感到遗憾，而且我觉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同情心。当一名警官将从小偷身上搜出的东西一一摆放在一块木板上时，我的同情心更是倍增。从他身上搜出来些奇特的东西，是我想象不到的：一块非常脏的手帕，钥匙钩上挂着十二个大小不同规格的万能钥匙和撬锁钩，这些东西互相撞击起来像乐器的叮当声。又搜出了一个破皮夹，好在里面没有武器。至少可以证明这个小偷是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种方式行窃的。用的是和平的方式。

警官当着我们的面细致地检查这只皮夹，结果令人吃惊的是，并不是里面有几百几千法郎，而是一张钞票也没有，倒是有二十七张袒胸露肩的著名舞蹈演员和女演员的照片，还有三四张裸体照。由此可以看出，他没有其他犯罪的事实，而且这个瘦弱的忧伤的年轻人是追求美的爱好者。巴黎的这些明星他崇拜万分，但那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把这些照片藏在心窝里。虽然警长故意装出严厉的目光，一张一张察看那些裸体照。但逃不出我的眼睛：警长在想另一个问题，一个处于这份天地的

人，还有这种收藏兴趣，真是趣事。我也是这样想。当我看到这个可怜虫式的犯罪者对美有着这样的爱好时，我对他的同情再次明显地增强了。当警长郑重地拿起笔，问我是否“起诉”时——即对小偷进行控告，我飞快地严肃地回答说：“不”。

为了对当时的情况进一步了解，也许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些补充，加以说明。在我们国家和其他许多国家，凡是犯罪案件，都由官方起诉，也就是说，由国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门提出公诉；而在法国，是否提出起诉，由受害人自己来决定。我觉得，这种法制观念比那种刻板的法律要公正得多。由受害人决定是否起诉，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宽恕那个干了坏事的人，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但是在别的国家就不行。譬如在德国，一个女人由于一时的嫉妒用左轮手枪打伤了她的情人，不论被打的人怎么苦苦哀求，一点用也没有，这个女人一定要受到审判。这时，国家要出面干预，把这个女人从她情人的怀里拉出去，送进监狱。这个女人一气之下打伤了她的情人，而这个男人说不定因她的激情会更爱她呢。在法国，这个女人做了保证以后，就同自己的情人手挽手回到家里。他们之间的一切矛盾从此云消雾散。

当我坚决的说出那个“不”字时，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反应。夹在两名警察之间瘦弱的可怜虫一下子站起来，带着一种无法描绘的感激目光望着我——这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警长满意地放下手中的笔，我看出他心里很满意，因为我不追究，省了他不少文牍琐事。而我的房东反应却很强烈，他涨得满脸通红，对着我大喊大叫，说我不应该这么做。对这些无赖、“混蛋”非得斩草除根不可。说我根本想不到这个家伙还会去伤害别人，他不会学好的；正派人要日夜提防这些无赖，你饶了一

个，等于给另外一百个壮了胆。房东的一番话，彻底暴露了一个小市民全部的诚实和正直，同时也暴露了小市民的狭隘性，他怕影响了旅馆的生意。为了避免由此事带来的麻烦，他的话有点粗鲁，还有点威胁的口吻，毫不客气地要我收回成命。但我毫不动摇，我语气坚决地对他说，我已经找到了箱子，没受任何损失，对我来说，一切都解决了，我没有什么可控告的。我又说，我有生以来从未控告过任何人。我加重语气说，我决不愿看到，今天的中午我在大吃牛排而津津有味，而另一个人因为我的缘故不得不吃监狱里的粗饭淡菜而愁眉苦脸。我说到这里，房东仍然坚持己见。这时警长发话了，这事由我而不是由房东作决定，由于我坚持不起诉，此事就这么了结了。房东听到这里，气冲冲地走出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警长站起来，望着这位生气人的背影，露出微微的笑容，拉着我的手，默默地表示赞同。这样，例行的公事就算完毕。我伸手去拿箱子，准备带回家。但是，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那个小偷有点低声下气地快步走到我的面前，说道："喔，先生，您别拿，我把它送到您家去。"于是我在前面大步走，那个感激涕零的小偷拎着箱子紧紧地跟在后面，走过四条街，回到了我住的旅馆。

看来，这件令人烦恼的事就这样轻松愉快地结束了。可是余波未平，这件事很快导致了另外两件事的出现。我对法国人心理的了解，这两件事对我很有启发。第二天，当我到维尔哈伦家时，他幸灾乐祸地迎接我，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在巴黎的奇遇可够特别了，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原来是一个很有钱的家伙。"开始，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接着他递给我一张报纸，上面登着一篇关于昨天发生的事件的长篇报道，我

一看，不过是一篇任意发挥的浪漫主义杰作，与原来的事实真相大不一样，使我目瞪口呆。报纸上的报道，以新闻记者卓绝技巧作了这样的叙述：在市中心一家旅馆里，住着一位外国贵宾，他的一只箱子被窃——为了引起大家的兴趣，把我写成了阔佬——箱子里有许多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一本两万法郎的信用存折——一夜间，我的二千法郎增加到十倍——以及其他无法补偿的东西（实际上仅仅是些衬衣和领带）；开始，几乎没有发现线索，小偷的动作不仅非常干练，而且他对周围环境也非常熟悉。由于警察分局的警长先生，具有“非凡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果断地采取各种措施，他用电话联系，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巴黎的所有旅馆和客栈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详细的检查。措施的一贯周密和准确，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抓住了坏蛋。警察局长为了表彰自己优秀部下的杰出成绩，及时给了特别嘉奖，因为他的能力和远见，再一次为巴黎警察局的模范组织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这篇报道中，没有一点是真实的。那个所谓做出杰出成就的警长始终没有离开写字台半步；其实是我自己带着箱子把小偷送到警察局的。可是这个高明的记者，为了捞到宣传资本，利用了这次好机会。

如果说这件事对小偷和高尚的警察当局都有好处，可是对我说来再倒霉不过了。因为从那时起，一向与我非常温和相处的房东，却处处与我为难，不让我在这家旅馆继续住下去。我走下楼去，向坐在门房的房东太太友好地问候，她不理不睬，反把她那个狭隘的不开窍的小市民脑袋扭到一边。那个小伙计也开始不认真打扫我的房间，连我的信件也莫明其妙地丢失了。隔壁的那些小商店和那间烟店，我见到的也都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于我大量消耗烟制品，我去烟店是大受欢迎的，

他们称我是老“朋友”。由于那件事，我伤害了小市民的道德观。不仅旅馆里的人，而是整个小巷，甚至全区的人，都一致起来反对我，因为我“帮助”了小偷。到了后来我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带着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离开了舒适的旅馆，好像我犯了什么罪似地不得不离开。

我从巴黎来到伦敦，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一个人从炎热的夏天一下子走进阴凉之处。一个人刚到伦敦，首先就感到冷得发抖，但眼睛和感官很快就适应了。我原来打算在英国逗留两三个月，作为自己的一种义务。因为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是按着这个国家的轨道向前运转的，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家，那么，怎么能够理解这个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影响呢？我也希望，我蹩脚的英语通过大量的会话和频繁社交好好练一练，顺便说一下，我的英语从未真正说得流利。可是我一直没有达到目的。我像所有欧洲大陆来英国的人一样，与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人，在文学上很少有接触。在这里，每天早餐的谈话和在小小公寓里简短的交谈，谈到有关宫廷、体育比赛和社交聚会等话题时，我总觉得非常不适应。当他们谈论政治时我插不上嘴，他们所说的那个家伙，我不知道他们指的是谁，指的是宫廷大臣还是别人。而英国的绅士先生们称呼人只称名字，不喊姓。我听马车夫说伦敦低层的话，我听不懂，耳朵像聋了似的。所以我的英语水平的提高没有我所想的那么快，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去教堂听传教士优美的措辞；我旁听过两三次法庭的审理；为了听标准的英语，我去剧院看戏。我在伦敦一直费力地去寻找，像在巴黎处处能遇到的社会活动，去寻找轻松愉快的生活和同伴情谊。找不到一个同我研讨我感兴趣的问题，同样，我对体育、

娱乐、政治以及他们平时关心的事毫不感兴趣，也不十分理解。所以在那些好心肠的英国人看来，大概我是一个缺乏修养和呆板的人。把自己与一种生活环境和当地的一群人从内心里打成一片，我从来没成功过。所以我在伦敦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自己房子里写作或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

开始，我想利用游逛好好了解一下伦敦。刚到伦敦的前八天，我在伦敦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走得脚底灼痛。我以一种大学生的责任感跑遍了导游手册上的所有游览点，从塔梭滋夫人的蜡像馆到英国国会。我学着喝英国的淡啤酒，也用英国正流行的烟斗代替法国的卷烟；我也从上百件小事上尽量去适应当地的情况。但是，无论是社会界还是文学界，我都没有真正与它们接触过。如果谁要从外表上看一下伦敦，只需走马观花似地看看那些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了，譬如说，只从伦敦城市数百万家商号门前一走而过，只能看到每家擦亮的大同小异的铜招牌以外，你什么也不会了解到。我到过一家俱乐部，但不知道是做什么的，坐在俱乐部又软又厚的安乐椅上，使我在精神上昏昏入睡，恰好说明了这里的整个气氛就是如此。我可享用不了这种柔软松弛的环境，就像有的人不能全神贯注的工作或者借体育活动来消除疲劳一样——人与人不同，各有所好。一个真正的观察者，或者是一个有闲暇的人，如果他不能把一切繁琐无聊的小事抛开，去追求一种高尚的社交艺术，伦敦就会把他当作异己排斥在外。而在巴黎绝不会这样，会愉快地让他参加到自己所喜欢的生活中去。在伦敦，我犯了一个错误，当认识到错误，为时已晚。到伦敦后，我本来应该找一份工作干，诸如，商店的见习员，一家报社的秘书等，可用以消磨来伦敦的两个月。这样可以使我多了解一些英国人的生活，可是我没

有这样做。两个月来，我看了一下伦敦的外表，经历的很少；那是过了若干年以后，打起大战来，我才真正认清了英国的真实概念。

在英国的诗人中，我只见到了阿瑟·西蒙斯①，通过他我得到了叶芝的邀请。我很喜爱他的诗，纯粹由于兴趣，我翻译了他的优美诗剧《水影》的一部分。我当时不知道，他邀请我参加的朗诵晚会，他只邀请一小部分人，是经过挑选的。我们坐在那间并不宽敞的房间里，显得有点拥挤，有的人甚至坐在垫脚的小凳上，有的索性坐在地板上。大家落坐之后，站在黑色斜面桌（或者是盖着黑布）旁的叶芝开始把两支手臂粗的祭坛蜡烛点燃，房间里的其他蜡烛顿时熄灭，这时朗诵开始了。叶芝黑色鬈发的脑袋和他的动作，显得轮廓分明，似剪影一般。叶芝缓慢地、低沉地、富有音乐感地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没有一点特意朗诵的味道。他的每首诗精辟透彻，颇具分量。他朗诵得很动人，确实也很庄重。我感到唯一不足之处，是他那一身不自然的打扮，他穿着道袍似的黑色长袍，活像一个神甫，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我认为，这是粗大蜡烛燃烧的结果。这一切，使这次自发的诗歌朗诵会并不像是一次文学欣赏，反而倒像是一次祭诗的仪式——但是，另一方面，这次晚会对我产生了一种新奇魅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地想起维尔哈伦朗诵自己诗歌时的情景：他只穿着薄薄的衬衫，以便于双臂露出来有节奏地挥动，他不讲排场，平平淡淡，不像演戏似的；我也想到里尔克，有时他从自己的诗集中吟几行诗，他说的朴实、清楚，默默地、不留痕迹的寻找恰当的词汇。叶芝的这次朗诵

①阿瑟·西蒙斯（1856—1945），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

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像演戏似的”诗人自诵会。虽然我很喜欢叶芝的作品，我还是带着怀疑的心情反对这种祭礼式的个人崇拜作法。尽管如此，叶芝表示我曾经是他值得感谢的客人。

不过，我在伦敦真正发现的诗人，并不是活着的人，而是一个恰恰被人忘记的艺术家：威廉·布莱克①。他是一位孤独的、有争议的天才。他的作品是拙笨与精细完美相结合的艺术品——至今还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议我，到大英博物馆的印刷品陈列室去——当时该陈列室由劳伦斯·比尼恩掌管着——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图的书籍：《欧洲》《美洲》《约伯记》——这些书在今天已成了古书店里的稀世珍本；我看这些书，像着了迷一样。我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一位具有魅力的人物，他好像乘着幻想的天使翅膀在荒原中毫无目地的翱翔。我连续几个星期深入发掘这位质朴又非凡的人物迷宫，并且打算把他的几首诗译成德语。想得到他的一幅亲笔画成了我的不可克制的欲望，不过在刚开始时，这只是一种梦想。一天，我的一个朋友阿奇博尔德·G·B·拉塞尔——当时他是布莱克作品最出色的鉴赏家——告诉我说，在他举办的展览会上，曾出售《梦幻式的肖像》中的一幅画，据他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这幅《约翰国王》是布莱克大师的一张最美的铅笔画。他对我说：“你对这幅画，会百看不厌。”以后事实证明了他说得对。在我的藏书和绘画中，唯有这一张画陪伴了我三十年。那位迷惑的国王不时用神奇的、明亮的目光从墙上注视着我。在我丢失的和损失的所有物品中，唯有这幅画是我辗转南北时最忘怀不了

①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

的。过去，我曾经在大街上和城市里，努力寻找过英国的天才，都没有找到。而这位天才突然以布莱克的名字出现，他是一颗真正的宿星，展现在我的面前。在我所喜爱的人当中，又增添了这一位。

我的崎岖道路

在巴黎、英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这种充满好奇的漫游和飘泊，本身就是一种十分愉快的事，而且还可以获得各方面的知识。但是，人终究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以便漫游时有出发点和归宿之处。当我今天周游世界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被迫流亡时，我对有个固定住所的感觉比以前更亲切。我从中学出来以后的几年，积攒了许多图书、绘画和纪念品，数量之多，简直成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的手稿打成大包堆放着。不可能把我心爱的东西装在箱子里，拖着它们周游世界。所以，我在维也纳租了一小套公寓房间，而它又不是我的真正住所。仅仅是一个临时落脚处，这是法国人常说的亲切言语。我的生活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就有一种神秘的临时感觉。我做每件事总要告诫自己，这件事是否实际，

是否正确。所以我写文章时，总是在正式写作前，先进行试写。我和女人交朋友时，也不乏这种临时的感觉。这样以来，我在青年时代的思想感情，也不是完全负责任的，同时，什么都是凭兴趣爱好，什么都想尝试一下，无论是练习、写作还是玩乐，都无所谓。我和其他人一样已到结婚、有孩子、有重要的社会地位，不得不集中精力进行奋斗的年龄，可是我一直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初学者、在自己面前尚有许多时间的起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是迟迟不为自己作出决定。因此，我总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真正创作”的预习，只不过是预告我文学生涯的一张名片，我的住所也不过是一个地址而已。我有意地在郊区选择一个小单元，不致于因为高昂的房费而妨碍我的自由。我也不买好家具，因为我不想把房间“维护”得像父母的房间那样。父母房间里的大小扶手椅都有外套，只是在接待客人时才把它拿掉。我有意不在维也纳久住，是因为我避免久住一个地方，会造成离开时有依依惜别之情。长年以来，我总觉得培养那种临时的观念是一个错误。到后来，我被迫离开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家园。我添置的东西都遭到了破坏。我反而觉得，我那种与己无关的神秘感情倒对我有所帮助；这种临时的观念倒是缓和了我不得不离开家乡的痛苦情感，使我的心情不致于过分沉重。

当时，我还不打算为自己的第一个住所添置很多值钱的东西。但是，我把在伦敦搞到的布莱克的素描和歌德一首诗的真笔手迹挂在墙上。歌德这首诗是他的名作之一，该诗写得字体潇洒、生气勃勃——那是我从中学开始搜集文人字画中最珍贵的一件。当时我们的文学小组，一边热衷于写诗，一边热衷于

追逐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签名。当然，随着中学生活的结束，我们就停止了写诗和征集签名的业余爱好。而我对搜集天才人物墨迹的兴趣与日俱增。我对签名逐渐觉得失去了兴趣。对国际名人的名言和对某个人的颂词也不感到兴趣。我要搜集的是诗歌和乐曲的手迹和原稿，因为我对艺术既从作者生平的角度，也从作者的心理角度来考察，由此产生了巨大兴趣，超过所有的一切。当一首诗、一段旋律，从渺茫之中，从一个天才的幻想和直觉中产生出来的主题，再用文字加以定形才能成为成品时，这是最神秘的时刻。这种加以定型的成品是经过反复思考推敲而成的，岂不比正在冥思苦想的或正在幻想中的原稿更鲜明更成熟？如果我面前只有一部成功的作品，我绝不会说，我对这个艺术家已经了解透了。我还是相信歌德老人的话，如果要完全理解一部伟大的著作，不仅要看到成品，而且还要必须了解这部作品的产生过程。如同我看到贝多芬乐谱的初稿一样，上面涂改的乱七八糟，改过的与原来的混杂在一起，改动的铅笔线正说明作者的才气，体现了他的创作热情，看到这些，我兴奋异常。从难以辨认的乐谱上反而引起我无限的遐想。我拿着这张像天书似的乐谱手稿，呆呆地凝视着，像着了魔似的。巴尔扎克的一张校样，几乎每句话都修改了，每一行字都反复涂改过，稿纸的周边已看不出白色，让各种修改符号和字迹占满了，从中我看到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为得到这种教益，心中欣喜若狂。有一首诗，我已经喜爱了十多年，如果一旦得到该诗的原稿，即它问世前的草稿，我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一股虔诚的、敬畏的感情，我几乎不敢动原稿一手指。能够收藏几张这样的手稿，是一种骄傲。像体育运动具有的魅力那样，我到处去搜集这种手稿，在拍卖时买到手或者弄清藏有这种手稿

的人，这几乎成了我的业余爱好中最有诱惑力的一种爱好。在搜集中曾度过了多少紧张的时刻！遇到过多少令人激动的好运气！有一次，幸亏我晚到了一天，拍卖了一件我非常需要的手迹，后被证明是假的。接着又发生一件稀奇事：我手中收藏了一件莫扎特的手稿，令人扫兴的是其中有一段乐谱被人剪掉了。这可能是五十年前或一百年以前一位莫扎特的爱好者将喜爱的乐谱剪掉的。该乐谱竟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拍卖会上出现了。这使我可以将莫扎特的咏叹调重新拼全，像他一百五十年前留下来的一模一样。当时我用稿费收入的大部分去购买名人手稿还尚且不足，但是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有体会，当他为了搞到一件手迹，不得不牺牲其他的爱好，可是那件手迹所带来的愉快大大超过牺牲的其他带来的不快。此外，我还向所有的作家朋友们请求，将他们的手稿捐送给我。罗曼·罗兰将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的手稿送给了我；里尔克把群众最喜欢他的《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给了我；克劳代尔给了我他的《给圣母的受胎告知》的手稿；高尔基给了我他的大批手稿；弗洛伊德给了我他的一篇论文手稿。这些人物都知道，没有一家博物馆会精心保管他们的手迹。我所收藏的手稿今天已散落在各个角落，可是对此有兴趣的人寥寥无几。

有两件最不寻常和最珍贵的文学手稿，够得上博物馆特级陈列品，虽不在我的柜子里珍藏，却藏在我住的一幢郊外公寓里。找到珍品，实属偶然。在我住的房间上面，有一套同我房间一样简朴的房间，住着一位灰白头发的老姑娘，她的职业是钢琴教师。有一天，她非常客气地站在楼梯上同我说话。她说，我在工作的时候，经常听到她在上钢琴课，这事使她深感不安。她希望，学生的拙劣弹琴不致于妨碍我的工作。接着她又谈到，

她的母亲同她住在一起，她母亲的双眼半失明，所以几乎不离开房间。她说，她母亲已经八十高龄，她不是别人，正是歌德的保健医生福格尔博士的女儿，她在一八三〇年由奥蒂莉·冯·歌德[1]当着歌德的面，为其洗礼。我听到这里，脑子轰了一下，不知所措。到了一九〇一年，世间竟还有一个看到过歌德神圣目光的人！由于我对一个天才留在世上的一切怀有深刻的敬意，所以我除搜集他们的手稿外，还尽量搜集他们的各种遗物。中学毕业以后，在我的“第二次生活”期间——大学的期间，家里的一间房子成了我搜集遗物的储藏室，如果允许我说，简直成了崇拜的殿堂。里面放着一张贝多芬用过的写字台和他的一只小钱匣。在他临终前，他从床上伸出颤抖的手，从小钱匣里拿钱给女佣人，里面还有贝多芬的家庭账簿的一张记账纸，有贝多芬的一绺灰白头发。歌德用过的一支羽毛笔我用玻璃盒仔细保存了多年，以免诱惑我好动的手去拿这支笔，我的手怎么配去拿这支笔呢！可是，现在居然还有一个被歌德那圆圆的黑眼睛慈祥、爱抚地注视过的一个人活在世上，这真是人世间的奇迹，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件更蹊跷的事啦！这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用一条极易断的红线把崇高的魏玛时代与我有幸住在郊区考赫巷八号楼系在一起。这时我忍耐不住请求钢琴教师允许我去看看她的母亲——德梅丽乌斯太太。这位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在她的小房子里看到有几件歌德家什，那是歌德的孙女童年时送给她童友的。有歌德桌上的一对烛台，还有一件歌德住在魏玛弗劳恩普兰街住所的住宅徽标之类的东西。而这位老人还活在世上，难道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奇迹吗？一顶极朴

①奥蒂莉·冯·歌德，歌德的儿子奥古斯特·歌德的妻子。

素的小帽盖在她那稀疏的白发上；她嘴唇上布满皱纹，可是很健谈。她向我详细叙述了她在弗劳恩普兰的住所里是怎样度过青年时代的最初十五年。那个时候，这个寓所还没有改成今天这样的博物馆；自从这位伟大的诗人歌德永远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家里的一切东西都保持原样，再也没动过。她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对自己的那段童年生活反而记忆犹新。他对歌德协会透露歌德等人的个人隐私的草率行径感到十分气愤，听到这些，我深受感动。他说，该协会“现已”出版了她童年的好友奥蒂莉·冯·歌德的情书。噢，她说“现已”完全忘记了奥蒂莉已去世半个世纪了！对她来说，歌德宠爱的这个儿媳现在还活着，还很年轻，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可在我看来，这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啦！她把过去的事，说成是现在的事，在她面前，我总有一股幽灵般的感觉。现在我们已经住在砖石结构的楼房里，互相用电话交谈，晚上有电灯，写信用打字机！从我这里再向上登二十二个台阶，就到了另一个世界——笼罩着神圣阴影的歌德时代。

从这以后，我多次看到过这位老太太，一个英雄的、庄严的世界依然在她的脑海里翻腾，其中有李斯特的女儿科西玛·瓦格纳①，在她热情奔放的姿态中，显示出坚强、严谨和大方的特性；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弗尔丝特②，她身材矮小，玲珑纤巧，有点卖俏；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女儿奥尔加·莫诺，她在

①科西玛·瓦格纳（1837—1930），音乐家李斯特的女儿，后来成为作曲家里查德·瓦格纳之妻。

②伊丽莎白·弗尔丝特-尼采（1846—1935），尼采的妹妹，1889年丈夫去世后，她一直作哥哥的助手、秘书和护士。

儿时，常常坐在托尔斯泰的膝盖上。我也曾听到过，年长的盖奥尔格·勃兰兑斯向我讲述他同惠特曼、福楼拜、狄更斯等人会见时的情景；我也听到过里夏德·斯特劳斯向我叙述他是怎样第一次见到里查德·瓦格纳的。这些人所讲的都没有像这位老太太德梅丽乌斯讲的那样使我感慨万千。她是受过歌德目光注视的唯一健在的人；恐怕我也是敢于说这种话的最后一人：我曾亲眼见过一个被歌德的手轻轻抚摸过头的人。

目前，我已找到了外出旅行出发和归来的落脚点。但更重要的是，我同时也找到了一个另外的家——出版社，三十年来它一直维护和促进我的全部作品。选择哪家出版社，决定一个作家的一生；我没有面临这种选择，而是我碰到了幸运的机会。几年以前，一位诗歌爱好者预想一个相当有素养的计划，他把自己的财产不用在赛马的饲养上，而宁愿用在一部艺术作品上。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瓦尔特·海梅尔①。他本人作为诗人，并无多大建树，可是他决定在德国创办一家出版社。他办社的宗旨是，不注重是否赚钱，甚至长期亏本，只要求出版的书有价值，而不在于它的销路。当时的德国出版界主要是从商业观点出发。海梅尔并不出版那些消遣性的读物，即使这类读物能赚大钱，他也不干。相反，他却愿意给那些深奥的、难以理解的作品提供出版的机会。专门收集那些以最纯粹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最完全的作品，这是他出版社的口号，是其他出版社望尘莫及的。开始，这家出版社并不为很多行家所认识，它却以自己的与众不同而孤芳自赏，故意命名为“岛屿”，即后来的

①阿尔弗雷德·瓦尔特·海梅尔（1878—1910），德国诗人、小说家、出版家，德语杂志《岛屿》和以后的“岛屿出版社”的创办人。

“岛屿出版社”。它印刷出来的书并非一般出版社的老样子，而是每部作品都印刷精美，装潢考究，使外在的形式配得上完美的内容。因此，每部要出版的作品，从标题的绘制、版心的排列、铅字的号码以及纸张的选择都要仔细考虑，还会遇到一些新的特殊的具体问题。甚至广告目录、信纸等等，这家注重信誉的出版社也一样考虑得十分周全。譬如说，我记得，三十年来我在这家出版社出版的那些书中从来没有发现任何印刷错误，我也没发现，出版社给我的信中有任何涂改的字句。所有的一切，包括最微小的细节都不马虎，堪称出版界的典范。

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的抒情诗都是由“岛屿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它不以作者还健在而放松既定的最高标准，我仅有二十六岁就被誉为“岛屿出版社”的固定作者，使我感到多么喜悦和多么自豪啊！我成为它的一员，从外表上看，固然提高了我在文学界的地位，同时，从实际上说，加深了我的责任感。谁要跻身于佼佼者的圈子里，就必须严于律己和节制自爱，在文学创作时绝不能粗制滥造或者像新闻体那样一挥而就，因为在书上印着“岛屿出版社”的标志，要求作者千遍万遍地考查它的内容质量，要和该书的印刷装潢一样完美。

现在，我年纪轻轻就碰到了这家年纪轻轻的出版社，我的事业与它的事业共同发展，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没有比这个更幸运了。只有这种共同的发展才能创造作者和他的作品与读者世界有机的生活联系。不久，我同“岛屿出版社”社长基彭贝尔格教授① 建立了真诚的友谊，这种友谊得到了加强，那是

①安东·基彭贝尔格（1874—1950），德国出版家、收藏家，1905 年任“岛屿出版社，社长，1938—1950 年歌德学会会长。

因为我们两人都热衷于搜集名人文稿。我们两人交往的三十年间，基彭贝尔格搜集歌德遗物同我搜集名家手迹一样，作为私产那是巨大的。我经常从他那里得到宝贵的忠告和建议；我也用我对外国文学的深刻了解，给予他许多重要的启发。所以，在我的建议下，岛屿丛书诞生了；它以数百万计的发行量，在“象牙之塔”的周围筑起一座巨大的世界之城，同时，也使岛屿出版社一跃成为最有名望的德语出版社。三十年后，我们觉得该出版社与它刚建社时完全不同，过去是一个小企业，现在成为最大的出版社之一；开始时，读者群很少，作者很孤独，而现在，是拥有最多读者的出版社之一。我与该社社长的关系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幸运的、相互理解的，要破坏我们之间这种关系，只能是一场世界性灾难和最野蛮法律的暴力。我今天一定会承认：要我离开家门和故乡，我并不觉得太难受，如果使我看不到我书上“岛屿”的标志，那我会更加痛苦。

现在，我前进的道路已畅通。虽然很早我就发表作品（几乎有点不大合适），可我心中有数，直到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我年轻时候，感到最大的激动是我与当时最有创造性人物的交往和友谊，这种交往倒成了我在创作中的危险障碍。由于见识多了，反而不知道哪个是真正有价值的，使我胆怯起来。由于我没有勇气而限制了自己，除一些翻译外，都是规模小的短篇小说和诗歌，这也是考虑经济上的稳妥。许久，我没有勇气去写长篇小说（要是有勇气需要三十年）。我第一次敢于在宽广的形式上作较大的试验，是第一次在戏剧创作上的试验有了成效，又进行了更大的试验，结果出现某些好征兆，促成了我创作的欲望。我在一九〇五年或一九〇六年夏天写了一个剧本——完全是我们时代的风格，是一部诗剧，是古希腊式

的。剧名是《忒耳西忒斯》①。说到该剧，我以后再没有让它再版——我三十二岁以前所有的著作，也没有再版过——这一事实说明，我所以今天还提到这个剧本，只是觉得它在形式上还有可取之处，另一方面，这出剧显示我的创作思想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我从来不喜欢为“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而是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在我中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命运的失败者，他们对我很有吸引力。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就的人，只写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比方说，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②；我不写伊丽莎白一世③，而写玛丽·斯图亚特④；我不写加尔文⑤，而写卡斯特利奥⑥。所以我在这出剧中，不把阿喀琉斯作为主人公，而是把他的对手，最不显眼的忒耳西忒斯当作主人公——一个深受苦难的人，只有别人给他苦吃，而他的力量和明确的目标不具备使别人痛苦的可能。我没有把完成的剧本给一个演员，甚至是我最熟悉的

---

①《忒耳西忒斯》是茨威格于1907年发表的诗体悲剧。

②伊拉斯谟（1469—1536），文艺复兴时斯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茨威格著有传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的胜利和悲剧》（1934）。

③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英国都铎王朝女王，1558—1603年在位。

④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后因争夺王位之纠纷，被伊丽莎白一世处死。茨威格著有传记《玛丽·斯图亚特》（1935）。

⑤让·加尔文（1509—1564），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家，受法国政府迫害逃亡瑞士，创加尔文教。他掌权后，大反异己，以“异端”罪名处死了许多科学家。

⑥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1515—1563），瑞士人文主义者，宗教改革家，1540年与加尔文结成友谊，1554年因对宗教看法不一，两人关系破裂，被加尔文以“异端”罪处以火刑。茨威格著有传记《卡斯特利奥反对加尔文》（1936）。

人去看。在这方面，我有自知之明，我十分清楚，用无韵诗写的剧本，还要用古希腊的服饰。这样的剧，即便是出自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和莎士比亚的手，也很难在现实舞台上创出“票房价值”。我只是图形式向几个大的剧院寄去了几册剧本，随后不久，我把这事全忘了。

大约过了三个月之后，当我接到一封信——信封上印有“柏林王家剧院”字样时，使我惊奇万分。我想，这个普鲁士的国家剧院对我有什么要求呢。出乎我的意料，剧院经理路德维希·巴尔奈——以前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演员之一——通知我，我的这个剧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最使他高兴的事，是他终于找到了阿达尔贝特·马特考夫斯基，他一直想扮演阿喀琉斯这个角色；因此，他要求我允许他们在柏林王家剧院首演这出戏。

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惊得我目瞪口呆。当时在德国有两名杰出的德语演员，一位是阿达尔贝特·马特考夫斯基，一位是约瑟夫·凯恩茨。第一位是北德意志人，他热情豪放，表演时激情如火，为他人所不及；第二位是维也纳人，他神态优美典雅，台词的艺术处理登峰造极，时而深沉回荡，时而铿锵响亮，此乃大师气派，无人能与他相比。而现在，将由马特考夫斯基塑造我剧中的人物，念我所写的诗句台词；我的这个剧将在德意志帝国首都最著名的剧院演出，这无疑给予我一大帮助——我觉得,这次演出将为我戏剧性生涯开创无限美好的前景，也是我还没有想到的。

从这个剧的排演中，我确实学到了一点经验：在舞台上的大幕布尚未拉开之前，绝不能先为这次演出而高兴。虽然该剧一次又一次的排练，朋友们又向我保证说：马特考夫斯基在排

练我写的那些诗句台词时，所表现出雄伟和阳刚的气派，是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我已经预订好去柏林的卧铺票，在快要出发的最后时刻，我接到了这样一封电报：因马特考夫斯基患病，演出延期。原来我以为这是一种借口，当剧院不能遵守时间或者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时，往往采取这种方法。可是八天以后报上登载一消息，报道马特考夫斯基已经去世。我剧中的诗句，成为他那张伶牙俐齿的嘴说的最后台词。

算了，我对自己说，就此结束。虽然还有两家够等级的宫廷剧院——德累斯顿王家剧院和卡塞尔王家剧院——表示愿意上演我的这个剧，但是我的兴趣几乎殆尽。马特考夫斯基去世以后，我想，谁还能演阿喀琉斯呢。可是，不久又有一个使人惊讶的消息：一天早上，一位朋友把我叫醒，他告诉我，他是约瑟夫·凯恩茨派来的，碰巧他也读过这个剧本，他觉得他适合演的角色不是马特考夫斯基要演的阿喀琉斯，而是阿喀琉斯的对手，剧中的悲剧人物忒耳西忒斯。他为能够演出这个剧，立刻与维也纳皇家剧院联系。当时该剧院的院长是保尔·施伦特①，他是一个合乎时代的现实主义者，领导着这个皇家剧院，以现实主义指导演出（维也纳人觉得很反感）。他很快给我来信说，他也看到剧中那些令人感兴趣的段落，可惜除了首演外，大概不会取得很大的成功。

算了，我再一次向自己说，对我自己，对我的文学作品，从来就抱着怀疑态度。凯恩茨对我的剧本持愤慨的态度。他立刻把我请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青年时代崇拜的神明，当时我是个中学生，真想吻他的手和脚。他虽然年已五旬，但他身躯

①保尔·施伦特（1854—1916），德国剧评家。

轻盈，精神焕发，两眼炯炯有神。听他的讲话是一种享受。即便是私下交谈，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楞有角；每个辅音说得清脆精练，每个元音说得流畅又响亮。我曾经听过他朗诵一首诗，如果今天他再朗诵一次，没有他的陪伴，我一定朗诵不好。他朗诵诗抑扬顿挫，富有韵律，意气风发。听他讲德语，是我从未有过的快事。现在看得很明白，这位被我奉为神明的人，确是因为他，我的剧本才不能上演，这一次请我来，就是为此事向我道歉的。他一再强调，今后我们之间千万不要失去联系。我现在对你还有一个要求——我心里倒挺高兴，凯恩茨有求于我！——他说，当前他有许多客串演出的任务，为此，他准备了两个独幕剧，他觉得两个少，还需要有第三个独幕剧。他初步设想，写一个小短剧，尽量写成诗体，最好有感情奔放的连篇台词——这是德国戏剧艺术中绝无仅有的——由于他具有说台词的卓越技巧，能一口气把连篇台词像一场瓢泼大雨一样倾注在一群屏息聆听的观众头上。他问我，是否能够给他写一出这样的独幕剧？

我答应他试一试。正如歌德所说，有时候意志能“指挥诗兴”。我完成了一部独幕剧的初稿，名曰：《粉墨登场的喜剧演员》，这是一出洛可可式的轻松喜剧，附有两大段抒情的富有戏剧性的独白。我下笔时，尽量考虑到凯恩茨的气质和他念台词的技巧，无形之中，台词写得符合他的愿望。所以我这篇应命文章写起来得心应手，不仅觉得写的熟练，而且觉得充满热情。三个星期以后，我把这部带有一首“咏叹调”的半成品草稿给凯恩茨看。他由衷地感到高兴。他立即把手稿中那段长篇台词吟诵了两遍，当他吟诵第二遍时，吟诵得十分完美，使我难以忘怀。他问我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定稿，显然，他已经急不可

待。我回答需要一个月。他说，好极了，正合适！他说，他现在要到德国去巡回演出，需要数周时间，回来后就立刻进行排练，因为这个剧已经是属于皇家剧院的。他又向我承诺，不管他到哪里演出，一定将此剧作为他的保留节目。因为这个剧是专门为他写的，非常适合由他来演，像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他握着我的手，深情地摇晃了三次，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像自己的手套一样合适！"

很明显，在他启程前，皇家剧院已先下手为强，把我这出独幕剧先排练上。剧院经理放下架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让我先把这出戏的草稿给他看；他拿到草稿后，立刻就开始排练。围绕凯恩茨这个主角，分配其他角色练台词。这次重新表明，我没有下多大的赌注就成了大赢家，赢得了皇家剧院——维也纳城的骄傲。该剧院里，当时除了女演员杜塞以外还有许多著名的男演员，将在我的剧里充当角色，几乎没有新手参加。现在只会出现一个危险，即是凯恩茨回来后，在我完成剧本前，他会变卦。看来这是完全不会的。虽说这样，我也是越来越不安。从报纸上我终于知道凯恩茨已经回来了。我的心平安了一些。出于礼貌，我没有在他刚到就立刻去打扰他，而是迟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我鼓起勇气把一张名片递给了扎赫尔大饭店的那个我相当熟悉的老看门人，"请交给皇家演员凯恩茨先生！"那位老人透过夹鼻眼镜痴痴地望着我："您真不知道？博士先生。"是的，我不知道。"今天早上就把他送进疗养院了。"这时我才明白，凯恩茨是身患重病回来的。在巡回演出中面对毫不知情的观众，顽强地忍受着剧痛，最后一次表演了自己最拿手的角色。因患癌症他第二天动了手术。根据报纸上有关他病情的报道，我们还是有胆量，希望他康复。我曾在他的病榻旁探望他，他躺

在床上，显得疲倦、憔悴、消瘦的脸上两只眼睛显得特别大。使我特别惊奇的是这个善于辞令永葆青春活力的嘴巴上第一次露出灰白胡子。我看到这位临终的老人，心里很难过。他忧郁地向我苦笑：“亲爱的上帝还让我演这个剧本吗？这出戏有可能会使我健康呢！”但是，几个星期后，我们却站在他的灵柩旁。

人们将会理解我不愉快的事，我还能继续写戏剧吗。每逢我把一出新剧交给剧院时，我就有点担心害怕。两个最伟大的演员，在排练我的剧时，双双身亡。哪有这么巧的事，这使我迷信起来，我公开承认这一点。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振作起来又写剧本。当时皇家剧院的经理是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是一位杰出的戏剧专家和讲演大师。他很快就采纳了我的剧本。我依然怀揣不安地看那份演员名单。我的想法自相矛盾得很，惊叹“谢天谢地，里面没有一个著名的演员”，怕就怕再出现一位著名演员。这种厄运不会有人能碰得到吧！到底还是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如果把不幸关在门外，另外的不幸会偷偷混入。我过去只是想到演员，却没有想到剧院经理阿尔弗雷德·贝格尔男爵。他打算亲自导演我的悲剧《临海的房子》，并写完了导演手册。可是啊，事实是：十四天后，第一次排练应该开始时，他就死了。看来，我若是搞戏剧创作，咒语一定会应验。甚至到了十年以后，我的剧本《耶利米》和《沃尔波内》在第一次大战后，在各国的剧院上演时，我心里仍有余悸。我有意地违背自己的利害关系，于一九三一年写了一个新剧本《穷人的羔羊》。我把原稿寄给我的朋友亚历山大·莫伊西以后，有一天，我收到了他的电报，问我是否可以为他保留主角作首场演出。莫伊西，从故乡意大利把自己优美的声音带

到德语舞台上。在此之前，他在剧坛上默默无闻。当时他是约瑟夫·凯恩茨唯一杰出的继承人。从外表上看，他富有魅力，聪慧活泼，同时还是一位心地善良、热心肠的人，他给每一部剧作都赋予自己的魅力。我想不出还会有更理想的人选，能像他一样充当主角。不过，顿时我就想起了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尽管他向我提出要当主角的建议时，我托词拒绝了他，只是我没有对他说明真相。我知道，他从凯恩茨手中继承了那枚所谓的伊夫兰德戒指①，德国最伟大的演员总是将它传给最杰出的继承人。最后，他会不会同凯恩茨一样的命运呢？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伟大的德国演员第三次碰上这种厄运。那么，我出于迷信，也是出于对莫伊西的爱，虽然我知道莫伊西当主角演出会完美无缺，会造成美好的社会影响，我还是没有同意他演主角。非但如此，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给戏剧界奉献任何新作。实际上我做出了这样的牺牲，并没有保佑莫伊西安然无恙。虽说我没有任何过错，却总是牵扯到莫名其妙的灾祸中。

我心里很明白，别人会怀疑我在讲一个鬼的故事。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的死可以解释成是意外的厄运。在他们以后的莫伊西的厄运又怎么解释呢？我一直没有同意他担任我剧里的角色，并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新剧本。所发生的事情是这样：许多年以后，即一九三五年夏天——在这里，我将自己

①伊夫兰德戒指，是德国著名演员、剧作家和剧院领导人奥古斯特·威廉·伊夫兰德（1759—1814）所捐并镶有伊夫兰德头像的指环，要一代一代传给最优秀的德语演员，虽然大战期间中断数年，战后又继续传下去。

的年日志中项目的时间提前了——我正在苏黎世，突然我接到亚历山大·莫伊西从米兰打来的电报，电报说，他晚上到苏黎世来找我，请我无论如何要等他。我想，这真是怪事。他怎么这样急来找我，我也没有写出新剧本，多年来，我对戏剧已相当冷淡。但是，十分清楚，我会高兴地等着他来，因为我喜欢这一个热情、诚恳的人，我把他看作是兄弟。他刚走出车厢就向我迎来，我们按意大利的礼节拥抱。我们坐小汽车离开车站时，他迫不及待地对我说，要我为他做点事。他有件事求我帮忙，而且是件大事。他说，皮兰德娄① 为了向他表示特别的敬意，决定把自己的新剧作《修女高唱五月之歌》交给他来首演，不仅在意大利首演，而且在世界上首演——应该在维也纳首演，还要用德语演。像皮兰德娄这样的意大利大师能让自己的戏剧在外国首演，这还是第一次；即便是巴黎这样的城市，他从来没有下定决心在这里首演。皮兰德娄最担心是他的诗剧在翻译中失去音乐性和优美的光彩。他不希望一般的译者来翻译，而是想请我来承担，因为他长久以来对我的语言功底评价很高。很明显，皮兰德娄再三迟疑不决，他又想，怎么要把我的时间浪费在翻译上呢！他把这个任务交给莫伊西，由他传达皮兰德娄的请求。多年来，我一直没有翻译什么，但是出于对皮兰德娄的尊敬，我不能使他失望；我同他有好几次友好的会面。对我亲密的朋友莫伊西表示兄弟情谊，也意味着我也获得了愉快。我放下自己的工作一两个星期；没几个星期，皮兰德娄的剧本，用我翻译的译文，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国际首演。另外，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该剧首演肯定引起巨大轰动。皮兰德娄答应亲自

①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意大利小说家、荒诞戏剧作家。

来参加。墨索里尼当时以奥地利公开保护人的身份，率领他的全部阁僚出席这次演出。首演的那天晚上，同时也成了一场奥—意友谊的政治示威（所谓友谊，实际上奥地利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

开始排练的那几天，正巧我也在维也纳。我为再一次能见到皮兰德娄而十分高兴。无论如何，我总想听到莫伊西的道白艺术念我译的台词。真像见鬼似的，二十五年后，这种可怕的怪事又重演了。一天早上，当我翻开报纸读到莫伊西得了重感冒，从瑞士来到维也纳，所以排练不得不延期。我想，流感也不是一种严重病，可是，当我去探望这位有病的朋友走到旅馆门口时，我心里怦怦直跳——庆幸不是扎赫尔大饭店，而是格兰特大饭店，我这样来安慰自己——当年我到饭店探望凯恩茨没有见到他的情景突然在我脑海里出现。经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恰恰是同样的厄运又重新落到一个德语的伟大演员身上。由于高烧他神志昏迷，医生不允许我再继续看莫伊西。两天后，我站在他的灵柩前，而不是在排练场，一切都像当年凯恩茨一样。

为了便于说明，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魔力总是同我的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第三次也应验了，这件事是以后发生的，为方便回忆把它提前的。不言而喻，在我今天看来，这种厄运的重演，纯属偶然。可是，马特考夫斯基和凯恩茨相继迅速逝去，无疑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影响了我的一生。如果当年马特考夫斯基在柏林，凯恩茨在维也纳，两人都健在，就会把当年二十六岁的我所创作的所有戏剧搬上舞台，我就可以借助他们的艺术创造，迅速地（也许快得没道理）在广大公众面前成名。只走这条路，也许会误了长期学习和了解世界的时

间和机会。开始，剧坛为我提供了许多诱人的、连我自己都不敢梦想的机会；可是到最后一刻，剧坛居然冷酷地把这些机会从我身边夺走。但是，只有青年时代我认为偶然事件是命运注定的；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自己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偏离愿望的道路会一直把我们引向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走出欧洲

当时的时间过得好像比今天快，是否因为我们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各种彻底改变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世界事件呢？还是青春少年时都好过。还是因为，按部就班的埋头工作，在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生的事件，在我今天的记忆里是否已相当模糊呢？当时我写作，发表作品，在德国已知道我的名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名声已传到国外。我有了支持者，他们对我的作品都能够说出一定的特点来；也有了反对者。帝国的所有大报都供我使用，我不用再向它们投稿，而是它们来向我约稿。但是，今天我心里才明白，过去我写的一切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当年的一切抱负、忧虑、失望、怨恨，在今天看来，确实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必然改变我们的

眼光。倘若几年以前开始写这本书，我就会提到我和盖尔哈特·霍普特曼、阿图尔·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戴默尔、皮兰德娄、瓦塞尔曼①、沙洛姆·阿施②、阿纳托尔·法朗士等人的谈话（与法朗士谈话本来就是愉快的；这位老先生可以给我们讲一个下午不正经的故事，却以一种非常严肃的和极其高雅的姿态来讲述）。我也可能记叙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况：古斯塔夫·马勒的第十交响乐在慕尼黑首演；《玫瑰骑士》③ 在德累斯顿首演；卡尔萨温娜④ 和尼任斯基⑤ 的首演。因为我是一个热情而好奇的人，所以我能够作为许多"历史"和艺术事件的见证人。但是，与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联系的所有事情，用我们较为严格的观点来看，都是注定要消亡的。我倒觉得，我年轻时候的那些人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学，不如现在的人把目光引向实际更为重要。

属于后一种人们中，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尔特·拉特瑙，他是在一个极其悲剧的时代控制德意志帝国命运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前十一年第一个被纳粹分子暗杀的人。我和他的关系，称得上是亲密的老关系了，我们这种关系是以很奇特的方式开始的。说到这里，要牵连到马克西米里安·哈尔登。我

---

①雅各布·瓦塞尔曼（1873—1934），德国作家，二三十年代享有盛名。

②沙洛姆·阿施（1880—1957），20 世纪犹太人文学的杰出代表。

③《玫瑰骑士》霍夫曼斯塔尔编剧，里夏德·施特劳斯作曲，于 1911 年在德累斯顿首演。

④塔玛拉·卡尔萨温娜（1885—1978），俄国著名芭蕾舞演员。

⑤瓦斯洛·尼任斯基（1890—1950），俄国著名男芭蕾舞演员，他的足迹遍及欧洲、美国、南美等地，有"舞圣"之称。

在十九岁时做出的成就，要归功于哈尔登。他创办的政治周刊《未来》，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最后几十年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哈尔登是由俾斯麦亲自推到政治舞台上的，他也甘心当俾斯麦的喉舌和替罪羊。他把俾斯麦以后的大臣轰下台，又促使奥伊伦堡① 事件的爆发，使德皇的宫殿在不同的攻击和揭露下瑟瑟发抖，期刊每周出版一次，它也每周发抖一次。除此之外，哈尔登的个人爱好是文学和戏剧。一天，《未来》周刊发表了一组格言，作者的笔名现在我记不起来了，可是格言写得特别机敏，语言特别精炼，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是该周刊的固定作者，便写信给哈尔登："那位新作者是谁？我已多年没读到过这样精练的格言了。"

回信的，不是哈尔登，而是署名为瓦尔特·拉特瑙的人。从他的来信和其他方面我可以断定，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柏林电气公司总经理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业家、无数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国"放眼望世界"（这里借用让·保尔② 一个词）的新型商人之一。他在信中以非常诚恳和怀着感激的心情对我说，我的信是他接到对他文学尝试赞许的第一封信。虽然他比我大十岁，而他坦率地向我承认，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书来出版，他真的没有什么把握。他说：我毕竟是一个门外汉，迄今为至，我的全部活动是在经济领域里。我回信，真诚地鼓励他。从此我们的通信联系一直保持着。以后我到了柏林，我先打电话给他，他在

①博托·奥伊伦堡爵士（1831—1912），曾出任普鲁士总理，当时与帝国首相卡普里维发生政见分歧，德皇于 1894 年突然将二人同时免职。

②让·保尔（1763—1825），德国小说家。

电话里的回话有些犹豫。“啊！原来是您呀，真不巧，我明早六点就要去南非……”我打断他的话：“那我们下一次再见面吧。”他边想，边慢慢地说：“您等一下……让我好好想一想……下午我要参加几个会……晚上我要到部里去……然后还要到俱乐部参加晚餐会……那么，您十一点一刻到我这里来，您是否方便？”我说可以。我们一直聊到凌晨两点。早上六点钟他就出发了——后来我才得知，他是奉德国皇帝的派遣到南非和西非去的。

我之所以在这里叙述这些细节，是为了更全面地说明拉特瑙的性格特点。这位十分忙碌的人总能抽出一点时间写文章或者会见文友。在欧洲大战最艰难的日子里我见过他，并且在热那亚会议之前，即在他被暗杀的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小汽车里，同他一起驶过大街。他是在这辆汽车里，也是在这条大街上被暗算的。他是个大忙人，而他把自己一天里的每一分钟都预先安排得十分妥当。因为他大脑的应变力很强，所以他随时都会很轻松地从这件事很快转到另一件事，就像一台精密的快速运转的仪器一样，我从来没见过其他人身上有这种特点。他说起话来非常流利，好像是在念一张看不见的讲稿，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形象、清晰，只要把他的讲话速记下来，便可以立刻复印成一份报告。他会说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说得像他的母语——德语——一样好。他的记忆力超群，从来没遇到过麻烦事。他从来不为一份材料去特意准备。我同他谈话时，我就觉得自己很笨拙、缺乏修养和自信、而且思路混乱，他恰好相反，他对面前的一切了解得都很清楚，能够冷静地权衡利弊得失。我感到他头脑清晰，思路敏锐的同时也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譬如他的宅屋里摆着最好的家具，墙上挂着最美的画像；他的才智像一台天才发明的仪器，他的住宅像一座博物馆。他

住的是封建时代路易丝女王的宫殿，这里秩序井然，一尘不染，视野开阔。可是让我呆在里面，绝不会感到温暖。不论何物都像玻璃透明一样，那就是在他的思想中把什么都几乎看透了，因而对什么都觉得无所谓。从他的表现中，我深切感觉到这位犹太人的悲哀。他的头脑尽管清醒冷静，却埋藏着深切的不安和无把握感。我的其他朋友们，例如，维尔哈伦、埃伦·凯伊、巴扎尔热特等等，虽不及他十分之一的聪慧，不及他百分之一的博学和对世界的了解，可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总觉得拉特瑙聪明过人，他的双脚始终不着地。他的整个生活始终充满着层出不穷的矛盾。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全部可以想象到的权力，却不愿做他的继承人；他是个商人，却觉得自己是个艺术家；他是个百万富翁，却愿意发挥社会主义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却向基督教献媚；他想的是国际主义，却又崇拜普鲁士精神；他梦想的是人民民主，但是他受到威廉皇帝的接见和询问时，又感到莫大的荣耀。他深知皇帝的弱点和虚荣心，可他知道自己不是有虚荣心的人。因此说来，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是一种鸦片，用来麻醉内心的烦躁不安和打消内心深处的寂寞。当一九一九年德国军队崩溃以后，历史的重任落到他的肩上，在这个时刻他的各种潜力才发挥出来。从一片混乱中重建遭到破坏的国家。他的天赋才干，他献身于一个理想：拯救欧洲，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与他进行活跃的谈话中，不仅开拓眼界，而且振奋人心；就谈话的思想丰富和明确清楚而言，与他的谈话只能和霍夫曼斯塔尔、瓦莱里、赫尔曼·凯泽林伯爵的谈话相媲美。我的视野从文学扩展到当代历史，应当归功于他。我应该感激拉特瑙，是

他首先鼓励我走出欧洲。他对我说："如果只了解英吉利岛，您就不会了解英国。同样，如果您从未走出欧洲，那您也不会真正懂得我们这块欧洲大陆。您是一个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这种自由！搞文学工作是一种特别好的事业，因为这是一种不紧不慢的工作。要出一本好书，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所谓。您为什么不去一次印度和美国呢？"这些偶然说出来的话却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下决心按他的建议办。

印度给我的印象比以前我想的更可怕更苦恼。那里的人骨瘦如柴，黑眼珠里散发着悲愤的神色；他们的悲惨生活总是和极单调的世态炎凉结合在一起，使我感到吃惊。更使我吃惊的是，阶级和民族顽固的等级观念。这种等级观念，我在船上已经体验到了。有两个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在我们船上，她们黑眼睛，身体苗条，很有教养，谦虚文雅，穿着讲究。第一天我就发现她们有意躲避他人，或者是被一条我看不见的线隔开了。她们不与别人交谈，也不跳舞，只是坐在一旁看她们的英语书或法语书，到了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才发现，不是她们回避英国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国人躲着这两个"欧亚混血儿"，虽然这两个姑娘的母亲是法国人，而她们的父亲则是波斯血统的印度大商人。她们在洛桑女子中学寄宿和在英国的女子家政学校上学时，曾度过了几年与别人完全平等的生活。可是一到了开往印度的船上，立刻就受到冰冷的看不见的社会歧视；虽然这种歧视看不见也摸不着，但不能说它不残酷。在这里，我第一次亲眼看到狂热鼓吹种族偏见的作为，像瘟疫一样危害我们的世界，其恶果不亚于上几个世纪中产生的真正瘟疫。

通过与这两个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开始变得敏锐起来。一个欧洲人到这里来旅游，譬如说到锡兰的亚当

峰① 去，必须要有十二名至十四名佣人陪伴，他们把白人尊为神明，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尊严”之下。我怀着惭愧的心情，享受这种对欧洲人的崇敬，其实这种作法是欧洲人的错误造成的，虽然这种错误在人的心目中已经消失，但留下的却是：殖民统治。我们在欧洲那种和平环境里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安全，而到了印度，对欧洲人就采取了这样的保护措施。我一直摆脱不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和几个世纪里，这种状况必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舒适的妄想的欧洲环境里人不敢想象的事。由于我在印度亲眼目睹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不同意皮埃尔·洛蒂② 所描写的印度情况，他给印度涂上一层“浪漫主义”的粉红色，说它是一个令人警觉的国家。他写的不是金碧辉煌的庙宇，不是风蚀雨刷的宫殿，也不是喜马拉雅山的风光——这些在我旅行中给我最深的印象，而写的是人，我这次所认识的人，是另一个世界上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欧洲作家在这里遇到的是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人。当时在欧洲的人，收入不多，生活节俭，还没有组织像厨师那样的人出去旅游的事。凡是走出欧洲去旅游的人，大多数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就不是那种目光短浅的小商人，而必定是大商人；如果是医生，必定是个真正的研究家；如果是世袭的企业家，必定是一个开拓者，他们敢于冒险，慷慨豪爽，无所顾及；就是一个作家，也要是个好奇心较强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收音机，我只有与旅伴们交流来打发漫长的旅游时间。在我

①锡兰的亚当峰，锡兰是斯里兰卡的旧称，当时属印度。亚当峰是一佛教圣地和游览地。

②皮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作家，原名于里安·维奥。

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人交往中，我了解到，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各种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学习胜读百本书。随着离开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心中的评判标准也在不断变化。过去我把某些狭隘的事当作重要的事来看待，旅游回来以后，我依然把它们看作是目光短浅的事。我不再把欧洲视为我们这个世界围着它旋转的永恒轴心。

我在印度旅游遇到的人中间，有一个人对我们当代的历史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不是公开的明显的影响。我从加尔各答出发，前往中南半岛，在一艘沿着伊洛瓦底江向上行驶的内河轮船上，我每天都要和卡尔·豪斯霍费尔及其妻子相处好几个小时。当时他正作为武官出使日本。他的身材挺直细长，面庞消瘦，尖尖的鹰钩鼻，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有非凡素质和身为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内在纪律性的人。很明显，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就已经间或与军人有过来往，他们都是一些友好的、热情的，甚至是一些快乐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由于家庭生活所迫，不得不穿上军装，试图在服役中寻找自己最舒适的生活。而豪斯霍费尔则相反——我立刻就感觉到这一点——他出身于富裕而有教养的家庭。他的父亲发表了不少诗。我记得，他还在大学里当过教授。豪斯霍费尔在军事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他的使命是实地研究日俄战争。因此，他与他的妻子一起事先都学习了日语和文学。我从他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任何一门科学，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想博大精深，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豪斯霍费尔在船上整天忙个不停，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每一处，写日记，写报告，翻词典。我很少见到他手里不拿书。他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者，又是个很不错

的表达者。从他的谈话中，我学到不少东方之谜。我回国以后，仍与豪斯霍费尔一家保持着联系，我们互相通信；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时我们之间互访。因为他身染严重肺病，在瑞士的小镇达沃斯或在阿洛沙住了一年，由于他离开了军队，反而使他有时间去钻研军事科学。康复以后，他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一名指挥官。德国战败以后，我以极大的同情常常想起他，他一定很痛苦，在战胜国的日本有他的不少朋友，这更使他羞愧难当。我也想到，像他这样的人，一定会参加德国的强国重建工作，说不定，以看不见的隐蔽方式参与战争机器的工作呢。

不久，事实已经证明，他是系统和全盘考虑重建德国强国地位的先行者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学杂志。这是很正常的，在一个新运动开始之初，我并不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我真诚地认为，地理政治学只不过是研究和观察各个国家势力互相作用的一门科学，即便谈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间"——我相信这个词是他发明的——我也只是按施本格勒① 的意思，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循环交替的时代里，相对而言，一般都会释放出一种与时代有关的、不稳定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费尔的主张：要仔细研究各民族的性格特点，为此，建立一个常设的学术性指导机构，协调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这种地理政治学的研究，最终完全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接近。也许豪斯霍费尔的本来意图并不是政治性的——现在我就不能这样说了。我怀着很大兴趣读了他的不少书（在他的书里还引用过我的话呢），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听到各方面的客观反映，都认为他的讲课很有启发和教益；没有

①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

人指责他，说他的思想是为一种新的强权政治和侵略政治服务的。也没有人指责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为泛德意志的旧要求提出新的论据。但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时，就有人好像发现了怪事似地对我说："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吗?"当时惊得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第一，因为豪斯霍费尔的妻子出身种族不纯①，从而使她的两个儿子（很有才华又讨人喜欢）经不起纽伦堡犹太法② 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个有高度有文化修养的、思想邃密的学者怎能和一个野蛮的鼓动家在思想上有直接联系呢？这些疯狂的鼓动像是一批把德意志民族性理解为最狭隘、最野蛮的狂人。但是豪斯霍费尔的一个学生鲁道夫·赫斯是他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系人。希特勒这个人很少采纳别人的建议，而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议，他都铭记在心。因此，他觉得，"地理政治学"完全可以融合到纳粹政治之中，所以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的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虚伪地掩盖起来。而"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露骨侵略他国的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生存空间"这个词的解释具有多意的不确定性。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口号，实际

①豪斯霍费尔的妻子玛尔塔·迈尔-多斯有部分犹太血统。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继承父业，是地理政治学教授。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即宣布豪斯霍费尔家是"雅利安人"。

②纽伦堡犹太法，史称"纽伦堡法"。1935年9月15日，由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会上宣布，该法规定犹太人不再是"国家公民"，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国家属民"。严禁"雅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

上是为任何一种吞并哪怕是最霸道的吞并他国，提供借口。把这种赤裸裸的侵略说成是有理的，也合乎道理的，合乎人种学的需要。那么我这个旧时的旅伴——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或无意——他的理论让希特勒拿来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为他吞并他国找出了理论依据。最初这个理论只限于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协调，现在蜕变成这样的口号："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世界属于于我们"——我那个旅伴今天罪责难逃。这个事例说明，一个简明而内容丰富的提法它本身就是一股力量，能够转化成行动的灾难，就像以前的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统治的提法一样，最终走到自己的反面，蜕变成恐怖和群众的情感冲动。就我所知，豪斯霍费尔在纳粹党内位置并不显赫，甚至还不是纳粹党的党员，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躲在幕后的、出谋划策、尽给元首出坏主意的狡猾"谋士"，就像今天那些耍笔杆子的记者一样。毋庸置疑，不管他自觉或不自觉，他的理论把国家社会主义的侵略政策，从狭隘的国家范围扩展到全球范围。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希特勒那些粗暴的顾问们影响更大。也许我们的后代人比我们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献资料，对这个人物给予正确的历史评价。

第一次出海旅游之后，过一些时间，我便开始第二次跨海旅游，到美洲去。这次旅行无非是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们未来的一角，别无其他目的。远渡重洋到这个新大陆来的作家极少，他们不是为了生活来赚钱，就是来贩卖美洲新闻，纯粹为了旅行，来见识一下这块新大陆，印证一下自己对美洲的印象，这种人极少。我就属于这种人。

过去我对新大陆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义的，我今天这么说，

并不觉得不好意思。我只知道，美国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是一片有新节奏的土地，也是一片正在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土地。我到美国以前，我曾经读过那部伟大的长行诗句《卡美拉多》，以免我走进曼哈顿的时候，带着欧洲人那种傲慢态度，而是怀着友善、宽厚的胸怀。至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问旅馆里的门房，沃尔特·惠特曼的墓在哪里，我想去看一看。我这个要求使那位可怜的意大利人极为难堪，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纽约给我最初的印象相当不错，虽然它没有像今天这样迷人的秀丽夜色。当时，泰晤士广场还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水花四溅的人工瀑布。城市的上空没有梦幻般的星空——这是夜间的数百万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的繁星互相交织而成的。市容及交通还缺乏像今天这样大胆的宏伟设计，因为新的建筑艺术仅仅在个别的高层建筑上尝试运用还没有多大把握。橱窗的陈列和门面的装潢争奇斗妍的景象还刚刚起步。从一直微微晃动的布鲁克林大桥向港口瞭望和在石块铺成的大马路上徒步行走，足能使人心旷神怡。当然，过了两三天以后，这样的兴奋感就被另一种强烈感觉所代替，那是一种极度的寂寞感。我在纽约无所事事，无事可做的人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千万别去纽约。因为那里没有可供消磨一个多小时的电影院，没有方便的小型自动餐厅，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艺术商店、图书馆和博物馆。在文化设施和文化生活方面比我们欧洲落后得多。当我用两三天时间走遍了所有的博物馆和重要的名胜后，我就像一条没有舵的船在冰冷的刮着风的街道上打转转。我在大街上游来荡去，百无聊赖；那种寂寞的感觉迫使我想办法去加以解决；想个门道把走街串巷变得更有趣一些，我发现了一个自己玩的游戏。由

于我是一个人在纽约闲逛，我没想到自己是一个远走他乡的人，就像背井离乡的人一样，不知干什么才好，身上只有七美元。我心里想，他们不愿意干的事，我倒可以自觉自愿去干。我对自己说，你可以设想一下，最迟三天以后你必须去挣钱糊口。那么你必须考虑到，作为一个举目无亲的外国人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挣钱的差事！于是，我从这个职业介绍所找到另外一个职业介绍所，猜想着贴在门上的各种广告。有的招收面包师，有的地方要招一个会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临时抄写员，有的地方要招一个书店伙计。对我这个假定人物来说，最后一个位置适合我。那我就爬上三层铁的回旋梯，打听能挣多少钱，再与通过报纸上的广告去租一间在布朗可斯区的住所价格比较一下。经过两天的"寻找职业"，理论上我已找到维持我生活的五种工作。这样比我无事闲逛好得多，我可以确切知道，这个年轻的国家为每个求职的提供多大的活动范围。有多少机会——这一点，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像逛大街似的从一个办事处到另一个办事处，通过自我介绍，亲身可以体会到这个国家的神圣自由在办事的过程中到底如何。在求职过程中，没有人问我的国籍、我的宗教信仰和出身，我不带护照常常可以旅行，简直不可思议；而在我们那个世界里要到处走动，必须盖手印、办签证、还要警察局的证明才行。但在这里是工作等人，不是人等工作，这才是唯一重要的。现在的美国已处在神奇的自由时代，一分钟内就能签订一份合同，国家和贸易联盟等机构都不会用繁琐的表格手续去干扰它。我从"寻找职业"中，就几天时间我所了解的美国要比以后逗留的全部时间所了解的要多得多。在后几周我作为一个愉快的旅行者，徒步旅游了费城、波士顿、巴尔

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顿，我拜访了查尔斯・莱夫勒[1]家，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他曾为我的几首诗谱过曲；在其他地方，我都是一个人生活，一边旅游一边工作。仅有一次，一件意外的事打破了我隐姓埋名的旅行生活。对这件意外的事情我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在费城，我沿着一条南北向的大街散步，在一家书店的橱窗前站住了，查看一下书的作者有没有我认识的和熟悉的。突然我惊呆了，在橱窗的左下角陈列着六七本德语书，其中一本跳入我的眼帘，却是我的名字。我像着了魔似的，并且开始思考。在这里没有人注意到我，毫无目地的在异国的大街上漫步，也没有人认识我，更不会有人重视我。而现在，自身的我竟与书上的我在这里相遇，我的寂寞感顿时消失。想必那位书商将我的名字记在纸条上，我的书大概要用十天时间，远涉重洋来到这里。当我在两年后重游波士顿时，还情不自禁地去寻找那家书店的橱窗。

我到达旧金山之时，那里还没有好莱坞，我失去了到处闲逛的兴趣。可是，至少我还有在某一处观看太平洋景色的愿望。自我童年以来，由于环球航行的报道，使我对太平洋十分着迷。有一个观察点已经消失，看不到了，是因为开凿巴拿马运河占据了最后一个山丘。当时，我是坐小船绕过百慕大和海地到达这里的。我们这一代由维尔哈伦培养出来的诗人们，对当代的科学奇迹赞叹不已，热情之高如同先辈们对古罗马文化的宠爱。但在巴拿马运河区看到的情景却使人难以忘怀。机器挖出来的河床呈黄褐色，像镜面一样，就是带着墨镜也感到耀眼；到处是蚊子，密密麻麻无计其数，被蚊子蜇死的人埋在公墓里，一

[1]查尔斯・莱夫勒（1861—1935），美国作曲家、小提琴家。

排接一排，没有尽头。开凿巴拿马运河可谓是一项残忍的游戏。死于这项由欧洲开始最后由美洲完成的工程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啊！这项工程历经三十年，遇到过多少灾难和绝望才得以完成，只剩下最后几个月闸门的扫尾工程；然后一按电钮，使自古以来相隔两个大海的水就要永远汇在一起。我可是那个时代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个大海是处于分离状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亲眼目睹美洲这个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是我向美洲最好的告别。

欧洲的光彩和阴暗

我在这个新世纪里已生活了十年，我已到过印度，到过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现在，以新的、更为内行的喜悦之情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欧洲。我从来没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几年更热爱我们这片古老的土地，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盼望欧洲的统一，从来没有比那个时候更相信欧洲的前途，我们认为，已经看到了新的曙光。但是，实际上燃烧世界的战火已经临近，火光已经在望。

今天这一代人，是在灾难、破坏和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觉得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他们几乎每天都害怕战争爆发，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自世纪之交以来，一直对世界上的人充满信心，要我们向今天这代年轻人描述当时那种乐观主义和对世界的坚定信念，也许是很困难的。四十年

的和平环境，使欧洲各国的国民经济充满活力，技术的发展加快了生活的节奏，科学技术的发现使那代人的思想感到自豪。在欧洲所有国家里几乎一致地感觉到繁荣的生活已经开始。城市一天比一天美，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一九○五年的柏林，不能和我们一九○一年见到的柏林相比；柏林已从一个国家的首都发展成一座世界性的大城市；而一九○五年的柏林又大大超过了一九○一年的柏林。维也纳、米兰、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城市，只要人们再去一次，就会感到惊讶和高兴。街道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漂亮，公共建筑越来越雄伟，商店越来越豪华，越来越美观。人们在各种事物中都能感到财富在增长、在扩大。就是我们这些作家，从书的发行量上就能觉察到本世纪初的头十年，这段时间虽不长，但书的发行量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还有新兴建的剧院、图书馆和博物馆。诸如，浴室、电话这些属于少数人特权的方便设施，现在已开始进入小资产阶级家庭。自从工作时间缩短以来，无产阶级的生活开始好起来，至少有一部分家庭已过上小康生活。到处都在进步，谁敢于大胆作为，就能获得成功。谁买上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旧书或一张名画，行情会不断上涨。谁要是越大胆，越是舍得出本钱办一家企业，谁就保证赚到钱。无忧无虑的美妙景象笼罩着整个世界，有什么能打破这种景象呢？有谁能阻止这种干劲呢？这是从自己热情中迸发出来的干劲。欧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富裕和美丽；欧洲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美好的未来充满自信。对那个“美好的旧时代”依恋不舍的恐怕是那些循规守旧的老朽。

不仅仅是城市，农村也一样。由于体育运动，较好的营养，劳动时间的缩短以及接触大自然，人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

越漂亮。冬天，过去认为是荒凉枯燥的季节，无精打采地在客栈里玩牌或在暖烘烘的房间里虚度光阴；而现在，人们发现山上的太阳光有益于心肺，舒筋活血，爽身健肤。山区、湖泊、大海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离我们遥远得很，因为有了自行车、汽车和有轨电车把距离缩短了，改变了世界的空间感。到了星期天，穿着闪光的运动服乘着滑雪板和雪橇的男男女女沿着雪坡飞快直下。到处在兴建体育馆和游泳池。人们恰恰在游泳时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自己身上的变化。我年轻的时候，身体长得很匀称：中年时，脖子变粗，胸脯瘪，挺起肚子表示自己健壮；现在人们看身材是否灵活，肌肉是否发达，皮肤是否被太阳晒成棕色，这是体育锻炼的标志；通过体育锻炼培养的身体在比赛中显得文雅风趣，除了最贫困的人以外，星期天没有人呆在家里。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游，爬山和比赛，同时也学习各种体育项目。如果遇到假期，都出门远游。不像我们父辈那个时候，只到附近不远的地方，最多到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喀麦尔特石灰岩区去。现在的人们对整个世界都感兴趣，看看世界上是否都那么美，是否还有另外的地方更美；过去，只有那些有特权的人才能到外国去旅游。而现在，银行职员和小业主都有条件到法国、意大利去旅游。现在出国旅游比过去便宜多了，方便多了。主要是人的观念起了变化：有新的勇气，有新的敢闯精神，出去旅游才更大胆；在生活上节俭和谨小慎微才是丢人的。这代人决心使自己成为更富有青春活力的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年轻而感到自豪，这一点与父辈们正相反；首先是年轻人脸上的胡子突然没有了，而使那些年龄大的人们去仿效他们，为的是不显示出自己老相。年轻、精神焕发已成为当时的口号，不再老成持重。妇女们甩掉了束胸紧身衣，再也不打阳伞和戴面

纱，因为她们不再害怕空气和太阳。她们把裙子裁短，便于打网球时两腿跑动方便；她们露出丰润的部位时，再也不感到害羞。风尚变得越来越合乎自然。男子穿着马裤；女子敢于坐在男子马鞍上，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再有什么遮掩和隐藏的。世界不但变得更美丽，也变得更自由了。

在我们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在习俗方面也赢得了这种自由，他们生活得很健康又充满自信。人们第一次看到，年轻姑娘在没有家庭女教师的陪伴下，自己同男朋友一起运动，一起郊游，他们完全是一种公开的、自主的伙伴关系。她们既不害羞又不矫揉作态。她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们摆脱了父母严厉的监督，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她们当女秘书、女职员，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权利。卖淫——旧世界唯一被允许的色情交易——明显地减少了。由于提倡新的更为健康的自由，男女之间假正经的行为早已成为背时的东西。从前在游泳池里男女中间用木板隔开，现在陆续地被拆除。男女不再忌讳，他们知道彼此长得怎样，也懂得人类的繁衍。在这十年里重新又获得的自由、大方和自然，胜过以往的一百年。

现在世界上有了另一种节奏。一年发生的事胜于过去的几倍，几十倍！一项发明紧接着一项发明，一个发现接着一个发现；每个发明和发现都以飞快的速度变成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每个国家都第一次感觉到彼此之间是息息相关的。在齐柏林飞艇初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在前往比利时的途中，恰巧在斯特拉斯堡停留。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飞艇在大教堂上空盘旋，下面的人们热烈地对着飞艇欢呼，盘旋的飞艇好似向这座有千年历史的教堂频频点头。晚上，我在比利时维尔哈伦家得到的消息说，飞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坠毁。维尔哈伦满含泪水，激动

万分。如果他仅仅是比利时人，那么他对这次德国的空难就会抱无所谓的态度，但他是欧洲人，又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所以他和我们会一起分享战胜自然的共同胜利，也会同我们一起分担所遭受的考验。当布莱里奥①驾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时，我们在维也纳欢呼雀跃，他好像是我们国家的英雄。大家都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取得如此迅速的进步而感到自豪。现在我们的感觉是不分国界的共有的感觉；欧洲意识是欧洲各国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识，我心里想，如果一架飞机轻易地飞越国界，那么国界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些海关关卡和边防岗位哨就成了无用的摆设，与我们的时代精神是矛盾的，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热切地期望着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共同实现大同世界。这种感情的高涨像飞机飞翔一样美妙无比。有些年轻人没有亲身经历过最后几年欧洲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情感，我今天仍为他们遗憾。因为我们周围的空气不是死的，也不是真空，空气携带着时代的繁荣和时代的脉搏节奏。空气不知不觉地将时代脉搏传入我们的血液和内心深处，传入我们的大脑，并不断地传到每一个人。在这几年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从时代的普遍繁荣中吸取了力量。由于大家都有这种信心，那么个人的信心更增强了。也许我们像今天的人一样，当时并不知道那股将我们卷入的浪潮有多大，有多大风险。——可是，事与愿违。只有那个经历并对世界充满信心的人，今天才会明白，从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其实都是倒退和黑暗。

①路易·布莱里奥（1871—1936），法国工程师、飞行家，1909年7月25日，他驾驶自己设计的飞机，从加莱飞到多佛，完成了飞越英吉利海峡的的壮举。

当时的世界无比壮丽美妙，就像服了滋补药似的浑身是劲。这股劲头从欧洲的各条海岸敲打着我们的心脏。可是我们却没有预料到，那些使我们深感幸运的事，同时也存在着危险，当时席卷欧洲的自豪和信心风暴，本身就带着乌云。也许繁荣来得太快了，也许欧洲各国和各城市强大的太急促了，所以那种浑身是劲的感觉总是诱发人和国家去使用和滥用自己的力量。法国的财富够充裕的，但是它贪得无厌，它还要一块殖民地，尽管法国的人口已不足维持殖民地的统治，可它还想侵略，差一点同摩洛哥动武。意大利指望昔兰尼加①。奥地利要吞并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把矛头指向土耳其。目前德国被排斥在外，但它的利爪总想伸出去，大抓一把。欧洲各国的头脑里都充满了蠢蠢欲动的热血。这些国家扩张的野心到处膨胀，像流行病传染那样，但同时也要有效地巩固国内的秩序。那些发了大财的法国工业家向同样肥胖的德国工业家唆使，两家大公司联手合作。——克虏伯公司和法国勒克勒佐②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销更多的大炮。拥有巨额股票的汉堡海运界和南安普敦海运界对着干。匈牙利的农场主和塞尔维亚农场主对着干；这帮康采恩反对另一帮康采恩。经济的暂时繁荣使所有的人像发了疯似的，拼命的攫取更大的财富。如今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发生了战争，我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上的几个小地方。我以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这也是唯力论必然的悲剧结果，这是战前四十年和平

---

①昔兰尼加，又称“拜尔盖”，指利比亚东部地区。

②勒克勒佐，法国东部城市。

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这才导致了战争。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力量的强大所带来的感情，可恰恰忘记别的国家也有这种感情。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但最糟糕的是，我们被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欺骗了，那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每个国家都想让别的国家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于是外交官们就利用起恫吓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尔①；在巴尔干战争中，在阿尔巴尼亚，都玩弄过这种手段。可是，巨大的同盟国之间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军事化。和平时期德国就征收战争税，法国延长了服役期。多余的力量必然要发泄出来。巴尔干的爆炸信号则显示出，战争的乌云已向欧洲靠近。

现在人们还没有惊慌，但是有一种不安一直郁结在心头。每当从巴尔干传来枪炮声，我们总有一点点不安。难道战争果真会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并不知道战争的起因，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反对战争的力量集合得太慢了，如我们所知，太慢了，太胆怯了。反对战争的力量中有社会党和数百万宣称不要战争的人——对立的双方都有这样的人；有在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组织；还有若干跨国的康采恩，另外有少数几个反对国家统治者搞秘密交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们这些作家也站在反战的一边，诚然，我们这些人一直是孤立地工作，单枪匹马地干，而不是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很遗憾，知识分子通常抱漠不关心的消极态度。由于我们的乐观主义，在思想上不会预见到战争的来临，根本不会去想战争带来的各种道义上的后果。当时社会名流写

①阿加迪尔，摩洛哥西南部城市，临大西洋。1911年法国占领摩洛哥首都非斯，德国派炮舰“豹”号到阿加迪尔示威。

的重要文章，没有一人提到过战争问题，或者大声疾呼去告诫人们注意战争的危险。当我们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考虑，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兄弟般的关系，当我们在自己的范围内——对于时局我们只发挥间接作用——认清这样的思想：不分语言和国别，以和平的明智态度增进谅解和加强思想上的团结，我们认为这就足够了。并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备加赞赏欧洲的思想。我在巴黎曾看到一群年轻人团结在我朋友巴扎尔热特的周围；他们和老一辈不同，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好侵略的帝国主义。儒勒·罗曼、乔治·杜阿梅尔·夏尔·维尔德拉克、杜尔丹、雷内·阿科斯①、让·里夏尔·布洛克等人先组织了"修道院"文社，然而变为"争取自由"文社。他们是一群热情的先驱战士，他们正在迎接欧洲主义的到来。欧洲刚刚露出战争的苗头，他们就无比憎恨地反对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法国过去很少产生这样一群勇敢、坚定的有才华有道德的年轻一代。在德国，韦尔弗② 和他的"世界朋友"雷内·席克勒③ 一起为加强两人之间的谅解而热情地工作着；雷内·席克勒身为阿尔萨斯人命中注定要介于两个国家之间，他在感情上特别强调，世界各族人民要和睦相处。作为我们的同志从意大利向我们问候的是朱塞佩·安东尼奥·博尔杰塞。从斯堪的纳维亚和斯拉夫各国不断传来鼓励。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写信给我："还是到我们这里来吧！让那些煽动我们进行战争的泛斯

①雷内·阿科斯（1880—1959），法国诗人。

②弗朗茨·韦尔弗（1890—1945），奥地利著名诗人、小说家、戏剧家。

③雷内·席克勒（1883—1940），在阿尔萨斯出生的作家，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法国人。

拉夫主义者看看，你们这些奥地利人是不要战争的。”是的，我们都热爱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促使我们的世界飞速发展，我们也热爱欧洲！我们坚信理智将会在最后时刻阻止那种错误的游戏。我们过分相信理智的力量，这也是我们唯一的错误。当然，我们没有抱着怀疑的态度来观察眼前的征兆，而是充满自信，这不正是青年一代应该有的思想吗？我们信任饶勒斯①，我们相信社会党国际，我们信赖铁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胞当作炮灰运到前线以前就把铁轨炸毁。我们期望妇女们会拒绝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送到前线充当无谓的牺牲品。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德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期必定会战胜一切。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必然产生乐观主义，使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再则，当今我们缺乏一位组织者，他能把我们的内心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来。在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提醒大家注意的人，应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人。最奇怪的是，他生活在我们中间，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他一无所知，可是命运安排他将来成为我们的领袖。我是在最后才发现他，这也算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遇吧！再说，要发现他也很难，他住在巴黎，又远离“闹市区”。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写一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史，那也肯定会注意到有这么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巴黎的各种报刊上，大肆吹捧的诗人名字中你可以想得出来，众多的名字中恰恰缺少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认为这三位作家出了什么岔子。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我从没有在《费加罗报》和《马丁

①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1904年创办《人道报》。

报》上看到有人提起保尔·瓦莱里的名字；马塞尔·普鲁斯特是沙龙里的花花公子；而罗曼·罗兰则被视为知识渊博的音乐学者。他们几乎都是到了五十岁才小有名气，报纸上略载一二；而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是在世界上这座新事物层出不穷、文学艺术全面发达的城市里不声不响地创作出来的。

我发现罗曼·罗兰太巧了，纯属偶然。一位住在佛罗伦萨的俄国女雕刻家请我去喝茶，为的是让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时也想为我画一张速写。我准时四点钟到达，而我却忘了，俄罗斯人对时间无所谓。看起来，像是一位老奶奶，准是雕刻家母亲的保姆，把我引进她的创作室，请我等一下。创作室里杂乱无章，只有四件小雕刻品，用两分钟我就看完了。为了不白白浪费时间，我抓起一本书，不，我是顺手拿了几期杂志，它叫《半月刊》。我记起来了，在巴黎是有这个名称的杂志。可是，谁能自始至终注意这份小杂志呢？这些昙花一现的东西，一会儿铺天盖地，一会儿销声匿迹。我翻到载有罗曼·罗兰的《黎明》① 那期读了起来；我越读越兴奋，越读越惊讶，这个如此了解德国的法国人到底是谁呢？此时，我反倒感谢这位姗姗来迟的女主人，使我能够读到《黎明》。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位罗曼·罗兰是何许人也？"她也说不清楚。只有我去把其他各卷搜集到手后（最后几卷尚在襁褓之中），我才知道，终于有一部作品，不仅为欧洲个别国家服务，而且也为全欧洲服务，一部为增进欧洲各国团结的作品；现在终于有了这个人，一个诗人，他给我们带来各种道德力量：对爱的理解，得到理解的

①《黎明》是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第一卷。

真诚愿望，经过考验和鉴别的公正，以及对于艺术有关联使命的坚定信念。当我们为那张小小的声明花费心血时，而他却静静地、耐心地干工作，表现各民族的特性，指出各民族人民最可爱的特殊个性在哪里。这是第一部有意识地写欧洲生活的小说，也是在这里完成的第一部提出决定性号召的小说，它号召建立欧洲的睦邻友好关系。由于这部小说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所以它起的作用胜过维尔哈伦的赞美诗；比一切传单和抗议书更感人。我们大家无意识中希望的、渴求的，却在无声无息之中完成了。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他。这当中我想起歌德的话："他学习过了，就能教我们。"我向朋友们打听他，维尔哈伦说，他记得起来的是，在社会党人的"人民剧场"演出过一场剧叫《群狼》①。巴扎尔热特常听别人说，罗曼·罗兰是一位音乐家，他还写过一本关于贝多芬的小册子。我在国家图书馆的目录里发现罗曼·罗兰写的十二本关于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书，有七八个剧本，这些作品都是由几家出版社或者由《半月刊》出版的。为了取得与他的联系，我寄给他一本我写的书；不久他来信说请我去，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除了我和弗洛伊德，还有维尔哈伦的友谊外，我和罗曼·罗兰的友谊使我收益最多，在某些时候，这种友谊甚至决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特别要记住的日子要比平常日子的光度亮得多。所以，我第一次同罗曼·罗兰相见的情形，现在仍依然历历在目。那是坐落在蒙巴拿斯林荫大道附近的一幢不显眼的房子里，我

①《群狼》是罗曼·罗兰写的剧本，作于1898年。

走上五层狭窄的盘旋楼梯，来到他的门前，我就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宁静，这里几乎听不到林荫大道的喧闹声；窗子下面是一个老寺院的花园，只能听到风打树叶的沙沙声。罗曼·罗兰为我开的门，把我引进那间书籍堆到天花板的小小斗室。他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显示出最清澈、最和善的神采，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有人会这样，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他的眼睛，把内心深处的色彩和热情不时地放射出来。可以看出，他内心暗暗隐藏着悲哀。在他深思的时候，他的目光变得更加深沉；当他激动的时候，他的双眼闪耀着光辉。由于读书和熬夜，眼睛露出过度疲劳的样子，眼圈微微发红，唯有那对瞳孔，在侃侃而谈的时候就会放出奇妙的光芒。我看到他的身材不觉有点害怕，他个子很高，却非常瘦，他走起路来，多少有点弯腰。由于他长时间地伏在写字台上，使他颈背变弯了，显出有点驼背。他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看上去体弱多病。他说话慢声细语，好像他是爱护自己的身体。他从不去散步，吃得少，不吸烟也不喝酒，避免身体上的任何紧张。后来，我才惊奇地发现，在他那苦行主义的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巨大的耐力啊！在他那虚弱的躯体后面，又有何等巨大的精神劳动力啊！他伏在堆满纸张和书籍的写字台上，一连工作数小时，他躺在床上看书也是一连看数小时，他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却给自己的睡眠时间只留下四五个小时。他允许自己放松一下的唯一措施是音乐，他的钢琴弹得很出色，他那柔软的指法弹着钢琴，好像不是弹出来的，而是手指引出来的，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从前，我在室内听到过马克斯·雷格尔、费鲁乔·布索尼①、布鲁诺·瓦

①费鲁乔·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钢琴家、作曲家。

尔特[1]演奏的钢琴，这些名家没有一人像罗曼·罗兰那样给了我同敬爱的大师进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他的知识非常渊博，使别人感到惭愧，他的生活就是读书。他精通文学、哲学、历史，熟悉各国家和各时代的问题。他懂得音乐中的每个音节；甚至像加卢皮[2]和特勒曼[3]等人最最孤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乐家的作品，他都熟悉。同时，他积极参加当时发生的每一个事件。他那间修道士式的简朴斗室就像一间照像馆的暗室，可它能够反映出全世界。在人际关系方面，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伟人都很熟悉，他曾经是乔治·勒南的学生，在瓦格纳家作客，是饶勒斯的朋友，托尔斯泰曾给他写过那封著名的信，信中自己承认并真心赞扬罗曼·罗兰的文学作品。在这里我感觉到他在人性上和道德上具有的优势，引起了我的幸福感。一种无骄傲感的内心自由，对一个坚强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关键的时候他将代表欧洲的良知——时间证明我说的是对的。我们谈论起《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向我解释，他的书想尽到三重责任：第一，他向音乐表示感谢；第二，表明他对欧洲统一的信念；第三，唤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作用。现在是一个需要保持警惕的时代，而且越来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们的卑劣本性要比善于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实际上，他们在背后追逐物质利益。这些坏人一点顾忌也没有，

---

①布鲁诺·瓦尔特（1876—1962），德国著名指挥家。

②巴尔达萨雷·加卢皮（1706—1785），意大利作曲家，著有多部轻歌剧。

③格奥尔格·特勒曼（1681—1767），德国作曲家。

我们反而顾虑重重。《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明显有一股荒谬的东西，而同荒谬的东西作斗争要比我们的艺术事业更重要。罗曼·罗兰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赞美了艺术的不朽，但我从他身上感到他对世界结构的脆弱表现出加倍的悲哀。他向我回答说："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现在已是一九一三年，从我和罗曼·罗兰的第一次谈话中，我深切地认识到，我们的责任是：不是没有准备，也不是无所作为地面对可能爆发的欧洲大战这个事实。罗曼·罗兰之所以在关键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是因为他事先痛苦地磨练了他的内心精神。在我们的范围内，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已经翻译过不少作品，介绍我们邻邦中的诗人，一九一二年，我陪同维尔哈伦走遍全德国，作旅行讲演。这次旅行成了德法和睦关系的象征，维尔哈伦——最伟大的法国抒情诗人和戴默尔——伟大的德国抒情诗人在汉堡当众拥抱。我为赖因哈德争取到维尔哈伦的一个新剧本，我们双方的合作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的真诚、强烈和冲动。有时候激动起来，我们就陷入忘乎所以之中，认为我们已经给世界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及拯救的道路。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些文学家的宣言，而坚持走自己的险恶之路。世界局势经常处在一触即发的战争边缘。——察贝恩事件①，阿尔巴尼亚危机，一次不明智的记者招待会——由磨擦引起的火花从来没断过，任何一个小火花都能

①察贝恩事件，察贝恩位于阿尔萨斯，1913年一个普鲁士军官在该地骂阿尔萨斯人是"怪人"，从而引起了当地居民与普鲁士军官一场冲突，史称"察贝恩事件"。

引起堆积的炸药大爆炸。特别是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深感处在动乱地区的中心。一九〇一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过八十岁了。这位象征皇位的白发老人不能再统治下去了。一种神秘的不安的伤感情绪开始蔓延：在他死了以后，再也挡不住千年王朝瓦解的过程。在奥地利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国外，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还有德国，正在瓜分奥匈帝国。克虏伯公司和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正在巴尔干战场上用外国的"活人材料"互相试验自己大炮的威力，就像后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在西班牙内战中试验自己的飞机一样。现在我们已陷入激流险滩之中。我们一直担心害怕，但总想舒一口气："这次战争还没有临头，但愿永远不会落到我们头上。"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事实，要比再现那个时代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我在这里插叙的就是这种生活中的小故事。说老实话，当时，我不相信战争真的会爆发。可是我遇到了两件事，使我在不同程度上想到战争，又使我的心灵受到震颤。第一件事是发生的"雷德尔事件"，这个事件像所有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一样，其幕后情节鲜为人知。

这位雷德尔上校是一起极其错综复杂的间谍案中的主要人物。我与他只是一面之交，我与他同住一个区，只隔着一条胡同。有一次，我的朋友——检查官T在咖啡馆里将他介绍给我，看起来此人和蔼可亲，这位很会享受的先生当时在咖啡馆里吸着雪茄。自那以后，我们见面就打招呼。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在

我的生活中间好像有许多秘密的人在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对周围的人却知之甚少。这位上校外表同普通的奥地利军官一样，可他却是帝位继承人的宠信，被赋予重要职权。他领导着军队的秘密情报局，负责破坏敌人的间谍机构。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危机时期，俄国和奥地利都在作把矛头指向对方的战争动员。可是，奥地利军队最机密的“进军计划”被透露出去，卖给了俄国。倘若打起仗来，俄国会很轻松地打败奥地利，奥地利就会一败涂地，因为俄国人事先知道了奥地利进攻部队所有战术行动的细节，这个泄密事件使奥地利参谋部一片惊慌。受命于情报局的最高负责人雷德尔上校奉命查出叛徒。而这个叛徒肯定在军事最高层的极小圈子里。但是外交部并不完全相信军事当局的能力，背着总参谋部秘密发出指示，独立去调查，并授权警察局，除了采取所有的措施外，为达到目的，对所有来自外国的信件，全部开封检查看有无秘密，不要有所顾及。

一天，一家邮局收到从俄国边境站波特沃罗奇斯卡发来的一封留局待领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个暗号：“奥佩尔巴尔”。打开信一看里面没有信纸，却有六或八张簇新的奥地利一千克朗大额钞票。这个可疑的发现立刻报告了警察局。警察局派来一名密探守候在领信处窗口附近，只要打听这封信的人一出现，就立刻把他逮捕。

眼前这个悲剧开始成为维也纳街头巷尾无所不谈的趣事。中午时分，那位先生出现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写有“奥佩尔巴尔”的信。窗口里的邮局职员立刻向密探使眼色，向他发出报警信号，可是密探恰巧这时去喝早饮。当他回来时，别人告诉他，那位不认识的先生坐上一辆出租马车，不知向何处驶去了。很快维也纳人又演出了这场悲剧的第二幕，在那个时代出租马

车是一种时髦的漂亮的双马拉的车；马车夫把自己看成是了不起的人物，从来不是自己打扫车辆，而是每个停车场都有一些“清洁工”，干喂马和冲洗车的活儿。幸亏那位清洁工记住了刚刚驶出的那辆出租马车的牌号；在一刻钟以后，所有的警察岗哨都发出警报：那辆马车已经找到。那位清洁工还描绘了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驶去的马车里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正是我经常遇到雷德尔上校的地方。另外，有人在马车里有幸找到了一把小折刀，那位先生就是用这把刀打开信的。密探们立刻向卡塞尔霍夫咖啡馆扑去。可惜，所描绘的那位先生已经离去。咖啡馆里的服务员非常自信地解释说，那位先生是雷德尔上校，绝不会是别人，他刚刚回到克罗姆塞尔旅馆去。

那位侦探被惊得目瞪口呆。秘密已经揭开，雷德尔上校，这位奥地利军队情报部门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又是被俄国总参谋部收买的间谍。他不但出卖了各种机密和进军计划，而且现在突然都清楚了，为什么他去年派往俄国的全部间谍，一个个先后被捕和判刑。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直打到奥地利军队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道尔夫元帅那里。当时的一位目击者向我叙说，赫岑道尔夫听过电话，脸色刷一下变得像白纸一般，他又把电话打到皇宫，进行一次次的磋商。下面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在这期间，警方采取了防范措施，雷德尔上校无法逃脱了。当他想再次离开克罗姆塞尔旅馆和向门房交待什么事的时候，一个密探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礼貌地问道：“上校先生，您没有把这把小刀遗忘在出租马车里？”这一刹那，雷德尔上校知道自己失败了。他向外走，看到一张张熟悉的秘密警察的面孔，他们在监视他，当他重新回到旅馆时，有两个军官随他走进他的房间，在他面前放下一

支左轮手枪。在这期间，皇宫已作出决定，以不声不响的方式了结这件军队中十分不光彩的事。两位军官一直站在克罗姆塞尔旅馆雷德尔的房间前，直到深夜两点，从房间里传出左轮手枪声。

第二天，所有的晚报上都登了一条简短的讣告，宣布这位忠于职守的军官，雷德尔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查雷德尔案件的过程中，牵扯到许多人，以致这件事无法保密，逐渐地了解到这件事的细节。这些细节揭示了雷德尔的心理活动，雷德尔上校是个同性恋者，他的上司和同伴竟无一人知道。他落在敲诈者手中已多年，这些勒索者最后逼他走上这条绝路。现在奥地利军队面对此事是不寒而栗。大家都明白，一旦发生战争，他一个人就能断送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奥匈帝国也由于他而陷入崩溃的边缘。直到这步田步，我们奥地利人才算明白，我们过去的一年，已经过了爆发世界大战前的关键时刻。

上面的事实，使我第一次感到战争的恐惧。第二天我偶然遇到贝尔塔·冯·苏特纳①，她是我们时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②。她出身于名门豪贵之家，青少年时代她在自己的故居波希米亚城堡的附近，亲眼目睹过一八六六年争夺领土的战争惨状。她抱着佛罗伦萨夜莺般的热情，认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战争，甚至完全杜绝战争。她写了一部称誉世界的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她组织过无数次和平主义的集会。她一

①贝尔塔·冯·苏特纳（1843—1914），奥地利女作家、和平主义者，曾任诺贝尔的秘书，190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②卡珊德拉，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亚公主，预言家。

生中最大的功绩是她唤醒了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建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炸药所造成的损害，取得国际上的理解。当时她非常激动地向我冲过来，在大街上她就高声嚷嚷，而她平时说话安静、亲切。她说："怎么现在人们还不明白刚发生的事，现在战争已经开始。那些人再一次的在我们面前掩盖真象，严守秘密。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行动起来？这些事与你们的关系最大！站起来去抵抗！团结起来保卫自己！不能什么都让我们几个老太婆来干，没有人会听这些老朽的话。"我向她说，我就要去巴黎。也许我们真地会发表一项联合宣言。"为什么说也许呢？"她急促地说："形势比以前坏多了，战争机器已经在运转。"虽然我已心神不定，但我还是尽力来安慰她。

在法国，当我想起第二件生活琐事时，不由得使我联想起那个老太婆的预见是多么准确，她看到了未来。可是在维也纳的人，却很少认真地看待她的话。那是一件特别小的事，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从巴黎到达都兰，准备在那里小住几日，为的是要凭吊达·芬奇的陵墓。我们沿着卢瓦河散步，岸边春风和煦，贪图欣赏春花绮绣色，忘记春游归。晚上回到住处，两腿似铅重。于是，我们决定到十分静悄的图尔城去看电影，过去我曾在这里拜访过巴尔扎克的故居。

这是郊区小城的一家电影院，它不能与用闪光金属板和玻璃装饰起来的现代化豪华电影院相提并论。只是凑合修起来的一间大厅，里面挤满了各类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场上的女商贩，他们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们无拘无束地闲聊天，同时向污浊的空气中喷着斯卡费拉蒂牌和卡波拉尔牌的低劣香烟

的蓝色烟雾，尽管室内挂着禁止吸烟的标牌。银幕上开始出现《世界各地新闻》，先是英国的划船比赛，观众照常闲扯和抽烟；接着银幕上出现了法国的阅兵式，人们仍没有注意；接后是第三个画面：《威廉皇帝到维也纳拜会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银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维也纳西车站冷冰冰的站台，站台上站着一些警察，正在等候进站的列车。接着出现的是年迈的皇帝沿着仪仗队走过去，准备迎接他的贵宾镜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有点驼背，步履艰难。图尔人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出现在银幕上时，他们善意地发出笑声。接着是列车进站的画面，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第三节车厢。沙龙式的豪华车厢车门打开了，威廉二世皇帝从中走出来，翘着高高的八字胡，他穿着一身奥地利的将军服。

当威廉皇帝在银幕上刚出现，昏暗的大厅里立刻爆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口哨声和跺脚声，他们完全是自发地大喊大叫吹口哨；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们，无不发出嘲笑，好像画面上的人侮辱了他们似的。善良的图尔人除了知道报上登的消息外，并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当他们刚看到一眼威廉皇帝，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感到十分吃惊，不由得惊恐万状。我觉得，经过多年对德国仇恨的宣传，流毒已浸入平民百姓的心里。在这个小城镇，远离大城市，这里的市民和士兵毫无恶意，却对威廉皇帝、对德国有这么大的仇火。银幕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画面，就引起这么一场骚动，只不过是一秒钟，是一秒钟，可见流毒是多么深广。下面继续放映其他画面时，他们把刚才的一切却都忘记了。今晚放映的主片是一部喜剧，观众看得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有人乐得直拍大腿，啪啪直响。那仅仅是一秒钟，而这一秒钟却被我看到了。我们曾做出过不少努力，想方

设法促进国家间、民族间的互相谅解、和睦相处。可是到了关键时期，彼此双方的人民是多么容易被煽动起来啊！

那天整个晚上我心灰意冷，一夜未眠。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巴黎，虽然我同样感到不安，但不会这么激动。我觉得十分可怕的是仇恨的心理已深入到外省，已深入到善良质朴的平民百姓中间。过了几天，我把这件事同我的朋友讲了，但大多数人认为这并不怎么严重，他们说："我们法国人过去也嘲笑过肥胖的维多里亚女王，两年以后，我们与英国结成了联盟。你不了解法国人，法国人对政治从来不向心里去。"只有罗曼·罗兰的看法不一样。他说："老百姓越老实，越容易轻信。自从彭加勒①当选以来，形势一直不好。他的彼得堡之行并不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行。"我们还长时间地讨论夏天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不过对这次代表大会，罗曼·罗兰比其他人更持怀疑态度。他说："一旦发布动员令，到底有多少人能坚持住，谁能知道？我们已陷入一个群情振奋、人人歇斯底里的时代，在战争中绝不能忽视这股歇斯底里的力量。"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些忧愁的短暂时刻就像风中的蜘蛛网一样，一吹就完。我们有时也考虑到战争，除了有时想到死以外，其他的事想的不多，但也想到一些可能发生的事，不过这些事也许还很遥远。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当时的巴黎实在太美了，我们自己也太年轻了，太幸福了。我至今还记得儒勒·罗曼想出来的令人着迷的闹剧，为了嘲笑"诗坛的王子"，我们故意推举了一个"善于思考的王子"，让一个憨直的、天真的人

---

①雷蒙·彭加勒（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31年1月17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由大学生们郑重其事地抬到巴黎伟人祠的罗丹塑像前。到了晚上，我们像一群中学生似的在模仿滑稽作品的宴会上大吵大闹。当时正是繁花似锦，微风吹拂，带来一股甜滋滋的气息。面对着如此多的欢乐，还有谁愿意想那些不堪设想的事呢？当时，朋友之间的友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厚；而且在异国——在“敌对的国家”又有了新朋友。巴黎这座城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无忧无虑，而住在巴黎的人也以自己无忧无虑的心情来爱这座城市。在离开巴黎的最后几天，我陪着维尔哈伦去鲁昂，他要在那里作一次报告。夜里，我们站在教堂前，教堂的塔尖在月光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如此良辰美景难道只属于一个“祖国”，而不属于我们大家？我们在鲁昂火车站话别。两年以后，在同一地点，一列火车把他辗得粉碎。他曾对火车唱过颂歌。他一边拥抱着，一边对我说：“八月一日，在我的卡佑基比克再见。”我当时答应了。因为我每年都到他的庄园里去看他，和他一起手拉手地翻译他的新诗。为什么我这一年没到他那里去呢？我也与其他朋友无忧无虑地告别。我向巴黎告别，同样是漫不经心，不动感情地告别，就像一个人要离开自己的家几个星期一样。我以后几个月的计划是清楚的。现在我就回到奥地利去，找个僻静之处，赶写那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书（五年后才出版），这样我就可以完成《三位大师》这本书了。写的是伟大民族的伟大小说家。写完后，我再到维尔哈伦那里去；也许到了冬天，计划已久的俄国之行得以实现。为的是在那里组织一个团体，以增进德语作家同俄语作家之间的相互了解。在我三十二岁之际，在我看来，如一切顺利的话，在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有一个美

好的未来。

可是在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一个安全的又充满理性的世界——我们在其中受教育、成长、世代卜居——像一只陶制空罐一样击得粉碎。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初期

一九一四年的那个夏天，即使没有给欧洲大陆灾难，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因为我很少经历过如此好的夏天，那是个鸟语花香、繁花似锦的夏天，我几乎可以这么说，今年的夏天特别好。一连数天天空晴朗，蔚蓝的天空朵朵浮云，空气湿润，但不闷热；草地上，夏风多温和，芳草亦未歇；郁郁葱葱的树林，遮天盖日。当我说起夏天这个词的时候，我必然会想起，过去我在维也纳附近巴登渡过的生气勃勃的七月天。这是一座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小镇，贝多芬非常喜欢选此地为自己的避暑胜地；我避居到这个小镇，目的是为了集中精力，在这个月完成那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件，然后再到尊敬的维尔哈伦在比利时的那幢乡间别墅去，渡过夏天的剩余时间。在巴登，不用离开巴登镇就能欣赏到此间的自然景

色。一间间适用的农舍依然保持着贝多芬时代的质朴灵巧风格，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小山坡上。为一片浓郁的树林所覆盖。露天的咖啡馆和餐厅比比皆是，人人都可以同那些来这里休养的快活的客人交朋友。节日里他们盛装在公园里游荡，有的深入幽径中。

六月二十九日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包括奥地利——纪念“彼得和保罗”①蒙难日，在这一天的前夜，许多游客就从维也纳涌到这里来。他们穿着浅色的夏装，高高兴兴、无忧无虑、成群结队来到公园的音乐厅前。那一天，气候宜人，在一片栗树的上空，万里无云，真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好日子。大人和孩子都快放假了，他们认为，夏天的第一个节日就预示着整个夏天会无比美好。空气暖融融，游人似微醉；一片片苍翠，一处处欢声笑语，使人忘却了人间的哀愁。当时，我坐在远离公园人群拥挤的地方，读着一本书。现在我还记得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②著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读得专心致志，可是，我依然听见穿林而过的风声，唧唧喳喳的鸟鸣声和公园那边飘来的音乐声。我一直听着音乐的旋律，并没有觉得被打扰，因为我耳朵的适应力很强。无论是持续不断的噪音，还是街道上车水马龙的喧闹声，潺潺的流水声，几分钟后我就会完全适应，在知觉上我的自控力很强。但有一点恰恰相反，只要一种旋律冷不防停顿，反而会引起我的注意倾听。

所以当演奏的音乐嘎然而止，不由得我就停止了阅读。我

①彼得和保罗，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两人，后被罗马皇帝尼禄杀害。

②Д. С.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国作家、哲学家、批评家。

只知道音乐停止了，而不知道乐队演奏的是哪部作曲。我下意识地抬起头，目光离开了书本。在树林中散步的那一群穿浅色夏装的人群，似乎有些变化，他们突然停止了走动，既不上山也不下山。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我站起身来，看到乐师们正在离开乐池。这真是咄咄怪事，平日里公园的音乐会都要进行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他们突然停止了演奏必有原因。我向前面走，继续观察，发现激动的人群在乐池前，东一伙西一群，正在议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几分钟以后我才听到，原来是一封急电：弗朗茨·费迪南皇储陛下携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军事检阅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丧生。

围绕着这一谋杀案件，人越聚越多，把这意外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说实在话，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特别震惊的愤慨。因为皇储没有人爱戴他。至今我还记得，在我童年时代，当皇太子鲁道尔夫——皇帝唯一的儿子——在马耶尔林被人枪杀时，全城悲痛万分。纷纷涌向街头，目睹一下他的灵柩，表示出极大的震惊和对皇帝深切的同情，因为皇太子是皇位继承人，又是哈布斯堡王朝中一位进步的和对下人极富同情心的皇太子；大家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他却在盛年之际离我们而去。而弗朗茨·费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种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品德，这是奥地利人认为极其重要的。他不像皇太子那样，讨人喜欢。富有魅力，善于同各方面的人物交际。我曾在剧院里多次观察过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厢里，威风凛凛，神气活现，一双冷冰冰发呆的眼睛；他从来不向观众投去友好的目光，从来也不真心地鼓掌欢迎艺术家的演出。从来没见到过他脸上出现一丝笑容，他的照片没有一张是轻松愉快的姿态。他没有一点音乐感，也缺乏幽默。他的妻子同他一样有一副阴沉沉的面孔，在他们

周围是一片冰冷冷的气氛。大家都知道，他们没有朋友；大家也知道，老皇帝从心底里厌恶他，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得到皇位统治权，他一点也不会藏匿他这种心情。我几乎有一种神秘的预感，这个脖子长得像叭儿狗脖子一样，两眼阴冷发直的先生，不管怎样总会带来一种不幸。这不只是我的预感，也是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预感。因此，他被刺的消息并没有引起人民的深切同情。两个小时后，我再也没有看到真正悲哀的表示。一切又恢复到常态，该谈天的谈天，该欢笑的欢笑。到了深夜，餐馆里又奏起了音乐。有很多奥地利人在这一天暗暗地舒了一口气，觉得老皇帝的这位继承人的丧命对那位比较可爱的年轻的卡尔皇子十分有利。

毫无疑问，第二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详细的讣告，并对这次暗杀事件表示出恰如其分的愤慨。但是，完全没有暗示利用这次事件对塞尔维亚采取政治行动。对王室来说，费迪南死亡引起了另一种烦恼事，就是他的安葬问题。根据皇储的身份，尤其考虑到他是为帝国因公殉职的。按理说，他完全可以在维也纳天主教的方济各会教堂墓地占一席之位，这是哈布斯堡皇室历史上安葬皇室成员的地方。他生前想要那位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曾与皇室作过长期激烈的斗争。肖台克虽然出身大贵族，但根据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同费迪南不是门当户对的，她的孩子是没有继承权的；在隆重的交际方面，其他皇子的夫人们强烈要求比这个皇储夫人领先，走在前面。宫廷的傲慢即便对一个死去的女人也不放过。怎么办？让出身伯爵门第的肖台克安葬在哈布斯堡陵园？不，绝不许这么办。于是，一场幕后的大肆活动开始了。皇子的夫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到老皇帝那里。政府当局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场面表示深切哀悼，

同时又在宫廷里玩弄了一套野蛮的混淆是非的诡计。经常说，死者无理可讲。负责典礼的官员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死者生前的愿望葬在阿尔茨台滕，奥地利外省的一个小地方。找到了一个假造的、尊重死者的借口，公开地向遗体告别、吊唁、出殡，以及其他与此相关的争执也就轻易地解决了。两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地送到阿尔茨台滕，并排埋葬在那里。一直好看热闹的维也纳人失去了这次大好机会，他们很快就开始忘记这个悲剧事件。总之，奥地利人，对伊丽莎白皇后① 和鲁道尔夫皇太子遭暗杀，及皇室成员不体面的出逃，早就形成了习惯看法：这位老皇帝在经历了家族的多灾多难后，仍会寂寞而又顽强地活下去。不过再过几个星期，弗朗茨・费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将从历史上永远消逝。

可是，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报纸上又重新开始争论起来；而且调门越来越高，发生的时间又完全一致，使人觉得绝非偶然。塞尔维亚政府受到指责，说它默许了这次刺杀事件。报纸用一半的话语暗示奥地利对本国皇储——据说非常受人爱戴——被刺绝不会罢休。人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必然准备采取某项国际法律行动，但是谁也没想到过战争。无论是银行、商店，还是私人，仍然照常处理自己的事情。这种与塞尔维亚无休止的争论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大家只知道塞尔维亚出口给我们生猪，不是签订了许多协定吗？我已经打点行装准备去比利时维尔哈伦那里，我的稿件正写得顺手。躺在豪华棺材里的皇

①伊丽莎白（1837－1898），奥地利皇后和匈牙利女王，1854 年与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结婚，1898 年在日内瓦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储与我的生活有何相干呢？夏天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美，而越来越美，我们无忧无虑地看着这个世界。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我同朋友一直穿过葡萄园的时候，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一个好夏天，我已经长时间没经历过了。如果今年的夏天一直这么好，葡萄收成将比任何年头都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年的这个夏天！"

这个穿着蓝色酒窖服的老头，他自己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每年我到维尔哈伦乡间小别墅作客以前，先到比利时西北部城市奥斯坦德附近的小浴场勒科渡过两星期，在勒科同样是一片无忧无虑的气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滩上彩色帐篷里，有的在海水里游泳；孩子们在放风筝，年轻人在咖啡馆前面的平台上跳舞。各国各族人民和平地集聚在一起，我听到不少人说德语感到无比亲切，因为邻近的德国莱茵地区人年年都喜欢到这里的沙滩上度暑假。这儿的沙滩上虽然人潮如织，但相当安静。唯有卖报童的大声喊叫才能击破这种宁静。他们喊着惊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正在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到那些买报纸的，看了报纸，脸色变得阴沉，不过，不出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还有，多年来我们早已熟悉了那些外交纠纷的解决办法，不论什么在特别严重的最后一刻总能顺利解决。为什么这回不是这样呢？半个小时后，我看到卖完报纸的报童们也成了一群欢欢乐乐的儿童，噼噼啪啪踩着海水戏游；风筝冉冉升起，海鸥翩翩飞舞；日有九光，普照一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恶劣的消息越来越多，越来越危险。先是奥地利向

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接着是塞尔维亚支吾搪塞的答复。君主之间的电报不断，最后双方几乎不再隐瞒战争的动员。我再也不能呆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电车到奥斯坦德去，以便消息更能灵通一些；而传来的消息越来越坏。人们依然在洗海澡，旅馆依然爆满，堤坝上依然有不少避暑的旅客在散步、欢笑、聊天。但是，这中间第一次出现了新鲜事。我们突然发现有不少比利时士兵在海滩上，他们平时绝不会到这里来。机枪安装在小车上，由狗拉车，这是比利时军队一件特别的事。

当时我正坐在咖啡馆里，同几个比利时朋友坐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年轻的画家和作家费尔南·克罗默林克①。下午，我们和詹姆斯·恩索尔② 一起度过的。恩索尔是比利时最伟大的现代画家，是个非常古怪的、孤寂的隐居者。他为军乐团作了一些不成样子的波尔卡和华尔兹舞曲，可他却为这些作品感到很自豪，认为远远胜过他创作的油画。他的画的确富于幻想，色彩闪烁不一般。那天，他把他的作品给我们看，这本是他不愿做的事，因为他心中有个怪想法，他希望有人能买他的一张画。他的美梦是，以高价出卖，再以低价收回。朋友们笑着对我说，他这个人既贪钱，又舍不得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每当他卖出一幅画，他悲观失望好几天。这位天才的吝啬鬼满脑稀奇古怪的念头，使我们感到很开心。正当一队士兵和一辆狗拉机关枪的车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我们中间有一人站起，摸了摸那条狗，旁边的军官十分生气，因为他害怕，怕对他作战用的东西的爱抚

①费尔南·克罗默林克（1886—1970），比利时法语剧作家。

②詹姆斯·恩索尔（1860—1949），比利时画家、蚀刻版画家。

可能会损害军队的尊严，不能随便去摸。我们中间有人在发牢骚："这种频繁地调动军队，到底有啥用?"有的人当场反驳他："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也就是说，打起仗来，德国部队要从我国突破。""不可能！即便打起仗来，德国和法国打得只剩最后一人，你们比利时人依然是安然无恙。"我充满自信地说，因为在那个古老的世界里，人们还相信条约是神圣不可动摇的。而那位悲观主义者反对我的看法，毫不让步。他说比利时采取这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几年前我们已闻风到，德国总参谋部有一项秘密的作战计划，一旦进攻法国，德军就要穿过比利时去攻打法国，什么条约不条约，全是些废纸。我也同样不让步，在我看来，一方面让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到这里来度假，尽情享受这个中立小国的殷勤接待！另一方面却在边境集结军队对付来犯之敌，这岂不荒唐。我说："这全是无稽之谈！如果德军向比利时进军，你们就把我吊死在这根灯柱上。"今天，还要感激我的这些朋友，因为他们后来没有把我这句话当真。

在七月最后的几天，正是形势危急的时候，每小时就传来一个自相矛盾的消息。威廉皇帝给沙皇的电报，沙皇给威廉皇帝的电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饶勒斯被暗杀。谁都知道，形势越来越严重，一股不安的冷风一下子吹到海滩，把海滩上的人吹光了。数以千计的人离开旅馆，奔向火车站。就是那些不相信战争的人也开始加速收拾箱子。就连我自己，在刚听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赶紧订购了一张火车票，真是及时，因为这次奥斯坦德快车已是比利时开往德国的最后一班车了。我们站在车厢里的过道上，焦急不安。每个人都在同别人讲话，没有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看书。每到一站，就有人急冲冲地跳下车厢，去打听新消息。内心暗暗

地抱着希望：会有一只强有力的手能把脱缰的命运重新拉回来，使仗打不起来。直到现在，我们依然不相信，战争已经开始了。更没有想到会向比利时进攻。人们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干这种事的人纯是疯子。国家统治者难道是一群疯子。所以我们都抱着一种幻想。列车离国境线越来越近。我们通过了比利时边境车站韦尔维耶。德国的列车员登上车厢，十分钟之后，我们就到德国境内了。

但是，列车驶向德国第一个边境站的途中，突然停在野外。我们挤在车厢过道里向窗外望去，发生了什么事？我看到一列货车在昏暗中对着我们开来，敞篷车厢用帆布盖着，我隐隐约约看到大炮的形状，我的心怔住了。这一定是德国的军队开往前线。直到如今，我还是不相信战争，说不定这仅仅是防护措施，这是战争动员式的威胁，只不过是战争动员本身的范围，也不是真打仗，我这样安慰自己。人总是这样，在紧急关头抱一线希望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终于传来了“通行”的信号，我们的列车开动了，总算到了赫尔倍施塔尔车站。我一步跳下车厢踏板，打算买张报纸看看消息，可是车站被军队占领了。当我想走进候车室时，一个车站公务员站在已上锁的门前，他胡须雪白，脸色严峻，他说，谁也不准进候车室。隔着门我听到了里面叮当的刺刀声和枪托着地的嘭嘭彭声，门上的玻璃被小心谨慎的挡上了布。毫无疑问，那件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德国军队公开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准则，要进攻比利时。战争行动已经开始。我极度不安地登上车厢，列车继续向前，驶向奥地利。现在完全无可置疑了：我正向战争发动国驶去。

第二天的早上我终于到了奥地利！每个车站上都张贴着宣

布战争总动员的告示；各类列车上旗帜飘扬，装满了刚入伍的新兵。音乐声似雷鸣，我发现维也纳全城的人都在发疯，从对战争最初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对战争的狂热。其实，谁也不愿意打仗，各国人民不要战争，政府也不要；这次战争本来是外交家们玩花招搞讹诈的一种手段，他们没想到，违背了他们原来的意图，弄假成真，他们的外交辞令对战争狂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维也纳大街上有各种各样的队伍，突然间，到处是旗帜、标语、音乐。年轻的新兵满怀胜利的信心在行军，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因为他们是社会上的小人物，平时不会有人对他们尊敬和庆贺，而现在却受到全城的欢迎。

说老实话，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确有一种崇高的、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的一生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成千上万的人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从来没有战争开始时的那种感情；觉得他们属于一个整体。这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的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巨涛淹没了。在大街上，不相识的人在攀谈；长年相互回避的人现在握手了；到处看到的是生气勃勃的面孔。每一个人都要经历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他不再是一个像先前那样孤立的人，而是群众中的一员，他是人民，他是人民中的一分子；平时不受尊重的人，现在受尊重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平时就是从早

到晚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拣到星期六，从不间断；还有抄写员、鞋匠之类人员，突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他们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可能成为英雄。每个人都能穿上军装，妇女们会向他们祝贺；留下来的人早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那些新兵承认，是股什么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拉出来，尽管在狂热的最初时期，母亲的忧伤，妻小的恐惧，她们羞于把这种最真挚的情感显示出来，他们还是清楚感觉到的。不过，也许在飘飘然的感觉中还有一种更深厚的、更秘密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原始人身上暗藏的无意识原始欲望和原始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上来，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之为“对文化的厌恶”。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要求放纵自己的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些黑暗势力，一部分投入狂暴的陶醉中，这种陶醉是无所不包的，主要包括：不怕死和酗酒、冒险的乐趣和愚昧的信仰、军旗的魔力和爱国主义言词的魔力——这些东西是十分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会使千百万人狂妄的情绪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行为——发动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只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今天这一代人，或许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没有像一九一四年的群众那么狂热？为什么一九三九年的群众仅仅是严肃地、坚决地、默默地、听天由命地服从召唤？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是一场有关思想意识的战争，并不是仅仅为了争夺殖民地或改划国界。难道这次战争比不上前一次战争？难道

这次战争比不上前一次战争更神圣、更崇高？

答案很简单：因为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像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有那么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当时的老百姓信任自己的权威人物，从不怀疑。没有人敢想，最最尊敬的国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必要，他能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也没有人想，如果没有凶残的、狡猾的、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他会要求人民作流血牺牲吗？再说，德国人在报纸上看到奥地利皇帝致沙皇的许多电报，在电报中老皇帝始终声称为和平而斗争。奥地利人民不仅忠于皇帝，对"高级人物"、大臣们、外交家，对他们的洞察力和忠于职守，也深信不疑。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不是政治家们的过错，战争是违背他们意愿的；全国上下，没有一丁点儿错误；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是敌对国。我们拿起武器只是为了自卫；是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敌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突然袭击"爱好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一九三九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整个欧洲已经没有这种对政府忠实的迷信，至少没有对政府能力的迷信。自从人们愤怒地看到，在凡尔赛的外交活动中，持久和平遭到了破坏以来，人们就瞧不起外交。这些外交家恬不知耻用许诺裁军、许诺不搞秘密外交来欺骗各国人民，对此，各国人民记得太清楚啦！从根本上说，一九三九年的人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没有人把自己的命运信任地托给他们。一个最普通的法国筑路工人公开讥讽达拉第①。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声称："为了我们这一代的和平"——

①爱德华·达拉第（1884—1970），法国政治家，1938年3月至1940年3月任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

签订以来，没有人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和德国，群众恐惧地望着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要把我们推向何方？当然群众不能反抗，因为这关系到祖国，希特勒代表德国，反希特勒就是反德国。所以，士兵们不得不拿起枪，妇女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但是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和认为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到前线打仗，但不再梦想当英雄。现在，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到，他们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的愚蠢政治，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凶恶命运。

在一九一四年，广大群众经历了几乎是半个世纪的和平生活，他们对于战争又能知道些什么呢？他们不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几乎没想到会有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是一种传奇，恰恰在遥远的将来，所以战争颇富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们看到的战争，始终是从教科书里看到的，或者在美术馆里绘画上看到的：骑兵穿着闪闪发光的盔甲，举着长矛在进行你来我往的厮杀；致命的一枪是正中敌人心脏。大获全胜，高奏凯歌——所以，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们向母亲高喊道："我们一定会回来过圣诞节。"在农村在城市，谁能想得出，"真正"的战争是个什么样子？幸好还有几个参加过一八六六年反普鲁士战争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还记起打仗的事。不过那是一场速战速决、流血不多、距今遥远的战争；整个战役只打了三个星期就结束的，双方都无大伤亡；很快就喘过气来。而这一次，普鲁士成了奥地利的盟国。在老百姓看来，一九一四年的战争也不过是一次浪漫主义的暂短郊游，一场惊险的、豪迈的冒险。甚至一些年轻人生怕失去了他一生中绝妙的机会，所以，他们急急忙忙地跑去报名参军。在开往激烈战场的列车里欢呼、歌唱。

整个奥地利帝国的血管里，鲜血沸腾，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但是，一九三九年这一代，他们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不再自己骗自己。他们知道，战争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很残酷的。他们知道，战争打起来不会速战速决，而是拖延好多年，战争耽误的时间，一生中无法弥补。他们知道，向敌人冲锋时不会带着橡树叶和彩带，而是在战壕里在营地里一连呆上几周，饥渴难忍；他们心里很明白，还没看到敌人，就被远处射来的炮弹、枪弹击得粉碎或打成残废。以前他们在报纸上和电影上看到过这种杀人的残忍新技术和新技巧；他们知道，巨大的坦克在行进中会把伤员压成肉酱，飞机会把睡在床上的妇女和儿童炸得粉碎。他们也知道，一九三九年这次世界大战，就其灭绝人性的机械化来说，要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卑鄙、残忍、非人性胜过千倍。一九三九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人会相信，这次战争有上帝所希望的那种正义性。要严重的事，是他们再也不相信通过战争取得的和平有什么正义性和持久性。因为他们对上一次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失望记忆犹新：战争带来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不是满意、而是怨恨；带来的是饥馑、货币贬值、公民自由丧失、被外国统治奴役、一种令人头疼的不安全感和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

这里存在着一种差别，两次大战的不同。一九三九年的战争有一种思想内容。这次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定目的而斗争。这使得人更坚决、更果断。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因为战争的目的脱离现实，只是一种幻想，只要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更正义、更和平的世界。正因为是幻想，而不是科学，才使人更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因此，那些牺牲者像醉汉一般欢呼着奔向死亡，他们头戴花环和

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家家灯火，像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突然陷入这种爱国主义的狂热中，并非由于我特别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是由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以前我还在“敌国”住过几天，所以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于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世界性的生活，今天在这个国家，明天又到了另一个国家；要我一夜之间突然去憎恨另一个国家，那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个国家也是我的国家，是我的祖国。数年来，我对政治是不信任的；正是最近几年，我同法国、意大利的朋友们经常谈论荒谬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事先打了预防针。我不相信蔓延四方的爱国主义热情。我已作好准备，面对战争初期的狂热病，我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我绝对相信：经过一场由不明智的外交家和无人性的军火大亨发动的兄弟国家之间的战争过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我内心里已经决定，在战争开始的最初时刻，我就要作世界公民；作一个国家的公民，坚持正确的立场，是很困难的。虽然当时我才三十二岁，但目前我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我都不合格，对此，我打心眼里高兴得很，因为这样落选使我白白地节省了一年服兵役的时间。此外，我们觉得，在二十世纪去学习和掌握杀人的武器，是罪恶的时代错误。我坚持自己的信念，正确的态度是：宣布自己是这次战争中的“拒服兵役者”。这样做在奥地利可以想象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在英国则相反）。敢于这样做，要为某种正义的信仰有不怕牺牲的坚定信念。而我本身缺乏这种英雄气概，今天我并不羞于

承认这个缺点。我的真实态度，在一切危险场合，我总是采取回避态度。不只是这一点我受到别人的指责，而且说我不坚定。我崇拜的大师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在另一个世纪里也常常受到这方面的指责。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个时代，就隐藏起来不愿出来，非得别人把他硬拉出来，把他扔到一个他不愿去的地方，这有多难受。所以，在四周寻找我能干的工作，只要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就行。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较高级军官，他管理军事档案馆，这使我有可能安插到他那里去。我可以作图书管理员；我的语言知识在这里也有用，可以帮着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之类。这不是一件煊赫的差使，我们今天自愿承认，一件很合适的工作，比一个俄罗斯农民去当屠夫合适多了。的确，我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干完这件不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要去做另一件事，看来是战争中最重要的工作：为将来的相互谅解而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里的处境要比职务上的处境困难得多。在我们作家中，只有极少数人受欧洲国家的教育，他们完全生活在德语的环境里。大多数作家认为，鼓动群众的热情，用诗意的口号或者用科学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美化战争，才是他们干的最好工作。还有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几乎所有德语作家，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士要有牺牲精神。他们的诗像阵阵暴雨，把战争和胜利，苦难和死亡写成合辙押韵的诗篇，这样的诗在当时遍地皆是。这类作家煞有介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任何一个法国人和任何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历史上有英国文化和法国文化。

他们认为，这种文化与德意志的特性、德国的文化和德国的艺术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和没有价值的。有些学者推得更远更恶劣。譬如，哲学家们突然之间失去了智慧，竟把战争解释成为把涣散的各国民众振奋起来的“洗礼”。医生们也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对自己的整形术夸耀得天花乱坠，好像补换上的假腿比原腿还要灵活，更加健康，说不定会有人喜欢截下真腿换上假腿呢！各教派的教士也不甘示弱，也参加到这一大合唱中。有时我仿佛听到一群狂徒在怒号。而这些人在一个星期、一个月之前还是理智的、有创造力和有人性的人，为我们所敬佩的。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发狂的人正是那些正经人。大多数是年龄大的人和身体弱而不能服兵役的人，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责任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所创造过的作品，他们认为有愧于德国语言，从而也愧于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用语言来效劳人民，让人民听到自己喜欢听的声音。在这次斗争中，正义在自己的一边，非正义在对面人的一边；德国必胜，敌人必败——他们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的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当最初的那股热情消失以后，有些人很快就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全是谎言。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人们听到最多的是，喊得最凶的，唱得最亮的；敌我双方都在拼命地大合唱。

在这种如此天真的、同时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热中，我觉得得最典型、最令人震惊的事例，莫过于恩斯特·利骚①。我同他

①恩斯特·利骚（1882—1937），德国抒情诗人和剧作家，1914年发表一首题为《憎恨英国》的诗，名噪一时。

很熟，他写过一些短小精悍的诗，有人认为他是一位心肠最好的人。我今天仍然记得，他第一次来见我时，我紧咬着嘴唇，怕笑出声来。在我的想象中，一位抒情诗人一定是身体修长、仪表消瘦、就像他写的精练的德语诗一样。他的诗非常简洁，文如其人嘛。当他进入我的房间，一步三摇，胖得像只桶，面部和善，双层下巴，不，是四层下巴。他是个小矮胖子，精力充沛、充满信心，口齿结巴。他说起话来，一再引用自己的诗句，而不能自制，说明他完全沉湎于诗歌创作之中。他这些可笑之处，反而引起人的喜欢，因为他热心、友好、诚恳，而且对他自己的艺术怀着一种几乎是着了魔的献身精神。

他出身于一个富有的德国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高级中学受过教育，是我认识的最普鲁士化或者说被普鲁士彻底同化的犹太人。他只说德语，而不说其他语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德国。德国就是他的世界，越是德国的东西，他越热爱。所以约克①、路德和施泰恩②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国自由战争是他最喜欢写的主题。他崇拜巴赫，称他是音乐的上帝。虽然他手指又粗又胖，像海绵一样，弹起巴赫的曲子来却异常出色。没有人像他那样了解德国的抒情诗，没有人像他那样热爱德国语言，并为之陶醉。像大多数犹太族一样，他的家庭很晚才进入德国的文化界。他比最虔诚的德国人更信赖德国。

战争刚爆发，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急急忙忙到兵营去，报名当一名志愿兵。我能够想象出，这个矮胖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那些上士和列兵们会笑成什么样子；肯定他们会把他打

①汉斯·约克·冯·瓦丁堡（1759—1830），普鲁士陆军元帅。

②施泰恩帝国男爵（1757—1831），德国政治家和普鲁士改革家。

发走。利骚非常绝望。但是他像其他德国人一样，从事另一种工作，他就拿起笔写诗为祖国服务。对他来说，报纸上战报上所写的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别的国家突然侵犯了他的祖国，完全像威廉街上的剧院所演出的那样。最坏的战犯是那个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大臣英国勋爵格雷①。英国进攻德国，是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他把这种感情写进了《憎恨英国》一诗中，这首诗——我今天手头上没有这首诗——用激烈的、简洁的、富有表现力的诗句掀起了对英国的仇恨，并发誓永远不原谅英国的"罪行"。不久就出现了灾难性的情况，说明掀起仇恨是多么容易的事（是个肥胖的，昏了头的犹太人利骚先一步学会了希特勒的伎俩）。这首诗像一枚炸弹在弹药库里爆炸，以从来没有的速度传遍全国，纵然是《守卫莱茵河畔》也没有如此迅速。皇帝深受鼓舞，特意奖给利骚一枚红色雄鹰勋章。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这首诗；老师在课堂上念给学生们听；军官上前线，朗诵给士兵听，直到每一个士兵将这首仇恨经念得滚瓜烂熟。但这还不够，这首短诗配上了音乐，改编成大合唱，在剧院演出。不久，在七千万德国人中没有一人不能从这首诗的第一行默念到最后一行。《憎恨英国》这首诗不但风行德国，也传到了全世界——当然，没有多大热情。一夜之间，恩斯特·利骚红得发紫，享受到一个诗人在战争中的最高荣誉。当然这种荣誉后来就像内萨斯衬衣②一样把他烧毁。因为战争刚过去，商人重新开始做生意，政治家真诚地为和解做出努力，人们采

①爱德华·格雷（1862—1933），1905—1916 任英国外交大臣。

②内萨斯衬衣，系希腊神话中染有半人半马怪兽内萨斯的毒血的衬衣，比喻带来灾难的礼物。

取一切措施要求抛弃那首永远与英国为敌的诗。政治家为了推卸责任，把可怜的“仇恨的利骚”斥之为当时鼓吹疯狂的歇斯底里仇恨的唯一罪人。实际上，一九一四年所有的人都有这股歇斯底里的仇恨。每个在一九一四年赞美过他的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很明显地都不理他了。报纸不再发表他的诗作；当他在同伴们中露面，立刻出现难堪的沉默。后来这位孤独者，被希特勒赶出他为之忠诚效劳的德国。以后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那首诗的牺牲品，那首诗曾把他捧得高高的，为的是以后把他摔得粉碎。

当时所有的人都像利骚一样。我不否认，作家们、教授们和当时突然冒出来的爱国者，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也想真心真意地干点事。但是过了不长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战争的赞美和放纵仇恨心理，酿成了多么可怕的灾难。所有参加战争的各国人民在一九一四年全都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最恶毒的谣言立刻会变成真理，最荒唐的诽谤变成可信的。在德国，有几十人发誓说，他们亲眼看到载黄金的汽车从法国开往俄国。每次战争开始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在报纸上充斥着各种挖眼睛、斩手指的童话。那些传播这类谣言的不知情者，他们哪里会知道，这完全是凭空想出来的，用这些暴行来谴责敌人的士兵。这种伎俩本身就是一种战争手段，像弹药和飞机一样。在每次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杂志上就会出现这种报道。战争与理性、与正常人的感情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战争需要感情的冲动，需要有为自己事业而奋斗的热情，还要有对敌人的仇恨。

话又说回来，按人的本性，强烈的感情不会永久持续下去，一个民族和一个人莫不如此；这一点军事机构甚为知晓。军事

机构则需要人为的煽动，还需要给人服用狂热的“兴奋剂”，使他们兴奋起来。而这种工作只能由知识分子来承担。诗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不管是问心无愧还是问心有愧，不管忠诚还是例行公事，都要干这种鼓动人心的工作。他们既然敲起了仇恨的锣鼓，就用力敲下去，一直敲到那些正经的老百姓耳朵直响，心脏直跳。几乎所有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比利时，无不把“战争宣传的任务”让顺从的知识分子干，他们用自己的笔来鼓动群众的战争狂热，和对敌国的仇恨，而不是教他们反对战争。

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当时的宣传工作还没有那么坏，尽管人民大众对宣传工作十分失望，但是他们对报刊文章却是十分相信的。因此，在最初几天里的纯净的、美好的、勇于牺牲的热情，慢慢转化为最恶劣的、最愚蠢的放纵行为。在维也纳，在柏林，在环形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同英国和法国“作斗争”更有效更方便。商店的法语或英语招牌全部取消，甚至修道院的英国名称“英国少女”也要修改。人民太激动了太狂热了，以致把英国（English）和天使（Engel）两词搞混了，幸好没有看成盎格鲁撒克逊（Angelsachsen）。这三个词的外形太相似了。那些老实正经的生意人在信封写上或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发誓（并写信给报纸）一辈子也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同样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却宣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不加思考的滥用文化精神财富就像使用从敌国运来的粮食和矿砂一样。各个国家成千上万的和平公民每天在战场上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他们在后方还互相责骂，还互相攻击对方的已经死去

的伟人，他们在坟墓里已默默地躺了有好几百年了。这种精神疯狂越来越荒唐。离开学生时代就从来没有打开地图、从来没有离开自己住的城市的厨师反而相信，没有“桑夏克”(波斯尼亚边境的一个小地方)，奥地利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赔多少战争赔款，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实际上他们搞不清十亿是个多大的数字。任何一座城镇，任何一个阶层的人士，无不陷入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传教士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以前还把军国主义谴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喧闹得比别人更厉害，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这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正是各国人民相信自己这一方完全是正义的，才铸成了战争的最大危险。

一九一四年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要想与人进行一次理智的谈话，逐渐成为不可能。最爱和平的、最善良的人，像喝醉了似的满脸杀气。我的朋友，我始终把他们看作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甚至看作是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爱国者，并且从爱国主义变成贪得无厌的吞并主义者。每次与他们的谈话都用一句愚蠢的陈词滥调结束，如“谁不会恨，谁就不会真正的爱。”或者以粗暴的怀疑态度结束谈话。我的同伴，多年来我同他们从未吵过也没斗过，这次反倒粗暴的责备我，说我再也不是奥地利人了，说我应该到法国或比利时去。不错，他们甚至小心谨慎地暗示，他们原本想让当局知道我的观点，诸如战争是一种犯罪和“失败主义者”，而“失败主义者”是奥地利最严重的罪名，这个漂亮的词则是法国刚刚发明出来的。

出路只有一条：在别人头脑发热大声喧闹的时候，我只有退回到自己内心保持的沉默。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完全认识到，即使我自己流亡到国外，也不见得比孤独一人在祖国好。

在维也纳我有许多老朋友，但他们都远离我而去。要交新朋友，还不是时候。我同里尔克还能交交心，所以有时与莱纳·玛利亚·里尔克闲聊。他同我一样，有幸在一家偏僻的军事档案馆效劳，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战士，因为他的神经太脆弱了，经不起任何肮脏、气味、嘈杂对他的侵袭。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门，一个战士胆怯地站在门前。我惊呆了，好久才缓过神来：里尔克！穿着军装的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看起来他显得又乖又笨，高高的军服领紧箍在脖子上，穿上这套军服把他的思想全搞乱了，因为他不得不十分留心，遇到任何一个军官他都要并腿立正行军礼。因为他这个人平时非常注重仪表和举止的规范，就是穿上这身简单的军服，他也尽量摆出军人的架式。所以他表现出惊慌和不知怎么做才好的样子，他轻声轻气地对我说："自从上完军事学校以后，我就讨厌这套军服，我想，我再也不穿它。可是现在我快四十岁了，又穿上了它！"幸亏有人向他伸出援助的手，保护了他；不久，一次有利于他的健康检查使他免于服兵役。他又来看我一次，是向我告别，这次他穿着平民服装。他到我的房间像飘进来的（他迈步轻得使人觉察不出）。他说，他还要感谢我，因为我请罗曼·罗兰帮忙，把他在巴黎被没收的书救了出来。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不再年轻了，他好像怀着恐惧的思想使他精疲力竭。他说："如果只能到外国去，就到外国去！战争就是监狱。"说完，他就走了。又剩下我孤独一人。

几个星期以后，为了躲避那种危险的群众变态心理，我决定离开维也纳城，到一个偏僻的郊区去，以便在战争期间开始我自己的战斗：向那些掀起群众狂热的背叛理性的行为作斗争。

为崇高的情谊而奋斗

隐蔽到偏僻郊区也没有用，这里的气氛依然是压抑的。我意识到，当别人粗鲁的辱骂自己的时候，仅仅采取消极态度，不参与反击是不够的，正因为如此，我要采取行动。我还是个作家，作家有话就要说，有事就要写，何况作家有此义务，只要当时的检查机构通得过就行。于是我写了篇文章，题目是《致外国朋友们》。文章中表达的内容同一些人的仇恨宣传截然不同，公开表示，一有机会就同外国朋友们一起重建欧洲的文化，即便现在不能够取得联系，我依然对他们抱着诚恳的态度。我把这篇文章寄给了一家报社。当时是读者最多的报社《柏林日报》。出乎我的意料，该报却毫不删改，毫不犹豫的全文刊登出来，只有一句话“不管胜利属于谁”成了检查制度的牺牲品，因为对德国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必然胜利不能有任

何怀疑，也不允许怀疑。就是通过检查官放行的文章，还是收到一些超级爱国者愤怒的攻击信件，他们说，他们不能理解，怎么在这个紧急时候还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敌人搞联合。这些说法并没有使我太伤心。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要求别人同意我的信念，我也从没有这么想过。只要能把我的信念表明出来，清清楚楚地表明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两周以后，我已经把这篇文章忘记了，我突然收到一封贴着瑞士邮票、并盖有通过检查印记的信，从熟悉的笔迹上看，我断定是罗曼·罗兰的信。他说，他不能不读这篇文章，因为他是这样写的："我永远离不开我的朋友。"我立刻明白了。这寥寥数行是想证实一下，在战争时期与一位奥地利朋友建立通信联系是否有可能。我立刻给他写了回信，从此我们就开始按时通信，这种通信联系一直持续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残酷——期间，国与国之间中断了任何联系时为止。

这封信的到来，是我一生中的巨大幸福时刻之一，这封信就像一只白鸽从乱吼、乱蹦、发狂兽群的诺亚方舟上飞来。自从接到这封信以来，我再也不感到孤独，终于又和我相同思想的人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受到罗曼·罗兰优越思想的强大鼓舞。我知道，罗曼·罗兰在边界那边是多么惊人地保持着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这是任何一个作家所应该走的路：不参与破坏和残杀，而是以沃尔特·惠特曼为伟大榜样。惠特曼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曾做过护士工作，参与救援和人道工作。罗曼·罗兰住在瑞士，由于身体时好时坏，不能参加战地工作；战争爆发时，他在日内瓦立刻参加了红十字会，他一天一天地在红十字会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做那件惊人的工作。后来，

我在一篇题为《欧洲的心脏》的文章里，对他所做的工作公开表示感谢。在最初几周的残酷战役之后，任何联系都中断了，各国的家属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兄弟、父亲是阵亡了，是失踪，还是被俘；他们也不知道该向谁打听，因为从“敌人”那里是等不到任何消息的。那么，红十字会就把这个艰巨任务接受下来。在恐惧残酷的战争中，红十字会的人员至少可以减少人们巨大的痛苦。红十字会设法从敌对国家那里将那些被俘人的信件发到他的故乡。失踪很久的人终于有了下落。成立了数十年的红十字会，第一次接受如此广泛和上百万人的事；第一次有那么多的志愿人员参加工作。痛苦地等待消息，是家属极其难熬的。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末接发的信件有三万多件，于是不得不动用一千二百人处理和答复每日的信件；一千多人挤在日内瓦小小的拉特博物馆内工作，他们中间有作家，有最富于人性的罗曼·罗兰，他从事红十字会的工作，放弃了自己原有的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另一种职责，艺术家的职责，表示自己信念的职责。要行使艺术家的职责，必然要反对国家的作为，甚至要反对整个进行战争的世界各国。就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大多数作家们仍在仇恨中声嘶力竭高喊，并且互相攻击谩骂时，他却写了一篇有纪念意义的自白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文章中抨击了国家之间的精神仇恨，要求艺术家们在战争中坚持自己正义和人道。当时还没有一篇文章像这篇文章那样引起如此的轰动，引来各种议论，引起整个文学界的分裂：有的赞成，有的反对。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对比，前者有一个优点，即：当时的舆论还有力量。那时的舆论还没有被有组

织的谎言，即：宣传所扼杀。老百姓还是听那些写出来的话，这也是他们所期待的。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没有任何一位作家的观点会起作用，不管是好还是坏；同样，没有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篇文章、一首诗能打动群众的心，影响他们的思想。而在一九一四年，一首利骚的十四行诗《憎恨英国》，一份像“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像罗曼·罗兰那篇只有八页的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还有那部巴比塞①的长篇小说《火线》，都是当时的大事。当时道德的世界良心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衰竭和耗尽，他们以数百年的传统信念的全部力量，反对出现的所有谎言，对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的行径作出强烈的反应。自从希特勒把谎言变成真理，把反人道主义变成法律以来，德国向中立的比利时发动进攻，在今天几乎没有严肃的谴责，而在一九一四年会激起全世界的愤怒。枪杀卡维尔护士②，用鱼雷炸沉卢西塔尼亚号③，激起了道义上的普遍愤慨，使当时的德国受到的打击比一次战役的失败还要沉重。在那个时候，人的耳朵和心灵还没有被喋喋不休的说尽假话的收音机的波浪所淹没，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说的话并非没有多大作用，恰恰相反，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发表自己宣言的影响要比那些政治家公开发表演说的影响要大上千倍，大家都知道，政治家的演说是针对时局政策，是政治的需要，最多不过有一半是

①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法共党员。《火线》是他的代表作。

②伊迪丝·卡维尔（1865—1915），英国护士，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雄，因协助在比利时的协约国军出逃，被德国占领军处死。

③卢西塔尼亚号是英国的一艘游船，因运军火和禁品，1915年5月被德国鱼雷击沉。

真话，那一代人完全相信诗人是代表纯正思想观念的最优秀公民，所以他们完全相信诗人说的一切——但是，最后却使他们失望。因为军人和官方机构深知诗人们的这种威望，他们便想方设法把一切有道德的、有威望的人作为他们煽动宣传的工具：诗人们应该声明、论证、证实、断言一切非正义的坏事都是敌对国的，一切正义、一切真理都是属于自己国家的。但是罗曼·罗兰没有使他们的阴谋得逞。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任务，不是去强化用卑鄙的煽动手段制造过度的仇恨气氛，而且相反，应该去净化它。

如果今天有谁再去读那八页的著名文章《超脱于混战之上》，有可能不理解当时广泛的影响；如果冷静地清醒地去读，就会发现，罗曼·罗兰在文章中所说的都是一些非常浅显的道理。但这些话是群众发狂的时代说出的，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法国一群超级爱国者喊叫起来，好像他们手中拿着一块烧红的铁块。一夜之间，罗曼·罗兰成了他最好朋友的众矢之的：书商们也不敢将《约翰·克利斯朵夫》陈列在橱窗里；正需要用仇恨来刺激士兵的军事当局想出了对付他的办法：一本接着一本的小册子出来了，提出的论据是“战争期间，祖国失去了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这种喊叫，正说明他们受到的打击是何等沉重。一场关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态度问题的大讨论已无法阻挡，这个问题，无可回避地提到每个知识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所有回忆中，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罗曼·罗兰这几年来给我的信都不在我身边；很可能在这次新的战争浩劫中被毁或者是遗失掉。每当我想到此事，就觉得一种沉重的责任感

压在我身上。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认为，人们以后可能把这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于人性的作品之列；当时他的这种作品，表示出他的博大胸怀和深厚的理解力。他出于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怒给国外那边的一位朋友——官方认为是敌人——写的这些信。这些信件无疑是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道德文献，做到这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付出巨大的代价。从我们之间往返的通信中便产生了一个积极的建议：罗曼·罗兰建议，应该将各国的文化名人邀请到瑞士来，共同举行一次会议，以便取得一个统一的和比较恰当的立场，甚至本着互相谅解互相团结的精神向世界发表一份观点一致的呼吁书。他说，他在瑞士向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界名人发出与会邀请；让我试探奥地利和德国的思想名流，只要他们没有公开地进行仇恨宣传而丧失名誉的皆可试探，我立即投入这项工作。当时德国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盖尔哈特·霍普特曼。为了让他在参加与不参加会议的问题上不感到为难，我不好与他直接联系。于是我写信给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瓦尔特·拉特瑙，让他试问一下霍普特曼的态度。可是拉特瑙拒绝了——到底霍普特曼是什么态度，他是否知道要开这次会，我至今不明了。拉特瑙说，现在还不是建立文学艺术界和平的时候。就这样，我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因为当时托马斯·曼站在另一个立场上，在他刚写的一篇论述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文章中维护德国帝国的立场。里尔克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但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公开的活动。那位曾经自认为社会主义者的戴默尔抱着幼稚可笑的爱国自豪感，在每一封信上都签上“少尉戴默尔”。再说霍夫曼斯塔尔和雅可布·瓦塞尔曼，有人私下里告诉我，这两人也不能算上。这么说，德国方面看来没有多大希望；在法国，罗曼·罗兰遇到

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这是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为时尚早，战争对后方的人来说尚距离太远。我们依然处于孤立状态。

孤立，而并不是完全孤立。通过彼此间的通信已经有一些收获：初步了解了几十个人的概况，从他们的内心来说，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想法，算是站在我们一边，虽然他们身居中立国或交战国。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互相关注两边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这样，我们之间会逐渐取得一致的观点，文艺圈里的新人会同意这种观点的。对一种新观点，开始时，总有些人犹豫不定，随着时代的压力加强，他们也会越变越强。这并不是完全空虚的感觉给了我勇气经常写文章，以此对一些人的回答和反应，使那些所有与我们有统一感情的人从孤独中，从隐居中走出来。我一直给德国、奥地利的几家大报纸供稿，从而我有一块重要的宣传阵地。因为我从不涉及现实的政治问题，对我们这些文人，有关当局原则上是反对的，但并不害怕。另外，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对文学家是极其尊重的。如我粗略浏览一下当时悄悄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的文章，我不得不对奥地利军事当局的宽宏大量表示由衷的敬意。在世界大战的进行期间，我竟在报刊上热烈赞誉和平主义的创始人贝尔塔·冯·苏特纳，正是她把战争指责为犯罪的犯罪；我还把巴比塞的长篇小说《火线》的详细内容在奥地利的报纸上作过介绍。在战争期间，为了把不合时宜的观点介绍给各个阶层的人民，我们要采取一个好办法。为了说明战争的残酷和后方的漠不关心，就十分必要在奥地利的报纸上介绍《火线》文章中有意强调那个“法国”步兵的痛苦。的确，从几百封奥地利前线的来信中得知，我们的步兵对自己的命运也认识得很清楚。另一个好办法是：为了说出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佯装互相攻击。譬如说，我的一

个法国朋友，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反驳我的文章《致外国的朋友们》，为了表示他对我文章的全面反驳，他将我的文章全文翻译并与他的反驳文章一起刊登，这样，我的文章就传到了法国，使法国读者都能读到它，这就是目的。什么时候用这个办法我们打起闪光的信号灯——这不是一种记忆的信号，而是互相联系的信号。后来有一件小事向我表明，我们的信号传递是非常默契的。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向它早先的盟友奥地利宣战时，我们这里顿时掀起了一阵仇恨的浪潮，所有意大利的一切都受到唾骂。这时突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尔·波埃里奥的意大利青年写的回忆录。他是意大利十九世纪统一运动时期的人。回忆录中写到他访问歌德时的情形。为了在仇恨的喧嚣声中说明意大利的文化与我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我有意写了一篇题目是《一位意大利人访问歌德》的文章。因为那本回忆录是贝内代托·克罗齐①写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向克罗齐表示崇敬。那时人们不允许赞美外国的诗人或学者，所以我说出对意大利人敬佩的话，无疑是对奥地利的一个明显示威；而敌对国的人对此却十分理解。当时在意大利当部长的克罗齐②，后来有一次跟我说，部里不太懂德语的职员惊慌失措地冲过来告诉他，在战争对方的一家大报上，有的文章反对他（因为职员只能这么想，在敌国的大报纸上点名，只能是敌意）。克罗齐叫人拿奥地利的《新自由报》来，先是大吃一惊，但仔细读起来顿时又高兴了。因为他看到的不是敌意，而是尊敬。

①贝尔代托·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政治家，曾任议员、教育部长等职。

②原书注：克罗齐 1920—1921 年才任部长。

我现在不想对这些小小的试验评价过高，但这些试验对事件的整个过程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仅帮助我们，也帮助了一些不知名的读者。这些作法缓解了可怕的孤独和绝望，一个二十世纪真正有人情的人正处在这种孤独和绝望之中。二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同样面对特别强大的势力却无能为力，我甚至更害怕这种势力。当时我已经意识到，我用这种小小的抗议和熟练的技能并不能卸掉我心头的负担。于是，写一部作品的计划在我心里渐渐形成。我计划中的作品，不仅表现一些个别的事情，而且要表现我对时代、对人民、对灾难和对战争的看法。

为了能用综合的文艺技巧描绘战争，而我却缺少最重要的素材，那就是我没有亲眼目睹过战争。我现在安安静静坐在办公室里几乎一年啦。在看不见的遥远的地方正进行着"实实在在"、真正的、残酷的战争。本来有几次机会可以到前线去，几家大报社三次请我到前线去当随军记者，可是我没能成行。因为当随军记者的任何形式的报道必须承担那种定型的义务：必须牢牢地用爱国主义和赞扬的精神去描写。我已经发过誓，我在一九四〇年也信守这一誓言——永远不写一句赞美战争的话，也绝不贬低别的民族。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好机会。强大的奥德联军发动进攻，于一九一五年春在波兰东南部塔尔努夫城附近突破了俄国人的防线，集中了一次兵力就占领了加利西亚① 和波兰。这时，军事档案馆头头就想，在奥地利新占领区

①加利西亚，在今波兰东南部，历史上长期为俄、奥争夺的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加利西亚归还波兰。

所有俄国的宣传品和告示的原件在没有撕下来和销毁以前，赶紧把它们收集上来，存到图书馆里。负责档案馆的上校知道我有搜集的才能，便来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承担此项任务。我乐不可支，赶紧打点行装；我得到一张通行证，拿着它可以乘坐任何一辆军用列车，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自由活动，不受任何部门的管辖，不直接从属于任何机关和上司，以后我所经历的无不离奇得很：我并非是军官，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衔的上士，我穿着一套普通的军服。可是，每当我出示我的秘密证件时，便能引起特别的尊敬。因为前线的军官和公务人员认为我一定是微服私访的总参谋部的某个官员，或者是身负秘密使命的特派员。由于我不到军官食堂用餐，只住在旅馆里，所以我又得到一个方便机会，我可以置身于庞大军事机关之外，不用“向导”就能看到我要看的一切。

命我搜集宣传品和告示的任务，我觉得并不很困难。每当我到达加利西亚的一些城市，来到塔尔努夫，来到德罗戈贝奇、来到伦贝格。在这些城市的车站旁总有几个犹太人，所谓的“中间商”，他们的任务是，你想要的，他们准能给你搞到手。这可不错，我同其中的一位万能老手说，我想要俄国占领时的布告和文件等。听后他像一只黄鼠狼一样敏捷地跑开，把我交给他的任务通过秘密通路传达到几十个下面的代理商。三个小时以后，我没走出一步，就搜集到最齐全的材料。有这个特别突出的组织帮助，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更多的东西，我确实看了不少东西。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觉得在他们的眼睛里，在那些尚且活着人的身上布满了恐惧，像一片乌云罩在他们身上。我还看到犹太人集聚区居民的困境，这是我意想不到的。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平房和地下室的

房间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敌人”。在塔尔努夫我首次看到正在押解途中的俄国战俘。一块不太小的四方形地面，四周围着栅栏，俄国战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大多数都留着胡须的奥地利的蒂罗尔人看守着。这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入伍的，现在服役期已满，他们现在的处境同那些战俘没什么两样，都是无依无靠。这些当看守的士兵没有一点好斗和严厉的情绪。他们跟那些漂亮的粉头净面的穿着新军服的士兵毫无共同之处，那些士兵经常出现在家乡的画报上。这些士兵对待战俘根本没有严格的防范，相反他们与战俘坐在一起，像同伴一般；战俘丝毫没有逃跑的意思。因为他们之间语言上的阻挡，互不明白，闹出了不少笑话。他们互相敬烟，相视微笑结成朋友。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旧、破、脏的皮夹里掏出妻子和孩子的像片给“敌人”看，敌人士兵们互相传看着，用手指着像片上的孩子问蒂罗尔士兵，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看到这个情景，不由得产生这样的感觉，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类兄弟。这种认识伴随着我整个的行程，使我感到宽慰。我穿过弹痕累累的城市，路过抢劫一空的商店，商店里家具就像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掏出来的内脏散落在大街上。介于战争之间，长势茂盛的田野反给我带来了希望，几年之后，所有被破坏的景象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时，我没有估计到，对战争恐怖的回忆会这么快地从人的记忆中消失，就像战争的遗迹能很快地从大地的表面消失一样。

在最初的几天里，我还没有遇到真实的恐怖的战争景象；以后我才看到了战争的面目，完全超出了我最坏的想象。由于没

有正常的客车运行，我只有坐军车。一次，我在运送炮车的敞篷车上。又有一次我坐在运牲口的车厢里，里面恶臭，许多人疲倦极了，互相挤着靠着，东倒西歪地睡着了，好像是拉往屠宰场的途中，个个要被宰了似的。最可怕的是运伤员的列车了。我已经被迫乘了两三次运伤兵的列车了。它跟那些光亮清洁的白色救护车绝无共同之处。战争开始的时候，维也纳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贵的女士们扮演护理伤兵的护士，在雪白的救护车里让摄影师拍照。我看到运伤员的车是一般的货车，车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窄小的通气孔，车厢里只有一盏熏黑了的油灯照明。临时搭成的担架一副挨着一副，上面躺着的全是不断呻吟、额头渗出汗珠、脸色像死人一般苍白的伤员，他们在尿、粪、碘酒的混合气味中大口大口地吸气。卫生员太疲劳了，走起路来晃晃悠悠。这里看不到照片上泛着白光的用品，只有躺在麦草上的、硬担架上的人，他们身上盖着渗满血迹的毯子。每一节车厢里都有两三个死人，其中有垂死者。我与医生谈过，他对我说，他是一个匈牙利某个小城的牙科医生，已有多年没有做过手术了，看起来他有些绝望。他对我说，他已向七个车站提前拍电报求援，要求供应吗啡。有的药品都已用光，药棉用完了，消毒的包扎用品也用完了。到布达佩斯医院还需要二十个小时。他请求我帮他的忙，因为他手下的那些人已支持不住了。我答应试试，可是我笨手笨脚，不过我还能干点事。每到一站，我就下车帮助提几桶水，虽然水质差，是供火车头用的，这时也成了清爽饮料。至少可以给伤员洗洗，揩净地上的血迹。对这些来自各民族的、一起挤进带轮子的活棺材里的士兵来说，还有一个交际上的困难，就是语言障碍。医生与护理员都听不懂鲁提尼人的语言和克罗地亚语言。唯一能够帮上忙的是一位

白发苍苍的牧师，他以自己从事的职业角度抱怨说，他无法从事他的圣职活动，因为他没有油给临终的人作涂油礼的仪式，所以他同医生一样感到绝望。他说，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还从来没有在一年最后的一个月“料理”这么多人。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用生硬的、愤怒的语调说出来的那句话：“我已经是六十七岁的人了，见的世面也不少，可是我曾经认为，人类犯下这样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我在回家途中，乘坐的那趟伤员列车拂晓时到达布达佩斯。我下车后立刻奔向旅馆，为了好好睡一觉，因为在车厢里，我唯一的座位是我的那只箱子。我实在太困倦了，一直睡到中午十一点，赶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饭。可是我刚走几步，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定定神，是不是我在做梦。真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早晨像春天，中午似夏天。布达佩斯是真美啊，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女士们穿着白色衣裙，挽着军官的胳膊轻盈散步。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军官们，好像不是我昨天或前天见到过的，完全像另一个部队的军官。那些军官的衣服里、嘴里、鼻子里散发出一股碘酒的气味，他们是运送伤员的。而这里的军官则是买紫罗兰花向女士们献殷勤。我还看到漂亮的小汽车驶过大街，里面坐着脸刮得净光、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所有这些情景，才离前线不过八九个小时快车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权指责他们吗？他们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乐，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们大概感到现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认为该享受的应尽量去享受，穿几件好衣服，渡过最后的美好时光。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

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这才使我理解到这些做法，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绿荫花香的上午，几千人聚在这里沐浴阳光下，去寻找自己的感觉，感到自己的血液，自己的生命也许又增添了新的更强的力量。开始我惧怕的那些事，现在我觉得几乎已烟消云散。可是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偏偏给我拿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硬着头皮看下去。不看还好，一看我怒火上扬。报纸上登的全是不可动摇的胜利信念的废话，说什么，我们的部队损失很小，而敌人伤亡惨重，看到这里，使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大谎言从报纸上向我袭来！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经心和无忧无虑的人，而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如果我们自己不去反对这些人，那我们也是有罪的。

现在，我才找到了真正的动力：必须反对战争！我心中已经有了素材，在开始动笔前，证实我直觉的最后材料还有些什么欠缺。我要反对的真正敌人——那种置别人痛苦和死亡而不顾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些预言家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他们侈谈胜利，实际上是拖延相互厮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乐观主义的背后，他们雇用了一批合唱队，也是我的敌人。像韦尔弗尔在他优秀的诗歌里所斥责的那样，他们充当“战争的吹鼓手”。谁要有点疑虑，他们就认为，这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就提出警告，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反正他们不去参战受苦——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间几经更替，但总有那么一群人，把谨慎小心的人称作胆小鬼，把有人情的人称为懦夫；而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自己反倒毫无主意。还是这

些人，他们嘲笑特洛亚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我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性从未理解得像当前这么深刻。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这两个形象相处的时代太相似了。战争开始时我就不相信会有“胜利”，纵然战争打胜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牺牲；胜利补偿不了牺牲。虽然，我在所有的朋友中间提醒过这件事，但他们听不入耳，我依然孤立。在第一枪打响以前，他们就狂乱的高喊胜利，在第一次战役前就分配战利品，这使我常常产生怀疑，是我在那些聪明人的面前发了疯，还是他们这些疯狂得像酩酊大醉的酒鬼中唯我一人独醒。这样，原本的、悲剧的“失败主义者”的帽子自然而然地戴在我的头上，有人发明了这个词，就是为了把“失败的意志”这个罪名强加在追求互相谅解的人身上。我把“失败主义者”的形象写在我的作品里。我选择耶利米作为一个形象的象征，他是一个徒劳的告诫者。无论如何我不会写成一部陈词滥调的“和平主义”戏剧。写和平比写战争好；我所描写的是一个在狂热的时代被别人蔑视，被看成是软弱的人、胆怯的人；但在失败时却证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败而且还能战胜失败的人。从我的第一个剧本《忒耳西忒斯》开始，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这个问题一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表现人内心的冷酷无情一直在吸引我去写：有权势的人每个形式的权势都会使自己成为冷酷无情；任何胜利都会使全体人民思想僵硬。我还将以上两者与给人的心灵造成可怕痛苦的失败对立起来。现在战争依然继续，当别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证明这次战争不容置疑的胜利时候，我却把自己抛入灾难的深渊，并寻找摆脱灾难的出路。

我选择圣经上的一个题目，但是我无意中触及到我身上迄今为止尚为注意的事：即我在血缘上或传统上与犹太人的命运

是紧紧相联的。难道他们不是我的同胞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族征服。可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即用意志改变失败的力量，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难，经受住失败的考验，继续生存下去。难道我们的先知，他们预先没有料道那种永远被追逐、永远被驱赶的命运吗？时至今日，我们的命运仍像糟粕一样被扔到大街上。难道他们没有感受到屈服于暴力的失败？甚至把失败美化为是通向上帝的路？如果考验不是永远对所有的人和对个别人有益的话，那么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有幸感觉到了这种益处。我认为这本书才真正算作我写的第一部作品。我知道，如果我没有对战争的痛苦体验和预知的一切，还像战前一样是一名作家，一名音乐术语中所说的“易激动的愉快”作家，就永远不会领悟、理解和深入发掘内心的最深处。现在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要说出心里话，同时要说出时代的心声。这期间我想帮助别人，而我却帮助了自己：写完《伊拉斯谟》后，又写了一部最富有个性、最隐晦的作品。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统治的日子里，我用《伊拉斯谟》这部作品，使自己摆脱了一次与以前相似的危机。从我创作这出悲剧开始的那一刻起，我就对时代的悲剧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是，我并不相信该作品能够取得明显的成功。因为剧本反映的问题成堆，如先知的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犹太人问题，还有最后的结束场面用合唱的形式，要把结束场面上升到一首歌颂失败者命运的赞歌等等，其容量大大超过普通剧本的容量。所以，剧院从头至尾演一遍，需要两三个晚上。再者，正当报纸上大喊大叫“要么胜利，要么毁灭”的时候，怎么能让这出宣传失败甚至赞美失败的剧在德国上演呢？如果这个剧本能够允许出版，我觉得这才是奇迹呢！就是遇到最坏的情况，剧本

不许上演，它至少也帮我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我把与周围人交谈中他们所不敢说的话，全部写进了剧中诗句的对白中。这样我把压在心头上的沉重负担抛得远远的，从而解脱了自己。同时，我对时代的一切“不满意”，却在我身上找到了“满意”的结果。

在欧洲的心脏

当一九一七年复活节我写的悲剧《耶利米》出版时，我正经历了一场出乎意料的事情：两万册剧本很快销售一空，对戏剧来说，印两万册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我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这部剧的，所以我必须等待对我的强烈反击。然而，实际上正相反。不仅我的朋友们，像罗曼·罗兰那样公开表示对我的支持，就是先前站在另一边的，像拉特瑙和里夏德·戴默尔等人也公开表示支持我。想要那些剧本而尚未到手的剧院经理写信给我，要求我允许他们在战后太平之日首演这出剧的权利，因为在战争期间演出该剧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主战派对剧本持反对态度，也表现得有礼貌和十分的尊重。我想到该剧本的上演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怎样会出现这种事呢？无非是，战争已过了两年半，时间使他们突然震动。在战场上可怕的流血过后，高烧开始降温。在战争开始最初几个月，他们热情奔放，而现在他们以相当冷静的眼光注视着战争。那种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感情开始松动，因为他们从现实生活中一点没体会到哲学家和诗人们大肆吹嘘伟大的“道德精神的净化”是怎么回事。一条深深的裂缝贯穿着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仿佛分成了两个不同世界。前方，士兵在打仗，在忍受最残酷的苦难；后方，人们安居乐业，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损人利己大发横财。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越来越明显了。走后门拉关系，戴上假面具可以干坏事。大家都明白，用金钱或者利用关系可以搞到优惠物资。另一方面，疲于奔命的工人和农民被一再驱入战壕。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无所顾忌地寻找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商的盘剥，生活必需品之类的物资价格飞涨，食品日益匮乏，百姓生活困苦，与其相反的是那些发战争横财的人，他们过着令人鄙视的奢侈生活，这种生活像野外的磷火一样稀少。老百姓渐渐开始产生各种强烈的怀疑，开始对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开始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每份公告，怀疑报纸和它刊登的消息，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当然，这绝不是因为我那本书的艺术成就所能产生如此意外的效果，反而是意外的效果促使我的剧本获得极大的成功，这只是因为剧本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仇恨战争，怀疑战争能够胜利。

当然，在舞台上用生动的语言表达这种情绪，看来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做不可避免地引起抗议。所以，我必须放弃在战争时期能看到第一出反战戏的演出。然而，我却突然接到苏黎世市剧院经理的信，他说，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

舞台，并邀请我参加首演仪式。我竟然忘记了德语世界里还有一块小小的但又非常珍贵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承蒙上帝关怀，这是一片处于局外的、民主之地，在这里言论自由，思想开明。毫无疑问，我立刻表示同意。

当然，我表示同意是有条件的，因为我是原则上同意，只要有关当局允许我离开本国和工作岗位一段时间才行。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交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本都没有成立。现在非常有必要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环境上的区别加以说明。当时的各个国家、领袖们、皇帝和国王们都是从人道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在下意识中觉得对战争也是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它们都会立刻进行反驳，说这是可耻的诽谤。与此相反，每个国家都会千方百计的表白、证明、解释，甚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在世界的舆论面前，人们总是宣传文化比强权高尚，总是鄙视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活空间”这类口号，认为它们是不道德的。他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此，各国的文艺演出团体全都蜂拥到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和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交响乐团到国外演出；甚至还派出诗人、作家、学者，并非去宣扬军事行动或者庆祝兼并的意图，而是用诗篇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并不是“野蛮的”，来证明德国人并非只制造枪炮和毒气，而且也创造欧洲的纯精神财富。公元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不得不一再强调，有一股追求世界民心的力量。一个国家道德基础和艺术创作在战争中表现出一定的力量，

该力量被看作是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国一股脑用非人的残暴把这种力量和人民的同情统统打翻在地。因此，我觉得现在是要求到瑞士参加首演式同时也是去度假的极好机会。令人担忧的最大障碍可能是这部反战戏剧，剧本里有一个奥地利人——尽管他是一个象征性的角色——战争的失败是可以想到的。我向部里主管文化宣传的部门领导提出申请，向他说明我的愿望。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他立刻答应了我，而且马上就办。他对批准我去的理由作了奇特的说明："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那好，请您在外面好自为之，坚持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四天以后，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张出国护照。

战争还正在进行之中，我居然听到部里的一位高级官员这样随便的谈话，心中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我并不知道政治上的秘密来往，我也没有料到，以新皇帝卡尔为首的政府高级人士在一九一七年就已经慢慢开始酝酿一场脱离德国军事独裁的运动，当时德国的军国主义，不顾奥地利的内心意愿，肆无忌惮地将它绑在野蛮的兼并主义的战车上。我们参谋部里的人都十分痛恨鲁登道夫残暴专横的做法；外交部的人，竭力反对德国的政策，把奥地利树为美国的敌人，就会遭到美国潜艇的攻击而又无法防御；甚至老百姓也都窃窃私语，抱怨"普鲁士人的无理妄为"。不过目前这一切，仅仅是小心谨慎的弦外之音，似乎是不自觉的谈话中流露出来的，不敢公开谈。但是，几天以后，我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当时最大的政治秘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我赴瑞士途中，在萨尔茨堡逗留两天，

在那里我为自己买了一栋房子，打算战后居住。在这座城市，有一小群笃信天主教的信徒，其中有两人在战后的奥地利历史上起到过重大作用。他们是海恩里希·拉马施[1]和伊格纳茨·赛佩尔[2]。前者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法学家，曾参加过海牙会议；后者是位天主教神父，他在奥地利君主制政体崩溃以后，担当起管理小小奥地利的责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充分施展了卓绝的政治才能。他们两人都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虔诚的天主教徒，热情的老牌奥地利人；他们内心深处对德意志、普鲁士、基督教的军国主义极其痛恨。他们觉得军国主义同奥地利的传统思想，同天主教的使命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的诗剧《耶利米》在和平主义的天主教阶层里博得了最强烈的同情。枢密顾问拉马施——赛佩尔正巧出外旅行——请在萨尔茨堡的我去见他。这位显贵的老学者非常客气地谈论我的剧本，他说，剧本里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奥地利思想，起到了友好相处的作用。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我与他从来没见过面，可是他很信任我，谈话是那么坦率，充分证明了他内心的勇气。他告诉我这样的秘密：我们在奥地利的人正处在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他说，俄国在战场受到挫折以后，如果它放弃侵略意图，那么，无论对德国还是对奥地利，缔结和平不会有什么障碍，眼下不能坐失良机。如果德国的泛德意志集团继续反对谈判，那么奥地利不得不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而独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轻的卡尔皇帝答

[1]海恩里希·拉马施（1853—1920），奥地利著名国际法学家，曾任维也纳大学法学教授，1918年10月底出任奥地利内阁总理。

[2]伊格纳茨·赛佩尔（1876—1932），奥地利政治家和天主教神父，曾两次出任奥地利总理。

应帮助实现这些意图；也许过些时候就能看到皇帝本人发挥的政治影响。现在的一切都取决于奥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能否达成互相谅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随德国的军国主义派，以草率地继续牺牲生命为代价换来“胜利的和平”。在紧急的情况下，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在奥地利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推入灾难深渊之前，及时脱离与德国的联盟。他坚决果断地说：“谁都不能谴责我们背信弃义，我们已经死了一百多万人，我们牺牲得够多了，我们付出的够大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为德国的世界霸权去牺牲一个生命，牺牲一兵一卒都不行！”

我屏着呼吸细心地听着。以前我们对这些事情也常常想过，但谁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说出来：“让我们及时与德国人和他们的兼并政策彻底脱钩”，如果这样说就会被认为是对盟友的“背叛”。现在有一个人，据我所知，他在奥地利得到皇帝的信任，由于他参加海牙会议而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的人说出来，他对我这样一个几乎还是陌生人说这些话，态度又是那么温和的平静和坚定。我立刻感觉到，奥地利单方面的行动早已不是准备阶段，已付诸于行动了。这种想法极其勇敢，要么以单方面媾和的事实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就在紧急的情况下实现单独媾和。历史将证明，这种想法是拯救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至整个欧洲唯一的、最后的可行方案。可惜到后来却缺乏实现原来计划的决心。卡尔皇帝派他的内兄帕尔玛亲王去会见克雷孟梭①，还带着一封密信。去法国的目的是试探一下在没取得德国宫廷的谅解之下媾和的可能性，并随时准备进行

①乔治·克雷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1906年至1909年任法国总理，1917年10月起继续任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

和谈。后来，不知是用什么方式德国发现了这一秘密使命，我知道，直到今天也没搞清楚泄密的真象。致命的错误是卡尔皇帝后来没有勇气公开坚持自己的信念，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德国以进军奥地利相威胁，卡尔皇帝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员，就怕自己给祖辈留下的历史上增添污点。可是在关键的时刻，他还是废除了由弗兰茨·约瑟夫老皇帝缔结的、用无数鲜血作保证的盟约。而无论如何他是不会任命拉马施和赛佩尔为总理的。这两人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国际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内心道德信念，敢于蒙受脱离德国的罪名。小皇帝的优柔寡断最后还是毁了他自己。他们两人是在奥利地共和国千疮百孔的困难时期当上总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期间。当时除了这两位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还不曾有人能胜任貌似不义的举动，即脱离德国之举。如果拉马施当时公开地以脱离德国相威胁，或者索性脱离，那么他不仅拯救了奥地利的生存，也拯救了由于无限扩张而陷入内部危机的德国。如果那位笃信宗教又十分明智的人向我坦率地宣告，行动已经开始，而不是由于懦弱和笨拙而毁灭的话，那么，欧洲的情况会更好。

第二天，我继续旅行，越过了瑞士的边界。今天的人很难想象，一个人从被封锁的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作战国到达中立国会有什么感觉。从国界这边车站到边境那边车站不过几分钟，从进入这一边的第一秒起，立刻使人感到从令人窒息的环境里突然来到强烈的白雪空间中，清凉又爽快，仿佛混沌的大脑一下子每条神经每个思路都活跃起来。（几年以后，我又从奥地利到瑞士来，在瑞士的边境车站——车站的名字我从来记不住——我依然呼吸到清新凉爽的空气。）旅客从车上跳下来，首先使我

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着各种我早已忘掉的日常用品,饱满的黄灿灿的香蕉和柑橘,还有我们只能走后门才买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制品,买面包不要面包票,买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们像饿狼似的扑向物美价廉又丰满的食品柜。车站附近还有家邮电局,从这里可以向世界各地发信或打电报,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的、意大利文的、英文的报纸,可购买、浏览、阅读,没有因读敌报而受罚的规定。只要倒退五分钟距离,我们那里全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之处,从这两个距离比较近的边境小站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可以全部揭露出来。再回头看看我们那边的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栋房子里和每间住户里,都有男人被征走,送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杀别人或自己被杀。五分钟的火车路程到了瑞士一边,同样年龄的男人和妻子一起悠然自得地坐在常春藤缠绕的家门口,抽着香烟。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右边的鱼群是正在作战的,而左边的鱼群则是保持中立。当我越过边境的那一刹那,我先想到这边和那边的不同,这里更自由、更使人振奋、更体现人的价值。到了第二天,我不但感觉到战争对我们精神上的摧残,而我们身体机能在战争中衰退到何等地步。我应邀在亲戚家作客,饭后喝了一杯浓咖啡和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没想到我突然感到头晕,心也跳得厉害。我的身体,我的神经这时表明,在长期饮用代用品和吸代用烟之后,亦不能适应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烟草。连身体也不得不从战争的不自然状态转变到和平的自然状态中。

这种眩晕,这种舒畅的昏昏沉沉感觉反而产生了一种精神刺激。我觉得每棵树变得更美了,每个山头显得更广阔了,每处风景变得更可爱了。可是,因为在进行战争的国土上,草原

本是和平宁静的，但用混浊眼光来看就会觉得大自然是无情冷漠的，殷红的日落会使人想起遍地鲜血。而在这里，在和平的国度里，自然环境、苍茫大地无处不美，到处是自然。我喜爱瑞士，好像我从来没有爱过它似的。我总是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到这个方圆不大的富饶的国家。而从来没有像这次深刻的体验到它存在的真正意义。各民族之间友好地生活在同一空间，这是瑞士人的思想。各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互相尊重，讲究真正的民主，可以克服语言上和民俗上的差异，这是最明智的生活准则——这对整个混乱的欧洲是多么好的榜样啊！瑞士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难所。多少世纪以来它是和平、自由的故乡，它最忠诚保存着自己固有的特色，欢迎各种思想和观点——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这个超民族的唯一国家的存在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我觉得，赐予这个国家这么多的风景名胜和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在这里不会觉得陌生，一个自由的、独立的人在这里会觉得比他的祖国更有归家之感。我沿着苏黎世的大街和湖边徜徉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万家灯火，一片和平景象，这里的人们过着安然自得的宁静生活。我好像感觉到，在那些窗户后面不会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和想念着自己儿子的女人。在这里我没有看见过伤员、残疾人和明天或后天被装上列车的年轻士兵。我觉得，人在这里更有理由活下去，同时在那个进行战争的国家里，人的生活成了一种恐惧，几乎是一种负担，甚至是一种精神折磨。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讨论我的剧本上演，也不是会见瑞士的朋友和其他外国朋友，而是首先想看到罗曼·罗兰，我知道他能使我更坚定、更清醒和更积极，对此我非常感激他。尤其使我感激的是，在我心情孤独沮丧的日子里，他及

时地给予了我友谊和鼓励。所以我必须去看他，我立刻前往日内瓦。现在，我们这些被称为“敌人”的人，正处在相当复杂的境地。不言而喻，交战国的政府是不愿看到它的公民在敌对国或中立地区进行私人往来的。在这方面也无法用法律加以限制。宣传部门也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对文化交 流和会面就科以刑罚。只有商业上的往来，“与敌人通商”才是法律禁止的，并且与叛国罪相提并论。为了避免由于最轻微地触犯禁令遭受不必要的怀疑，我们朋友之间原则上避免相互之间敬烟，因为我们的一举一动被无数的密探随时监视着。为了避免他们认为我们做了亏心事而害怕或者认为我们居心不良，我们这些各国朋友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完全公开的作法，使密探们无机可乘。我们相互写信也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领的办法，更不在夜间偷偷互访，而是大摇大摆地穿过大街，公开坐在咖啡馆里。所以我到达日内瓦以后，就向旅馆登记处通报了我的全名，公开说我要见罗曼·罗兰先生，这样做，德国的或者法国的通讯社就可以报导出我是谁，我要访问谁，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岂不更好。对我们来说，我们各属敌对的国家，又是在打仗的时候，我们偶然相遇本应回避，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义务，由于世界变得如此荒谬，我们也要随之变得荒诞。

现在，我终于站在他的房间里——我几乎觉得这像他在巴黎住的房间。像在巴黎时那样，桌子上、靠背椅上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书；在写字台上堆满了报纸、杂志、信件纸张等。他不论走到哪里，他的布置都一样，简单的像修道士的禅房，可是它与全世界却联系在一起。我们见了面，只是紧紧握着手，霎时间竟忘了彼此问候的话。多年以来，这是我重新相握第一只

法国人的手；罗曼·罗兰是我三年以来交谈的第一个法国人。正是这三年，我们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紧密。我用法语同他交谈，比在家乡同任何人谈的更投机更坦率。我心里完全意识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谈的这位朋友代表着全欧洲的道德良知。现在我才能看到，他为促进彼此的互相谅解所进行伟大的事业中正在做的或已经做的一切。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他日夜注视着世界各国的动向，同无数向他请教公益事业的人保持着通讯联系。他每天写数页日记。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亲自写下历史的时代责任感，并看作是对后代的一种帮助和责任。(现在日记又在何方？那些亲笔写的无数的日记本，总有一天会全面揭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种种矛盾冲突。）同时，他还要发表一些文章，当时的每篇文章都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他现在正在写长篇小说《格莱昂波》——这部书他投入了全部的力量，本着牺牲精神，孜孜不倦地写作，体现了他所承担的巨大历史责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他在每一件具体事物中处处伸张正义和做出表率。他对每封来信都回复，对每一本关于时代问题的小册子他都看。这位身体虚弱、当时健康状况受到威胁的人，只能轻声说话，同时不断地抑制轻微的咳嗽。他不戴围巾就难以走出一段路；快走一步就要停一会儿。就是这么一位体弱的人居然贡献出难以置信的巨大力量。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他动摇，任何攻击和任何诡计也无法动摇他的意志。他大无畏地、清醒地看着这个动乱的世界。在这里，我从一个活着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种英雄主义，即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道德的英雄主义。我在写罗曼·罗兰传时就没有充分写出这种英雄主义（因为人总羞于把活着

的人赞美得过分)。当我看到他在这间斗室里向世界各地射出看不见的、使人振奋的光芒,几天后在我的血液里也感觉到了。我知道,罗曼·罗兰创造的真诚的振奋人心的力量,他单枪匹马或者说几乎是单枪匹马向千百万人那种丧失理智的仇恨作斗争中产生的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是无法估计的。只有我们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才深切地知道,他的存在和他堪称表率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染上狂犬病的欧洲由于他的存在才保持了自己的道义和良知。

那天下午我们的谈话使我很感动,后来几天在他所有的谈话中隐藏着一丝悲哀,我同里尔克谈到这次战争时也感觉到这种悲哀。他对那些政治家,对那些为了自己民族的虚荣而不顾牺牲他国无数生命的人无比愤慨。而对那些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受难和死去数不清的众生总是寄于同情。他把列宁发来的电报给我看,列宁是在离开瑞士的、声名狼藉的、密封的列车里发出的,恳求罗曼·罗兰同他一起去俄国。可见列宁十分清楚,罗曼·罗兰的道德威望对他的事业是多么重要啊。可是罗曼·罗兰一直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只以个人身份、独立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共同事业奋斗到底。所以,他不要求别人追随他的思想,同样,自己也不愿受到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同样也应该是自己不受约束的人。他表达的信念只有一个:人应该怎样保持自己的自由,就是坚信自己的信念,天翻地覆也不动摇。

我到了日内瓦的第一个晚上,就遇见了一小群围绕着两家独立的小报《报页》和《明天》周围的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他们是皮埃尔-让·茹弗、雷内·阿科斯、弗朗斯·马塞雷尔。他们都是作家和艺术家,很快成了我的朋友,速度之快就像青年

人结成友谊之快捷。我们单凭直觉也能感到我们的生活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蒙蔽，我们大多数老朋友的关系已经中断了。人是需要不断增加新朋友的。由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我们又一起站在同一思想战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刚过了二十四小时，我们之间的信任就达到了如此牢固的程度，好像我们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不论在何种场合的谈话我们都亲切的称呼“你”。我们大家——“我们人数不多，我们的欢乐不多，但是我们都是一群兄弟”——都感到这种冒个人危险的聚会是够大胆的。我们知道，只有五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每一个德国人正对着一个法国人，反之，一个法国人正对着一个德国人，随时准备着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弹把对方刺倒或炸得粉身碎骨，以此立功获奖。交战双方的千百万人都在做自己的美梦：把对方从地球上消灭掉，“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攻击和谩骂。在双方千百万人中间只有极少数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不仅友好地坐在桌旁，而且怀着最真诚的甚至怀着自觉的、热情的兄弟情谊互相交谈。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的；我们知道，真实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与祖国对立起来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种冒险行为能够推动我们的思想变为极度兴奋状态。我们不但喜欢冒险，也喜欢享受冒险带来的乐趣，因为冒险本身就给我们的抗议增加实际的分量。所以我甚至同皮埃尔-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组织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这在战争进行期间可谓是一件奇事）——他用法语朗诵了自己的诗，我用德语朗诵了《耶利米》中的片断——我们恰恰用这种公开的形式显示我们在这场冒险的游戏中是严肃认真的。我们的领事馆和大使馆对这个朗诵会是怎么

想的，我们认为无关紧要，我们这样干就像科尔特斯① 似的是一种破釜沉舟的做法。从我们灵魂的深处来说，我们不是“叛徒”，“叛徒”正是在关键时刻背叛作家的人类使命的那些人。这些年轻的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他们有着何等的英雄气概啊！那位弗朗斯·马塞雷尔向我们展示了他自己创作的反对战争暴行的版画，那些令人难忘的黑白相间的画面表现出慷慨激昂和愤怒的感情，即便与戈雅② 的《战争的灾难》相比，也毫不逊色。他的反战版画，公认是竖起了一块纪念碑。这位刚毅的男子汉日日夜夜不停地在死木头上雕刻出新形象和新画面，他那狭小的工作室和厨房堆满了木头块。每天早上《报页》登载他的版画，它发出的控诉，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国家，而是控诉我们共同的敌人：战争。我们梦想：飞机向下投的是宣传品，是一些任何人甚至文盲都能看懂的恐怖的战争场面的版画，投向城市和军队，而不是投下炸弹。我甚至相信，这种用版画谴责战争，可能提前消灭战争。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版画只能刊登在那份小报《报页》上，它的影响几乎超不出日内瓦的范围。我们所谈的一切，做的一切都在这个狭小的瑞士方圆内，再说现在也刚刚起作用，可是太迟了。我们的内心并不欺骗自己，我们对军事参谋部和政府机构的庞大机器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之所以不迫害我们，是因为我们对他们还不构成威胁，认为我们的言论

①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军官、殖民者，1519 年他率舰队在圣胡安·德·乌卢阿登陆后，焚毁全部船只，以示征服墨西哥的决心。

②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1746—1826），西班牙画家。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他以法国士兵枪杀西班牙起义者为题材创作了题为《战争的灾难》铜版组画。

只不过是说说而已，我们的影响也始终不能得以发挥。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数确实太少，十分孤立；这样，我们互相肩并肩、心贴心地团结在一起。我在成年以后，还没有体验过像在日内瓦那段时间深厚热烈的友谊。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不是从艺术家的角度看），在这些人中间最引人注意的角色是昂利·吉尔波，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他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规律：在天翻地覆的突变中，尤其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在短期内，勇气和冒险往往比人的内在信念和稳定的品格更起作用，比人的内在价值和坚持正义的勇气更发挥作用。每当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和汹涌翻腾的时候，总有一些善于赶潮流的人毫不犹豫冲到浪尖上，他们像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时代的浪花把他推到他们的才智所不能胜任的位置，像贝拉·库恩① 和库特·艾斯纳② 那样的人物。刚才说到的一个人物叫吉尔波，他有一双机警不安的灰色眼睛，金黄色的头发，瘦弱而能说会道的矮个子男人，并非是一个聪明人。十年前，尽管他曾把我的一些诗译成法文，可是我不得不真诚地说，他的文学水平微不足道。他的语言能力没有超出一般的水平，他的修养也不深。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政治论战上。他糟糕的性格，是属于那种无论什么事都必须“反对”一通的人。他清楚地感到，如果他是个真正的浪人就会到处寻衅，去攻击任何一个比自己

①贝拉·库恩（1886—1939），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领导人，1919年是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主要领导人。

②库特·艾斯纳（1867—1919），德国记者，巴伐利亚社会党领导人。

强的人，他这样做认为是件乐事。虽然他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心肠的人，在战前他已经不断和文学界的某些人物进行论战，反对某些个别倾向。以后他又参加了激进的党派，可是他觉得哪个党也称不上激进。现在，在战争中他终于成为一个反军国主义者，找到自己的巨大对手：世界大战。大多数人正处在恐惧和怯懦之中，而他却以疯狂的蛮干方式投入战斗，这使他在世界面前显得特别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恰恰是普通人害怕的事反而吸引着他，那就是冒险。别人不敢做的事，他自己却做了不少，这样以来使这个摆弄笔墨的人突然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把他的写作和蛮干夸大到他自己的本来水平——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现象。这种现象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主义者的温和派——中的小律师和小法学家身上看到。当其他人保持沉默，当我们犹豫不决再三踌躇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断然行动起来了。吉尔波留下的不朽功绩，是他创办和领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反战刊物《明日》，这是每一个想要了解那个时代各种思潮和各类人物必须查阅的文献。他给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在战争中他提供了一个国际主义的——超国家的——讨论中心。罗曼·罗兰给予他的支持使这份刊物名声大振，因为罗曼·罗兰凭借自己的声望和他与外界广泛的联系，从欧洲、美洲和印度请来编辑人员；另一方面，当时正在流亡的俄国革命家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吉尔波的激进立场也很信任，并定期为《明日》撰稿。因此，在世界上有十二个月或二十个月之久，还没有一份杂志像它那样令人感兴趣和不受官方支配。如果这份杂志能够延续到战后，也许它对公众舆论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呢。吉尔波在瑞士还同时代表

法国的激进小组，因为克雷孟梭不准他们在法国发表言论。他在著名的昆塔尔①和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②上他起了很大的历史作用，坚持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在两次会议上同蜕变为爱国主义的社会党人分裂开来。在战争进行期间，在巴黎的政界和军界认为没有一个法国人，甚至在俄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沙杜尔上尉③也没有像这个身材矮小满头金发的吉尔波令人害怕和憎恨。最后，法国情报机构蓄意陷害他的阴谋终于得逞了。他们在伯尔尼的一家旅馆里，从一个德国特工人员的房间里偷走了一些吸水纸和几份《明日》，这些东西无非说明，有些德国单位订购几份这个刊物——这件事本身是无罪的，由于德国人一丝不苟的精神，查得这几份是某些图书馆和公务机关要求订阅的。这样，巴黎当局把此事当作足够的借口，把吉尔波说成是德国收买的一个鼓动者，并对他进行起诉，他缺席被判处死刑——这完全是违法的。像以后的事实证明，十年以后在一次复审中被撤销了。但是这个案件发生不久，由于他的激烈和极端的行动，渐渐危及到罗曼·罗兰和我们大家，他与瑞士当局发生了冲突，被当局逮捕和监禁。直到列宁大笔一挥将他的国籍

---

①昆塔尔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人第二次代表会议，1916年4月24日至30日在瑞士昆塔尔村举行。

②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即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1915年9月5日至8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宣言，确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和“保卫祖国”的口号。

③雅克·沙杜尔上尉（1881—1956），法国军官，法国社会党员，1917年作为法国军事使团成员被派往俄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加入俄共（布）法国支部，参加了红军。他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法国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1924年他回国时宣告无罪。

改成俄国公民，他乘坐第二趟封闭的列车到达莫斯科，才算把这个人彻底救了。列宁本人对他颇有好感，并且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帮助他们是很感激的。现在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因为他觉得，在莫斯科他够一个真正革命家所具备的全部功绩，坐牢如被缺席判处死刑，给了他第二次创业的机会。他在日内瓦的时候，在罗曼·罗兰的帮助下，这次他到莫斯科依仗着列宁的信任，才能在建设俄国时有所作为。在另一方面，在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由于自己在战争时刻的大胆举动能够在议会或政府中谋一重职，虽然所有的激进小组都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有作为、有勇气的人，一个天生的领导人。可是，实际上证明他不是一个具备领导素质的人，仅仅像许多战时的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样，是一个来去匆匆的时代过客，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他突然会升得高高的，最后还是要垮台的。吉尔波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论战者，在俄国也像在巴黎一样，他的小聪明全用在争论不休、摆弄是非上，逐渐和那些尊敬过他勇气的人终于闹翻，其中首先是列宁，然后是巴比塞和罗曼·罗兰，最后是我们大家。他开始时不声不响，他的终结也是同样不声不响，他晚年只写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册子和无关紧要的争论文章。在他被赦免以后，他在巴黎的一个角落无声无息地死去了。这位在战争中最勇敢、最冒险的反战者，如果懂得时代赋予他的机遇，并充分利用这次机遇，那么他一定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伟人之一，而他今天已被人全忘记了，我可能是没有完全忘记他最后几人之一，因为我对他在战时创办了《明日》一事永怀感激之情。

几天以后我从日内瓦返回苏黎世，去商谈我剧本的排练问题。这座城市位于苏黎世湖畔和群山的荫影之中，由于它的风

景秀丽，所以我格外喜爱它。当然也由于它的高雅和略微保守的文化，特别引人注意。可是，由于和平绿洲瑞士处于交战国的包围之中，所以苏黎世不再那么安宁了，成了欧洲最著名的不夜城，成为各种思想运动的集中地；当然也是所有老谋深算的生意人、投机商、间谍和宣传鼓动人员最理想的集中地。由于他们突然看中了这个城市，所以当地的居民对这些来客持有十分正确的怀疑态度……在饭店和咖啡馆里，在有轨电车里和大街上听到人们说各种语言，到处可以碰到熟人，有你喜欢的或不喜欢的熟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顿时陷入激烈的争论之中。因为来这里的所有人都是被命运驱逐来的，人人对战争的结局都万分关切。有些人肩负着自己政府的使命，有些人是受自己政府的迫害和驱逐的。但，不论是谁，每个人都脱离了自己原来的生活，被抛到这里来碰运气。由于他们大家都没有家，所以始终与同伴呆在一起。由于他们没有权利，所以他们对政治事件和军事事实没有任何影响力，他们可以一天到晚争论不休。这种毫无意义狂热式的讨论，一时能引起人的兴趣，同时也能引起人的乏味和厌恶。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离开家他就会憋不住地大说而特说；如果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之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连素质平平的人——例如我说过的那个吉尔波——也会捷足先登兴趣盎然的全力以赴。操各种语言、抱着形形色色不同观点的作家和政治家都云集在这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①

①阿尔弗雷德·赫尔曼·弗里德(1864—1921)，奥地利新闻工作者，1911年因他为和平奔忙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在这里出版了他的《和平瞭望台》；前普鲁士军官弗里茨·冯·翁鲁[1] 在这里向我们朗诵他的剧本；莱昂哈德·弗兰克[2] 在这里创作了激动人心的小说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3] 的《战争中的人们》在这里引起轰动；弗朗茨·韦尔弗尔来过这里朗诵他的作品；而我却在这里当年歌德和卡萨诺瓦下榻的古老的施韦德旅馆里会见过不少各国人士。我见到过俄国人，他们在革命以后才渐渐露面，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见到过意大利人，意大利天主教教士和社会党的强硬派人士以及主战的德国社会党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瑞士人当中，有大名鼎鼎的莱昂哈德·拉加茨神甫[4] 和诗人罗贝尔·费齐[5]。在法国书店里我遇到我作品的译者保罗·莫里斯；在音乐厅里我遇到指挥家奥斯卡·弗里德[6] ——所有遇见的人，都是来去匆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各种言论，有最荒唐的，也有最富理智的，有的人说话垂头丧气，有的人则趾高气扬。各类期刊纷纷创刊，各种论战广泛进行。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并不断激化。各种小组织，有的正在组织，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苏黎世度过的日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晚上（因为人们热烈的讨论一直到贝

---

①弗里茨·冯·翁鲁（1889—1970），德国作家，作品有《决战之前》《家族》等。

②莱昂哈德·弗兰克（1882—1961），德国小说家，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集《人是善良的》（1917）、《市民》（1924）、《卡尔和安娜》（1927）等。

③安德雷阿斯·拉茨科（1879—1943）。奥地利剧作家和小说家，代表作是1917年的反战短篇小说集《战争中的人们》等。

④莱昂哈德·拉加茨（1868—1945），瑞士新教神学家，苏黎世教义神学教授，1913年起为社会民主党人。

⑤罗贝尔·费齐（1883—1972），瑞士日耳曼学家，作家。

⑥奥斯卡·弗里德（1871—1941），德国作曲家、指挥家。

莱菲咖啡馆或奥德翁咖啡馆的灯火熄灭为止，有时，还要到别人的寓所继续讨论），所见到的人是如此的多种多样，所听到的意见是如此的五花八门，人们的精神是如此的集中，讨论问题是如此的热烈，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的。在这个令人着迷的世界里，没有人去看此处的风景，也没有人游山玩水，享受温柔的和平生活，而是在报纸、消息和谣言中，在各种分歧的争论中渡过日常的时光。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只是精神上经历这次战争，可是都觉得在这里的感觉比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里的感觉要深刻得多，这是因为在中立国里看战争更客观，完全不受胜利或失败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的影响。这里的人不再用政治观点来看待战争，而是用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能改变的，不只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就是世界的模式和前途。

在这些人中间最使我感动的是那些没有祖国的人，或者是比没有祖国的人还要不幸的人，即他们不是没有祖国，而是有两三个祖国，他们自己心里不知应该属于哪个国家——仿佛当时我就感到自己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在奥德翁咖啡馆里的一角，常常坐着一个蓄着褐色小胡子的男子，他孤零零坐在那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英国诗人。几天后我认识了这位诗人。当我见到詹姆斯·乔伊斯时，他非常直率地向我说，他与英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爱尔兰人。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不用英语思考问题，也不想用英语想问题。当时他对我说：“我想，要有一种超越一切语言的语言，这种语言服务于大家。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此我不受传统的束缚。”他说的

这句话，我不完全明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正在写他的小说《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这本书借给我看，这是他仅存的一本样书，还把他的剧本《流亡者》借给我看，当时我还想把剧本翻译出来，为的是帮帮他的忙。我认识他的时间越久，他非凡的语言知识越使我惊奇不已。在他那圆突形的前额后面装满全部词汇和习语，他用极娴熟的技巧把各种词汇和习语交织地搭配在一起，组成组合词；他的前额在电灯光下像瓷器一样闪闪发光。有一次，他问我，《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一个组合词组成的句子怎样译成德语。我们试着用意大利语和法语才将它译出来。他小说里的句子，都是由习语中的四五个词组拼出来的，甚至还有方言土语拼合而成，别人看不太懂，可他对词的色彩和含义的细致差别分辨得极清楚。在他身上总有一点愤懑怨恨的情绪，但我认为，恰恰是这种愤慨情绪才促使他的内心产生激情和创作力量。他对都柏林，对英国，对某些人的憎恨情绪在他的心中已变成巨大的能量，并从他的创作中释放出来。看起来，他好像喜欢无情的面貌，我从未见过他笑，或者是高兴。在他的身上总有一股抱成团的阴暗力量，每当我在大街上遇见他时，他总是紧闭着狭窄的双唇，老是那么快步走，好像正往一个特定目标赶去。这时候，我就觉得比在我与他谈话时更显示出他那离群索居的性格和内心的孤独。所以后来我完全不奇怪，恰恰是他写的那些充满孤独感，与尘世间之事毫无联系的作品，像陨石般地坠入我们的世界。

还有一个在两国之间过着两栖生活的人是费鲁乔·布索尼，他生在意大利，也是在意大利受的教育。成人后他选择了在德国生活。我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是我最喜欢的大演奏家。当他演奏钢琴时，他的眼睛放射出一种奇妙的、梦幻的光辉。他

的双手在下面轻盈地弹奏着，充分体现他的技巧娴熟，而他那颗才华横溢又好看的脑袋微微向后仰，若即若离地倾听着自己演奏的乐曲，好像自己创作的乐曲又融化到自身之中似的，他突然感到好像一股艺术升华似的。在音乐厅里我像着了魔似地不断注视着他那张白里透红的脸面，同时他的琴声使我内心异常激动，琴声跌荡起伏，又如银铃般的清澈浸入我的肺腑。这时，我重新又注视他一次，发现他头发已灰白，眼圈里藏着悲哀。有一次他问我："我属于何方人士？如果我在梦中醒来，我知道，我在梦中说意大利语，如果我写作时，我就用德语进行思维。"他的学生遍及全世界。——"现在也许有一个学生向另一个学生开枪"——他本来想创作歌剧《浮士德博士》，但由于他感到心烦意乱，而不敢动手写。只写了一部轻音乐的小独幕剧，只是为了解脱自己的苦恼。在战争时期，乌云不会从他的头上消失。我很少听到他洪亮欢快的笑声，这种笑声我以前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天深夜我在车站饭店餐厅看见过他，当时他一人已喝了两瓶葡萄酒。我从他的面前走时，他向我喊："麻醉一下吧！"接着，他指着酒瓶说："这不是喝酒！只不过是麻醉自己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总不能使人一直陶醉下去，而创作欲只有在美好的时光里才会来临。"

但是，两种精神矛盾的情景对阿尔萨斯人是极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在他们中间最最不幸的要算雷内·席克勒那样的人，他们心向着法国，可是用德语写作。在他们祖国的周围战火纷飞，他们的心好像被刀剖成两半。有人把他们拉向右边，又有人把他们拉向左边；强迫他们承认德国或承认法国；他们十分厌恶这种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择。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希望德国和法国成为兄弟，相互理解，而不是敌视，为了达到

这个目的，他们忍受了许多痛苦。

在他们周围还有一群茫然不知所措的人，就是那些混血儿。一个英国妇女和一个德国军官结婚生的孩子，法国妇女和奥地利外交官结婚，诸如此类的异国通婚家庭，儿子在敌对两边服役，父母盼望天各一方的来信；有的家庭，在这里仅有的一点财产被查收，原来的职务在那里丢失。支离破碎家庭的所有成员尽其可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嫌疑，因为他们不论在自己的祖国还是在对方的新故乡都一样受到怀疑。他们在惧怕中，尽力避免给亲人造成麻烦，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像幽灵一样，悄悄走路，生怕自己的生活条件被毁坏。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把自己看得越是欧洲化，就越会被要砸烂欧洲的拳头打得粉碎。

在这期间，《耶利米》上演的日子日益临近。后来，演出的效果非常成功，《法兰克福报》以告密的形式向德国国内报道说，美国的公使和协约国的几位知名人士也观看了演出，这并没引起我多大的不安。我觉得战争已经打了三年，德国内部越来越虚弱，反对鲁登道夫的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已不再像当初威风凛凛的作孽时刻那样危险。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战争总会有个结局吧。可是，我不想在苏黎世呆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因为我的目光逐渐变得更清醒、更机警；所以我不想在苏黎世再呆下去。我刚到达苏黎世时，我怀着满腔热情，原以为在所有的和平主义者中间和在反军国主义者的中间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能够找到有决心促成欧洲和解的真正战士。但不久我就发现，在那些装扮成流亡者和坚守信仰的殉道者中间夹杂着一些阴暗人物，他们是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劳的，接受它的雇用，去

监听每一个人，去监视每一个人。这个安静又正派的瑞士已经证明，每个人凭着自己的经验也能作出判断，瑞士已被两个阵营的秘密情报人员像鼹鼠打洞似的破坏了。倒纸篓的女工，女电话接线员，行迹可疑的、彬彬有礼地服务于旁的旅店招待，都在为一个敌国服务，甚至有的人，一个人为两国一起服务。箱子被秘密打开，吸水纸上的印迹被秘密地照像，信件在途中或邮局里不翼而飞；在旅馆大厅里花枝招展的妇女们向每一个男人纠缠不休发出令人讨厌的媚笑。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些特别热情的和平主义者，突然登门拜访我们，要求我们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或者假惺惺地来索取那些“可信赖的”朋友的地址。还有一个“社会党人”请我到瑞士西部拉绍德封小镇给工人们作一次演讲，报酬高得叫人生疑，而那里的工人们对此毫无所知。真是处处得小心提防。没有多久，我终于发现，我们认为绝对可靠的人真是凤毛麟角；由于我不愿意卷入到政治漩涡中，所以我的交往圈子越来越窄。更何况，甚至在可靠人的家里，那种无休止的毫无结果的争论，我也感到无聊极了；再加上那些激进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不同政治的小组的人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的这种奇特现象，更使人无法忍受。我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如何正确地观察一位典型职业革命家的形象：他对反对党的任何小事都持反对的态度，他觉得这样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死守这个教条。因为他本身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立场。我觉得继续留在充满扯不尽的空谈混乱环境里，就意味着自己的头脑也混乱起来，与他们同流合污，会危害自己信念的道德力量，于是我就离开苏黎世回国了。实际上，所有在咖啡馆里策划谋反的人没有一个人敢于真正地造反；即兴凑合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如

需要政治的时候，却没有一人懂得政治是怎么回事。在战后开始建设的时候，他们会立刻起积极作用。他们还是抱着吹毛求疵、诸多指责的消极态度，正像当年的反战作家一样，在战后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能写出一部重要的作品。因为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他们的创作与政治与无休止的争论联系在一起，他们追求的是当时的地位，而不是一种共同的思想。一旦战争结束，反战运动也随之结束；而那些有兴趣的、有才华的人组成整个反战阶层亦悄悄的消散了。那些小团体当然也不会存在。战争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

在离苏黎世约半小时路程的吕施利孔，我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家小旅馆，从吕施利孔的小山丘上，能够眺望整个苏黎世湖，只是显得又远又小，还可以看到城里教堂的塔尖。我在这里只需要会见我的几个知心朋友。到这里来的有罗曼·罗兰和马塞雷尔。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无情消逝的时间。美国的参战，使那些被蒙住眼睛、被本国空话震聋耳朵的人顿时猛醒，看来德国的失败在所难免。德国皇帝突然宣布说，从现在起实行“民主”管理国家。我们知道德国的形势非常严重，警钟已经敲响。我坦白地承认，我们奥地利人在语言上在思想意识上同德国人是相通的，也变得不耐烦，巴不得在所难免的事快些到来。曾经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威廉皇帝终于逃亡出国了。曾经为自己要达到“和平胜利”而葬送了几百万生命的鲁登道夫戴上蓝色墨镜偷溜到瑞典。他出走的那一天却带给我们许多宽慰。因为我们相信——那时整个世界都像我们一样——随着这次战争的结束，战争就永远结束了。蹂躏我们这个世界的人面兽心的坏人都已被制服，或者统

统被杀死。我们深信威尔逊① 的伟大纲领，好像也是我们自己的纲领似的。当俄国的革命还是以人道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欢庆自己蜜月的日子里，我们看到了曙光。我们知道，当时我们有点憨直。只不过我们有点傻。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回想到，在所有城市的街道上热烈欢呼威尔逊，把他当作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福音的救世主；也都会想到敌对双方的士兵互相拥抱和亲吻的情景；在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深信不疑的信心。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一个去建立正义和博爱王国的空间。我们现在就梦想，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共同的欧洲。过去，我们经历过地狱般的生活，现在我们还怕什么呢？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开始。因为我们还很年轻。我们对自己说：未来世界是我们的，而这个世界是我们梦想的一个更美好的、更人道的世界。

①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 28 届总统。

回到祖国奥地利

从逻辑的观点出发，我在德奥联军崩溃以后返回奥地利是最愚蠢的。当时的奥地利还笼罩着早年皇朝专制主义的阴影，在欧洲的地图上还是一块捉摸不定、单调的、毫无生气的地方。捷克人、波兰人、意大利人、斯洛文尼亚人都把自己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奥地利剩下的只是残缺不全的，好像是全部血管都流着血的躯干。在那六七百万不得不自称是“德意志族奥地利人”中间就有二百万人拥挤在首都维也纳，他们在那里受冻挨饿。过去能使国家富强的工厂是设在现在属于外国的土地上；铁路线只剩下可怜的地基；国家银行储备的黄金全部用来赔偿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家周围的边界尚未划定，因为和平会议刚刚开始，要承担的责任尚未最后确定。国内没有面粉、没有面包、没有煤炭、没有石油等供应。看来一场革命

不可避免了，或者要经过一次灾难来解决。按照所有世俗的预见，由战胜国人为制造的国家是无法独立生存的——所有的政党，各种社会主义的、教会的、民族主义的政党都异口同声地喊着这种腔调——看来这个国家也不愿意自己独立存在下去。据我所知，出现这种悖理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强迫一个国家独立，而它竭力拒绝这么做。奥地利的愿望是，要么和那些分割出去的邻国重新合并，要么和有同一民族关系的德国统一成一个国家，而绝不能像现在这样在被肢解的状态下过着一种屈辱的乞丐式的生活。而它的邻国则不愿意与奥地利保持经济联盟，一则因为这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因为他们害怕哈布斯堡皇朝的复辟；至于同德国联盟是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意看到德国由此变得更强大。所以协约国的明文规定：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并存下去。对一个不愿意存在下去的国家竟下了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下去！"——这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稀奇事。

在我们的国家最困难的时期，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自愿回到祖国，至今我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战前成长起来的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国家处于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属于自己的家庭。我认为，贪图安逸，逃避眼前发生的悲剧局面，是一种懦弱行为。我觉得——我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有责任，用自己的言论帮助克服因战败带来的困难。我似乎觉得在战争进行期间我好像是多余的，而在战争结束后，反而我找到了正确的位置。尤其因为我曾竭力反对拖延战争，而赢得一定的社会声誉，特别在青年中间影响最大。再说，即便我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但是我能和他们一起去共同经历苦难，是

我所预见的这种苦难，至少算是小功一件吧。

当时，返回奥地利的准备工作就像到南极探险一样复杂，必须穿保暖的衣服和毛线内衣，因为大家都知道过了边界那一边就没有煤了，冬天也快到了。还要备好皮底的鞋子，因为那边只有木底鞋；尽量带些食品和巧克力，瑞士方面允许带多少就带多少，以备在拿到第一次面包票和黄油票之前不致于饿肚皮。托运的行李还要保险，只要保险费能承担得起，就得保险，因为大多数行李车都会遭到抢劫，不保险，丢一只鞋，丢一件衣服是不能赔偿的。十年以后，我去俄国那次也做了这样类似的准备。我乘车到了布克斯边境车站，一年多以前我很高兴地驶进这个车站；这次我下车后在站台上踌躇片刻，我问自己，在这最后时刻，是否返回瑞士为好。我觉得，这是决定我命运的关键时刻。最后我决定，去迎接艰难困苦，我重又登上列车。

一年前，我到达瑞士的边境车站布克斯时，确实兴奋了一阵。而现在，在回国途中经过奥地利边境站费尔德基尔希时，也确实惊讶了一阵。我刚下火车，就发现边境官员和警察明显的表现出局促不安。他们对这些旅客并不特别注意，过境检查也十分草率，显然他们在等待什么重要事情。最后钟声敲响，有一趟从奥地利方面开来的列车缓缓驶来，警察在站台上各就各位，工作人员从小屋里急忙出来，他们的妻子也纷纷拥向站台，显然是事先通知的。在这些人群中，极引人注意的是身着黑色服装、带着两个女儿的老妇人，从她的仪表和服饰上看，显然是贵族。看起来她很激动，正在用手帕擦眼睛。

列车徐徐地、我认为是庄严地驶过来。这是一趟极特别的列车，完全不像那些日晒雨淋褪了色的普通车厢，而是黑色的宽大的豪华车厢。火车头停住了，列队等候的人群明显有点激

动，我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猛的发现，从车厢窗户的玻璃上反射出一个我认识的身影，高高站立着的卡尔皇帝。他是奥地利的最后一个皇帝，他身后是穿黑色服装的齐塔皇后。当时我呆若木鸡，统治奥地利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哈布斯堡皇朝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最后一个皇帝要离开他的帝国了！虽然他拒绝正式退位，但是奥地利共和国要他离开奥地利，允许他离开时仍然享受原有的礼遇，或者说，这是经过他多次的强烈要求才答应的。此刻，这位身体高大、面容严肃的人正站在车窗前，最后看一次自己国家的山水、房屋和自己的臣民。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历史性的时刻，我备受震撼。因为我是在帝国传统中长大的，我在学校里唱的第一首歌是颂扬皇帝的歌；以后我服兵役，曾面对着此刻穿便装、严肃而又沉思的年轻皇帝发过誓："愿与领土、领水、领空共存亡"。现在目睹此景，我更是感慨万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庆典上见过奥地利老皇帝，那种豪华场面在今天早已成为神话般的传说。我曾在申布龙皇宫里看见他从台阶上走下来，他身后簇拥着皇室成员和穿着闪闪发光制服的将军们，接受维也纳八万学童的宣誓效忠。他们整齐地站在绿色宽阔的草坪上，齐声高唱海顿的《上帝哺育歌》。我也曾在宫廷舞会上，在戏剧预演时见到过老皇帝，那时他穿着金光闪闪的礼服。我还在伊施尔草场看到老皇帝戴着施蒂里亚人的帽子驱车打猎。我也见过他排在圣体节的行列里，虔诚地低着头，缓缓地向斯提凡教堂走去——而在那个雾茫茫湿漉漉的冬天，我终于看到他的灵车，正是大战期间，人们把这位年迈的老皇帝埋葬在卡普泰陵园。"皇帝"这个词，我们这些普通百姓的理解是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体现，是奥地利永存的象征。我们从孩提时起就学会了以无比敬畏心情说皇帝这个词汇，而现

在我却眼望着皇帝的继承人，奥地利最后的一个皇帝被驱逐离开自己的国家。哈布斯堡皇室的光荣帝国，代代相传了数百年，在这最后一分钟里表明寿终正寝了。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以悲惨的心情回顾这段历史和世界的历史。站台上的宪兵、警察和士兵尴尬地站在那里，略感羞耻地在一旁观看，不知是行军礼好呢还是不敬礼好。妇女们都不敢正视，也不敢说话，所以当听到那个伤心的老妇人低沉的呜咽声时，不觉一怔。老妇人觉得，有谁会知道，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还是再看“她的”皇帝一眼吧。最后火车司机发出开车的信号。每个人都像从睡梦中惊醒，那一去不复返的一秒钟已经开始。火车头猛一抖动，好像它必须这样用力似的，列车缓缓开出了。铁路工作人员恭敬地目送着列车，渐渐远去，他们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回来的每个人都露出送葬时那种悲哀窘迫的心情。延续了近千年的皇朝这一瞬间才算真正结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地方，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

那趟特殊的列车刚刚消逝在远方，就有人叫我们从洁净明亮的瑞士车厢换到奥地利的车厢。如果要想知道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要一踏进奥地利车厢便会知晓。列车员走起路来慢悠悠，面部憔悴，好像饥不饱腹，衣衫破旧；穿破的制服顺着柳肩周围飘来飘去。车厢玻璃窗上用来拉上拉下的皮条已被割掉，因为每块皮条都很珍贵。就是座位也被盗贼的匕首和刺刀破坏得不成样子；整块软垫皮面被野蛮的整个割走，可能是想用它补自己的鞋子，只要是皮革，都被割走。同样，车厢壁上的烟灰缸也都不翼而飞，因为上面镀着铜和镍。深秋的冷风穿过破碎的玻璃窗，从外面呼呼吹来，夹杂着劣质褐煤的

烟雾和炉灰；当时的火车头都烧褐煤，烟雾和炉灰把车厢的地板和四壁都熏黑了，我觉得这股烟雾的臭气总比那股碘酒的刺鼻味好些，而碘酒的味道总会引起人的回想，回想到只剩一个骨架的车厢在战争期间曾运过多少个伤员。不管怎么说，只要火车能向前开，就算是一种奇迹，尽管是一种折磨人的奇迹。只要听到缺油的车轮发出稍微刺耳的嘎吱声响时，我们就非常担心超负荷的机器会失灵停摆。过去跑一小时的路程，现在需要四五个小时。黄昏时刻车厢里已经黑下来，灯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找东西，只能点火柴向前摸。车厢里的人并不觉得冷，因为从开始起就是六个一堆或八个一伙地挤着坐在一起。可是刚到前一车站，就挤上一些人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因为所有这些等了几个小时的人都已经十分困倦。车厢中间的过道也挤得满满的，甚至在车厢之间的脚踏板上都蜷缩着人，也顾不得这时初冬的夜间气温。另外，每个人都十分留心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紧紧地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须臾不敢离手。我从和平环境乘车仿佛又回到战争的恐惧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

车快到因斯布鲁尔克之前，火车头突然嘭哧嘭哧喘着气，尽管呼呼冒气、气笛长鸣，也无法爬上这个小山坡。如果等一台辅助机车，需要一个小时。到萨尔茨堡还需要十七个小时，而不是平常的七小时。在车站上远近都没有搬运工。最后多亏几个衣着破旧的士兵帮我们把行李搬到一辆马车上，可是那辆出租马车的马，又老喂养的又差，如其说是马驾辕，倒不如说是马靠在辕木上才站得住。我再也没有勇气，将我的箱子放在马车上，让那匹像鬼怪似的马拖着走，于是我把箱子存在车站行李房，当然我会十分担心，怕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战争期间我曾在萨尔茨堡买了一栋房子，因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于对战争的看法相背而疏远，我心里盘算着，不想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避免同那些过去的朋友晤面。后来，我的工作也需要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我认为萨尔茨堡在奥地利所有的小城市中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地理位置也最为理想。因为它位于奥地利的边陲，坐两个半小时的火车就可以到慕尼黑，五个小时到维也纳，十个小时到苏黎世或威尼斯，二十小时到巴黎，是通向全欧洲的真正出发点。当然，当时它还没有举办过各种艺术节，使自己成为“群英荟萃”的艺术名城（但到夏季雅士淑女云集于此），它仍是一个古朴的、待开放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城镇（否则，我不会选此地作为我的工作地点），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余脉的山麓，阿尔卑斯山脉的峻岭和山岗在这里和德国的平原自然相连。我买的那栋房子坐落在郁郁葱葱的小山岗上，是这座巨大山脉的最后一支余脉上。汽车开不到那里，只能沿着一条已有三百年历史的一百多级台阶的崎岖山路爬上去。当你从山岗房子的平台上鸟瞰山下塔尖林立的城市屋顶和山墙门窗的迷人景色时，你攀登向上的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山岗后面是绵延不断的气势磅礴的阿尔卑斯山的全景（当然也能望见贝尔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萨尔茨山，不久，当时一个毫无名气的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对面）。我住的那栋房子富有浪漫色彩，但并不实用，是十七世纪一个大主教狩猎的休息行辕，周围是坚固的城堡围墙；到了十八世纪末在主房的左右各扩建了一间房子；主房里有一幅精美的老式壁毯和一个绘有图画的九柱戏球。一八〇七年弗朗茨皇帝访问萨尔茨堡时，曾亲自用这个球在这个行辕的长廊里打倒了九柱戏的柱。这所行辕里还保存几张写有各种基本权利的羊皮纸，

它们是已往辉煌历史的见证。

这座行辕——由于它的门脸宽大而显得华丽壮观，但厅室不过有九间，因为不能向后延伸了——那是一座结构奇特的古建筑。后来，宾朋来访问我时，无不为这所建筑而感叹。可是在当时，行辕历史的悠久却不是件好事。我们发现这个家几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答答落进房间里；每次下雪以后，满门廊里全是雪，把屋顶彻底修理一下是不可能的，木匠没有修房椽的木头，白铁匠没有白铁皮而无法修理房顶的沟槽。最大的漏洞只能用油毡纸修补一下，如果再继续下雪，除非到屋顶上去把积雪扫掉，别无办法。电话也常常和人作对，因为它的导线用的是铁线代替铜线。任何一点小东西都必须由自己从山下运到山上，山上没有人供应。但是，最使人受不了的是寒冷，因为周围远近都没有卖煤的，庭院里的树太新鲜，燃不起来，发出嗞嗞像蛇的叫声，不是在燃烧，而是冒着白沫，发出爆烈的声响，在困难中救急的东西是泥煤，它总能发出一点热量来。但是冬天里有三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用被子围着自己，用冻得发紫的手指写我的文章，每写完一页，把冻僵的手指放在被窝里暖和一下。在那个灾难之年，不仅食品和燃料全面匮乏，住房也相当紧张，凡能栖身的地方都被看作是宝地。奥地利已有四年没有盖房子；许多房子因破旧而倒塌，而大批无家可归的退役士兵和战俘突然蜂拥而至，以致每间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户人家。管理委员会已经到我家来了四趟，我们也自愿交出两间房子来，不过我们的房子又破又冷，当初我们对这栋房子不满意的看法，现在看起来起了好的作用，谁也不愿意爬上一百多个台阶到这里来受冻。

那时，我每次进城都能碰到令人震惊的事，我第一次亲眼

目睹严重的、危险的饥荒。面包干瘪成黑色，一股霉变味道；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麦磨成的；啤酒是黄颜色的水；巧克力是染色的沙粒；土豆全都冻坏了；为了不至于忘掉肉的味道，大家都饲养起家兔来。有一个小伙子为了在星期天改善一下生活，到我们的园子里来打松鼠，养得稍胖一点的狗猫之类，它们走得稍远些就很少能够回来。衣服料子实际上是加工过的纸，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们的衣服几乎都很破旧，还穿着俄国人军服，是从仓库和医院里弄来的，甚至是死人穿过的衣服。他们穿的裤子是麻袋做的，不在少数。街道上的陈列窗被洗劫一空。墙上的泥灰像疮痂一样剥落下来，路上的行人明显地营养不良，强挺着身子去工作，看到这些，使我心神不宁。平原地区的营养状况较好一些。在道德风气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农民也不按法定的“最高价格”出售，而是高出几倍的价格出售自己的黄油、鸡蛋、牛奶等。凡是能贮存的食品，他就把食品贮存在仓库里，等待买主找上门来以好价钱卖。因此，不久就出现了一种新职业：“囤积居奇”。有些无职业的男人，带着一两个背包，到农民那里挨家挨户收购食品，甚至乘火车到那些特别有利可图的地方非法收购，再拿到城里以高出原价四至五倍的价格出售出去。开始农民很高兴，他们用鸡蛋和黄油换来了那么多的钞票，像流水般淌到自己的家门，并把钞票“攒起来”。可是，当他们带着满满的钱皮夹到城里买东西时，他们发现要买的长柄镰刀、铁锤、饭锅等的价格已上涨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卖的食品只多五倍的价钱，他们愤怒了。从这时起，他们就决定以食品换工业品，等价交换，以物易物。人们刚从战壕里爬出来，就有幸重温穴洞时代人的生活，重又摆脱了流通了千年的货币交换，返回到原始人的以物易物的交换，这种荒诞的交

换方式开始遍及全奥地利。城里人将农民需要的物品送到乡下供应他们，像中国的大花瓶和地毯，剑和猎枪，照相机和书籍，灯具和装饰品，换回等值的食品。所以，当你走进萨尔茨堡一户农家，就有一尊印度菩萨凝视着你，你会感到很惊奇，或者看到一个洛可可式的书柜，放着一些法国皮面书，它们的新主人特别自豪，沾沾自喜。“真正的皮面精本，法国的！”他们鼓着双腮，夸耀地说。要物不要钱已成为大家的口头语，为了吃饱肚子，不得不拿下自己的结婚戒指和身上的皮带去换吃的东西。

最后，政府部门为了制止这种实际上对拥有食物的人十分有利的黑市交易，进行了干预。各省之间都设立了关卡，没收铁路上和骑自行车的“囤积居奇者”的货物，把它交给各城市的食品供应部门。囤积居奇者也模仿美国西部片走私的方式，组织夜里运输或者贿赂那些自己家里有挨饿孩子们的检查人员，用此办法进行走私。有时候囤积居奇者用手枪和大刀进行搏斗强行通过关卡。那些走私的小伙子们经过前线的四年磨练，动刀动枪十分熟练，在平地上逃跑时也会利用军事上自身保护的多套动作。这种混乱局面一周比一周严重，因此居民们感到越来越不安。因为人们明显感到，货币一天比一天贬值。邻近几个国家用自己的货币代替奥匈帝国的货币，兑换老“克朗”的亏空，或多或少转嫁给了贫穷的奥地利。老百姓对货币不信任的第一标志是硬币不见了。因为用铜或镍铸造的硬币抵不上自身的价值，还是纸币方便，造价也低。国家虽然开足马力印钞票，即便接照魔鬼靡非斯特的办法造出尽可能多的人造纸币，依然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于是，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小镇，甚至一个村庄都开始印刷自己的临时钞票，只在自己这个

地方用，到其他地方就不能使用。后来证明这些临时钞票毫无价值，干脆扔掉了事。如果有一位国民经济学家先把奥地利的，以后把德国的通货膨胀的各个阶段清楚完整地描写出来，我会感觉到，其紧张惊险的程度超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混乱局面越来越离奇。一件东西一会儿就不知道是什么价格，物价随意飞涨。在一家及时涨价的店铺里，一盒火柴要高出另一家店铺的二十倍，只因为这家店铺的主人老实诚恳，心肠不黑，还是按头一天的价格出售。众人为了报答店主的忠实可靠，人们奔走相告，大家都奔来这店买它的货。不到一小时，这家店铺的货便销售一空。不管自己是否需要，买到手就好。当时的人们要物不要钞票，即便是一条金鱼，或者是一只旧望远镜，它们总是“物”。最荒唐是房租了。政府为了保护租房人（他们是广大群众）的利益，不准提高租金，从而损害了出租人的利益。那时，在奥地利租一套中等大小的公寓套房，一年的房租还不够一顿午饭的钱；这就是说在奥地利全国有五年或十年时间差不多等于白住房（因为后来连解除租房契约都不准许）。由于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使得社会风气一周比一周更加荒谬，更加道德败坏。出于爱国热忱而把自己节俭了四十年的积蓄买了战时公债的人顿时成了乞丐，借债的人逍遥法外，全都不再还债。谁要是遵守分配用粮制度，谁就会挨饿；只有那些厚颜无耻、胆大妄为的人，才能填饱肚皮。凡是善于行贿的人，皆鸿运亨通；投机倒把的人，大发横财。凡是按批发价出售货物的人，他的货物就像抢夺似地被抢购一空；那些精打细算的买卖人总是上当受骗。在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期间，再也没有规范、尺度和价值可言。道德已不再存在，唯有一条准则：投机取巧、随机应变、无所顾忌。在这个混乱时代，只有跳上那匹飞驰的骏马，

而不是被它踩在蹄下。

另外，当奥地利人在价值发生急剧变化中失去任何规范的时候，有些外国人看到在我们这里可以混水摸鱼。在通货膨胀期间——通货膨胀已持续了三年，而且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国内唯一能保持价值的东西是外币。奥地利的克朗放在手中像液体一样容易流失，极易贬值，所以人人争着想要瑞士法朗和美元。有相当可观的外国人充分利用这种经济状况，吞噬奥地利克朗抽搐的躯体。奥地利这块肥肉被外国佬“发现”了。一种灾难性的“外国旅行旺季”出现了。维也纳所有的大旅馆都住满了那些吞食腐尸的秃鹫。他们见什么买什么，从一只牙刷到一座农庄。他们把私人的收藏和古玩店的古董收购一空，直到古玩店主恼怒地发觉自己像遭到了一场浩劫为止。瑞士旅馆的看门人，荷兰的女打字员都住进了环行大道上的几家大饭店的贵宾客房。这种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我可以作为一名目击者对下列事实加以证明：在萨尔茨堡的那家著名豪华旅馆，欧洲旅馆，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全部租给了英国的失业者，他们有充足的失业救济金，因为在这里住，能过上比老家贫民窟更便宜的生活。没有不透风的墙，奥地利的生活费用和便宜的物价——这是指用外币买——消息逐渐传开，越传越远。从瑞典、法国又来了一群一伙儿的贪得无厌之徒。在维也纳市区里，讲意大利语、法语、土耳其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比说德语的人要多。甚至德国也利用自己坚挺的马克对付奥地利贬值的克朗，因为开始时，它的通货膨胀率比奥地利低得多，德国抓住了这个时机。萨尔茨堡是边境城市，这就给我提供一个最好的机会，来观察每天过路的掠夺大军。成百上千的巴伐利亚人从附近的村庄和城镇涌入这座小城。他们在这里让人给做衣服，修理汽

车，他们到药房里去买药品，找医生看病。慕尼黑的一些公司向国外寄信或打电报，都到奥地利来办，因奥地利邮政价比德国低得多，从中可以占便宜。后来，德国政府终于决定，建立边防检查站，以制止所有的必需品不是从本地商店购买而是从价格低廉的萨尔茨堡购买的，也是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最后，一马克在萨尔茨堡可顶七十奥地利克朗用。德国海关严格执行，从奥地利来的商品一律没收。但有一种商品无法没收，就是喝进肚子里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亚人每天都拿着市场行情表仔细核算，由于奥地利克朗的贬值，看看在萨尔茨堡的酒馆里用同样的价钱是否能喝上比家里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想不出比这个更大的诱惑了。于是成群结队的人带着妻儿老小从费赖拉辛和赖申哈尔越境过来，为的是享受一下奢侈生活，灌满一肚子啤酒，肚子能容纳多少就喝多少。每天晚上，火车站就成了酩酊大醉、狂喊乱叫、打饱嗝儿、呕吐不止的酒鬼们真正的魔窟；那些喝得不省人事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时用来运箱子的手推车，送入车厢，然后火车满载着这群又喊又唱的发酒疯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当然，这些快活的巴伐利亚人没有预见到以后有那么可怕的报复在他们面前即将发生。因为当克朗稳定下来，马克却以天文数字大幅度狂跌下来时，奥地利人也同样从同一火车站乘车过去，在那边也猛喝便宜的啤酒，又重演了一场啤酒闹剧；只不过方向变了。这两个国家由于通货膨胀而形成的啤酒战是值得我特别回忆的往事之一。也许因为啤酒战从一个角度形象又荒诞地把几年来全部神经病式的现象揭露得淋漓尽致。

最奇怪的是，我今天竟然记不起那几年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怎样安排的。当时在奥地利维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需要花费几

万和几十万克朗，在德国则要数百万克朗，可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更使人神秘不解的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么多钱，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我们也适应那种混乱的局面。一个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外国人，从逻辑推理上讲他一定会想象到：一个鸡蛋在奥地利的价钱相当于过去一台豪华汽车的价钱，后来在德国的价格竟高达四十亿马克——几乎相当于过去柏林的全部房屋的地皮价。从感情方面出发，这样的事情人们怎么也想不通。也许人们还会这样想：妇女们披头散发在大街上疯狂地匆匆而过，商店里一片荒凉，货架上空空，什么也买不到；特别是剧院和娱乐场所全都空空荡荡。但是，令人不胜惊奇的是，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人们要求生活的连续性远远超过货币的稳定性。在金融的混乱中，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受干扰地继续下去。但是，个人的变化却非常大，富人变穷了，因为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钱，由于大量印刷钞票，使货币贬值，存的钱也大大贬值。而投机倒把者却富了。地球像飞轮一样一直按自己的节奏在旋转，从不停顿，从不关心个人的命运。面包师在烤他的面包，鞋匠在缝制皮靴，作家在写书，农民照常种地，列车正点运行，每天早上报纸照常准时送到门口；那些娱乐场所、酒吧、戏院天天爆满。因为，恰恰是以往最稳定的货币现在天天在贬值，是无法料及的；所以，人们现在更重视实际生活——工作、爱情、友谊、艺术和自然——的真正价值。在苦难之中的整个民族生活得比以往更有生气，更具活力。小伙子和姑娘们到山里漫游，回家时脸已晒得黝黑。舞厅里的音乐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厂和新的商店到处在兴建。连我自己也不敢想，那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竟比以前更富有朝气。过去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现在觉得更重要了。我们在奥地利，在混乱的那几年里，反而更喜爱

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譬如说，我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从来没有忘记过去看歌剧。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前进，由于缺煤而限制路灯照明。看歌剧要拿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的座位票，这些钱在战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里没有暖气，观众要穿着大衣看戏，并且可能靠紧邻座的人彼此取暖。过去男人穿笔直的制服，女人穿贵重的长裙，在剧场里交映成辉；而现在是一片灰色，既单调又灰暗！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个星期是否还继续演出。如果货币继续贬值，而运来的煤只够一个星期用的话，那么这座富丽堂皇、豪华的皇家剧院，将显出一片绝望的毫无生气的景象。乐队演奏员坐在乐池里，穿着破旧的燕尾服，也是一片灰蒙蒙的景象。他们的身体虚弱，生活用品匮乏，个个显得精疲力尽。在那个阴森森的大厅里，我们这些观众变得也像幽灵一样。当指挥举起指挥棒，前幕渐渐拉开时，出现在我面前的场景从未有过的那么精彩。每位演员，每位演奏员无不竭尽全力演出，因为他们都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演出。我们这些观众都集中精神，细心聆听，从来没有这样过，因为我们也觉得，恐怕是看最后一次歌剧了。我们大家，成千上万的人都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我们每个人不管是还有几个星期、几个月或者几年，甚至是片刻，在最后崩溃之前也要尽到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心中感觉到像当时那种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生存，继续活下去。

不过，尽管如此，要我向别人解释，被洗劫一空、贫穷的、多灾多难的奥地利当时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我真不知道说什么

好。当时，在奥地利右边的巴伐利亚已经建立了共产主义的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左边的匈牙利在贝拉·库恩的领导下成立了布尔什维克；至今我还想不通：多灾多难的奥地利怎么没发生革命。当时在奥地利并不缺少枪炮弹药，街道上到处游荡着半饥饿的、衣服褴褛的复员士兵，他们愤怒的望着那些靠战争和通货膨胀而发横财的暴发户过着可耻的奢侈生活。在兵营里已有一个“红色卫兵”组织，他们正在准备起事，而且他们也设有对立的组织。当时只要有二百名坚决成事的人，就能拿下维也纳和整个奥地利。可是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唯一的动乱是一些不守纪律的人企图闹事，被五十个武装警察轻松地平息下去了。所以，奇迹却变成了现实：这个能源被切断，工厂、煤井和油田处于停工的国家，这个被抢劫一空，依靠着雪崩般地下跌和失去价值的货币维持的国家终于保持下来了，坚持下来了——也许因为它太虚弱的缘故，因为老百姓太饥饿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不可能去进行什么斗争；不过，还有自身的原因：天生的善良性格——奥地利人民极神秘的、典型的心理力量。因为奥地利最大的两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两党之间固然有很大的分歧，却在最最困难的时期共同组织了联合政府。两党都作了妥协，以防止出现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的灾难后果。社会秩序逐渐得到整顿和治理。而且发生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奇事：这个被肢解的国家依然存在着，甚至在以后希特勒向这个坚强无比忠诚的民族征募兵员时，它曾下决心准备起来捍卫自己的独立。

不过，从外表和政治意义上讲，这个国家始终没有被推翻，实际上，在战后最初几年，在它的内部一场巨大革命正在发生。军队里的许多规矩随着战争失败而告终。如，我们从青年时代

接受的教育认为权威人士不会犯错误的信念破灭了。又如，难道德国人还应该敬佩他们的皇帝？而正是他们自己高喊发誓要战斗到"最后一息"，而战败时则偷偷摸摸逃出自己的祖国。难道还应敬佩那些军队首脑、政治家和那些写"战争"和"胜利""困苦"和"死亡"的诗无休止地进行押韵的诗人吗？当战争的硝烟从国土上消失，而现在的国土满目疮痍时，人们才觉得战争的可怕。在英雄主义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杀戮，在合法征用的名义下，所进行的四年抢劫，这种道德观怎么会被看作是神圣的呢？国家把公民应尽义务中的一切对自己不利的条款任意取消，那么国民怎能信任国家的许诺呢？而现在正是这些人，即所谓有经验的那些原班人马干出了比战争这件蠢事还要愚蠢的事：他们缔结的和约是相当拙劣和草率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在当时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这种和平显示不出那种最大的正义的历史事实。威尔逊认识到这种历史事实，他以十分丰富的想象力，为世界各国实行真正持久的和解提出一项具体的计划。但是，那些原来的老将军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利益获得者却把这个伟大的计划撕毁了，把它撒成毫无价值的碎纸片。威尔逊曾经向千百万人许下伟大而又神圣的诺言：这次战争将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种许诺只不过是从那些半绝望、半衰竭和丧失信心的士兵身上唤出最后的力量；这种许诺，为那些利润巨丰的军火商和战争狂热的政客们所抛弃而分文不值。表面上他们对威尔逊的明智、人道的要求表示积极的支持，可是幕后仍然全力推行秘密谈判和签定密约的故伎，并且获得成功。带着明亮的眼睛看世界的人都觉得自己被骗了，牺牲了自己孩子的母亲们觉得受骗了，回到家乡沦为乞丐的士兵受骗了，所有购买爱国战争公债的人受骗了，每个相信国家许诺的

人受骗了，我们所有梦想一个新的、更美好有序的世界的人全都受骗了。我们终于知道，这是旧伎重演，那些原来的铤而走险者和新的铤而走险者把我们的生存、幸福、时间和财产作为那场赌博——战争——的赌注。如果整个年轻一代怀着愤慨和鄙视的心情审视先是战败尔后又获得和平的父辈，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搞糟了吗？难道不是他们一点也没预见到吗？难道不是他们把一切都算计错了吗？如果新的年轻一代从此失去了任何尊严，他们会怨恨和鄙视自己的父辈，不是很容易理解吗？整个年轻一代人，他们不再相信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老师；他们对国家每项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战后的一代毅然决然抛弃了迄今为止的一切旧观念，摆脱了一切传统的束缚，决心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告别旧的过去，朝气蓬勃地走向未来。随着青年一代的觉醒，一个崭新的世界开始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秩序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已经开始了。当然，不言而喻，开始的时候不免有些过火：凡是与青年一代不同龄的人或事统统在被破除之列。那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不像以前跟随父母去旅行，而是男生女生一起以“候鸟协会”① 会员的名义在国内旅游，还去意大利和北海旅行。学校里仿效俄国的榜样建立了监督老师的学生会。“教学计划”被彻底废除，因为孩子们喜欢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纯粹由于造反的兴趣，对任何有效的规章制度，他们都要造反，甚至违背客观自然法则，造男女永远有别的反。女孩子剪短了头发，剪成“小男孩的发型”，从外表上看，分不清

①候鸟协会是一个徒步旅行的组织，1910年由德国卡尔·菲舍尔发起，后传入奥地利。

是男孩还是女孩；青年男子为了显示出女孩子的媚气，把胡子刮得净光；男子之间的同性恋和女子之间的同性恋，不是出于自身的欲望，而是作为一种对传统的合法的、正常的恋爱关系的一个反叛而盛行。每一件现实生活表现的形式都竭力染上激进的和革命的色彩，艺术当然也是如此。新的绘画宣告，伦勃朗、贺尔拜恩和委拉斯开兹所创作的一切作品都已过时，并且开始了一种最粗野狂乱的立体派和超现实主义派绘画的实验。音乐中的旋律，肖像画中的类似性，语言中的可领会性，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原则都被他们摈斥在社会之外。德语中的冠词“der，das，die”不再用，句子的结构颠倒过来用，采用“简明扼要”的电报文体进行写作，再用上色彩强烈的感叹词。除此之外，没有积极意义的每种文学作品，即缺乏政治理论的文学，统统被扔进垃圾箱。他们在音乐创作固执地寻找一种新的调式和一种节拍分开的新方法。建筑学中采取了一种由里向外的建房程序。舞蹈中，华尔兹不见了，只剩下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时装方面特别强调裸露的原则，使服装越来越荒唐。在剧院里，穿着燕尾服演《哈姆雷特》，试图引起爆炸性的戏剧效果。在各个领域中开始了一个大胆的试验阶段，试图一蹴而就，超过以往的一切既成事实、变化和成就。一个青年人越年轻，他学习的就越少，与传统的联系就越少，就越来越受到欢迎——青年一代人终于成功地向我们父辈的世界进行了大报复。可是我反而觉得，在这场狂欢节式的疯狂中，既可悲又可笑的事莫过于在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惊慌失措的窘态，他们害怕自己被别人超过而变得“无足轻重”。毫无疑问，他们在绝望中不得不装出一副敢干硬拼的假面孔，试图迈着笨拙的步履，一拐一拐地跟在后面，走入最明显不过的歧途。老实、厚道、胡须

灰白的大学教授，在他们卖不出去的“静物写生”画上再画上象征性的立方体和六面体，因为年轻的校长们（他们到处物色年轻人，越年轻越好）认为所有这些画太“古典主义”，要从画廊里清除出去，放入仓库。用完整又清楚的德语写了几十年的作家，他们也跟着潮流把句子写得支离破碎，以“积极精神”违反语言规律。因肥胖行动迟缓的普鲁士枢密顾问在台上讲授卡尔·马克思的学说。上了年纪的宫廷舞女裸露着三分之二的身体，“僵直”地扭动着身体，跳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和勋伯格的《升华之夜》。老人们情绪纷乱地到处追逐最时髦的装束，使自己变得“年轻”。他们总想迅速找到永不过时的流尚，一天比一天时髦，最好隔夜就翻新，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虚荣心所致。

这是一个多么野蛮、混乱无序和难以置信的时代啊！在那几年里，奥地利和德国的货币极度贬值，它们的一切价值观一下子下滑到低点。这是一个极端兴奋极其眩晕的时代，是急躁和狂热交织在一起的时代。一切疯疯癫癫和无法检查的东西，如通神学、神秘学、招魂术、梦游症、人智学、手相学、笔相学以及印度的瑜伽功和巴拉塞尔士的玄学，它们都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种麻醉品——吗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具有刺激性的东西，十分畅销。戏剧作品充斥乱伦和弑父的题材。在政治方面，唯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合乎他们需要的极端主题。任何正常和适度的东西全都遭到摈斥。但是，在我一生中，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我可不愿意失去混乱时代的时间。在每次思想革命兴起之时革命运动总是不顾一切地向前猛冲，思想革命荡涤了旧传统令人窒息的空气，消除多年的紧张气氛。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大胆实践毕竟起到宝贵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对他们的过激作法有些惊愕，但是我们

没有任何理由去责备和傲慢地否定那个时代。因为，从根本上说，年轻的一代试图弥补我们这一代人由于谨小慎微和漠不关心所耽误的一切——尽管他们做得有点过火，有点急躁。他们内心深处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他们认为战后的时代就应不同于战前的时代，这是一个新时代，一个美好的世界——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所盼望的吗?很显然，就是在战后我们这些较年长的人再次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未能及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对抗世界上新危险的政治伎俩。虽然还在和谈时期，以长篇小说《火线》而获得世界声誉的昂立·巴比塞就试图本着和解的精神把欧洲所有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那个团体自称为“清醒社”① ——头脑清醒者——要把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起来，誓与今后任何煽动民族之间的仇恨行为作无情的斗争。巴比塞委托我和雷内·席克勒共同领导德语作家小组，这是任务中较艰巨的一部分，因为在德国还充满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愤怒情绪。只要德国的莱因兰、萨尔和美因兹的桥头堡还被外国的军队占领着，要想使有声望的德国人具备超民族主义的思想，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不过，如果巴比塞没有在困难时期丢下我们不管，那么建立一个这样的组织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后来高尔斯华绥以笔会的形式实现了这样一个组织。巴比塞的俄国之行，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使他坚信资产阶级国家和民主不可能促使各族人民建立真正兄弟般的关系，唯有共产主义才能够设想建立全世界人民之间的兄弟关系。因此，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变成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

①“清醒社”是巴比塞于1919年发起组织国际进步文学艺术家的反帝团体。

可是，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做法，因为它必然会削弱我们队伍中彻底变革的激进作法。于是这项本身有意义的计划必然就提前告吹了。我们在争取思想自由的奋斗中，往往因为过于热爱自身的自由和独立，而屡屡遭到失败。

现在只有一件事留在自己的面前：过隐居的生活，安安静静地搞自己的创作。在表现主义者和放纵主义者看来——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已属于业已死亡的旧一代作家，因为我绝不会矫揉造作投其所好，我的早期作品，我自己再也不喜欢，在我“唯美主义”时期写的书，我决定一律不准再版。也就是说，我要重新开始，并且等待着，直到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激荡的浪潮平息下去。我觉得，我这个人不虚荣，有利于我淡泊宁静的心情。由于心情好，我开始写一套系列丛书：《世界建筑师》。为了尊重事实的真实性，我已准备了多年。我怀着完全冷静的心情写了《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样的一些中篇小说。我周围的国家，我周围的世界已逐渐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我不再犹豫；那个我没法过的日子已经过去。我过去所开始的一切，不过是应急作为。现在已经到了我一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现在是实现许诺和考验自己的时候了，或者是彻底地放弃一切的时候了。

又回到世界上

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是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这期间，我是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渡过的。我已经放弃了重建世界的希望。战后的大崩溃、外国人对德国人或用德语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国的货币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决定准备一辈子都呆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了起来，人们重新又吃得饱，又可以重新坐在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去工作。已经没有抢劫活动，也没有发生革命。我生活着，我感觉到自己精力倍增。难道我不应重新尝试一次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外出去旅行？

我还没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小时或者十个小时的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是奥地利人，到了那里是否会被看作“世

敌”，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不让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非要试一试，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了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立刻走进了一家旅馆。守门人递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填上表，门房把表粗略看了一眼，当看到国籍栏内写着“奥地利”这几个字时他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吗？”他问道。我当时想，他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当我作了不否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见到您我很高兴！终于来了一位奥地利人！”这是我在“敌国”看到的第一个表示欢迎的人。再一次证实我战争时期就有过的那种感觉：战争期间所有的煽动和仇恨的宣传只会使头脑一时发热，而从未触及到欧洲真正的群众。一刻钟后，憨厚的门房亲自到我住的房间来看看，看是否服务得周到。他热情地赞扬我意大利语说得流畅，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米兰，我又看到大教堂，在画廊里闲游。在米兰，我又听到了舒畅的充满魅力的意大利歌曲。我在熟悉的街道上漫步，欣赏有点熟悉的异国风光，充分享受这种异国情调。我走到一栋大楼前面，这里挂着《晚邮报》的招牌，使我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杰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在柏林和维也纳我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经常参加博尔杰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许多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于热情的作家之一，他在青年人中的影响很大。虽然他是《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译者，又是德国哲学狂热信徒，但在大战中始终坚持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开始时，他紧密地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后来又同

他分道扬镳。在战争期间我曾经有一个怪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充当调停人。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样一个“敌人”。我并不想直接到他那里去，怕有吃闭门羹之嫌。因此我给他留下了一张名片，并在名片上写上我住的旅馆的地址。当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有人从身后冲到我的面前，一张生动的春风满面的脸庞——正是博尔杰塞。我们只谈了五分钟，就像往常一样的诚恳，也许更加推心置腹。由于他从战争中也吸取了教训，所以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们比以前更加接近了。

这种事件到处可见。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突然向我跑来，也不作任何介绍，死死地把我抱住，吓得我妻子还认为这个满脸胡须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这一切都像战前一样，比战前更为诚恳。我舒了一口气，战争已被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但是战争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在善意的希望中我们都常常欺骗自己，而且把我们的思想与世界的思想看作是一个东西。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错误而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自己欺骗自己的人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蒙蔽，为了国家的富足而疲惫不堪。实际上斗争已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在战后的最初几天我是那个场面的见证人，我是后来才懂得它的深刻意义。我们在奥地利并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只知道战后失望情绪严重，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布尔什维克的倾向日益蔓延。在每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木炭和粉笔写出笨拙的笔迹：“列宁万岁”的标语，并且还听到过，在战争期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人物宣布与本党脱离关系，又组织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种现象只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

度，只是听听而已。这样一个区区小党能翻起什么大浪来？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党派，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到处都有义勇队员在列队进军；在莱因兰，在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的政党。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暴动，不过每一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没有人想到那些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① 义勇军的红色衣衫，在未来的欧洲发展中，这些法西斯分子都会成为重要因素。

在威尼斯我突然对“法西斯”这个词有了感情上的认识。一天下午，我从米兰来到礁湖岛上那座可爱的小城市。到达后现场上竟没有看到一位搬运夫和任何一艘威尼斯的游船。工人和铁路员工空闲无事地站在那里，双手插在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当时我拖着很重的箱子，环顾四周，我想找人帮忙。我向一位年龄稍大些的人打听，哪个地方能找到搬运工。他遗憾地说：“您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经常罢工，这次是总罢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不过我也没法继续问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习以为常，每当社会党人处于险境时就采用这种最厉害的手段，可无实际效果。我拖着箱子继续步履艰难地走着，直到我终于看见侧边一条河里一个划游艇的人偷偷摸摸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当船驶开时，有好几个人向我的这个船主挥舞拳头，因为他成了罢工的破坏者。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旅馆。住下后，按我的老习惯一定要到外面去走一下，我来到集市广场。广场上极其冷清，大多数商店都已关门，咖啡馆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

①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1860 年率领义勇军推翻了波旁王朝的统治。

两两站在商店的房檐下，好像是等待什么特别的事。我也同他们一起等。不一会儿，等待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从侧面的巷子里有一队年轻人以整齐的步伐急促走出来，更确切地说是急步跑出来，队列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拍唱着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那首《青年之歌》。罢工的群众人数高于这队年轻人百倍，他们在罢工的工人涌来之前，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人群的前面飞奔而过。这支队伍组织严密，怀着大无畏的精神，从罢工的人群中穿行而过。当罢工工人意识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挑衅时，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无法把他们抓住。工人们气愤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也追不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凡是亲眼看到的事始终是一些令人信服的事。现在我第一次明白，我几乎也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它是一股领导的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专门能煽起那些易激动、勇敢的年轻人的狂热，易造成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崇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赞同佛罗伦萨和罗马的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们的看法了。谈到那些年轻人，他们总会轻轻地耸一耸肩膀，认为他们是被人“雇佣来的歹徒”，以讥笑的口吻谈论他们的“魔鬼老头子”。出于好奇，我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的尖锐、简洁、拉丁语文风的文章中同样感到同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会预见到这场斗争一年之后会达到什么样的规模。但是，从那时我就意识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地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在我们欧洲的表面似乎是风平浪静的，可在它的底下潜藏

着危险的暗流，这给我敲起了第一次警钟。当给我敲起第二次警钟也没有等好久。我旅游的新思路强烈地引诱着我，我决定夏天到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能到德国去旅游，是一件颇富诱惑力的事。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直到今天马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全面进行。各次列车都正点到达，旅馆里窗明几净，铁路两旁一片片新房和一座座新工厂拔地而起。到处都在执行无可指责的规章制度，这种规章制度在战前令人讨厌，可在混乱时期却受到赞扬。当然，德国国内仍存在一股紧张的空气，因为全国都在等待着，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几轮谈判中，对德国作为一个平等国家对待还是单纯的作为敌对国对待，希望能够减少战争赔偿，或者最少能够得到真正谅解最一般的承诺。领导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人，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了他在组织方面的杰出才能；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极易遭到致命打击的原料供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及时地（在时间方面他也很有预见性）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而在战后，需要有一个在敌人中间能最机智最富有经验的左右逢源的人物去谈判，这个外交部长的重任自然又落到他的身上。

我到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说："是的，很难找出会面的时间。为了公务不得不牺牲朋友之间的友谊。"他具有能够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很快找到了我们会面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家使馆去拜访，他是从格鲁内瓦尔特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的汽车，所以最实用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坐上汽车可以谈半小时。他的精神集中

力很强，他思维的转换很快，他从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所以他在汽车里和列车上的谈话，事实上就像在他的办公室里说得一样准确和透彻。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而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又是他多年的好朋友来谈谈心，同样也会使他高兴。这是一次内容丰富的谈话。现在我可以证明，拉特瑙还不是一个完全脱俗的人，因此，他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没有什么兴趣和不耐烦的情况下接受德国外交部长职务的。他预先就知道，他接受的任务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只能争取到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十年以后吧，到那时我们这些人身体都不行了。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已离开外交界，那些将军们只留下自己的纪念塑像默默地立在各个公共广场上。"他清楚地意识到肩负着双重任务，他还是一个犹太人。在历史上也许难得有这样的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承担自己的使命。他很清楚，这个使命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他已预示到，这一使命还会给他的生命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① 就是由于承担令人不快的停战协议这个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在接受此项任务之前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德国。从此后，拉特瑙毫不怀疑，作为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相似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不过，他没结婚，没有儿女，孑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有害怕

①马蒂亚斯·埃尔茨伯格尔（1875—1921），德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德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力主接受凡尔赛和约，后被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暗杀。

生命之虞；而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的谈判中表现相当出色，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取得最好的成果，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历史事实。他具备及时抓住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政治家的风度以及他个人的声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有些组织变得很强大。这些人诡计多端，认为只要向战败国的国民声言保证：我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说的次数越多，越能吸引更多的人。那些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势力很大，是当时共和国的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共和国的领导人以自由的观念对那些要把德国的民主永远消灭的人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

我在外交部门前同他告别，当时我万万没想到，这次告别却成了诀别①。后来，我在照片中辨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的那条街，正是不久后暗杀者伏击我们小轿车的那条街，仅仅是由于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的历史事件目击者。所以我对那次事件感到特别痛心，印象更加深刻。随着这一悲剧的过去，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有一天，我到了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快活地游泳洗澡。一支乐队就像宣布弗朗茨·费迪南被暗杀消息那天一样，照样为无忧无虑避暑的人们演奏音乐。送报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样穿过林荫道飞速而来，一边高喊：“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一阵惊慌失措，震撼全德国。马克一下子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计算为止。通货膨胀

①1922年6月24日拉特瑙从家驱车去外交部的途中，被德国国家主义者暗杀。

的混乱局面刚刚开始。我们奥地利货币贬值的比例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是非常荒唐的，现在与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能把马克贬值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都写出来，简直能写成一部书；而这部书在今天的人看来，好似童话一般。我经历了那样的日子：早上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要用十万马克。兑换外币的人不能一下子换完，按时间分几次兑换，因为四点钟兑换的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的多好几倍，五点钟兑换的比价要比四点钟的多好几倍。例如，我给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立刻预付给我一万册的稿费，当支票到手时，其面值还抵不上一周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价以百万计算。帝国银行用卡车向各支行送货币。十四天后，我在排水沟看到一张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是一个乞丐看不上眼扔掉的。当时买一根鞋带用的钱，在过去可以买一双鞋子。不，可以买一座有二千双鞋子的豪华鞋店；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价格比过去买一幢楼的价格还高。一本书的价格，比以前一家拥有数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贵。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柏林主要街道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上一幢高楼整个七层的所有房间。几间工厂的价值不会高出过去买一辆手推车的价钱。几个刚成年的小伙子在港口发现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小汽车兜几个月的风，因为每天只要卖出一块肥皂，就可以生活得像贵族一般。而他们的父母，以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乞丐，处境艰难地到处奔走。送报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厦，他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的佼佼者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的大赢家。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业务，而他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没花一分钱，因

为每一笔钱，每一笔贷款最后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财富，都在他的手中掌握。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对他敬佩备至，甚至把他崇为天才，热烈欢呼。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有，他们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汽车里的外国人挥舞拳头，因为他们把整个街道的东西全买光了，就像买一盒火柴那么简单。凡是能认字的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投机倒把想办法赚钱，不过某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秘密的感觉：大家都在相互欺骗，同时大家又被一只隐蔽的黑手所欺骗，这是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负债和义务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黑手。我对历史了解得很清楚，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与此类相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观都变了，不仅在物质上是这样；国家的法令规定遭到嘲笑；所有的道德规范遭到歧视；柏林成了世界上罪恶的渊薮。酒吧、游艺场、小酒馆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我们奥地利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与其相比不过是在群魔狂舞面前的一次小小的温和的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全部热情和一丝不苟的作风搞颠倒了。穿着紧身胸罩、涂脂抹粉的年轻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大道游来逛去，这帮人不仅是有职业的年轻人，连中学生都想挣钱。在阴暗的酒吧间里，就能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恬不知耻地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甚至在斯韦东① 的罗马也没有见过像柏林这样的舞会上互穿异性服装狂热放荡的场面。上百名的男青年穿着女人的服装，女青年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跳起舞来。在一

---

①斯韦东（公元70？—140），罗马传记作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盛世。

切价值观跌落的情况下，原来的生活秩序并没有波及到市民阶层，这次可不同，也遭受到一种疯狂情绪的剧烈袭击。年轻的姑娘们把不正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当时在柏林的每所中学，如果一个到了十六岁的女孩子还是处女，就会被蔑视为不光彩的。每个姑娘都愿意将自己的风流事张扬出去，把这种风流事说得越热烈越好。但是，这种色情本身最重要的是它可怕的虚伪性。事实上，这种伴随通货膨胀而迸发出德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那些出身正派市民家庭的女孩子，她们宁愿将头发简单地向两边梳，而不愿意梳男孩子那样的光头。她们宁愿用小勺吃苹果饼，而不喝烈性酒。可是，大家每天遇到头疼的事，是通货膨胀像脱缰的烈马飞奔一样，全国人民都无法忍受，人人都神经紧张。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实际上都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整个民族在暗地里都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而是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

凡是经历过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他们都会有这种感觉：事物发展到极限必然产生反弹，而德国正处在这一种可怕的过程中。那些使德国人民陷入乱世中的幕后人物，笑嘻嘻地在等待着，拿着钟表计算着：这个国家情况越糟，对他们就越有利。”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股反革命势力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希特勒当时还未掌权，当然拥戴他的人更少些。那些被人扯下肩章的军官们组织成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们，悄悄地进行联络，并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恢复正常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有灾难性了，即共和国本着理想主义的意图：他既给人民以自由，也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国人民从来是讲秩序守

纪律的民族，所以对政府给的自由不知如何用，所以才急不可待的盼望有人出来剥夺他们的自由。

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当用令人眩晕的大数字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的时候，正是一切都恢复到正常之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泛起的污泥浊水从此迅速消失，酒吧、小酒馆消失了，社会状况日趋正常，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算出，有何所得，有何所失。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群众遭受的损失，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来负，而是要那些以牺牲精神挑起恢复新秩序的人来负——尽管得不到感谢——但是建立新秩序的责任也落在他们的肩上。再也没有像通货膨胀那样使全德国人民变得如此痛恨、如此仇恨、如此充满杀机——这是需要我们永远引以为戒的。因为战争是杀戮人的工具，但人们却以胜利的号角和钟声欢呼胜利的时刻。德国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国家，曾为自己一时的胜利感到无比自豪，可是相反，通货膨胀却使德国受到玷污、屈辱和欺骗，国家的声誉遭到损害。整个一代人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那些苦难的日子，他们不愿受屈辱，宁愿回到大肆杀戮的时代。但是这些事情离我们很遥远。一九二四年，表面上看，那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犹如飘忽不定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新到来，秩序得到恢复。我们的内心感激不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认为，战争永远消逝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又当了一次无药可救的大傻瓜。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时间。

在今天看来,从一九二四到一九三三年短暂的十年时间,是从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攫取政权的这十年,我们这一代人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是自一九一四年所经历过一连串灾难后出现的一段平安无事的安全时期。并不是说这十年里没有发生过一次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危机——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不管怎么说,这十年欧洲和平显然得到保障,仅仅这一点就说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内,德国被光荣地接纳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利用贷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秘密发展军火工业),英国裁减了军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权。世界好像要重新建设自己。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还是战败国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美丽。飞机加快了交通的速度。办理护照的规定已经放宽。货币的比价大幅波动已经停止,人们可以知道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数字,人的注意力不再热衷于那些表面的琐碎问题。人们能够重新正常的工作,能够集中精力去思考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事情。甚至人们在梦想,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欧洲。十年时间,只不过是世界上的一瞬间,重新把一种正常的生活赋予我们这一代经受考验的人。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这是我从未期待的客人,可是它给我带来了成就。不言而喻,对我的书从表面上讲它们的成就,对我来说,我并不愉快。在一般的情况下,我对这些肤浅的说明文章并不在意,对那些自吹自擂的粗略说明我一份也不留。但是,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我是在强迫自己,对自己一生中的历史事实不能保持缄默。因为七年以来,即自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经成为历史。我的数十万册书,甚

至数百万册书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的家庭中占有牢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我的书一本也买不到；要是谁有我的一本书，就要小心谨慎地藏起来。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始终塞到所谓的“毒品书柜”里，极少的情况下，非得经过官方批准——大多数是为了批判辱骂的目的——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我的读者，我的朋友们给我写信时，在信封上早就没人敢写我的真名实姓，我的真实姓名已列入另册。更有甚者，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不得不遵照希特勒的命令，我的书同样遭到禁止。而当年，我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是属于读者最多之列的。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行走的人”；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所创作的一切，或者说是几乎的一切，都被那只拳头击得粉碎。因此，在我谈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说的并非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事先没有指出我在被人推入深渊之前所达到的高度，就无法形象地说明我和其他相同的无数的无辜者以后又被人推落到有多深以及其他的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个文学界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消灭的，我确实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个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它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来到我家的。但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以前，一直忠实地、顽强地与我相伴。我的成就一年比一年高涨。继我的《耶利米》发表以后的第一本书，是我的《世界建筑师》三部曲的第一卷《三位大师》，它为我开辟了道路；在此之前，曾出现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和实验主义者，不论是这

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只要是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人，才能畅通无阻地通向人民之路。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读者的欢迎，达到了平常只有长篇小说才会有的程度。这两篇小说被改编成戏剧，被公开朗诵，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本小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成了所有学校的读物，很快地列入“岛屿丛书”出版计划，印数达到二十五万册。没有几年时间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有一个广大的读者群，有一批可信赖的人，他们都期待着购买我的新书，等待着一本新书的出版。他们信赖我，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我的读者群越来越大，我的书刚出版，在德国第一天的销售量就达两万册，而且在报纸上并没有登过广告。有时我故意避开这种成绩，可是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成就始终伴随着我。为了自娱自乐，我写了一本《富歇传》。我把这本书寄给了出版商，他来信说，立刻要印一万册。我当即回信，请他不要印那么多。我说富歇这个人物是不会给人好感的角色，况且书里也没有描写女人的情节，不会吸引读者，所以最好印五千册。一年之后，这本书在德国就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在同一个德国，现在却不允许人们读我写的一行字。我以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狐疑心情写的一部悲剧《伏尔波尼》也遇到相同的麻烦。我原来的计划要把它写成诗剧，可是我只用九天的时间用散文形式写出各场次，显然这出剧有点松散和肤浅。由于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了我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了一份情，正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我马上就把散文体写的剧本第一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寄奉的只是我打算改成诗剧的散文稿。可是剧院立刻给我来了电报，说对我的剧本不需要作

任何修改。后来，这个剧本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登上世界各个舞台的（在纽约，是由美国著名演员艾尔弗雷德·伦特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的）。无论怎么说，我在那几年取得的一切成就，总是受到日益增长的德语读者忠诚的守护。

由于我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这些作品或人物在它（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何在，我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我在某些思考的过程中，不得不反问自己，我的书怎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究竟它们有什么特点呢。最终我才相信，那是由于有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又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任何一部长篇小说中，在任何一本传记里，和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繁琐、豪华奢侈、晦涩朦胧、不明不白、过分迟缓之处，都使我感到反感。只有那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气读到底的书，才能使我感到完全满足。我发现，我手里有十分之九的藏书描写过多，对话冗长，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写上，面铺得太广，从而使作品显得不紧凑，没有生气，甚至一些经典名著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干扰我的情绪。我曾多次向出版商阐述我那项大胆的计划，把全部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段落，出一套简明丛书。只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发挥生气勃勃的作用。

我对所有的繁琐和冗长所抱的反感，势必会从阅读外国作品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同时也教育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本着这种警惕性，我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书的第一稿，我只是信手写来，但是充满了我内心的感情。同样，在写一部

传记著作时，我首先把一切有用的能想象到的文献中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东尼特》这篇传记作品中，事实上我把每一笔账目都核算过，以便确定她个人的开销；我还研究当时所有报纸和政治小册子，从头至尾仔细地研读了所有的诉讼卷宗。可是在印刷出的书中，却找不到素材里的任何一句话。因为一本书的第一次未定稿刚刚誊清，对我来说正式的写作刚开始。即进行压缩和调整结构的工作；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是一项不间断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练的过程。大多数其他的人总是下不了决心对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去芜存精地写在纸上，反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将所知道的一切再加以扩展；而我的看法是，绝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重要的是了解事物的内情。

这种对作品压缩的过程，也就是使作品更加戏剧化的过程，随之要在长条校样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反反复复的工作成为一种兴趣很浓的猎奇。这个工作，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作品节奏的情况下，尽量地对作品进行删节，哪怕是一个字，甚至是一句话或者是一大段。我的整个创作中，我感到最有趣的就是这种删节工作。我记得有一次，我非常喜欢删节工作，站起来时，我的妻子说我看上去分外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成功地删去了一大段，这样文章更紧凑了。"如果说我写的书被誉为情节紧凑和富有戏剧性，那么这种特点并不是由于我天生的激动或者内心的兴奋，而仅仅是因为我采用了去掉多余的休止符号和杂音条理化的方法。倘若在已写完的一千页文章中，有八百页被扔进纸篓，只留下经删选的精华，我绝不会抱怨的。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具备那么大的影响，那是因为我严格遵循我的原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些，但在内容上必须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我开始写作的意图就是对准全欧，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法国的、保加利亚的、亚美尼亚的、葡萄牙的、阿根廷的、拉脱维亚、挪威、芬兰和中国的出版商，它们纷纷来信同我联系出书事宜。不久，我不得不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容下各种不同译本的样书。有一天，我从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统计表上看到，我的作品是世界上翻译最多的（按我的禀性说，我会认为它是一篇错误的报导）。又一天，我收到了俄国出版社的来信，信中说，该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俄文版全集，并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读高尔基的小说，是偷偷摸摸把书藏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他敬佩他。但是，我从未想到他会知道我的名字，也没想到他会看过我的一些作品。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亲自动笔为我写序，我更是不敢妄想，还问我是否同意。还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像非这样不可——来到萨尔茨堡我的家，建议出版我全部的著作，并保留连续出版权。这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亚明·许布施。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希特勒践踏了欧洲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真正的故乡，失去了德国故乡和欧洲故乡之后，是美国出版商本亚明·许布施为我建造了一个文字情的故乡。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美好的未来，而对自己的能力和作品的效果却想得很少。不管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出名，本身就意味他自然平衡

的状态遭到破坏。在一般的情况下，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标记，犹如雪茄的外层烟叶一样，是一个表面的无关紧要的客体，它与真正的主体本来只有松散的联系。一旦这个名字取得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主体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各种强烈力量的作用下，必须产生出更大的影响力，成为一种左右主体并使主体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人、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的影响。一个头衔、一个职业、一枚勋章或者该人的名字天下扬，就会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更大的自尊和自信，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为了用他们本人的力量达到他们的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大吹大擂起来。可是，一个天生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是自己应尽的责任，不管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责任尽可能地保持不变。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欢欣鼓舞。但是，我认为我的成就仅仅是脱离了我这个主体的产物，已不属于我了。我所著的书以及上面的署名都属于过去的事，与主体的我早就脱离了。偶然间我在德国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很小的一个中学生用一点零花钱买我写的那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这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十分尊敬地把护照交给我时，还有意大利海关人员因读过我的一本书而认出我来，不再对我的行李检查时，我心里也曾沾沾自喜。就是个人的作用日益扩大的时候，对一个作家来说也是相当诱人的。有一天，我到莱比锡去，正巧遇到那天要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我看到我用三四

个月写完了三百页的书，在无意中竟发现有那么多的人花费体力劳动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工人们用大木条箱把书捆包起来，另一些工人们唉哟唉哟哼着号子将木箱抬过来，装上汽车，然后卡车将木箱送到发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里。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和批发商从早工作到深夜。我自己计算了一下，那些书如果像砖块排列起来，就能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马路。我也不是因为自命清高而轻视物质利益。在开始的那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甚至以为靠版税能够维持生活。而现在，我的书给我带来了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这些钱似乎可以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当时谁还会想到我们的时代呢？我还能够慷慨大方地纵情我青年时代的老爱好：搜集名人手迹，有些最精美的最宝贵的圣人遗物在我这里找到了妥善保管的归宿。我能用我写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是相当短命的作品换来的钱，去换取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的手稿。我所要强调的是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成就竟无所谓地或者内心并不情愿地落在我身上，这才是一种可笑的说法呢。

不过我现在说，我出版的书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界内的声誉，足以使我高兴。这是我说的实话。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个人身上，即便取得成就，也会引起我的反感。从我少年时起，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我甚至感到，任何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如果到处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会受到阻碍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写作而开始的事，会变成一种职业的形式，甚至会出现一种企业形式的危险。每天邮局送来大批信件、请柬、通知和要求答复的咨询。每当我外出一个月回来时，就得用两三天时间处理

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以便让“企业”的工作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想这么做，而由于我的书十分畅销，使我陷入忙碌不堪的事务中。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要求我必须井井有条、统观全局、办事准确、工作熟练，这一切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是与我的秉性是格格不入的，这必将严重影响和威胁那种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思考和梦想。所以，越是有人请我到大学讲课，去出席各种庆典，我是一概拒绝而深居简出。我从不抛头露面宣扬自己。我也未能克服几乎是病态的腼腆。直到今天，我还有那种出自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在剧院看戏，总是坐在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抛头露面的位置，让大家盯着我看，更使我难以忍受了。对我来说，各类形式的隐姓匿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总是喜欢穿丝绒茄克衫，烫着鬈发，鬈曲的头发飘落在前额上，或者以奇特胡须式样，穿着与众不同的奇装异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一个想以非常装束使自己闻名四方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的生活变成像韦尔弗尔所说的那种“镜中人”。人的每一个姿态表现无不显示出一个人的风格。过于注重仪表的多样化，那么内在的善良、自由和无忧无虑就消失殆尽。如果我今天还能重新开始，那么我就用另一个名字，一个杜撰出来的名字，用一个笔名发表我的作品，这样我就能够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带来的幸福，又能享受隐姓匿名带来的平静生活。像这样两全齐美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魅力和层出不穷的惊喜。

日落

我很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回想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这一段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也正是搅乱世界的那个人——希特勒——崛起以前的十年。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在十年之前受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所以我们对相对平静的十年看作是一份十分珍贵的礼物。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想法，我们一定要在这十年中，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艰苦岁月从我们生活中夺走的自由、幸福与精神财富；所以我们发愤工作，而心情也非常舒畅；我们到处漫游，试图找到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的世界。人们外出旅游从没有像这十年里那么多。是否青年人忍耐不住急于弥补他们过去由于彼此隔绝所造成的损失呢？在我们重新被禁锢之前，及时冲出这狭小的天地，这或许还包含着一种朦朦胧胧的预感吧？

在那个时候，我经常外出旅行，只是跟青年时代的旅游不可同日而语罢了。现在我在许多国家已没有生疏感了，因为到处都有我的朋友，我的出版人，还有一大群读者。去那些国家我是作为我书的作者去的，并不再像从前那样名不见经传，出于好奇地旅游。这给我带来很多好处。我能够更为有效地、更广泛宣传我多年以来已经成为我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争取欧洲精神的统一。我本着这个信念在瑞士和荷兰发表讲演；在布鲁塞尔的艺术宫我用法语演讲，用意大利语在那座具有十三世纪艺术风格的佛罗伦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厅——米开朗琪罗和莱奥纳多·达·芬奇曾在这里住过——发表演讲。在美洲，在大西洋到太平洋彼岸的一次巡回演讲中我又用英语。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旅游；在那些国家我可以看见该国最优秀的人物，像老朋友似的，不用特意去找他们。而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对他们深怀敬意，却不敢给他们写一个字；而现在，我们却成了朋友。现在我已跻身于那个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门外的社交圈子；我可以在巴黎贵族的圣日耳曼区参观华丽的宫殿建筑和意大利的高级宅邸；我还能看到私人的珍藏；现在我已用不到在图书馆借阅台前求助于人，而是图书馆长亲自把禁止读者看的馆藏珍本拿给我看。我还可以在拥有百万美元资产的古董商那里，如费城的美国著名书籍古董收藏家罗森巴克博士家作客，可是那些小的收藏家们从这家古董店铺前走过时，会不尽羞色满面，而我却是这里的常客。从此，我第一次见识到这个所谓的“上层”世界及这个世界的奢华。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应有尽有，舒适，愉快，举手接物无需向别人请求，所需要的一切自己会送上门来。难道这样的一个世界，在我看来是一个较好的世界吗？不，我依然永远渴望我青年时代那样无人事先等候的

旅行，由于是只身的行动，似乎出现的一切更具有神秘感，所以现在我还不愿放弃过去那种旅行方式。每当我去巴黎，我尽量避免把到达日期通知给罗歇·马丁·杜加尔①、儒勒·罗曼、杜阿梅尔、马塞雷尔这些最好的朋友。我还像大学生时候那样，先在大街上毫无目的闲逛；我重访那些我年轻时候喜欢的咖啡馆和小饭店，让自己重温年轻时代的美梦；如果我想写作，我也是到那些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诺或第戎这样一些远离城市的偏僻小地方。我觉得，当住过那令人厌恶的豪华大旅馆之后，住进小旅馆，无人知道自己的行踪，起居行动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尽管后来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在这十年里按自己的意愿享有充分的内心自由欧洲式的生活，希特勒既不能没收，也不可能从我心中铲除。

在众多的旅行中，特别使我激动和受教益的一次旅行是去新的俄国。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前夕，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当时我作了此行的准备；由于战争流血的场面打乱了我的计划，自那以后，我对去俄国的计划产生了顾虑。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人热烈赞美它，有人疯狂反对它，这两种人都没有真正了解它。从宣传和同样激烈的反宣传中知道，没有人清楚地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人们都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次全新的试验，不管这种试验是善是恶，它们很

①罗歇·马丁·杜加尔（1881—1958），法国著名作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蒂波一家》。

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肖伯纳、威尔斯①、巴比塞、伊斯特拉蒂②、纪德及其他许多人都去访问过这个国家；当他们回来时，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失望。这样反而引诱我要亲自到这个国家去看看得出自己的结论。我这个人的秉性是：在思想上对那些新事物立刻就想了解它。我的书在那里广泛流传，不仅有马克西姆·高尔基为我撰写序言的全集，还有值几个戈比的廉价普及本，在广大群众中流传。显然，我到了那里肯定会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是，仍然存在成行的障碍，因为，当时每次去俄国旅行，就意味着表露一次政治态度；并且要我这个对教条主义和政治性事情深恶痛绝的人，对一个难以预测的国家进行几周一般性的观察之后就表态是赞许或否定；要我对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事先就发表自己的判断。我绝不会做这种违心的事。所以，尽管我有强烈地好奇心，还是下不了决心到苏维埃俄国去。

一九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请信，邀请我作为奥地利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列夫·托尔斯泰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请我在大会上发表贺词。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次机会，因为这次活动是超党派的，从而我的访问也失去了政治色彩。托尔斯泰就是一个非暴力的信徒，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写的那部包括托尔斯泰在内的书，已有数万册在俄国流传，显然我有权谈谈作家托尔斯泰。我还觉得，如果

①H·G·威尔斯（1866—1946），英国科幻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隐身人》（1897）《星际战争》（1898），从1900年起创作了大量社会小说。

②帕纳伊·伊斯特拉蒂（1884—1935），用法语写作的罗马尼亚小说家。代表作有《安格尔舅舅》《阿德里安·佐格拉菲的故事》。

所有国家的作家们都团结一致，共同纪念他们中间最伟大的人物，按照欧洲的思想方法，这无疑是一场重要的示威。那么，我就接受了这次邀请，对这次迅速的决定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这次旅行要穿过波兰，肯定会使我增加不少阅历。我沿途看到，我们的时代治愈自己造成的创伤有多么快。在一九一五年我曾经看到过加里西亚一些城市，当时是战后的一片废墟，而如今已焕然一新。我又一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路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过程中仅仅是一瞬间。在华沙已经看不到交战双方的军队在这里两次、三次、四次激烈战斗的痕迹。咖啡馆里坐着穿得时髦的妇女，十分耀眼；穿着笔挺，身体修长的军官们在大街上散步，外表上很像扮演官兵的皇家剧院的演员。到处都感到一股奋发向上、信心十足和值得自豪的气氛，因为如此兴隆的新波兰共和国是从几百年的瓦砾堆上建立起来的。离开华沙我们继续向俄国边境驶去。大地越来越平坦，沙土地面越来越宽广。每到一个车站，站旁村庄的居民穿着各种色彩的乡村服装站在车站两旁，观看着一趟联接东西方世界的特别快车的洁净车厢，村民们把这些当作盛事。因为在当时，每天只有一趟客车通过这里向那个禁止外人入境封闭的国家驶去。边境车站涅戈洛尔耶终于到了。铁轨上方高高地悬挂着一条宽大的鲜红横幅，上面用西里尔文字写一句口号，我不认识，别人给我翻译说，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从这条鲜红的标语下穿过，踏上了无产阶级的帝国，苏维埃共和国的土地，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当然我乘坐的列车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沙皇时代的卧车，比欧洲豪华的列车还舒适方便。因为车体宽大，行驶速度慢一些，震动小。我是第一次穿越俄国的大地，奇怪的是，我对这片土地并不感到

陌生，觉得一切都那么熟悉，可是广阔、空旷无垠的草原略带一点忧伤；草原上一朵朵小茅舍，矗立着洋葱头形屋顶建筑的小城镇；留着长胡须的、一半像农民一半像先知的男人，用善良憨厚的笑声向我们致意；戴着花头巾、穿着白色短裙的妇女们向我们出售克瓦斯（汽水）、鸡蛋和黄瓜。我为什么早知道这一切呢？因为我读过俄国文学大师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萨科夫、高尔基的作品，他们用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民间”生活。那些穿着白色肥大上衣憨厚的普通男子站在那里，和蔼可亲；列车里年轻的工作人员，有的下棋、有的看书、有的在交谈；虽然我听不懂他们的谈话，但我相信自己懂得这些人说的意思，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具有青年人那种烦躁和不能自控的精神状态，但是他们受到了巨大力量的召唤，所以在他们身上迸发出特殊的活力。如果说，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大众”的爱，他们依然记得并起作用，那么我在列车上就已经对这些单纯的、动人的、聪明又尚缺修养的青年人产生了怜悯之情。

我在苏维埃俄国度过了十四天，这两周过得够紧张了。我又看、我又听、有时赞赏，有时厌倦，有时欢乐，有时生气，就像不冷不热的交流电的电流一样。莫斯科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那里有壮丽的红场，旁边是宫墙和洋葱头形屋顶的建筑，有一点儿鞑靼人的、东方的、拜占庭的奇特风格，这也是古老俄罗斯的风格；在红场的另一端矗立着现代化、超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犹如一群陌生的美国巨人。两者格格不入；被蜡烛烟熏黑的古代希腊正教的圣像和镶嵌宝石的圣坛在暗淡的教堂里影影绰绰地放金光，而离教堂百步远的地方却是一口水晶棺材，里面躺着穿黑色西装的列宁遗体，这里刚刚粉刷过（我不知道是

否因为我们的到来)。红场的一边行驶着几辆闪闪发光的小汽车，另一边却是满脸胡须、满身油污的马车夫轻轻地吆喝着，挥动鞭子驱赶着驾车的瘦小马匹。大歌剧院里灯火辉煌，我们曾在这里发表演讲，在无产阶级的观众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时代富丽堂皇的景象。而在郊外，则是一片老式的旧房子，好像脏兮兮无人照料的老人一样，为了免得跌倒，他们互相紧紧地依靠着。郊外的一切建筑早就老朽不堪、风烛残年，可是，现在想要一下子变成现代化，超现代化。因为这种急于求成，莫斯科人满为患，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不论是在商店里还是在剧院门口，到处是拥挤不堪的人群。由于机构臃肿，所以办事效率很低，到处是等着办事的人群。本应该订出各种“制度”来，可是那些新官僚主义者热衷于批条子发文件，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结果把一切事情都耽误了或者错办了。那次盛大的纪念大会原订六点开始，可是到十点半才开始，当半夜三点我精疲力尽离开大歌剧院时，那些演说者正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我作为一个欧洲人，参加每次招待会或赴约时，总是提前一小时到场。时间就这样从人的手缝里白白流去，但在注视和观察事物时、在讨论问题时，却显得每一秒钟都十分重要。俄罗斯人不论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一种热情；我还觉得，俄罗斯人那种煽动人心的秘密力量会在不知不觉中抓住每一个人，使得他们的精神兴奋、情感和思想无法控制，会炽热地迸发出来。虽然我们无权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和为了何事竟如此激动，但是和社会新变化的气氛有关；也许是俄罗斯的国魂已降落在他们的身上。

有很多事情确实了不起，首先是列宁格勒，这座由胆识过人的诸侯们天才地设计的城市，布局宏伟，宫殿气派。它同时

又是《白夜》中令人压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尔尼科夫① 的彼得堡。沙皇居住的冬宫极其雄伟壮观，里面的景象使人难忘。我们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农民，他们穿着沉重的靴鞋，手里拿着帽子，缓缓地穿过从前皇帝住过的殿堂，就像在教堂里走到圣像前面似的。他们在观看那些绘画时，心中暗含着一种自豪：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要学会懂得这些东西，老师们带领着圆脸蛋儿的孩子们穿过大厅。冬宫艺术的讲解员向那些拘谨的而又专心听讲的农民们讲述伦勃朗和提香的绘画；当讲解到某些画的细部时，农民沉重的眼皮总会抬起来，怯生生地向上看。那种天真的、一本正经的学习精神，似乎有点可笑，可这是认真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因为要想让这些目不识丁的“民众”一夜间就能够懂得贝多芬和维米尔②，这显然是拔苗助长。无论是讲述这些艺术品的一方，还是要求懂得艺术品价值的另一方，双方都性急。孩子们在学校里画的是最简单、最粗糙的东西。在十二岁小姑娘的课桌上放着黑格尔的著作和索列尔③ 的书（当时连我都不知道这个人）；甚至连不大认字的马车夫手里也拿着一本书。仅仅因为这是书而不是别的，书就意味着“教育”，这是新的无产阶级荣誉和义务。他们让我参观那些中型的工厂，并且期待我们会赞扬他们，好像在欧洲和美洲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工厂，我们不得不装出一番笑容。一个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着一台缝纫机对我说：“这是电动的”。然后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我应该大大赞扬他们一

①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

②简·维米尔（1632—1675），荷兰风俗画家。

③乔治·索列尔（1847—1922），法国新闻记者和社会哲学家。

番。因为工人们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产品，所以他们虔诚地相信，是革命，是革命之父列宁和托洛茨基设计和发明了这一切。于是我强打着笑容赞扬一番，而在赞扬的同时又暗自觉得好笑。俄罗斯国家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并且像是一个有才能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们总是这样想而且反问自己：这个国家真的会像它打算的那样迅速地改变旧面貌吗？也许宏伟的计划会变得更加庞大，或者在俄罗斯人原有的奥勃洛摩夫①式的怠倦中变成泡影？我们有时候觉得可信，有时候觉得怀疑；我越看得多，心里就感到越糊涂。

可是，难道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国人身上就没有？难道我们共同纪念的托尔斯泰心灵中就没有？在去托尔斯泰的故居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火车上，我跟卢那察尔斯基谈论过这个问题。卢那察尔斯基对我说："他究竟是个什么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他自己知道吗？他作为一个真正的俄国人想把数千年世界上的一切在他手中来个翻天地覆。"他微笑着补充说道："完全像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种方案改变一切。如果有人把我们称之为有耐性的人，那么这是把我们俄国人看错了。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心灵都是有耐性的，但是我们的思想却比任何民族都没有耐性。我们总是立刻想知道所有的真谛，即'真理'。结果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心里备受痛苦。"是呀，确实如此，当我走过在亚斯纳亚·波尔亚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时，我总有这个想法："这位伟大的人物是怎样自讨苦吃啊。"我看到一张写字台，托尔斯泰曾在这里写下不朽的著作，

①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的名篇小说《奥勃洛摩夫》中主人公。

他写累了，就到隔壁一间很小的房子里去修鞋，修理那些破鞋子。这是一扇门，那是一座楼梯，他正是穿过这扇门，通过那座楼梯，逃离这个家，摆脱他自身的矛盾。屋里挂着一枝枪，在战争中他曾经用这枝枪打死过敌人，而他又是一个反对一切战争的人。就在那栋矮矮的白色庄园里，托尔斯泰的生活矛盾，全部问题强烈地、形象地浮现在我眼前，而令人奇怪的是，我向他的最后安息地走去时，原来的哀思之情渐渐淡薄起来。

在俄国我所见到的再没有比托尔斯泰的坟墓那么伟大和那么更使人感动了。那块高贵的朝圣地坐落在偏僻、寂静之处，被一片树林环抱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通向那个小山丘，这座山丘不过是用土堆成的矩形土山，那里无人看守，也没有人保护，只有几棵大树为它遮荫。在墓前他的孙女对我说，那些参天树是列夫·托尔斯泰亲手栽下的。他同他的哥哥尼古拉童年时曾从一个村妇那里听到一个传说：栽树的地方将是块吉祥的之地。因此他半开玩笑似地种下了一些树苗。以后，老人们到了晚年才突然想起那个迷人的预示，于是他立刻说明了自己的愿望：死后让人把他埋在自己栽下的树林中间。他的后事是完全遵照他的意愿办的，他的坟茔简朴得令人心酸，从而使它成为世界上给人最深刻印象的墓地。一个小小的矩形山丘，上面都是苍天大树笼罩着——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更没有铭文！这位伟大的人物入葬时不留姓名，世上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自己的姓名和荣誉感到痛苦；他默默地被埋葬在这里，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流浪汉或者像一个不知名的士兵之墓。谁都可以踏进他这块永久之地，虽然周围有栅栏，但在人行小路上从来没有封闭过。唯有人们的敬意护卫着这位永远不休息的老人的最后的安息。通常人们总是对陵墓的宏伟壮观深表惊奇，而

这里的坟茔却以出奇的简朴更引起人们的深思。微风像上帝的低语在这座没有名字的坟墓上沙沙作响，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静。人们可以从这里走过，除了知道这里埋着一个人，在俄国的土地上埋着一个俄国人，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无论是拿破仑的墓室在巴黎荣民疗养院教堂里大理石拱门之下，歌德的灵柩与奥古斯特公爵的灵柩都在君王陵寝里，还是伦敦的名人墓地威斯敏斯特教堂，都是表面显赫，但它们的景象都不及这座在树林中的、非常安谧的无名坟茔这样感人至深，因为在它上面风儿微微低语，而坟墓本身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信息。

我在俄国呆了十四天，我始终有这种感觉：他们内心里急于求成和有点朦胧的陶醉感。可是，究竟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激动呢？很快我就获得了答案：因为他们是人，而人总会有热情的冲动。而他们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参加到一个涉及全人类的伟大事业中，他们全部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不得不忍受物品的匮乏和短缺之苦，都是为了一个更崇高的使命。过去他们在欧洲人面前的自卑感，现在变成了高度的自豪，好像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走在别人的前面："光明来自东方"，他们是未来的救世主；他们想的就是这样诚恳和正直；这就是他们所认识的"真理"，别人只能梦想的事情将由他们来完成。如果他们给我看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他们就会眼睛明亮起来："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我们"是指全体人员。替我驾车的马车夫用鞭子指着一幢新楼，张着大嘴笑着说："这是我们自己建的。"鞑靼人和蒙古人大学生向我走来，骄傲地向我展示他们的书，这个说"这是达尔文的书！"那个说："这是马克思的书！"

他们那股神气，就好像书是他们自己写的似的。他们急切地向我们显示他们所有的一切，向我们仔细解释，他们非常感激那些观看他们“事业”的来宾。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们每个人都充分信任欧洲人。他们以善良的、诚恳的目光望着我们，同我们亲切地紧紧握手，像亲兄弟一般。可是，恰恰是这些少数人同时也表现出：他们对我们友好，但却缺乏“尊敬”，因为他们认为，人本来就是亲兄弟，也是同志。我们曾在过去属于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宅第里聚会，不仅有欧洲的作家和俄国的作家，而且还有通古斯族作家、格鲁吉亚的作家和高加索的作家。每一个苏维埃联盟国家都为参加托尔斯泰纪念活动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同他们的大多数人不能互相交谈，但彼此之间明白意思。有时，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站起来，径直向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走来，指着我们一位作家写的书，然后再指着自己的心，意思是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接着他紧紧抓住这位作家的手，使劲握着，并且用力地摇动，好像他高兴地非要把对方的手关节摇散了不可。使人更为感动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带来了礼物。当时还是困难时期，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一点东西给我们留作纪念：一幅价值不高的旧雕版画，一本古老的不能读的书，一件民间木刻。他们给了我一些礼物，我也回敬给他们，我送给他们的是在他们这里早已见不到的，在他们看来价值很高的东西，如，一把吉列特保险刮脸刀、一支钢笔、几叠优质的信纸、一双软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时行李少得不能再少。正是这种不用语言表示的热烈情感，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在这里受到如此宽厚和如此温暖的礼遇，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因为在我们那里还没有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界。每次聚会都有一种危险的诱惑。的确，也

有一些外国作家在访问俄国时经不住这种诱惑，因为他们受到如此隆重的款待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爱戴。他们认为一定要赞扬这个新政权，因为在这个政权之下的人民非常喜欢读他们的书，也喜爱他们本人。礼尚往来，以心换心，本来就是人的本性。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在俄国有时几乎也大唱赞歌，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我的头脑近乎发昏。

我之所以没有跌入魔术般的迷境，如其说是归功我内在的克制力量，倒不如说是一位不知姓名的陌生人的提醒，我以后一直不知此人是谁。那是一次与大学生们的快乐聚会，会后，学生们围着我，拥抱我，同我握手。他们的热情完全感染了我，我以充满快乐的心情望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最后有四五个大学生陪我到住处，这些人之中，就有派给我的那位女翻译，她也是大学生，她什么都翻译给我听。直到我关上旅馆房间的门，我才是真正独自一人，这是十二天来第一次独处，因为在这二十二天里，我身边总是有人陪着，有人围着我，始终被一股暖流推动着。我开始脱衣，把外衣脱下放在一旁，这时我发现上衣有沙沙的纸声。我伸手到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是用法语写的，但不是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定是有人在拥挤时或拥抱时悄悄塞到我的衣袋里。

这是一封没有落款的信，是一封十分精巧和通情达理的信，尽管这不是一名“白俄”写的，可是信中露出最近几年来对自由不断地增加限制的愤懑情绪。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他们向您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他们向您展出让您看的一切，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让您看。您要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他们还没有把真心话告诉您，他们也不敢，只是讲了允许讲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恐怕您受的监视更

多。您的女翻译每天都向上级汇报您说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走一步都有监视。”他举了一系列无法证实的例子和细节。我按照写信人的要求把信烧了。“请您不要撕碎它，因为有人会把纸篓里的碎片拿出来再拼凑起来。”——这时我开始深省一切。我处在诚挚的热烈气氛中，在那非常融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有许多机会私下里同某一个人进行无拘无束的交谈，难道这一次次的私下接触都是假的吗？由于我不懂俄语，无法与真正的老百姓直接接触，更何况只有十四天时间，就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望无边帝国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那么我一定要说，我得到的印象，在细节上是相当动人和鼓舞人的，但从客观上讲，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几乎所有的作家从俄国回来以后，都很快地出版了一本书，不是热烈的赞扬，就是激烈的反对，而我只不过写了几篇文章。我认为我采取这种保留的态度是正确的，因为三个月后，俄国发生的事就不像我看到的那样；一年之后，那里发生的剧烈的变革，当时说的每一句话却被斥之为谎言。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在俄国强烈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暴风骤雨式的变革，是我一生中极少经历过的。

当我返回故乡离开莫斯科时，我的箱子基本上空了。我把能送的东西都送给他们了；他们送给我的东西，我只带回两幅圣像，后来我把它们长期挂在我的房间里，点缀我的房间。不过，我带回来最珍贵的东西，是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友谊。我和他第一次会面是在莫斯科；两年以后，我和他在索伦托再次重逢，他是由于健康受到威胁而去那里疗养的。我到他家作客，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三天。

这次会面真是不同寻常。高尔基不会任何外语，我也不会俄语，按正常的道理讲，我们两人只有默默地相对而坐，幸亏有我们尊敬的玛丽亚·布德贝格男爵夫人在一旁翻译，才得以交谈。高尔基真不愧为世界文学中的一位最有天才的叙述家。叙述不仅仅是他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而且也是他整个天性本能的集中表现。他在叙述时，把自己放到要叙述的事物中，把自己变成叙述的对象。我虽然不懂俄语，可以从他面部表情中明白他的意思。看上去，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我无法用别的词来表达。他脸面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看到这位身体瘦长、头发草黄、颧骨宽宽的人，叫人联想到田里的农民或马车夫或小鞋匠或无人管教的流浪汉等等。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罗斯原型的集中体现者。在大街上人们可能漫不经心地从他面前走过，不会注意他的特点。只有坐在他的对面，听他叙述什么的时候，你这才会认出他来。因为他很快在无意之中就变成被叙述的人。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他在描述游历时遇到一个疲倦、年迈的驼背人时，很自然地把脑袋耷拉下来，双肩下垂，眼神阴郁、倦怠，没有翻译，我已明白了他叙述的是什么。开始叙述时，他精神抖擞，蓝眼睛明亮有神；当他的声音变得颤抖时，他自己不知道，他已变成了那个驼背的老人。如果他叙述一些高兴的事情，他会立刻大笑起来，他轻轻地向后仰着，额头闪着光。听他的讲话确实是一件难以形容的快事，在他讲述的时候，他用熟练的形象动作来体现他叙述的人和物，使其更加生动。他身上所有的一切，不论是走路的姿态还是坐相，以及倾听别人的讲话和十分高兴的时候，都是那么实在和自然。一次晚会上，他乔装成一个贵族，腰间佩带一把军刀，眼神顿时变得威严无比，他眉毛飞扬挺胸收腹，在

屋里来回踱着方步，好像是在考虑沙皇的一道谕旨；可是当他一卸装，他笑得像农家少年那样质朴。他的生命力简直是一个奇迹，他的肺坏了，可他依然活着，这与医学规律是相违背的。但是那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意志和坚强的责任感使他顽强地活下去。每天早上他用清晰的手写体写他的长篇小说，回答他本国的青年作家和工人们提出的成千上百的问题。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像到了俄国，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不是今天和以前的俄国；而是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阔、坚强、深沉的灵魂。在那些年月里，他的内心还是犹豫不决的。作为一个老革命家，他也主张改天换地，他与列宁的个人友谊甚为密切，但他当时也很犹豫是否完全投靠党，用他的话来说，是否成为党的"牧师或教皇"式的权威，他始终感到良心上的压力，因为在那些岁月里，每个星期都有新决定，但那些决定与他这样的人是非常不合拍的。

在那几天里，我恰巧成了那样一种完全是新俄罗斯人的典型场面的见证人，那个场面为我揭开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国战舰在训练航行中第一次驶进了那不勒斯。从没有到过西方世界的年轻水兵们穿着漂亮的制服下船散步，穿过托莱多大街，他们睁大那双好奇的农民的眼睛，看着一切都新鲜，看也看不够。第二天，他们中的一群人决定到索伦托来，来看看"他们自己的"大作家。他们没有事先通知他，在他们俄罗斯人同胞情谊的思想中，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作家会给自己的同胞随时腾出时间。他们突然来到高尔基的家门前，而他们的想法完全正确，高尔基没有让他们等候，就把他们请进去。可是，高尔基第二天笑着对我说，那些青年人在开始的时候对他非常严厉。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公事"高于一切，他们刚踏进这座美

丽舒适的别墅就说过："你怎么住这样的房子，你怎么生活得像资产阶级一样。你究竟为什么不回俄国去?"高尔基不得不向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好在事情顺利，这些老实规矩的青年人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严重。他们无非是显示一下自己的信念。接着，他们毫无拘束地坐下来，喝茶、聊天，最后告别时，他们一个一个地同他拥抱。照高尔基的叙述，那个场面是非常动人的，他对青年一代的轻松自由的处事方式非常喜欢，对他们落拓不羁的作风他一点也不生气。他始终重复说："我们与他们是多么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无比，但从来不能把握自己。"这个晚上，他始终兴高采烈。可是我却对他说："我看你的想法是最好和他们一起回家。"这时他猛地一愣，直瞪瞪地望着我："这，你怎么知道的?说真的，直到最后一刻钟我还在考虑，我是否把一切：书籍、纸张、手稿统统留下，同那些小伙子们一起乘船去航行十四天，这样也许我知道俄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一个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把自己学到的最好的东西逐渐忘记，我们在流亡中还没有一个人为祖国做出过有益的贡献。"

高尔基把在索伦特的疗养生活叫作流亡是不对的。他每天都想回国，事实上他也回去过。他不像梅列日科夫斯基真的被驱逐，书籍被禁止，我在巴黎时曾遇到这个悲剧性的愤懑人物。他也不像今天我们这样的人，按照格里尔帕策的美妙的说法，他和我这"两种外国人都没有祖国"，我们说的是他国语言，无家可归，随风飘荡。真正的流亡者并不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曾在那不勒斯探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流亡者，这就是贝尔代托·克罗齐。数十年来他曾是青年人的精神领袖，他曾当过参议员和部长，在他的祖国享有各种礼仪上的荣誉，一

直到他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和墨索里尼发生冲突，因此他辞去各种官职，隐居起来。这样也不能使那些强权者满意，他们要制服他的反抗，必要时会采取惩罚的措施。那些青年人也变得跟过去大不一样了，他们成了为反动势力随时处处效劳的先锋队。他们冲进他的住宅，打碎他住房的玻璃。但是，有一双大而聪明的眼睛、留着一撮山羊胡子、看起来更像个普通老百姓，一个矮胖人物，他并没有被吓倒。他没有离开他的祖国，虽然他接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他还是留在家里，藏在书堆成的大墙后面，继续办他的杂志《批评》；继续宣传他的思想；继续出版他的著作，他的威望越来越高，以致根据墨索里尼的命令制定严格的检查制度在他面前执行不下去；另一方面，他的学生、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全部被瓦解。不管是意大利人还是外国人要去探望他，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当局知道得很清楚，他在自己的城堡里，即在他满是书籍的书房里，他会无所不谈，直言不讳。所以，他等于生活在一个空气密封的房间里，他在四千万同胞中，就像生活在一只煤气罐里似的。我觉得，在一座几十万人口的城市里，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种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同时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种消灭一个人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后加在我们头上的做法，还是宽容得多的。令我不能不钦佩，这个年迈的老人在每天的斗争中需要如何清醒和多少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却笑着对我说："恰恰是这种反抗斗争使一个人变成年轻人。要是我还当参议员，在精神上我早变得懒散和逍遥自在，我就容易老了。对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危害最大的莫过于缺乏反抗精神。自从我孤身一人，青年人也不再来了，我更需要使自己变得年轻。"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不断升级和强化，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知识，从不是来自别人的经验，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我从未见过意大利的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这应该归咎于我历来不愿意接近政治人物；即使我在我的祖国，小小的奥地利，我也没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如，赛佩尔、多尔富斯①、舒施尼克②。本来我有这样的机会，可是我有意不这么做。我从我的朋友——他们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里获悉，墨索里尼非常喜欢读我的书，是意大利的第一批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由于他曾经满足我首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请求，所以我本该亲自向他致谢。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我接到一封从巴黎发来的快信，信中说有一位意大利妇女有要事到萨尔茨堡来见我，要我立刻接待她。第二天，她来了。她说的事，确实让人震惊。她的丈夫，一个出身微寒的优秀医生，是由马泰奥蒂出钱把他培养成材的。马泰奥蒂这位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野蛮地杀害以后，心力交瘁的世界良心对这种暴行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他这个忠诚的朋友是在当时敢于在罗马大街上公开抬着被害者灵柩的六位勇士之一。但是不久之后，他因为受

①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1892—1934），奥地利政治家，曾任总理和外交部长等职，1934年在纳粹分子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中被杀害。

②库特·冯·舒施尼克（1897—1977），奥地利政治家。多尔富斯被杀后，他继任奥地利总理。他为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反对希特勒的兼并而被德国法西斯分子投入集中营。

到威胁和刁难而出外流亡。而他还担心马泰奥蒂家属的命运，使他十分不安。为了报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马泰奥蒂的孩子们偷偷地从意大利送到国外，可是他们在行动的时候落在密探和破坏分子的特务手中，他也在这次行动中被逮捕。由于一提起马泰奥蒂就会使意大利当局陷入难堪的境地，所以用这样的理由对他起诉，几乎对他构不成大罪。可是，那位起诉官却十分巧妙地与另一件同时发生的用炸弹暗杀墨索里尼的案件联系起来了。于是这位在战地获得过最高奖赏的医生被判了十年徒刑的监禁。

十分明显，他的这位年轻妻子是多么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说，他的丈夫活不过这十年，求我为反对这项判决做点什么，要我与欧洲的文学界名人联合起来，大声地疾呼提出抗议。她请我即刻帮助她。我立刻劝阻她不要提什么抗议。我早已知道，自第一次大战以来，所有这样的公开声明一点用处也没有。我竭力向她说明，出于民族的尊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外部的压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国的萨科—万泽蒂案件① 中，欧洲的抗议完全起了反作用，帮了倒忙。我恳切求她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干出什么傻事来，她这样做，只能使她的丈夫处境变得更糟。因为有人从外部给墨索里尼施加压力，他也绝不能作出减刑的安排，即使他想这样做，也是办不到的。但是，我用诚恳的态度答应她，我将尽量设法帮助她。正巧下个星期我要到意大利去，我在意大利有一些颇具影响的朋友，也许他们能够悄悄地为她丈夫说些好话。

①萨科—万泽蒂案件：萨科和万泽蒂是无政府主义者，两人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尽管证据疑点颇多。1921 年被判有罪，并于 1927 年处死。

我到达意大利的第一天，就开始办这件事。但我发觉，我的那些朋友变得谨小慎微，我刚刚说出那位医生的名字，他们个个脸上流露出为难的神色，都说没有办法，并且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我去找一个又一个。如果我这样地回国，我会十分惭愧，也许那个不幸的女人会以为我没有给她尽力办事呢。可是，我还有一条路没有试一下。现在只剩下一个可能性，那是一条直截了当的，即：给那位掌握生死大权的人，墨索里尼本人写一封信。

这封信我写了，我给墨索里尼写一封十分诚恳的信。我在信中说到——但信的开头我不愿意说一些恭维的话，我开门见山说实事——我不认识这个医生，也不知道他的实情；但是我见过他那显然是无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在狱中度过那么多年，那么，这个沉重的枷锁不也是加在她的身上么！我并不想批评这次判决，而我可以设想，如果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被遣送到某个允许妻儿一起居住的荒岛上，这将意味着对这个女人是救命之举。

我拿着这封写给贝尼托·墨索里尼阁下的信，投入了萨尔茨堡的普通信箱。四天以后，意大利驻维也纳的公使馆给我来信说，墨索里尼阁下让公使代他对我表示感谢，并说，阁下已满足我的愿望，并已缩短刑期。这时，从意大利也来了电报，证明我所请求的改判已经进行。墨索里尼大笔一挥，亲自批准了我的请求。实际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很快被赦免了。在我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像这封信那样给我带来如此的快乐和满足。如果说一个摆文弄字的人能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我怀着感激的心情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这封信。

在风平浪静的最后几年外出旅游是十分愉快的。可是回到家乡看看倒也觉得惬意。在风平浪静之中倒是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萨尔茨堡这座小城市只有四万人口，因为它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位置又比较偏僻，所以我选择此处作为自己的定居之地。这几年里，小城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夏天，它不仅成为欧洲艺术家聚会的地方，而且也成了全世界艺术家的大都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艰难的那几年，为了帮助在夏季没有收入的演员和音乐家摆脱贫困，马克斯·赖恩哈德和霍夫曼斯塔尔曾举办了几次演出，尤其是萨尔茨堡教堂广场上举行那次称为“为每一个人”的露天演出，甚为壮观，吸引了不少邻近地区的观众；后来又在这里试演了歌剧，演出效果很好，越演越好，越演越完美，于是逐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最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和演员怀着好胜的心情一齐涌来，为了能有机会不仅在自己的国内有限的观众面前，而且也在国际观众的面前愉快地表演他们的技艺。萨尔茨堡一下子成了各种艺术节举办的地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各种人民，仿佛成了新的奥林匹克艺术表演场；各个国家都到这里来竞相展现最优秀的艺术成就；也没有人愿意错过观看这些精彩的演出。国王和王公们，美国的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音乐爱好者，艺术家和诗人，还有那些摆绅士派头的人，都在近几年云集于萨尔茨堡。在一个长期不被重视的小小奥地利偏僻的小城，能够把各国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音乐大师成功地荟萃一堂，这在欧洲是空前未有的。萨尔茨堡繁荣起来了。到了夏天，在大街上就可以遇到不少来自欧 洲和美洲的人，为了寻求艺术最高水平的演出；他们到了这里，穿上萨尔茨堡的民族服装，男人穿白亚麻布短裤和短上衣，女人穿阿尔卑斯山“农妇服装”；转眼之间，小小的萨尔茨

堡反而成了领导世界时装风尚的新潮流。在旅馆里，人们争着订房间，去演出大厅的汽车道上一片光彩夺目的景象，就像过去参加皇家宫廷舞会的路上一样，火车站上一直是人山人海，其他城市想方设法吸引这股有钱可赚的人流，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萨尔茨堡在这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地区的圣地。

可以说，我住在自己的城市里，一下子等于生活在欧洲的中心。又是命运满足了我一个自己几乎从来不敢想的愿望。我们那座在卡普齐纳山上的房子，成了我欧洲朋友的落脚处，有谁没有到我们那里去作客呢？我的贵宾登记簿比我单纯的记忆更能说明问题，可是，后来这本登记簿连同这幢房子，还有其他许多物品都落到了纳粹党徒的手里。我们在那里同谁没有度过美好的时光？我们从阳台上眺望美丽的、宁静的景色，可是我们不知道，在对面的贝希特斯加登山上住着一个要破坏这一切的人——希特勒。罗曼·罗兰在我家住过，托马斯·曼也住过，在作家中，我们曾友好接待过H·G·威尔斯，霍夫曼斯塔尔，雅可布·瓦塞尔曼，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房龙，詹姆斯·乔依斯，瑞士德语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弗朗茨·韦尔弗尔，盖奥尔格·勃兰兑斯，保尔·瓦莱里，简·亚当斯，沙洛姆·阿施，阿图尔·施尼茨勒等人；在音乐家中，我们也曾热情接待过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理夏德·施特劳斯，奥地利作曲家阿尔浜·贝尔格，布鲁诺·瓦尔特，匈牙利钢琴家贝拉·巴尔托克。还有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演员、学者，还有谁没到过我家呢？每到夏季，这些人给我们带来许多畅谈文学艺术的愉快和美好时光呵！有一天，意大利世界著名指挥家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拾级而上到了我家，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

谊，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爱和享受音乐。所以有好几年时间我成了他排练时最忠诚的座上客，我不止一次地亲眼目睹他为了达到艺术完美无缺的境地而付出的热情代价。这种一丝不苟的排演，在演出时奇迹般地成功，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他的排练，可以说堪称是模范，不达到完美无缺绝不罢手）。这时，我才觉得莎士比亚说得好："音乐是心灵的养料"。我看了艺术比赛以后，庆幸我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真是我交了好运。夏天的日子是多么丰富多彩啊！艺术与风景交互辉映，使人多么陶醉啊！以后我被迫离开这个家，每当我想起这个小城时，一股惆怅闷闷不乐的感觉涌向心头。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我在那栋房子里经受过寒冷和屋漏的苦楚，想到这些，我觉得国泰民安的那几年在我生活里所起的作用，使我重新又恢复了对世界和对人类的信任。

那几年里，有许多受欢迎的著名人士到我家来，但是在我一人独处的时候，依然有一群高贵的人物神秘地围在我周围，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名人遗墨搜集本里收藏着各个时代最杰出的大师们的手迹。我逐渐把著名人物的踪影召唤来了。我十五岁那年就开始了这种业余爱好，经过几年的探索，逐渐取得了经验，办法越来越多，热情越来越高，从单纯的一般搜集达到科学地汇编水平，所以我才能够说，现在我从事的是一种艺术的工作。开始时，我像所有的新手一样，追求把名字，名人的签名搜集起来；后来出于好奇的心理，便搜集更多的手稿——作品的初稿或片断；通过这些手稿同时使我了解到一个受人爱戴的大师的创作方法。在世界上无数不解的谜中，造物者的秘密乃是最玄妙最深奥的。大自然不让我摸清造物者的秘密，大自

然也从来不让人看到最关键的奥妙：地球是怎么产生的，一朵小花是怎样产生的，一首诗是怎么产生的，一个人是怎么产生的。大自然在这里无情地、绝不让步地给自己蒙上了一层面纱。甚至诗人和音乐家事后也无法说清灵感产生的一瞬间是怎么回事。当一部作品非常成功时，就是作者本人也弄不清作品的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他永远或者几乎永远说不清楚，在他精神非常集中时，一般词句是怎样变成诗句的，个别的音节组合是怎样成为千古流传的旋律。对这种捉摸不定的创作过程能够提供一点猜测依据的唯一材料，就是艺术家的一页一页的手稿，尤其是那些几经涂改，不准备拿去复印的未定初稿。后来的定稿就是从初稿逐渐形成的。收集所有的伟大诗人、哲学家、音乐家的底稿。这些反反复复的修改稿，也是他们艰苦创作的见证。我搜集名人字迹的第二阶段，是一个更有意识的阶段，因为要到隐蔽之处去挖掘。到拍卖市场去搜罗这些底稿，我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也愿意花费精力到藏匿很深的地方去寻找某些底稿。搜集底稿也是一门科学，因为我除了搜集名人的手迹以外，还搜集临摹手迹的第二手书品，以及现已出版的手迹本全部目录，我现在已经搜集到四千多册有关书籍，从数字上讲，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无人可比拟的私人藏书。即便是一个商人他也不会用这么大的精力和热情来搞这门学科。现在我可以这样说，搜集名人手迹的时间已有三四十年了，在这个领域我已经成了专家，那一页重要的手稿在什么地方，谁收藏着，是如何转到收藏者手中的，这一切我都知道。我成了一个真正的鉴定家，一眼就能辨出真伪。在估价方面，我比很多专业人员还要有经验。——当然，在文学方面或者在生活各方面，我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

虽然如此，我搜集手稿的热情有增无减。尽管，仅仅能够搜集反映上千种创作方法的一系列世界文学和音乐方面的手稿，并不能使我满足。单纯扩大搜集量对我再没有吸引力。我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搜集物的精选上，我最后十年的搜集工作重点就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以前是专门搜集反映诗人或音乐家创作过程的手稿，那么，后来我搜集的重点逐渐转到搜集艺术家创作鼎盛时期的手稿，即获得最高成就时期的手稿。换句话说，我搜集的不仅仅是诗人的任何一首诗的手稿，而是他的最优秀诗篇的手稿，而且尽可能是一首不朽之作的手稿——用羽毛笔或铅笔记录下灵感中的诗篇已成为千古绝唱。我正是要从这些不朽巨人遗留下来的珍贵手稿中搜集到为世界创作不朽作品的手稿。这种搜集工作极其不易。

好在我的搜集工作从来是持续不断的，如果搜集到一页意义重大和更具有特色的手稿，即一页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手稿——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会把过去收藏的任何一页用手剔除、卖掉或拿去交换，因为这已不符合我收藏的最高标准。我觉得很奇怪，有些非常困难的事居然也能成功，除了我之外，只有很少的人具有这种技能，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同时又具备搜集这种重要手迹的经验。我搜集最初的手稿或者是具有开创性的、永久性意义的划时代宣言文稿，搜集到最后为止，先是用一个皮包，然后用金属和石棉加以防护，装了整整一箱子。由于我今天被迫过着一种飘泊不定的生活，我编写的收藏品目录早已丢失，所以我只能列举几件收藏品，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不朽时刻的世间天才。

我的收藏中，有一张达·芬奇的工作笔记手稿，是向左倾斜的笔体写的对素描的附注；有四张拿破仑用几乎不易辨认的

字体写给他在黑沃利的士兵们的军令；还有用大幅印刷纸印的巴尔扎克一整部小说，每一印张上都有上千处字迹甚为清晰的校对，说明他在上面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幸亏美国的一所大学对这部校样影印了，原稿才得以保存下来）。收藏品中有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这部鲜为人知作品的最初手稿，这部为他所爱的人科西玛·瓦格纳而写的手稿在《悲剧的诞生》发表很早以前就已写成了；还有巴赫的合唱组曲，格鲁克的阿尔西斯特咏叹调和韩德尔的咏叹调，而韩德尔的音乐手稿是所有音乐手稿中最为稀世罕见的。我总是搜集那些最富有特点的手稿，有幸大部分都搜集到了，如勃拉姆斯的《吉普赛人之歌》，肖邦的《巴尔卡罗勒》，舒伯特的千古绝唱《音乐颂》，海顿的《皇帝四重奏》中《上帝保佑》这首不朽旋律。在某种情况下，我甚至能够成功地做到：从搜集具有独创性的单一的手稿，扩大到搜集能概括艺术家一生创作个性的手稿。所以，我不仅有一张莫扎特十一岁时稚气未退的手稿，而且还有他为歌德《紫罗兰》谱成歌曲的手稿，这是作曲家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莫扎特的舞曲中，我收藏的手稿有：表现费加罗“不再受人欺凌”的小步舞曲；《费加罗的婚礼》里的小天使咏叹调；还有那些从来没有发表的写给巴斯勒①的一份很粗鲁的信和一首轻佻的卡农乐曲；还有一页他逝世前不久写的《狄托》②中的一首咏叹调的手稿。我收藏的歌德的手稿，从他九岁时的一篇拉丁文译文的手稿一直到他去世前不久八十二岁时作的一首诗的手稿。这中

①巴斯勒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一个爱给主人帮闲的音乐师。

②《狄托》是莫扎特 1791 年创作的歌剧。

间还有他的不朽名著《浮士德》的一张双面对开的手稿；还有他的自然科学论文的原稿，许多诗作的手稿以及他一生中各个不同阶段选出来的绘画手稿。从这十五件宝贵的手稿中可以概括歌德的一生，也清晰地勾画出歌德的形象。但是，我搜集最崇拜的贝多芬的手稿却不能概括他的一生。我的发行人基彭贝尔格教授在搜集歌德和贝多芬的手稿方面是我的对手和竞争者。他是瑞士的大富翁，他搜集的贝多芬珍贵的手稿是无人可比拟的。但是我收藏的贝多芬的遗物至少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他一生中最凄凉的时刻。现在没有任何一家博物馆能够提供这样的材料。且不说我除了搜集到他年轻时代的练习本、歌曲《吻》和哀格蒙特音乐的片断外，还有说明他一个阶段特征的手稿。我遇到过一次幸运的事，我得到贝多芬走后房间的全部摆设，这些摆设是贝多芬死后拍卖的，后来由枢密顾问布罗伊宁购得，以后转让给我的。这些什物中，主要是那张大写字台和藏在抽屉里他的两位恋人的画像：一幅是吉乌莉塔·古西亚尔蒂伯爵夫人，另一幅是埃尔德蒂伯爵夫人；还有那只直到他临终前一直在使用的床头钱柜；那张小型的斜面桌，在他生病卧床时总是在这张斜面桌上写最后的乐谱和信件；还有一绺他在临终床上被剪下的白色鬈发，以及讣告信函等，还有他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张洗衣单，可以拍卖的家具什物的清单，以及他在维也纳的朋友为他无依无靠的厨娘莎莉认购遗物的认购单。一个真正的收藏家总会碰到好运气，我在得到贝多芬留下的一切遗物之后不久，我又碰到一次机会，搞到三幅他在临终床上的素描。大家知道，三月二十六日那一天，贝多芬正在弥留之际，舒伯特和他的朋友画家约瑟夫·特尔切尔想把临终的贝多芬画下来。可是那位枢密顾问布罗伊宁却认为这是对死者的大

逆不敬，把他们轰了出去。从此后那几份素描匿迹了数百年。一直到这位名气不大的画家的几十本素描手稿在捷克小镇布尔诺的一次小小拍卖会上，以低得可怜的价格出售时，才突然发现那三幅素描的原件，我如获至宝。不知怎的，好运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一个商人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对贝多芬在临终床上的画像真迹感兴趣，我回答说，我已经有了这幅画像。到后来才弄清楚，想卖给我的那幅真迹原来是奥地利画家约瑟夫·丹豪塞非常著名的贝多芬临终时的石版画。我把所有的视觉形式原件保留下来作为纪念，真正的不该消逝的贝多芬最后画像就这样收集到手的，将两种画像收藏在一起。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这些物品的占有者，而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代的保管者。我之所以不是占有者，是因为把收藏看作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占有的欲望，一种据为己有的欲望，我还有一种把一切珍品搜集到一起的僻好。当时我就意识到，搜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搜集工作本身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所以说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虽然我搜集了不少东西，可是我迟迟不能整理出一份目录，因为我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工作正在进行，搜集品尚不完善，尚缺少某些名人和某些手稿。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在我死后把这些独一无二的收藏品交给一所能满足我要求的研究所，也就是说，该研究所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款项，按照我的做法去继续完善这种收藏。如果这样做下去，那么我的全部收藏就不会僵化，而会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有机体，它会在我身后五十和一百年的时间内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就会变成越来越完美的齐全的收藏。

可是，对我们这一代经受考验和磨难的人来说，是不会想到自己以后很远的事。随着希特勒时代的开始和我远离祖国，我

的搜集收藏品的兴致一下子荡然无存；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存放在哪里更安全。有一段时间，我还把一些收藏品放在朋友们的保险柜里，后来我决定按照歌德的话去做，如果不存在博物馆、收藏馆和兵器库里，还不如把那些文稿实物封存起来。我宁可与搜集工作告别，因为我没有办法继续从事搜集工作。离开奥地利时，我将收藏的一部分赠给维也纳国家图书馆，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朋友们，还有一些我变卖给别人；其余部分，过去和现在的命运如何，我就无法知晓了。我的兴趣从此转到自己的创作上来，而不是为别人的创作再费心劳神。我放弃了收藏，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这个敌视一切艺术，敌视一切收藏品的时代，我们这些被追逐被驱赶的人必须重新学会一种新的艺术，即舍得放弃真正的艺术，向我们过去视为骄傲和热爱的一切诀别。

岁月就这样随着写作、旅行、学习、读书、搜集、玩乐，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我醒来时，我已是五十岁的人了。在萨尔茨堡为我服务的那个老实诚恳的邮差，对他来说，这一天是个倒霉的日子。因为德国有这样一种好习俗，一个作家过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报纸就要为他大大庆祝一番；那位老邮差必须把大批的信件和电报从一级级陡峭的台阶上弄上来。我打开信件未看之前，我即思忖，这一天对我有什么意义，人生的第五十个年头被视为一个转折点；我不安地回首往事，我已经走过了多少路程；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还要继续向前奋进。我仔细琢磨已度过的时光，回顾那五十年的生活历程，我是怎样从自己的家走进阿尔卑斯山的山区，然后又到那块倾斜的谷地，同时我的心又想到别处去了，那块谷地

很可能是罪恶之地①，我觉得这里也没有值得可留恋的。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人们最终给予我的，要比我期望的多得多。各种传播媒介，我利用它们的帮助而求得发展，通过它们发表自己的诗歌、文学作品，这次又起了很大作用，远远超出我童年时代的大胆梦想。岛屿出版社特地发行了一本我业已出版的各种文本著作的总目录，作为庆祝我五十寿辰的礼物。总目录本身就像一本书一样，里面什么语种都有了：保加利亚文、芬兰文、葡萄牙文、亚美尼亚文、中文和马拉提文②。传播媒介物还把我讲的话和思想用盲文、速记用各个国家的铅字和方言传播到人民中间，我的生存空间永远超出我自己居住的范围。我和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物结成私人朋友，我欣赏过最完美的演出；我曾游览和观赏过那些不朽的城市、不朽的绘画和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我始终自由自在，不受工作和职业的羁绊，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乐趣，我的工作也给其他人带来了乐趣！还有什么不幸的事会发生呢？我的书多得很，到处都是，难道会有人把这么多的书毁掉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完全没料到以后发生的事。）这里是我的家，难道会有人把我从家里赶出去？那里有我的朋友，难道有一天我会失去他们？我曾经毫无恐惧地想到死，想到过生病，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过当前面临的这种处境，没有预想到我不得不背井离乡，作为一个被驱逐出家门的人被追逐、被驱赶，再次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越过这个海洋到那个海洋，真乃浪迹天涯。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的那些书籍会被焚毁、被禁止、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我也没有想到我

①罪恶之地是作者指希特勒曾一度居住的萨尔茨堡。

②马拉提文，印度孟买省中部马拉提人用的文字。

的名字在德国会变成像一个罪犯的名字一样受到指责；也没有想到我那一班朋友，他们的信件和电报在我生日那天全都放在我的桌子上。现在我突然遇到他们，他们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我也没有想到，我三四十年孜孜不倦所做出的一切业绩竟会被一笔抹杀。我也没有想到我生活中十分稳固的一切会很快地分崩离析。我也没有想到我的事业即将达到顶峰的时候竟要我这颗精疲力竭的心去重新开始一切。说真的，在庆祝我的五十寿辰的那一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以后会发生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荒唐事。当时，我非常满足，从而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我的生活，我无忧无虑，即使我不再写作，我已出版的书籍足够我的生活。我似乎得到了一切，万事如意。那种安全感，早年我在家庭中获得，尔后又在战争中失去了这种安全感，现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又重新获得。我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呢？

可是，奇怪的事，恰恰是在我知道不希望得到任何其他东西的时候，在我心中出现了一种莫名奇妙的不快。在我的心中总是隐藏着一个疑问（不只是我自己），要是你的生活四平八稳的这样下去，始终这样一帆风顺，始终这样有条不紊，始终有收获，始终这样舒适和没有新的焦虑和磨难，果真就不错吗？这种富裕的、完全有保障的生活不是完全符合你的本性吗？我沉思着，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住的那栋房子，已按照我的意愿修理得相当漂亮了。难道我不应该永远在这栋房子里生活下去？不应该始终坐在那张写字台前写我的作品，一本接着一本写下去？然后又等着一笔又一笔的版税？难道我会渐渐变成一位受尊重的先生，用正派端庄的德行维护自己的名声和著作吗？是否能与一切意外事件、一切焦躁不安和一切危险隔绝呢？难道我应该在笔直的、平坦的大道上继续这样下去，一直到六七十

岁？我一直这样梦想着，出现其他的一些事，一些新鲜事，一些使我不安、焦急同时又能促使我年轻的事，这些事能够促使我去参加更新的、也许是危险的斗争，这样岂不是更好的事吗？在每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反而渴望紧张。在我五十岁生日那一天，我的最深心处只有一种邪念：但愿能发生一些再一次把我从安全感的舒适环境中强拉出去的事，但愿出现迫使我不能正常继续生活下去，必须从头开始的事。难道我这是害怕年老，害怕衰退，害怕迟钝的表现？或者是一种神秘的预感，那时代就要寻求内心的发展而渴望另一种更艰苦的生活？对此，我无法知道。

我之所以不知道，是由于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从无意识的朦胧中产生出的想法，根本是无法说清楚的，也肯定不是从清醒的意识中产生的。这只是我感到突然出现的一种念头，也许并不是我自己的想法——鬼念头——而是从莫名其妙的深渊里发出来的，它已经在我周围，而我并未觉察到。但控制我生活的那种神秘力量是不可捉摸的，它曾满足过我许多愿望，这是我从未希望也不敢希望的。但是，现在这股神秘的力量却举起了自己的手要把我的生活基础击个粉碎，同时迫使我在自己生活的废墟上重新建立更为艰难困苦、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

希特勒的开始

一次巨大的运动开始之时必然决定那个时代的一切，恰恰是这段历史阻碍同时代人对它的认识，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名字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个名字我们已经知道多年了。现在，我们几乎每天，甚至每秒钟都联想起或提到这个名字。这个人却给世界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我们在萨尔茨堡得到的消息又准又快，因为它离慕尼黑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可以说是慕尼黑的邻居，只要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很快地就会传到萨尔茨堡。我只记得有那么一天，可我记不准是哪一天啦，一位熟人从慕尼黑来，悲叹地说，那里又闹起来了，特别是那里有个叫希特勒的家伙煽风点火，他用野蛮的大打出手的伎俩捣毁群众大会的会场，用最

下流的方式煽动人们反对共和国，反对犹太人。

当时，希特勒这个名字我听后是空洞的，没有分量的，对我也是没有作用的。我认为，在当时混乱的德国出现那些煽动家伙和暴乱分子的名字，不用多久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比如说，带领波罗的海部队的上校艾哈特的名字，他参加了卡普暴动，发动暴动的卡普将军的名字，政治谋杀者的名字，巴伐利亚共产主义者的名字，莱茵地区分裂主义者的名字，志愿军头目的名字，这几百个名字，就像发了酵的泥塘里泛起的汽泡，既不会爆炸，也不会留下什么，只能发出一股恶臭，这不过是把德国身上尚未愈合的伤口腐烂过程清楚地显示出来而已。还有一次，我偶然看一份《米斯巴赫报》，是新纳粹运动经办的（这份报后来发展成《人民观察报》）。米斯巴赫只不过是个小村庄的名字，这份报办得粗俗下流，可是谁会关心它呢？

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越过国界到那边的赖兴哈尔和贝希特斯加登这两个边境小镇去一次，我不只一次看到穿着翻口长筒靴和褐色衬衫的青年学生队伍，我看到的队伍一次比一次大。每个人的手臂上都带着颜色鲜明的卐形袖标，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高喊着口号穿过大街，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下方示以卐字符号。我第一次领悟到，这些突然冒出来的乌合之众的背后一定有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在支持他们。当时希特勒只能在巴伐利亚的啤酒馆里发表演说，他一个人绝没有力量把几千名年轻人武装成一支耗费如此浩大的队伍。必定有一个更强的人物在推动这次新“运动”。因为他们的军服都是簇新的，“冲锋队员”从一个城市被派到另一个城市，竟然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停车场，因为要停“冲锋队员”的全部簇新的汽车、摩托和载重车。这与那个穷困时代老兵穿着破旧的制服，机

动力极差形成了强烈地对比。另外，显而易见，肯定军队的领导人对这些年轻人进行过战术上的训练——正是人们当时所说的“准军事”训练——这肯定是国防部提供的物质条件，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技术训练。希特勒开始就是德国国防部秘密情报处的密探。不久，我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亲眼目睹这种事先经过训练的“战斗行动”。在边境上的一个小镇，社会民主党人正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集会，突然有四辆大卡车急驰而来，车上全是些拿着橡皮棍的年轻纳粹党徒。完全像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看到的那样，那些纳粹党徒闪电般地向毫无准备的人群进行突然袭击，他们用同一种法西斯的袭击方法，只是这次他们的动作训练更加有素了，用德国官方的话来说，他们对细枝末节都作了系统的准备。随着一声哨响，他们迅猛地跳下汽车，拿着橡皮棍向集会的人群冲去，警察还来不及干预，工人们还没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已重新登上汽车，飞驰而去。使我惊诧不已的是他们跳下蹦上攀登汽车的准确动作，都是按暴徒头目的哨声完成的。看得出来，每个年轻队员事先都训练过，用什么技巧，从汽车的哪个轮子爬上跳下，跳到哪个位置，以避免与他人相撞，不致于给同伙造成危险，他们的肌肉和神经早已为此有所准备。这绝不能只靠人的机灵所能办到的。他们手的动作，肯定早在营房或在练兵场练了几十次或者上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从开始起，训练这支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袭击、施用暴力和搞恐怖活动。

不久，我便听到在巴伐利亚州举行的那种地下演习的种种消息。当大家都熟睡以后，那些青年队员便悄悄地溜出房间，集合在一起，进行夜间“野外训练”。国防军的军官或退役军官训练这支部队；而由国家或者党的秘密资助人出钱支持。政府当

局对这些稀少的夜间演习并不大注意。当局是真睡着了吗？还是只闭着眼睛？当局对这个新运动是袖手旁观呢还是在暗地里火上浇油呢？不管怎么说，曾经暗地里支持这个运动的当局，后来也被这个运动所采用的残暴手段和快速行动惊骇得不知所措。一天早上醒来，当局发现慕尼黑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所有行政部门都被他们占据，报纸在手枪的逼迫下宣告革命已胜利完成。一筹莫展的共和国这次做梦似地望着鲁登道夫将军，把他看作是从云雾中降临的救星，他被看作是能战胜希特勒的人物中的首选人物。希特勒很会掩饰自己，反把他们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国的著名啤酒馆暴动是从上午开始的，到了中午暴动就完蛋了（我在这里并不想叙述世界史）。希特勒逃跑了，不久就被抓住了，那个运动也随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符号不见了。冲锋队和希特勒的名字几乎被人遗忘了。没有人再去想他可能是一个掌权的人物。

若干年后，希特勒又出现了，当时对现状不满的浪潮匆匆把他推出来的。通货膨胀、失业、各种政治危机，还有外国愚蠢的举动，使德国民族人心动荡。德国民族的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力更重要。歌德也曾经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前谁要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会有几十万人跟着他走。

但是，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危险。少数作家还在那里花费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分析研究他的纲领，只是十足的文人气从艺术上分析这本书的得失，嘲讽他那枯燥无味的散文和华而不实的风格。民主主义的大报纸也不去提高读者的警惕性，而是一味安抚自己的读者，说什么依靠重工业和冒险借来的钱来维持那种耗巨资的宣传运动，肯定不可避免地在

明天或后天会彻底破产。可是在外国，他们永远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在这些年里德国人为什么低估和轻视希特勒的为人和不断扩大他的势力的作法：这是因为德国从来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而且在等级观念的基础上还要加上无法改动的“学历”，“学历”是德国人十分推崇的。在德国，除了一些将军外，所有的高级职务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担当；与此相反，在英国却有一个洛德·乔治①，在意大利有个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在法国有一个布里昂②，他们都是从平民走上国家最高职位的。一个还没有读完市立中学、更谈不上读过大学的人，一个还在成年男子收容所过夜、而常年过着不明不白的生活——至今还没有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人③，竟然也沉迷于一个是冯·施泰恩、一个是俾斯麦、一个是比洛④亲王曾占有的职位。这对德国人来说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德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重视学历的，在他们眼里，希特勒只不过是一个啤酒馆里好煽风点火的小丑。这种看法使他们上了大当。他们认为这个人绝不会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人，而希特勒在幕后支持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广泛阶层的有力支持。即使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一天当上总理时，竟有一大批人，甚至那些推他上台的人，还误认为他是临时占据那个职位，把纳粹夺取政权看作是一首临时的插曲。

①洛德·乔治（1863—1945），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1922年任首相。

②阿里斯提德·布里昂（1862—1932），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③过着不明不白生活的人，指希特勒。

④冯·比洛亲王（1849—1929），德国外交家和政治家，1900年任帝国首相。

希特勒上台以后，他的庐山真面目才大量表现出来。许多年以来他向各方面许愿，取得各个政党领导的支持；这些党派领导人都以为利用这个“无名小卒”的神秘力量达到各自的目的。后来，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采用同样的伎俩：以发誓和以德国人的忠心先和他想铲除和要消灭的人结盟。他的上台，说明他的这种伎俩已取得了初步胜利。所以，他心里明白，用许诺欺骗各方面的人士已大见成效，在他掌权的那一天，即便在最对立的阵营里也竟然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在荷兰的多伦市君主政体主义者们看来，他是皇帝最可靠的开路先锋；在慕尼黑古老的巴伐利亚维泰尔斯巴赫王族君主政体主义者们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把他看作是“他们的”人；德意志国家主义者们希望他为他们把木头劈成小块，以便投入自己的炉子里，都是为了私利，所以他们的领袖胡根贝尔格① 根据率先的协议为自己在希特勒内阁里弄得一个重要职位。他确信自己站稳了脚跟，可是没过几个星期，那份协议犹在，他却被赶出了内阁。重工业家们感到，由于希特勒的存在，他们就可以从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中解脱出来，他们极希望他能登上权力的宝座，他们多年来暗中用钱把他扶植起来的；而那些日益贫困的小市民也同样舒了一口气，因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集会上答应他们要“打破利息的桎梏”。小商人想起了要关闭大商店——他们最危险的竞争者——的许诺（这个许诺从未实现过）。特别喜欢希特勒的要算是军界了，因为他用军事眼光看待一切，痛骂和平主义。甚至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非常不高兴希特

①阿尔弗雷德·胡根贝尔格，德国工业家、政治家，当时为克虏伯公司董事会主席。

勒青云直上，因为他们希望他扼杀他们的死敌——那些在他背后令人讨厌的共产党人。与纳粹党最不相同，甚至是对立的党都把这个对各阶层、各政党、各种倾向的代表作过许诺并发过誓的“无名小卒”当作是自己的朋友。甚至德国的犹太人也不感到有什么不安。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一个当上“部长的雅各宾派”就不再执行雅各宾派的激进政策了。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总理理所当然地会阻止反犹太主义煽动者的野蛮行径。再说，这样的一个法律已经固定下来，国会里的大多数议员监督着他、每个公民按照宪法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不久，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了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的一切法律都化为乌有。当人们知道，集中营就设在和平的环境中，秘密审讯室就设在兵营，无辜的人在不经过法律的审判和任何手续就被处死，使人毛骨悚然。有人对自己说，这只能是第一次丧失理智的疯狂表现而已，这种事不会在二十世纪里继续存在，然而这是刚刚开始。世界人民密切注视并首先拒绝相信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可是，就在这几天里我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趁着夜里翻过萨尔茨堡山地或者蹚过边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服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当地的人；一场躲避惨绝人寰迫害的可怕大逃亡已从他们开始了。当我看到这些被驱赶出去的人群时，我却没有预见到，他们苍白的脸色已预示了我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暴行的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几个星期里把三四十年形成对世界的信念彻底改变，谈何容易。我们依然相信我们的法律，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会持久永存，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

在人性面前会立刻毁灭。这一切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由于我继续留在这里为了亲自试一下到底会出现些什么事，所以我必须坦白承认，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这两年我们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人，遇到的每件事都会出现上百次上千次之多，在几个星期前我们认为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这些自由独立的作家对出现的一些困难、烦恼、敌对行动事先是清楚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国会纵火案刚发生不久，我便向我的出版者说，我的书很快会在德国成为过去。我永不会忘记，他听我的话时那个惊愕神情，他说："谁会禁止您的书呢?"他说这话的时候是一九三三年，所以他还是很惊奇，"您可从来没有写过反对德国的一个字或者干预过政治啊!"我看到的所有难以置信的暴行，诸如焚书和使用残酷的刑具，几个月以后都成了事实。仅在希特勒掌权的一个月之后，对此，那些思想深远的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惯用的欺骗伎俩，在时机尚未成熟之前，他们不会暴露自己目标的全部激进性。所以纳粹分子总是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像用药一样，先用一定的剂量，间歇一会。就是先用一粒药丸，然后停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否强，再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因为欧洲的良知总是竭力强调"与己无关"一让再让的态度，所以药的剂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个欧洲毒死为止。欧洲这样做，是因为暴行在"国界的那边"进行。欧洲的这种作法，有损于我们的文明，也是我们文明的耻辱。希特勒并没有什么天才之举，但他运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对付一个在道德上、尔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弱的欧洲，却是非常成功的。希特勒早决定的行动：消灭任何言论自由和任何不唱赞歌的独立书籍，也是运用试探的方法然后在德国全面展开的。当时在德国并没有颁布公

开禁止我们著作的一项法律。——而是两年之后才颁布的。开始时，他们没有颁布禁书的任何法律，也是采取小心翼翼的试探，看看能走多远。对我们的著作第一次攻击是唆使那些不负正式责任的人，即身为纳粹党徒的大学生们去干的。他们为了贯彻蓄谋已久的全面抵制犹太人的决定，导演了一场“民众愤怒”的丑剧，他们也是用同样的伎俩，暗示大学生们对我们的著作表示公开的“愤慨”。德国的大学生能够公开表现其反动思想是十分兴奋的。他们在一处又一处的大学里聚众闹事，把我们的书从书店里拿走，带着他们的缴获品，举着旗帜，向一处公共广场走去。在那里按照德国古老的习俗，把书钉在耻辱柱上示众，这种中古时代兴起的恶习现在又变成了一种时髦。我今天就有一本曾钉到耻辱柱上的我自己的书，那是一位友好的大学生在执行完任务后抢救出来的，送给我作为纪念。有时他们把这些书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着爱国主义的词语，一把火将书烧成灰烬。很遗憾，那时还不允许他们烧死活人。虽然宣传部长戈培尔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最终决定焚书，但是焚书这件事始终不敢公开，好像都是大学生干的。可是公众却没有从大学生焚书和其他为非作歹中吸取一丁点儿的教训。当时的德国对这些反常行动反倒视而不见，再一次清楚地说明了民众毫无警惕性。尽管书商们受到警告，不准把我们的书放在橱窗里，也尽管没有一家报纸敢于登载这些书的广告和评论，但是真正的读者却丝毫没受影响。在尚未建立监狱和集中营的时候，我的书虽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不少刁难和凌辱，而销售量几乎同以前一样多。为了把几十万和几百万德国的读者从我们的身边强行拉开，非得制定一项荒唐透顶的法律不可。为了“保护德意志民族”的纯洁性，只有把印

刷、出售和传播我们的著作说成是政治犯罪，对此非要订立一项法律不可。那时的德国读者还是喜欢读我们的书，而不愿意读那些突然冒出来带着野蛮血腥味的诗人的作品。大批读者愿意伴随着我们的创作永远同我们在一起。

在德国遭受剥夺文学创作命运的同代人有托马斯·曼、亨利希·曼、韦尔弗尔、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他们的著作远比我的重要。我们共同的厄运，如其感到是一种耻辱，不如说是一种光荣。不过，如有人认为自己是那个时代的殉道者，对此我十分反感。我们同这种人不是一路人。可是，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纳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处于特别尴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中，唯有我一人引起上峰人的争论。由于我创造的人物形象在贝希特斯加登①别墅里的高层人物和最高层人物中间成了最恼火的和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使我感到很满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因为我让那个新时代最强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也不时地恼怒。

在新政权成立的最初几天里，我就被无辜地扣上一条暴乱的罪名。当时全德国正在放映一部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灼人的秘密》改编的片名也是《灼人的秘密》的电影。根本没有人对此片表示任何不满。可是在国会纵火案，纳粹党徒嫁祸于共产党的企图破灭以后，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电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的广告前聚集着一群人，他们互相挤眉弄眼，并且哄堂大笑。不一会儿，盖世太保明白了他们在片名前大笑的原因。当天晚上，

①贝希特斯加登，德国东南端边境小城，希特勒和纳粹首领的别墅所在地。

警察骑着摩托车在街上巡逻,并命令电影院停止上映这部影片。从第二天起,我的《灼人的秘密》书名就从所有的报纸广告和一切张贴广告的柱子上消逝的无影无踪。其实,这次禁止根据我的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的放映,不会引起我的不安,甚至焚毁和捣毁我的全部书籍,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在特殊的情况下,他们对我也无可奈何,因为在关键的时候他们不能同时反对另一个人,此人就是他们所极需要用来维护他们在世界上声望的人物,德意志民族最伟大、最出名当时仍健在的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我当时与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剧。

这是我第一次和里夏德·施特劳斯合作。在这以前,从施特劳斯的歌剧《埃勒克特拉》和《蔷薇骑士》起,他所有歌剧的歌词都是由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写的。我从来没见过里夏德·施特劳斯本人。霍夫曼斯塔尔死后,里夏德·施特劳斯通过我的出版人跟我说,他很想开始写一部新歌剧,问我是否愿意为他的这部歌剧写歌词。我对这样的请求感到一次莫大的荣幸。自从马克斯·雷格尔为我早期的诗歌谱曲以来,我一直不断地生活在音乐和音乐家的圈子里。我同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鲁诺·瓦尔特、阿尔浜·贝尔格等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但我不知道,在我们时代的音乐创作家中,有谁能比里夏德·施特劳斯更引起我的兴趣,为他效劳。里夏德·施特劳斯是纯日耳曼血统的音乐世家伟大后裔中的最后一位了。这个伟大的世系,从韩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我马上表示同意,并在第一次会面时就向施特劳斯建议,用本·琼生①的

①本·琼生(1571－1637),英国戏剧家,与莎士比亚是同代人,代表作有讽刺喜剧《伏尔蓬涅》等。

《沉默的女人》作为一个歌剧的主题。施特劳斯对我这一建议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迅速。这对我来说确是一件非常令人惊喜的事情。我从未想到过，他对艺术的理解力竟会这么敏捷，他的戏剧知识竟是那么使人吃惊。我正在叙述那部歌剧素材的时候，他已经把它戏剧化了。更令人惊异的是他把素材和他的音乐才能结合得天衣无缝。他对自己能发挥所长的地方了如指掌。我一生见过不少艺术家，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清醒而又客观地对待自己。我们刚开始合作，施特劳斯马上就向我坦诚地承认，一个七十高龄的音乐家不再具有音乐灵感的原始魔力。他说，他再也创作不出像《梯尔·欧伦施皮格尔》或《死与神化》那样的一些交响乐作品，因为恰恰是纯音乐才需要一种最高级的创作活力。不过，现在他对歌剧的歌词一直还会产生灵感。他说，他还能够将已写完的和已经形成的主题用音乐的语言把它表现出来，因为对他来说，音乐旋律会自然而然地从那些意境中和从诗歌中缓缓流出。因此，他到了晚年，就专门从事歌剧创作了。他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歌剧这种形式已经过时。他说，瓦格纳的创作是伟大的高峰，没有人能超过他，“但是，”他用粗犷的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补充道：“我可以绕开他走。”

我们把歌剧的基本轮廓搞清以后，他又向我提几点应注意的要点，他让我有绝对的自由，因为一种预先用威尔第歌剧格式化裁成的歌词永远引不起他的灵感，只有富有诗意的作品才能引起灵感横溢。他说，如果我能构思出节奏多变的歌词，他就会非常的高兴。他说：“我不像莫扎特那样擅长运用旋律，我一直是从短的主旋律开始的。但是，我知道以后怎样去变奏这个主旋律，自由地装饰这个主旋律，把蕴藏在主旋律中的一切

都挖掘出来。我知道到今天还没有人仿效我的作法。”我对他的这种坦诚态度再一次感到惊叹不已。说实在的，施特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超过几个节拍的旋律；正是这种短旋律加深了音乐的表现力，像《蔷薇骑士》的华尔兹就是这种短旋律的。他确定主题后，他又是如何用赋格作曲法把短旋律谱成绚丽的又完美的音乐啊！

像我们第一次会面一样，每次新的会面，无不使我对他怀着敬慕之情；赞赏这位年迈的大师在创作中充满自信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有一次，我和他单独坐在萨尔茨堡艺术节演出大厅里看他的《埃及的海伦娜》内部彩排。大厅里没有其他人。周围是一片黑暗。他专心地倾听着。我突然看到，他先是轻轻地，后是不耐烦地用手指敲着坐椅扶手。他轻轻地对我说：“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起说别的了。”几分钟之后他又说：“我干脆把它删掉吧！哦，上帝啊，太空洞了，太冗长了，太冗长了！”又过了几分钟他说：“您说，这么办不错吧！”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这么客观，这么实事求是，好像他是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似的，好像那音乐不是他创作的而是别人创作的。他这种衡量自己的作法从来没离开过他，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他对自己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多大的本事，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喜欢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比别人强得多，还是比别人差得多，多没意思呵！他同样不喜欢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只有创作本身才能使他感到兴趣。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过程。他没有那非凡的魔力，也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更没有像生活传记中所描绘的贝多芬和瓦格纳那样的沮丧和绝望。施特劳斯在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在作曲的时候，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

样，像所有技巧高超的艺术家一样，安静又有规律。每天从早上九点起，他坐在桌旁接着昨天作曲结束时的地方继续创作，直到十二点或者午后一点。下午休息时玩纸牌，誊写两三页总谱。他像一般的作曲家一样，用铅笔写初稿，用墨水笔写钢琴总谱。晚上他或许到剧院指挥乐队。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所以神经衰弱这类病与他无缘。他的艺术智慧昼夜都一样，都是那么光辉、明晰。当仆人敲门进来，给他拿来指挥乐队穿的燕尾服时，他就放下工作，站起来，乘车去剧院。他指挥乐队时是那么镇定和自信，就像他下午玩纸牌时一样。到了第二天，他的灵感又准确无误地出现在头一天创作结束的地方。因为施特劳斯是按照歌德的话来“指挥”自己的思想灵感的；他认为艺术就是一种能力，甚至所有的能力都是艺术，像他用诙谐的话证明说：“一个真正的音乐家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他也能够为一张菜单谱曲才算够格。”任何困难不但吓不倒他，而且给这位日益取得成就的大师带来不少乐趣。我今天想到那件事仍然非常兴奋，有那么一次，他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我给一位女歌唱家出了一个难解的谜语，她要猜出来，必然要费一番脑筋。”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放射着光芒，使人感觉到有股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隐藏在这位奇特人的身上。他的工作方法首先是准时、按部就班、实实在在，就像手工业工人那样。乍眼一看，他工作起来好像心不在焉，会给人一种不信任之感，恰似他的那副面孔一般。他的面庞属于一般的圆形，胖呼呼的，像孩童的面颊，额角微微向后，乍一看，平淡无奇。可是你仔细看下去，就会看到他那一双蓝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炯炯有神，你立刻就感到，在那张平凡的面孔背后隐藏着一股特别神秘的力量。尤其是那双眼睛，我是在音乐家身上看到的一双最清澈的眼睛，它不仅具有

魔力，也显示出深邃的智慧，是一双真正认识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富有生气的会面之后，我回到了萨尔茨堡，立刻开始了歌剧的写作。总是由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以后，我就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位歌唱大师的一句名言："一鸣惊人"。他对我写的第二幕的热烈祝贺的形式，他又寄来了他写的歌曲的头几句："啊！我终于发现了你，我可爱的孩子！"他那种喜悦的心情，或是说是对我的鼓励，为我以后的创作带来了难以表达的快意。里夏德·施特劳斯对我写的歌词没有改动一句，只有一次因为对声合唱的需要，要求我再加上三四行字。由于我们之间的亲密合作，在我们中间才开始了最真挚的友谊关系。请他到我的家里来，他也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德国的加米施小镇去。在加米施他的家里，用他细长的手指在钢琴上按照我的初稿断断续续为我演奏了歌剧的全部。好像事先预约了似的，其实，既没有协议，也不是义务。在完成了这部剧以后，接着就动手写第二部，而他也毫无保留地同意了第二部歌剧的基本梗概。

一九三三年一月，当希特勒上台之时，我们的歌剧《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钢琴总谱已全部完成。可是，几个星期以后，当局下令，严厉禁止在德国舞台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一个犹太人参与的那些作品，这一骇人听闻的强制措施甚至连死人也不放过。莱比锡音乐厅前的门德尔松的站像被拆除了，此种暴行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乐界的朋友。这个禁令的下达，对我来说，我们那部歌剧的命运也就算完了。我原以为里夏德·施特劳斯自然会放弃和我的继续合作，与别人再搞另一

部作品。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他给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倒是他多次提醒我，说我应该为他下一部歌剧准备歌词，因为当时他正为第一部歌剧配乐。他表示，不许任何人禁止他和我的合作。我不得不坦白地承认，在整个形势的变动下，他一直对我恪守朋友的忠诚。当然，他也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可是这些措施对我来说没有一点好处。他经常接近权贵，常常同希特勒、戈林、戈培尔见面，当富尔特温格勒[①] 还在公开对抗希特勒的时候，而里夏德·施特劳斯竟接受了纳粹的国家音乐局总监的任命。

他公开参加纳粹组织，对当时的纳粹分子来说是极端重要的事。因为当时最有名的作家，还有最有名的音乐家无不愤怒地对纳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与纳粹分子一个鼻孔出气的人或者投奔纳粹的少数人，在最广泛的艺术圈子里不过是无名之辈。就在这个难堪的时刻，这位德国最有名望的音乐家公开倒向纳粹一边，从粉饰太平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给希特勒和戈培尔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过去，施特劳斯对我说过，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的那几年里，就用自己千方百计挣来的钱到奥地利的格拉茨去看他的歌剧《莎乐美》的演出，并说，希特勒很尊重他。当时，在贝希特斯加登的节日晚会上，除了瓦格纳的作品外，几乎全部是施特劳斯的歌曲。施特劳斯同纳粹共事，是有许多重要的打算。可是对他这个真诚地信奉艺术唯我主义的人来说，哪一种政权对他都一样。他曾作为宫廷乐队的指挥为德国皇帝演奏过；曾为皇帝的军乐配曲；后来又作为维也纳宫廷

①威廉·富尔特温格勒(1886－1945)，德国著名指挥家，从1922－1945年两次出任柏林乐团总指挥。

乐队的指挥为奥地利皇帝服务。在奥地利，在德意志共和国，这两个国家都喜欢他。他迎奉纳粹，还出于对他生命攸关的事情，他欠下一大笔债务，他的儿子还娶了一个犹太人的妻子，他肯定担心，他最疼爱的孙子们会被当成废物踢出校门外；他的新歌剧受到我的牵连，他以前的歌剧又受到非“纯雅利安种”的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牵连，他的出版商也是一个犹太人。他觉得，给自己找一个靠山是当前的首要举措，于是决定迈出这一步。他遵主子旨意到任何地方去指挥，他为奥林匹克运动会写了一首赞歌。这时他给我来了一封充满忧郁又十分坦率的信中说起对他的那项委任并没有什么兴趣。事实上，在这位艺术家的神圣自我中，他所关心的只有一点：让自己的作品发挥作用，特别是那部新歌剧的演出，那部歌剧同他的心贴得特别近。

他向国家社会主义做出这样的让步，对我来说，肯定使我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推想：好像我暗地里参与了此事，或者说，在作家艺术家的联合抵制的行动中，我犯了一次错误，认为施特劳斯的这次事是一次例外。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斥责我，他们公开反对我们俩合作的歌剧在德国上演。但是，第一，原则上我反对这种公开的大嗡大哄的作法，其次，我也不愿意给这位天才的里夏德·施特劳斯制造麻烦。施特劳斯毕竟是当今健在的最伟大的音乐家，而且已经七十岁了。他为那部歌剧花了三年时间，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在我面前的态度只有友好的情谊、正直和勇气。所以，对我朋友的种种责难，我只有采取沉默的态度，让它自由发展，我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再说，我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我不得不采取这种完全消极的态度，却给德意志文化的新卫道者增添不少困难。除此

之外，我还知道，纳粹的国家文化局和宣传部挖空心思地想寻找一个好听的借口以便确立一项对他们自己的那位最伟大的音乐家的禁令得以实施。譬如说，他们把那部歌剧的脚本拿到所有官员和名人那里去征求意见，希望从中找到一个借口。如果在《沉默的女人》里有类似于《蔷薇骑士》里的场面：一个年轻男子从一个已婚女人的卧室里走出来，那事情就可能好办多了！他们可以抓住这种伤风败俗的借口，大力宣扬必须捍卫德意志的仁义道德。这种鸡蛋里找骨头的作法令他们大失所望，因为我的剧本里没有任何伤风败俗的描写。他们还不死心，他们把盖世太保的卡片索引和我的全部著作都翻了一遍，没有找到我对德国（同样对地球上的任何国家）说过任何一句贬低它的话或者涉及到任何一项政治活动的描写。虽然他们继续在活动，在试探，可是所作的决定原封不动的又回到了他们的手里，无法出台。他们是否应该在全世界面前剥夺这位年迈的音乐大师演出自己歌剧的权力，而正是纳粹自己将纳粹音乐的大旗塞到施特劳斯手中的；或者是我这个词作者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同施特劳斯并列在一起，写在节目单上。这样的事曾发生了多次。这一次不仅玷污了德国大剧院，也给纳粹德国造成了奇耻大辱。他们挖空心思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作法多么令我暗自高兴啊。我已经预料到，即使我不参与，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置可否，我的那部音乐喜剧几经周折，也会不可避免的发展成一种具有党派色彩的刺耳音乐。

纳粹党对这件事的了结一直下不了决心。可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初，必须作出最后决定，不管纳粹党是想违反自己的法律，还是想反对这位当时最伟大的音乐家，无论如何，再也不能继续推迟了。歌剧的总谱、钢琴曲谱、歌词脚本早已印刷完毕；歌

剧的角色已经选定，并且进行了排练；道具服装已经在德累斯顿皇家剧院预订好了。可是戈林和戈培尔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国家文化局、文化委员会、教育部以及宪兵队，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为了一个歌剧搞到这步田地，够荒唐了；《沉默的女人》事件终于成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所有的部门都不敢打破僵局，谁也不敢承担“同意”或者“禁止”的责任。现在别无办法，只好交给德国的主人、魁首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定夺。我的作品在这以前就受到很多纳粹分子的青睐；特别是那本《富歇传》，他们曾把它看作政治上毫无问题的榜样，他们经常对该书加以研究和讨论。可是，在戈培尔和戈林之后，最后一位至高无上的人不得不仔细地阅读我的那部三幕抒情歌剧。我私下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说他们召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会议。最后，里夏德·施特劳斯被召到德国那位至高无上的人面前。希特勒亲自告诉施特劳斯，他将破例批准那部歌剧演出，尽管这样做也是违背新德意志帝国的有关法律。希特勒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像他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一样，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在玩弄权术。

纳粹德国倒霉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被纳粹谴责的名字斯蒂芬·茨威格又出现在戏剧海报上，各个剧院将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剧。我当然不能出席那次演出，因为我知道剧院大厅里肯定挤满了穿褐色制服的党卫军的人；人们甚至估计希特勒本人也会出席其中的一场演出。这部歌剧的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我一定要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我的敬意。他们中间有十分之九的人高兴地利用这次好机会，以便再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机会表达他们内心对种族论的反抗。他们用尽美好的言词评论我写的脚本。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几乎所有的德国

剧院都马上宣布下次上演那部歌剧的时间。

第二次演出刚过，突然晴空一阵霹雳。一夜之间，德累斯顿和整个德国都接到通知：禁止上演那部歌剧。更使我惊奇地是，我看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辞去国家音乐局总监职务的消息。大家都知道，肯定发生了特别的事情。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真象。事情是这样的：施特劳斯又写给我一封信，他在信中督促我马上创作一部新歌剧的脚本。他在信中以惊人的坦率表示了他的态度，这封信落到了盖世太保的手里。这封信摆在了施特劳斯的面前。这样，施特劳斯不得不立刻辞职，于是那部歌剧立刻遭到了禁演。可是那部德语的歌剧当时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以及在意大利上演，因为当时还没有拜倒在民族歧视脚下的墨索里尼特别批准的。而德国人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自己的、当时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老音乐家写的那部令人销魂的歌剧中任何一个音符了。

当那件事情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正在国外，因为我感到动荡的奥地利使我无法安静地工作。我在萨尔茨堡的家离边境非常近。我随便一望就能看到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就住在这座山上。我们那边的邻居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和令人不安的国家。因为我住在德意志帝国的边界这边，我对德国虎视眈眈地望着奥地利的危险情况，比住在维也纳的朋友们了解得更加深刻。在维也纳，坐在咖啡馆里的人，甚至政府的官员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看作是“那一边”发生的事，认为它绝不会触及到奥地利。有严密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不是还依然存在吗？它几乎得到半数国民的支持。自从希特勒的“德国基督教徒”公开非难基督教，并公开宣称自己的元首“比耶稣基督还要伟

大”的时候起，希特勒不就成了天主教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敌人吗?法国和英国也就成了奥地利民族联盟的保护国了吗?墨索里尼不是早就宣称意大利是奥地利的保护国了吗？他不是说要保证奥地利的独立吗？奥地利的人在这里装聋作哑，就连犹太人对面前发生的一切也漠不关心，好像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的自身权利的事情是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只有三个小时火车路程的那边讲同样德语的地方。奥地利人悠然自得地坐在自己的家中；坐着自己的汽车到处兜风，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句口头禅式的安慰话:“那边的那种事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由此使我回想起来，我在俄国短暂之行时，在列宁格勒和我的出版者的一次谈话，他对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美好的生活。我问他，为什么不像许多人那样在革命一爆发就马上离去?“唉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都会相信，像一个委员会和士兵共和国怎么能存在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像他一样，对这种事的看法都是相同的，是自己在欺骗自己。

萨尔茨堡紧靠着德国的边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事比较清楚。狭窄的边界河上不断有人来往，年轻人夜间悄悄地渡过河去接受那边人的训练；鼓动闹事者们坐着汽车或者拄着登山杖装成纯朴的“旅游者”越过边界，在奥地利各地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基层组织”。他们开始招募新成员，同时威胁说，谁如果不表态支持他们，谁就会以后一定受到惩罚。这一切才使奥地利的警察和国家官员们战战兢兢。我越来越感觉到，人们开始动摇，人们的心情开始不稳。我在萨尔茨堡有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也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我和他有三十年最友好的密切交往。我们交往时都相互称“你”，而不用客气的“您”。我们

互相题词赠书，我们每个星期都能见一次面。有一天，在大街上我看到这个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一起走，我看到他立刻在一个和他毫无关系的橱窗旁站住，把后背对着我，兴致勃勃地向那个陌生的人指画着什么。好奇怪，我想，肯定他看到了我。但这也可能纯属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他是否下午可以到我家来谈谈。我答应了，可是我有点纳闷，因为我们从来是在咖啡馆里见面的。结果呢，虽然是他紧急来访，也并没有说些什么重要的事。我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继续保持我们之间的友谊，他又怕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而受到怀疑。因此他表示在这座小城市里与我的关系不要太密切。这件事引起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觉察到，平时常来常往的许多熟人过了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我的处境变得凶险了。

我当时还没想到彻底离开萨尔茨堡，但我像往常一样，决定到外国去度过冬天，以避开那里小小的紧张气氛。可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了美丽的家园，竟成了一种告别。

我打算在法国工作度过一月和二月。我热爱这个美丽的文化国家。我把它看作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没有觉得自己是外国人。瓦莱里、罗曼·罗兰、儒勒·罗曼、安德烈·纪德、罗歇·马丁·杜加尔、杜阿梅尔、维尔德拉克、让·里夏尔·布洛克，这些文学界的头面人物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书在那里拥有几乎和在德国一样多的读者。在那里，没有人把我看成是外国作家，看成陌生人。我热爱那里的人民，热爱那一片土地，热爱巴黎城。我在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家里一样，所以，每逢我从巴黎北站下车时，总会有这种感觉：我“回来”了。可是，我

这次离开家是由于特殊的情况，我比往常提前动身，我又想圣诞节后再到巴黎，这段时间我到哪里去呢？我回想起来了，自我上完大学至今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可是我还没有重访英国。我跟自己说，为什么总呆在巴黎。为什么不去伦敦住上十天半月呢?为什么不用另一种眼光去看看阔别多年的那些博物馆呢?再去看看那个国家和那个城市呢？作了决定，我就没有乘特别快车去巴黎，而是坐上了去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加莱的火车。三十年后的又一个十一月的日子，我在维多利亚车站下了车，这里依然是迷雾蒙蒙。刚到伦敦，我碰到的第一件新鲜事就是不像以前那样从车站坐马车去旅馆，这次换成了汽车。雾，灰色的雾，依然是那么柔和阴凉。我还没有向这座城市望一眼，我三十年前闻到过的那种特别呛鼻、潮湿、郁闷的空气，如今又把我包围起来。

我带的行李很少，同样，我对伦敦也没抱很大的希望。在这里我没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英国的和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彼此之间来往甚少；他们的民族传统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不同，他们不喜欢交往,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过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从世界各地寄到我家，在我桌面上摆满的很多书籍中,是否能找到一本英国作家作为礼物赠给我的书。我曾在德累斯顿的赫勒劳区遇到过一次肖伯纳。有一次，威尔斯在访问萨尔茨堡时到过我家,虽然我的很多著作都已译成英文,但在那里并不出名,英国一直是我的作品产生影响最小的国家。在我同美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俄国的出版商结成私人交情的时候,我还没有见到过一位在英国出版我著作的公司经理。因此之故，我已经作好了一切思想准备，等待像三十年以前的那种陌生感觉。

而事实并非如此，刚刚过了几天，我就感觉到在伦敦有说不出来的舒适。并非是伦敦大变样，而是我本身变了，我增加了三十岁。经过战争和战后过度紧张的年代以后，我特别渴求过着安静的生活，不想再听到政治方面的事。在英国也有各种政党，这是很自然的事。有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个保守党，一个自由党和一个工党，它们之间的争论与我何干。就是在文学界里也有门户之见和各种流派，必然有各种争吵和隐蔽的抗争，我完全站在圈外，我不但感到生活的舒适，而且我终于又感觉到自己置身于一种温良恭俭的市民气氛之中。前几年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我在农村和城市里感觉到的仇恨和紧张更毒害我的生活了。我还必须事事提防以免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伦敦的居民没有那种惊慌失措的表情，在伦敦的社会生活中，诚实、礼貌具有较高水平，而我们的国家由于欺骗成性变得不仁不义，我们与伦敦有天壤之别。伦敦的居民生活得祥和、满足；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自己的花园和个人爱好的小玩艺上了，并不关心他们邻居的事。我在这里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虑问题。但是我留在伦敦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的《玛丽·安东尼特》刚刚出版，我正在审校我的《伊拉斯谟》的校样，我在这本书里，试图描绘一位人道主义者的精神面貌；这位人道主义者尽管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的理解时代的荒谬思想，可是他却不能用自己的全部理智去阻止这种荒谬思想，这才是最可悲的。在完成这部影射现实的作品后，我打算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我写的传记够多了，应该换个题材了。可是到了伦敦的第三天，很快发生了一件事，由于我对作家名人的手迹感兴趣，我就到大英博物馆的公共阅览室里去观看展出的手迹，其中有一份关于

处死苏格兰玛丽亚女王的手写报告。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玛丽亚·斯图亚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她真的参与谋害他的第二个丈夫？或许不是她？因为晚上没有可看的东西，我便买了一本关于这位女王的书。这本书对女王是一首赞歌，它像保护圣灵一样保护她。这是一本肤浅又愚蠢的书。由于无法治疗我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买了另一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同上一本书完全相反。一个说她好，一个说她坏，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向人打听，哪本书说的真实，可是没有人能说出来。于是我自己动手寻找材料，探索事实，不知不觉地陷入两者的对比之中；而且在我没有真正知道实情的条件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亚女王的书。后来为了写这本书，使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离开图书馆。当一九三四年初我重新回到奥地利时，我就决定，我想在安静的环境里把这本书写完，我要重新返回我喜爱的伦敦去。

用不了两三天的时间，我就看出奥地利的局势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变得这么糟糕。从宁静、安全气氛的英国，来到充满狂热和好斗的奥地利，就像在七月里酷热的纽约，从一间有空调的凉爽房间一下子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德国纳粹的报刊开始逐渐破坏宗教界和市民阶层的神经；奥地利人感到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德国的颠覆势力越来越强。多尔富斯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抵御希特勒，一直拼命地寻找最后的一根支柱。法国和英国离得太偏僻了，它们对奥地利的态度也太冷淡了；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抱着宿怨，仍同奥地利作对。这样，只剩下意大利了。当时，意大利正在争取成为奥地利在经济上政治上的保护国，为了奥地利保护阿尔卑斯的关卡和的里雅斯特。

可是墨索里尼却为这种保护提出了苛刻条件：奥地利要顺应法西斯主义潮流解散议会，这样就把民主彻底埋葬了。如果不消灭或者剥夺社会民主党的权力，这个奥地利最有势力的组织最严密的政党是不可能答应墨索里尼的条件的。若要摧毁这个政党，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依靠残酷的暴力。

多尔富斯的前任伊格纳茨·赛佩尔已经针对那些恐怖的活动建立了一个组织，即所谓的"民团"。从外表上看，这是一个极为可怜的组织。它是由外省的小律师、退伍军人、不明身份的人、失业的工程师组成，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失望，并且他们之间也疯狂地仇恨起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所谓的领袖，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亲王。这位亲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的脚下，反对德意志共和国，谩骂民主，现在却率领着自己的雇佣兵成了希特勒的敌人而到处游荡，并且声称"要罢许多人的官"。那些民团的人到底想干些什么，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实际上，民团的士兵无非是想混一口饭吃。他们全部力量不过是墨索里尼的拳头，是他推着他们向前走的。那些表面上标榜爱国主义的奥地利人，实际上他们正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着的树墩，但自己并没有觉察到。

社会民主党比较清楚的认识到，真正的危险究竟在什么地方。从这个党的本身来说，它并不需要害怕公开的斗争。它自己有武器，并能通过总罢工使所有的铁路、水厂、电厂陷入瘫痪。该党也清楚，希特勒正等待着一场所谓的"赤色革命"的发生，以此为借口，他就能以一个"救世主"的名义，命军队开进奥地利。在这种形势下，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比较妥当的解决办法是：牺牲自己大部分的权力甚至取消国会，以便达到一项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当时奥地利正处在希特勒主义的阴

影威胁下。在这种严重的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一切有理智的人都会支持这种折衷方案。甚至像多尔富斯那样多谋善断、功名心很重、但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人，也倾向于大家的意见。可是年轻的施塔勒姆贝尔格和他的同伙，即民团的另一个头目法伊上校，他们则要求保卫联盟交出其武器，同时要求消灭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苗头，社会民主党则反对这类要求，双方阵营陷入剑拔弩张的地步。后来法伊上校在谋杀多尔富斯的事件中是主要的角色。人们感觉到，一场决战正迫在眉睫，我们大家都怀着紧张的心情，在预感中想起了莎士比亚的话："这么恶劣的天气没有一场暴风雨是不会放晴的。"

我在萨尔茨堡只住了几天，接着就到了维也纳。恰恰是二月的头几天，那场暴风雨就突然爆发了。民团在林茨袭击了工会的驻地，他们以为这里有军火库，为了夺取军火。工人们以总罢工来回击他们。多尔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镇压那次纯粹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革命"。所以，正规军用机枪和大炮威逼维也纳的工人区。整整进行了三天艰苦的巷战。这是西班牙内战前欧洲最后一次民主和法西斯的较量。工人们在装备精良的强大的军队面前坚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维也纳，因而我是那次决战的见证人，我也是奥地利自我毁灭自己独立自由的见证人。但是，我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人，我会老老实实说，我根本没有看到所说的那次革命，而我认为那样看纯粹是荒唐的事。要是尽可能地真实而又清楚地说明当时的真相，必须有挺身而出的勇气来揭穿那些浪漫主义的胡思乱想。我反而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最能体现现代技术的特点和革命的本质，可是只发生在城市里几

个个别地区的个别事件也算是革命。因此大多数居民并没看到革命。所以看起来特别奇怪：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就在维也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维也纳发生的那些重要事件，什么也没看到，就连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在场，而我一无所知。大炮的轰击，许多房子被侵占，几百具尸体被运走，如此等等，我既没有听到，也没看到。可是在纽约、伦敦、巴黎的报纸读者却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过程，而我这个亲眼见证人却不知道这一切。后来，我经过多次的事实证明了一种奇怪现象的存在：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发生事件的地方只隔着十条街的人，远远不如相隔数千公里以外的人知道得清楚。几个月后的一个中午，多尔富斯在维也纳被暗杀后，当天下午五点半我就在伦敦街头看到这条消息。我马上向维也纳打电话：使我惊奇的是电话居然很快的接通了，使我更加惊奇的是，在电话里我获悉，在维也纳离外交部只有五条街道的人竟不如伦敦街头的人知道得多，知道的早。我必须以维也纳所经历的那次革命作为例子只能从反面加以说明：今天同时代的人要想亲眼看到那些改变世界和改变自己生活的事件的发生是多么不容易啊，如果他不是碰巧在现场的话。当时，我所经历的全过程是：那天晚上，我同歌剧院芭蕾舞女导演玛加蕾特·瓦尔曼在环城大道咖啡馆见面，我是步行去环城大道的，正当我漫不经心地穿过马路时，突然有几个穿旧军服的人端着枪向我走来，问我到哪里去。我告诉他们，我要到 J. 咖啡馆去，他们就放我过去。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实际上当时在郊外已经打了好几个钟头的枪战，可是在市内的人并不知道。因为我想第二天晚上回萨尔茨堡，当晚我回旅馆结账时，旅馆门房对我说，恐

怕走不成了，铁路不通车了，铁路工人在罢工；另外，市郊正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天的报纸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一次暴动的报道相当含糊其词，好像说暴乱已经被平息。实际上，那天的战斗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政府决定用机枪以后再用大炮对准工人住宅区。可是我并没有听到大炮响。如果那时整个奥地利被占领，不是被社会党人，就是被纳粹党人或共产党人所占领，我依然知道的极少。也许就像慕尼黑人那样，什么也不知道，等早晨一觉醒来，才从《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看到，他们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当时市内的一切都像往常一样平静、有条不紊，而郊区的战斗依然非常激烈。我们天真地相信官方的报道，认为一切都已解决，一切都已结束。我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些资料，那里坐着许多大学生，他们在看书、在学习，跟往常一样；所有的商店都正常营业，完全没有什么不安的迹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过去了，人们才获知零星的真相，铁路交通还没有恢复。第四天早晨我才启程返回萨尔茨堡。在萨尔茨堡的大街上，我遇见几个熟人，他们急切地走来向我打听，维也纳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作为那次革命“亲眼目睹者”的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们：“我不知道此事，还是买一份外国报纸看看。”

奇怪的是，那些事件结束的第二天，在我一生中重大抉择突然落在我身上。从维也纳返回萨尔茨堡再到我的家已是下午时分，家里的桌子上堆满校样和信件，我把所拖欠的工作干完，已到深夜了。翌日早晨，我还在床上躺着，就有人敲门，是我们那位忠实的老仆人，若不是我事先同他有约，他平时不会来叫醒我的。这次他惊慌失措的神色，预示……他说，请我下去

一趟，警察先生来了，要同我谈话。我有点惊奇，穿上晨服，走下楼。楼下站着四名便衣警察。他们通知我，他们是奉命来抄家的，说什么我应该交出全部隐藏的共和主义者保卫联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须承认，刚开始的一刹那我几乎惊呆得不知说什么好。我家里会有共和主义者保卫联盟的武器？实在是太荒唐了。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在萨尔茨堡了，这岂不是说这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吗。一个军火库居然设在我的家里，怎么没有人看见把枪支弹药向山上运送呢！我没有好回答的，只好冰冷冷地说："请，您搜查吧。"那四个秘密警察穿过房间，打开一些箱柜，又敲敲墙壁。从他们搜查时马马虎虎的神情看，我马上明白了，这种搜查纯粹是一种形式，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在这所房子里存在一个储存武器的仓库。半小时后，他们宣布搜查完毕，接着便走得无影无踪。

这场恶作剧在当时为什么使我如此愤慨，恐怕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因为近几十年来，欧洲和世界上的人几乎已经忘记了，个人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自一九三三年起，搜查、随便抓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国家、流放以及各种形式贬谪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在我认识的欧洲朋友中，无一人没有经历过这种遭遇。在一九三四年初，在奥地利无故搜查一个公民的家庭，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可是像我这样一个完全脱离政治，多年来没有行使过公民权的人也进行搜查，必须有特殊的理由。事实上，这是奥地利的典型作法。萨尔茨堡的警察首领觉得十分必要，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民族社会主义者用炸弹和爆炸品扰乱居民终日不得安宁的暴行。而采

取这种严厉措施是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纳粹党采用恐怖手段加以反击。当局每天都收到恐吓信，说什么，要是“迫害”纳粹分子，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从统计资料看，纳粹分子所说的报复的话，一直是百分之百实现的。那些忠实的奥地利官员们，在希特勒进驻的第二天就被关进了集中营。可想而知，搜查我家清楚地表明，那些人对任何人都采取这种所谓的安全措施。我在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插曲背后反而觉得奥地利的局势是多么严峻，从德国来的压力是这么强大。自从那几个警察到过我家后，我再也不喜欢我那个家了。一种确切的感情向我表明，这种插曲只不过是大规模侵犯人权的可怕的前奏。当天晚上，我把最重要的文件捆装成包。决定长期浪迹天涯。可是我觉得个人的自由是人世间最重要的。所以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离开祖国的意义更深远。我们的家庭对那所住宅的眷恋胜过对自己的家乡，我们全家人都热爱住宅那片土地。可是我更渴望自由。我没有跟我的朋友和熟人说明我的打算，两天后径直返回伦敦；到了伦敦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萨尔茨堡当局，我已决定放弃我的住宅。那是我脱离自己祖国的第一步。不过我知道，自从维也纳发生事变以后的几天，奥地利已经失败——当然我不能预测，我会因此失去多少。

和平的濒死状态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逼近；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尤里斯·凯撒》**

我在伦敦的头几年，多少有点像高尔基在索伦托一样感到有点流亡的感觉。即便是在那次所谓的“革命”之后，紧接着纳粹企图用突然袭击和暗杀多尔富斯等卑鄙手段占领那个国家，可是奥地利依然存在下去。我的祖国又继续挣扎了四年，自然我可以随时回去。我还没有失去自由，我也没有被驱逐。我的书完好无损地放在萨尔茨堡的家里。我身边带着奥地利的护照，奥地利还是我的祖国，我还是奥地利的公民——还是有全部公民权的公民。那种可怕的、没有亲身经历过而无法体会的、失去祖国的处境还没有开始，却引起

了我搅乱神经的感觉，好似睁着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虚中神志不清，心里反倒明白，无论你在哪里落脚，随时都会引起人的反感。而我正处在这种尴尬境地的最初阶段。当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维多利亚车站下车的时候，好像这次的来和那次的去不一样，过去是一座去作客的城市，而如今则是决心长期居住的城市。我不知道，在伦敦我会住多久。只有一点对我是重要的：那就是我又可以从事自己的创作了，又可以维护我的人身自由和内心的自由了。由于财产是一种累赘，所以我没有计划买房子，只是租了一套简单的公寓，房间刚够用，我少量的书可以放在两个壁橱里，我是一刻也离不开书的。房间里还可以放一张写字台，这样已满足了我一个脑力劳动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有客人来，就没有住的地方了。我宁愿住在最狭小的房间，可以随时出去旅行。在无意中使我的生活变成了临时性的，不能再作长远的打算。

在第一天的晚上——天已经黑了，墙壁的轮廓在昏暗中渐渐模糊起来——我踏进刚刚布置好的小房间，我不觉吃了一惊，在一刹那间，我仿佛走进了大约三十年前我在维也纳为自己布置的那个小房间。因为两个房间一般大小，墙上同样贴着那句对书的祝辞，同样挂着那幅布莱克的画：《约翰国王》；这幅画一直陪伴着我，国王幻觉般的眼睛始终盯着我。我需要时间镇静一会儿，以便回想起维也纳的那套小房间，因为我已经多年没有想到它啦。相隔这么长的时间，难道过去生活过的房间成了我今天住房的象征吗？难道我自己又变成幽灵的象征？当我三十年前在维也纳为自己选定那间斗室时，我的工作命运已经开始。当时我还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来，或者说，没有创作出重要作品；我写的书，我本人的名字还没有在祖国生根。现在

——在惊人的相似环境里——我的著作已经从自己的语言中重新消失了。我写的一切，现在对德国来说已经相当陌生。朋友们都已疏远，昔日的联系已经中断。贮藏收藏品、绘画和书籍的住房已经失去，我现在像三十年前一样，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围。我当初努力做过的、学过的、享受过的一切，看来都已飘逝。我已经五十岁，还要重新开始，又要坐在写字台前当学生，早上疾步走到图书馆——只是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一层薄薄的沮丧。

每逢谈到有关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英国的情况时，我总有些犹豫，因为我已经踏进了我们的时代，并且我们大家几乎都同样经历过这个时代，怀着同样由广播报纸煽动起来的不安，怀着同样的希望和同样的烦恼。今天我们大家很少怀着骄傲的情感去回想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情感回想那个时代把我们引向何方；过去谁想说明问题，那就要先控诉一番过去，可是在今天，我们谁还有这种权利呢！所以，我在英国的生活处处谨慎节制。我知道自己憨厚得不会克制自己的内心障碍，所以我在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里，断绝了一切社交活动。我私下里想，当他们在讨论时局的时候，我这个外国人怎敢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呢；在奥地利的时候，我对那些领导人物愚蠢的作为尚且无能为力，我怎么能够去评价英国领导的作为呢?我很清楚,我只是这个美丽岛国的一个客人——我们对这个消息知道的比较清楚、比较可靠——指出希特勒将给世界带来的危险，那么英国人就会认为这仅仅是我个人感兴趣的看法。当然，如果亲眼看到他们那些明显的错误而缄口不语，有时也是困难的。眼看着英国人最高尚的道德、诚恳正派、

毫无猜忌地信赖别人的真诚心理，竟被事先精心策划的宣传所滥用，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他们一再受蒙蔽，认为希特勒只要把周围边界外的德国人聚集到自己的身边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示感谢希特勒会把布尔什维克主义铲除，这样的诱饵确实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效果。只要希特勒在演说中说出“和平”这个词，英国的报纸就会热烈欢呼，而忘记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就不再思考德国如此疯狂地扩军备战到底是想干什么。从柏林旅游回来的旅客盛赞德国的新秩序和新秩序的设计大师，那是因为他们的旅行访问是经过预先精心安排的，受到恭维般的接待。英国开始逐渐默认那位新领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国是合乎道理的——可是没有人理解，奥地利是欧洲大墙里的一块基石，谁要是把它挖掉，全欧洲必然垮台。我以焦急的心情感受到英国人和他们的领导人存在着那种被人诱骗的天真和高尚的轻信，因为我亲眼目睹冲锋队员凶恶的嘴脸，并听到他们在唱：“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就将是全世界。”政治局势越紧张，我就越避免同别人交谈，避免任何公开的活动。在英国我从没有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同时局有关的文章，从没有在电台上讲过话，从没有参加公开的讨论会；在过去的世界里，唯有对英国，我没有说过一句话。我生活在斗室里，比我三十年前作为大学生住在维也纳的那间小屋，更加匿名无声。因此，我今天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却没有权利去描述英国；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前我并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来的力量。

在英国我并没看到几个作家。我刚开始接近的那两位作家约翰·德林克沃特和休士·沃尔波尔，恰巧提前被死神带走了。较年轻的作家，我更无法看到。由于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深

负着一种不幸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乐部、宴会厅和一切公共场所。虽然这样，我还是经历了一次真正难忘的特别欢乐，我看到两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肖伯纳和H·G·威尔斯，和他们一起进行一次私下的成见极深的、但外表文雅得体的争论。我事先并不知晓，他们之间有那么深的隔阂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在这两位作家之间那种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他们互相问候的时候就已经让人觉察到了。他们彼此之间像半开玩笑似地嘲笑对方，所以我当时的处境既尴尬又深感有趣。他们之间必然有重大的原则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经消除，或者，要通过这次午宴来加以解决。这两位在英国享有声誉的大人物在半世纪以前均是文学团体“费边社”的成员，当时他们尚且年轻，他们肩并肩地为年轻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过，从那以后，他们都按自己个性的特点发展，彼此之间的距离越距越远。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憧憬着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肖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目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现实，以便检验他明智的“愉快的戏剧”①。他们的外部形态也随着岁月而形成鲜明的对照，肖伯纳，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竟然如此精神抖擞，当时他只吃些核桃和水果，嘴巴还不时地发出格格的响声；他身材高大、瘦长，一直轻轻松松，十分健谈，谈话时经常发出朗朗笑声，他比以前更喜欢自己的奇谈怪论；而威尔斯，这位乐天派的作家也已是六旬的老人了，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的生活，他身材矮小，面颊红润，他偶然表现得轻松愉快，而多半是严肃有余。肖伯纳善于进攻，能迅速又巧妙的变换进攻点；

①“愉快的戏剧”，肖伯纳把自己戏剧分为“愉快的戏剧”和“不愉快的戏剧”两大类。

而威尔斯在战术上长于防卫，他不动声色，好像他是一个教徒、一个信念坚定的人。我很快得到这样的印象，威尔斯来我这里不仅是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谈话，而且也是为了一场原则的争论。正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气氛有点紧张。两个人的每一个表情、每次目光、每一句话，都反映出一股傲慢的气质和相当认真的好斗情绪；就像两个击剑手在正式激烈的交锋之前，总是先用小小的试探碰击来试一试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肖伯纳思路敏捷，当他回答问题或者避开某个问题时，在他那浓眉下的眼睛里总是闪闪发光，他喜欢幽默和喜欢文字游戏，在过去，经过了七十年的千锤百炼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此深感自豪。在轻声轻气长时间的笑声中，他浓密的白胡子不时地颤抖；他的头稍微有点偏斜，好像他总是注视着自己手中剑的剑头是否刺中了对方。而威尔斯，他面颊红润，一双深沉的眼睛，他的言词尖锐，表达的直截了当；他的理解力也同样敏捷，但他不喜欢华丽的词藻和拐弯抹角的手段，他喜欢单刀直入。这场舌战宛如剑击一般，进行得非常激烈，非常迅速。剑光闪闪，你来我往，你刺我挡，我刺你闪，好像给人带来无穷的乐趣。使观战的人对这场击剑比赛的剑光闪烁你来我往的技艺怎么去赞扬都不会过分。在这场快速的、一直在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这表现了英国人高贵的风度。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在这种最文雅的辩论形式中充分表现出来。这次辩论如此紧张，这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两个极端对立的人的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表面上看是由某件事引起的，实际上早就有不明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么说，我所看到的是两位英国最优秀的人物所进行的一场十分精彩的争论。而后来他们在《民族周

刊》继续了好几个星期的论战，却没有引起我的一点兴趣，因为文字论战远不如那次激烈的对话引人入胜，因为只有抽象的论据，而见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实质问题再说也说不清楚。但是，才智很高的人之间发生摩擦，是非常难得的。这场争论使我茅塞顿开。不管在这之前或者之后，我从未在喜剧里听到过这样精彩的对话艺术，因为他们的对话艺术并非刻意追求什么戏剧效果，而是极自然达到的。

可是那几年，我在英国只是占了一个空间，而我整个的灵魂并没在英国。恰恰是对欧洲的忧虑，这种痛苦的、压迫神经的忧虑，促使我从希特勒掌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几年里，经常外出旅游，甚至两次渡过大西洋。促使我外出旅行也许是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开放，只要轮船在航道上安全行驶，我就应该在更黑暗的时代到来之前多积累一些常识和经验；使我下大决心去旅行的原因，也许还有一种渴望：我想亲眼看看，当我们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而大西洋彼岸世界是怎样建设的；我甚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的未来，我自己的未来，是否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彼岸。美利坚合众国邀请我环美演讲旅行，这给我一次极好的机会看看那个强大国家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看看那个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万众一心的决心。不过，我对南美的印象特别深刻。我愉快地接受了国际笔会的邀请，到那里去参加大会。我倒觉得，在这个时刻，没有比超越国家和超越语言的思想团结更为重要的了。在这次旅行之前，我在欧洲的最后几个小时，可怕的警告伴我上路。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表面上看，这次战争不过是这个美丽又可悲的国家内部矛盾造成

的；但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势力集团为自己未来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我是从南安普敦乘英国轮船启程的，我原以为，为了避开战争地区，轮船会绕开往常停靠的第一站西班牙西海岸城市维哥。但出乎我的意料，轮船竟驶进了这个港口，而且允许旅客上岸玩几个钟头。当时的维哥已经掌握在佛朗哥党徒的手中，离真正的战场还很远。在那段不多的时间里，我还是看到了一些着实使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厅前飘动着佛朗哥的党旗，在市政厅的前面有不少年轻人，他们穿着农民的服装，在牧师的率领下，排着队，这些年轻人显然是从附近农村来的。我开始还不知道，当局叫他们来做什么？是临时招募的工人？或许是来领救济金的失业工人？可是一刻钟后，我看到的同那些青年一样的人从市政厅出来，而大变了样，他们穿着簇新的军服，佩戴着枪和刺刀，在军官的监视下，登上崭新锃亮的汽车，穿过几条街道，向城外开去。我一阵害怕。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样的场面？第一次是在意大利，后来是在德国！那些簇新军装、崭新的汽车和机枪突然出现在这里和那里。我又一次反问自己，是谁提供的军装？是谁付的钱？是谁把这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的？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那些新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运进来的，毫无疑问，是从近邻葡萄牙越境而入的。可是，到底是谁提供、是谁付钱的？这是一股想取得政权的新势力，也是一股在这里也在那里活动的势力，同样也是一股喜欢暴动、需要暴动的势力。我们忠诚的信仰，并为之终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这股势力看来，早已成为古董了。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

他们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康采恩里，狡猾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欲和自己的事业服务。他们信奉暴力，想用新的、难以捉摸的伎俩把旧时的野蛮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亲眼目睹、自己亲身感受到的印象对心灵产生巨大的力量远远胜过报纸上许多文章和一些小册子产生的力量。我从来没有比这一时刻如此震惊过，我亲眼看到这些无辜的年轻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同自己国家的同胞兄弟打仗。我突然预感到，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也是欧洲面临的现实。轮船停了几个小时又起锚了，我赶快上船，走进船舱里。要是再多看一眼这个美丽的、但遭到外国罪恶蹂躏的国家，会使我更痛苦。我觉得，欧洲由于自己的疯狂而濒临灭亡。欧洲，我们神圣的故乡，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圣殿，正在走向死亡。

从罪恶的欧洲看到阿根廷国土上的和平景象，当然令人更加高兴。这里是另一个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化在这一片新的、辽阔的、没有流过血的、没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上得到保护和延续。这里有丰足的粮食、过剩的财富和利润，这里有无限的空间，是未来的粮仓。对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给我带来了新的信心。数千年来，文化不是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吗？如果一棵大树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保留下来，不愁它不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像大树一样，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永不枯竭。可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衡量。我对自己说，人们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应该超出欧洲来考虑问题；人们不要把自己埋葬在逐渐消亡的过去，而应该参与重建新的历史。因为这座百万人口的新城市里，它的所有居民对我们的

大会表现出友好的热情，所以我才辨别出来，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外人；在这里，对思想统一的信仰——我们把最美好的东西都贡献给这种信仰——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价值、仍然起作用。我们有了共同的信仰，即使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纵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在这里一个新任务代替了旧任务：那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在更大胆的设想中建设我们所渴望的共同事业。如果说我最后一瞥看到战争将近，而对欧洲已经失去信心，那么，我在南方的十字星座下却又重新开始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信仰。

巴西也给了我同样的深刻印象，也给了我很大的希望。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有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在它那片广袤的国土上，至今还有铁路、公路，乃至飞机未曾到过的地方。在这里，历史遗物被保存得比欧洲还要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毒还没有侵入到此地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中。这里的各族人民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礼貌待人，不像我们欧洲，各民族之间存在着仇恨。这里的人不是由人们用荒谬的血统论、种族论和出身论来划分的，而是大家一律平等。一种奇妙的预感使我事先就觉得，我可以在这里安静地生活，这里的空间为未来的无限繁荣提供了条件。可是在欧洲，各国为了一点点空间而付诸武力，使得政治家们焦头烂额。这里的大地期待着人们去开发，用现代的技术去充实它。欧洲文明所创造的一切都能够在这里以其他的新形式得到富有成效的延续和发展。这里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使我赏心悦目，我已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但是旅行，继续不断地到另一片星空下，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不意味着脱离欧洲、摆脱对欧洲的担忧。看起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几乎是凶狠的，当人类成功的技术把大自然最

秘密规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技术成就反而扰乱了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最坏的灾难，莫过于阻止我们逃避现实，那怕只是一刹那的逃避。我们过去的祖辈，当他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便可逃到偏僻孤独的地方；可是现在，在同一时间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都能知晓或感受到某个地方发生的事件。尽管我距离欧洲那么远，可是我随时都知道欧洲的命运。在巴西的佩尔南布戈城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十字星座就在我们头上。我疲惫不堪地混在黑色皮肤的人群中在大街上走着，忽然我从报纸上看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几个月前我曾与这位朋友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乘坐在一辆普尔曼①式的车厢里，飞驰行驶在休斯顿和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大声喊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客把车厢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语的电台上。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无时不在怀着痛苦的忧虑思恋着欧洲，一直眷恋着欧洲中间的奥地利。在众多危险的地区中——从中国到西班牙的埃布罗河和曼查那雷斯城——唯有奥地利的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似乎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是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部系在那个小国身上——这正是我的祖国。如果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洲的政治家没有执行简单明了的威尔逊计划，不执行也罢，反而歪曲。他的中心思想是给小国自由和独立的权力，威

①普尔曼（1831—1898），美国铁路工程师，他创立了普尔曼公司，生产车厢等铁路器材。

尔逊正确地指出：这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的大国和所有的小国都参加的一个有约束力组织的保证下才能得到确认。由于还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无法实现纲领的那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可是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连续不断的紧张的空气。因为再也没有比小人的狂妄欲望更危险的。所以，那些小国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国之间你争我夺的阴谋，为自己获得这一小块土地而争吵不休。波兰人同捷克打仗，匈牙利人向罗马尼亚开战，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交火；而在这些对抗中，唯有小小的奥地利敢于同庞然大物的德国对抗。这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想支配全欧洲；我始终强调，奥地利已成为欧洲城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国百万人口的最大城市，所有的人都没有那种精神准备：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会被希特勒公开吞并。他们也觉察不到纳粹党利用维也纳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起，翻几个个儿。希特勒依靠他在维也纳发展众多的组织将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我们奥地利人才知道，希特勒是在一种由愤恨激起的欲望驱使下向维也纳进军的。希特勒在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正住在这座城市里，这次他要以凯旋而归的统帅身份进入这座城市。所以，每逢我匆匆忙忙回一趟奥地利，接着又越过边界返回来，这时总算舒一口气："幸亏希特勒还没有来"，我回头看一下，好像这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灾难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年里，每天早上别人看报时神情泰然自若，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里害怕这样大写的标题：奥地利完了。可是，当我装作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觉得这是多么欺骗自己啊！我每天从遥远的地方为奥地利慢性的、发烧的最后挣扎

而深为痛苦，比在奥地利的朋友更为深切。他们在国内以为爱国主义游行就能镇住希特勒，这才是自欺欺人呢。他们每天以此为保证："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首先是墨索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像病人相信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非常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我最后一次回到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对那些越来越近的灾难产生的恐惧心理促使我亲自去看一看。一九三七年我为探望老母回了一趟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干，更没有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横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天正是英国掌玺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飞往柏林的日子，这是他第一次同希特勒本人进行谈判。在《旗帜晚报》第一版上，我只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其中一条是涉及奥地利的。我从这些字里行间感觉到或者说我已经看到，他在出卖奥地利。因为同希特勒谈判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奥地利人全都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绝不会让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的内容归纳为几点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旗帜晚报》上，在下午晚些时候出版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上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设法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旗帜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它的真实性，我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对这个消息却吃惊不小；这就是说，希特勒已经同英国在谈判奥地利的问题；现在我坦白地说，当我看这份报纸时，我的手在发抖。不管消息是真是假，

这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激动过，因为这个消息似乎有一点点真实，那就是意味着奥地利开始完蛋了，欧洲城墙上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随之欧洲也会崩溃。我立即转过身，跳上一辆上面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有明天早上的机票。因为我想再去看一次年迈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故乡。很巧，我买到了一张飞机票，我飞快地将东西塞进箱子里，就飞往了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对我迅速地、突然地再次回到维也纳，感到十分奇怪。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嘲笑我是庸人自扰。讥讽我是圣经上的先知“耶利米”。他们问我，是否知道奥地利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喋喋不休地赞扬“爱国阵线”组织的盛大游行；我在萨尔茨堡看到过这种游行，绝大多数示威者在外衣领上别着一个统一的徽章，凭徽章彼此好照应，避免发生危险。同时，为了谨慎保险起见，他们早已在慕尼黑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的历史够多了，我知道的太清楚了：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我同时也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劲头高呼“希特勒万岁”。可是，在维也纳所有同我交谈过的人都表现出天真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他们根本没有料到，不久就会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忙着购买圣诞节礼物，把自己的家布置得更漂亮（他们也没想到，几个月后，这些东西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那么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爱它的逍遥自在，我整个的一生也在梦想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岑格鲁贝尔曾把这种无忧无虑概括成一句简练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的。”可是，这回第一次使我感到痛苦。终有那么

一天，突发的事件也会使他们痛苦的。虽然我的这些朋友，在维也纳的朋友，他们比我聪明，不会有心灵上的痛苦，只会在大难临头时才开始觉得痛苦。而我呢，在事先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大灾大难真的降临时，又产生了第二次痛苦。我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再也不去警告任何人了。何必去打扰那些不愿别人打扰的人的安逸生活呢？

不过，我如果说，我在维也纳的最后两天望着我出生的城市每条熟悉的街道、每座教堂、每座花园和每个古老的角落时，我总有一股绝望的“永不会再有”的感觉。人们以后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故弄玄虚而认为完全是真话。我拥抱我母亲时，也有这种暗藏的“这是最后一次了”的感觉。我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对这个国家的一切都怀着“永别了”的情感。这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诀别。列车途中经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工作二十年的住宅；但是，火车进了站，我却没有下车，虽然从车窗里能够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引起我对消逝岁月的回想，当时我没有下车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永远不能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那一刻，我就像圣经里的老祖公罗得一样，知道身后尽是尘土和灰烬，由它们凝结成像盐块一般苦涩的历史。

我觉得，当希特勒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想，将作为凯旋而归的统帅占领这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苦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那座城市维也纳的时候，我就预见到将会发生一切可怕的事情。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终于爆发了我预料的那种惨无人道的事件。那一天里，奥地利以及欧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战利品！现在他们的假面具已经完全撕下来了。但是，

我对这种不仁道的事情的想象以及其他人都有如此的想象，与事实相比显得多么保守、多么懦弱又是多么可怜啊！由于其他国家公开表现出畏惧的情绪，不能理直气壮地对付侵略者，所以残暴势力不再顾及任何道德的约束了，也不再需要——英国、法国、世界还算个什么？——利用从政治上消灭“马克思主义”这个虚伪的借口。而现在不仅是掳掠抢夺，而且每个人都在恣意放纵自己的复仇私欲。使得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去擦洗马路；憨厚老实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拖进寺庙；狂吼乱叫的年轻人逼着他们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这些年轻人像抓兔子一样把无辜的人抓在一起，押他们到冲锋队的营房去打扫厕所。病态的、污朽的仇恨狂人过去只能在黑夜里痴心妄想一切，而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发泄出来了。他们闯进居民的住宅，从吓得发抖的妇女耳朵上抢走珠宝首饰——类似这样的洗劫在中世纪野蛮时期也曾发生过；可是那种折磨别人的无耻私欲是对无辜人心灵上的摧残，以及变换手法的侮辱都是过去不曾有过的。所有的这些罪行已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千万万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到一个平静的环境里——不是我们这个道德沦丧的时代——阅读这些记录报告使人心惊肉跳，一个空前绝后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纪的这座文化名城里犯下了滔天大罪。因为正是希特勒在他的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凶恶的一次胜利，这样一个人居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办法，砸碎每一条法律。在这种“新秩序”的面前杀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而表面上吹得再天花乱坠，也会使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纪是不堪想象的。当时，人们把没收财产，明明白白地称为抢掠。可是现在，在一个接踵而至的圣巴托罗缪夜

晚① 之后，在冲锋队员营房里和铁丝网的后面，每天都把人打得死去活来，还谈什么正义呢？还谈什么人世间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奥地利被占领以后，惨无人道、无法无天及野蛮粗暴的罪行在我们的世界已遍地开花了，这是数百年之前从未出现的现象。要是这座不幸的城市维也纳在以前发生了这样的事，足以遭到国际的摈斥，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这些暴行之前，就已经沉默，或者只是嘟囔几句。

这些天以来，每天都有来自祖国的呼救声，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亲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为每一个我所爱的人担惊受怕，但却无能为力。今天，我毫不害羞的说，当我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当时我们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悲痛——这个时代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此麻木、如此反常——而且相反，我倒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会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她已八十四岁了，双耳几乎全聋了，她就住在我们家的老宅里。根据新的“雅利安人的法律”，她可以暂时不被驱逐。我曾经想，再过一些时间，通过一些手续和办法把她接到国外。可是不久，在维也纳发布了第一批法令中有一条规定击中了她。她已八十四岁，体力不支，她只能每天出去走一走，走上五分钟或十分钟就累了，总习惯在环形大道或者公园的椅子上坐坐歇歇。希特勒在这座城市里刚当上八天的新主人，就下发了残酷的禁令：不准犹太人坐在长椅上。这条法令

①圣巴托罗缪夜晚，指16世纪法国巴黎屠杀新教徒之夜（1572年8月24日）。

也够绝了，想方设法折磨人的肉体。如果说，抢劫犹太人的财务，还有他们自己的一点逻辑，也可理解。因为他们可以把从工厂、私人住宅、别墅里抢来的东西奖赏给自己的老部下，将空缺职位赐给自己人。戈林的私人画廊之所以这样富丽堂皇，要归功于那种大规模的抢劫。可是不让一位老妇人或者一位精疲力竭的老头儿坐在长椅上喘一口气，居然发生在二十世纪里，只有那个家伙才能干得出来；而千百万人却把这个家伙尊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幸运的是，我的母亲再也不会受到那些野蛮行为和侮辱了。在维也纳被占领几个月后，她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跟她的去世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那些细节对说明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是重要的，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一天早晨，八十四岁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觉，请来的医生很快就说，她可能过不了这天晚上，医生还雇来一个女看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守护在老太太临终的床边。我母亲仅有的两个儿子——我和我的哥哥——正巧都不在她身边，当然无法赶回来，因为即使我回到临终母亲的床边，对德国新文化的维护者来说也是一种罪行。于是我的一位堂兄决定在老太太屋里过夜，这样，在她断气的时候，还有个家人在场。我的那个堂兄当时已六十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事实上，一年之后他也死了。当他正准备在隔壁搭床过夜时，女看护出现了——我今天写这件事，对她是相当不光彩的——她解释说，很遗憾，按照纳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在要死的人身旁过夜的。她说，我的堂兄是犹太人，她作为一个不到五十岁的女人，即使在一位将死的老太太身边，也不可能同我堂兄在同一住处过夜的。按照这位挑剔者的意愿，我的堂兄应该首先考虑到的是：不

要给她带来种族上的耻辱。她又说，她当然对这种规定也感到非常苦恼，可是她又必须遵守这些法律。我堂兄为了能让女看护守留在我临终的母亲身旁，自己被迫离开了这个住所。现在人们也许会理解：我为什么庆幸我母亲没有继续活下去。

奥地利的形势突变也给我生活上带来了变化。起初我对奥地利的变化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仅仅是形式上换了一个政府，可是我的旧奥地利护照失效了，我不得不向英国当局申请一张白卡，即一张无国籍身份证。过去我常常在世界主义的美梦里为自己私下描绘这样的情景：没有国家、不用为某个国家承担责任，就这样让所有的人没有区别地生活在一起，这该是多么美好啊！又多么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情啊！可是，我又不得不再次确认：我们人间的幻想是多么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十年前，我在巴黎遇到过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抱怨地对我说，他的书在俄国遭到禁止，当时我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才不痛不痒地安慰他几句；面对当前国际上流行的通病，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可是，当我的书在德国消失时，我才清清楚楚理解他的抱怨。因为我写的书只能通过翻译，以合乎译文的习惯和变化了的媒介形式才能出版，所以我在英国的地位不如在其他国家里高。因此，我在这段时间里——当时，我在前厅申请人坐的长凳上等了一阵之后，才把我引进英国官员的房间——才懂得，把自己的护照变成一张外国的身份证意味着什么。因为过去我有权要求得到奥地利的护照，每一个奥地利领事馆的官员或者警察局的官员都有义务立即给我这个享有一切公民权的人填发护照。可是现在我要得到那张英国的外国人身份证，必须提出申请。这是一种经申请

得来的照顾，而且这种照顾随时都可能被收回。一夜之间我又降了一级。昨天还是一位外国客人，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位有身份的绅士，我在那里支付外汇并且纳税，现在我却变成了流亡者，一名"逃难者"。我被降至那类少数人中间，虽然他们还属于正经人那一类。从此之后，我每到一个国家，持白色身份证的人得由本人提出特别申请。因为所有的国家对我这个个人身份的归属不清、没有法律保护、无国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们这类人同其他人不一样，如果我们在某个国家变得令人讨厌或逗留时间太长，必要时，他们就会驱逐我们或把我们遣返回自己的国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同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人们不会把他当人看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到世界意识的大倒退，可能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自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想在那里呆多久就呆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同年轻人讲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观察他们一再流露出的惊奇神情，那个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护照这件事。人们上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一百多张表格，那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也没有签证，更谈不上刁难；那些国界线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畅通无阻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彼此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

的现象，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国人，至少是害怕异国人。到处都在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要交出左面、右面、正面的照片，头发要剪短露出耳朵，还要留下指纹，过去只要求拇指指纹，现在要十个指头的；此外还要出示各种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证明，推荐信；还必须出示邀请信和亲属的地址；也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丢失了自己。

看来这是些小事。我第一次出国旅行也觉得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由于这些毫无意义的"琐事"，使我们这一代人也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如果我今天算总账，我在那些年里不知填写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时不知写了多少声明、赋税说明、外汇证明、过境和居留许可证明，还有申报和注销。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前厅里不知站了多少小时，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他们有的和善、有的不友好、有的无聊、有的过于热情。我在边境检查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搜查和盘问。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这个世纪里丢失了多少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曾迷信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能成为自由的世纪，成为即将到来的世界主义时代。由于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也是侮辱人格的陋习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呵！因为我们每个人在这几年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官方的这些规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学艺术。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或者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第一条路线是去那里的博物馆、风景区等，而现在却要先去领事馆或警察局领取"居住

许可证”。过去，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常常是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者热烈地讨论文艺问题，而现在，谈论的却是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打听是否要提出申请长期签证还是旅游签证。结识一个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会节省不少时间，同她搞好关系甚至比和一位托斯卡尼尼或者一位罗曼·罗兰的关系更重要。凭着天性我一直感觉到，人是客体而不是主体，所以没有什么权利，一切都是官方赐予的。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停地受盘问、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没完没了。就是今天，我，我作为一个出生在自由时代的人、不接受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对我护照上加盖的图章我一直觉得犹如犯人脸上的烙印；每次盘问、每次检查犹如一种侮辱。我知道这是些小事，一直是些小事，那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的小事情。但是，只有当人们抓住这些小事的特点，以后时代的人才能把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状态完整地记录下来，而那种精神失常的精神状态却深深地影响着两次大战之间的我们这个世界。

也许我早就放纵惯了，我的敏感是由于近几年来世界的巨大变化刺激而生成的。不管是那种形式的流亡不可避免地破坏人的生活本身的平衡。如果人失去了立足之地——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有切实的体会——人就没有了主心骨，就觉得更没有把握，连自己都不信任了。我毫不迟疑地承认，自从我必须依靠外国人身份证或护照生活在异国的那天起，我就觉得主体的我与客体的我是分离的。和原来的我、真正的我相联系的一点天性永远地被破坏了。现在的我比原来的我更加谨小慎微了。我——早先是一名世界主义者——今天时常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在外国能够呼吸到空气也是我的福分似的。我心里自然明白，

这种怪想法是极荒谬的，可是什么时候理智才能战胜感情呢！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是没有成功。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大得多。

但是，并不是只有我一人有这样的不安全感。动乱不安开始渐渐遍及全欧洲。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那天起，政治形势始终阴暗不明。同样在英国，那些曾经悄悄地为希特勒开路，希望能以此换来自己国家和平的人，现在变得更加持重了。自从一九三八年以来，在伦敦、巴黎、罗马、布鲁塞尔以及所有的城市和农村不再有人议论什么，如果有人谈论，不论谈论的问题天南地北，最终必然归结到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上，即是否可以又怎么避免或至少推迟战争。当我回顾战争恐惧在欧洲不断上升的那几个月，我记得，其中只有两三天时间的反常现象，人们重新又充满信心。在这两三天里，人们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乌云总会消散，人们又像往常那样和平的、自由的生活。没想到的是那两三天正是今天被称之为当代史上最耻辱的日子：张伯伦同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谈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们很不愿意回忆那一次会谈，在那次会谈中张伯伦和达拉第有气无力地靠在墙旁边，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面前拱手投降。但是，我在这里希望忠于历史事实的真相，我一定要说，每一个在伦敦经历了那两三天的人，都说这次会谈好极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最后几天，形势才令人绝望。张伯伦刚刚第二次从希特勒那里飞回来，几天以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伯伦到德国去，是为了在波恩近郊的戈德

斯贝格毫无保留地同意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事先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几个星期前还能使希特勒感到满足的事，现在已不能满足他那歇斯底里的欲望了。英法的绥靖政策和“争取再争取”的政策可悲地失败了。在英国的轻信思想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个欧洲只有这样的选择：要么在希特勒的淫威面前屈服，要么拿起武器同他对抗。看来，英国是下定了决心，人们对备战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公开示威。工人突然出现了，他们在伦敦的公园里、在海德公园、摄政王公园，特别是在德国大使馆对面筑起了防空洞，以防备轰炸。舰队也作了战时动员，总参谋部的军官经常在伦敦和巴黎之间往返飞行，为了共同协调防务的措施。开往美国去的船只挤满了外国人，他们想及时到达安全地带。自一九一四年以来，这次是英国人第一次觉醒，人们走起路来显得更加严肃和沉思。大家望着房屋和繁华的街道，心里暗自盘算：炸弹会不会在明天就落在它们上面？人们在屋里围着收音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收听晚间新闻节目。笼罩着全英国的可怕的紧张气氛，也深深印在每个人的心田里，虽然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到。

接着在英国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会会议，张伯伦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他要再次努力，试图和希特勒达成协议，并且再次，也就是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议，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和平。他愿意到德国任何地方去会见希特勒。他的建议还没有得到答复，国会会议照常进行，会议期间，回电来了，电报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举行会议。这个消息传到国会会场，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了，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英国国会失去了控制，议员们跳起来，喊叫着，拍着手，大厅里欢笑声此起彼伏。多少年来，在这座庄严的大厅里，爆发出如

此欢乐的情绪恐怕还是第一次。从人性上讲，这是一出精彩的戏，为了拯救和平议员们表现的那种纯真的热情而大喊大叫，完全顾不上英国人的特别是国会议员的老成持重的一贯作风。但从政治上看，这种乐观情绪的爆发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因为国会、国家通过这次热情的欢呼，暴露出它们对战争的深恶痛绝，为了和平，它们非常愿意作出一切牺牲、甚至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放弃自己的威信。张伯伦就是这种人，他到慕尼黑不是去争取和平而是去乞求和平。在当时还没有人预料到，这将是一次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认，也包括我自己，都认为张伯伦去慕尼黑是为了谈判，而不是为了投降。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两三天，这两三天，这两三天，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呼吸。在公园里，人们在挖壕沟，兵工厂忙个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卫大炮，防毒面具也分发到人，疏散伦敦孩子的计划已经制定，还做了很秘密的准备，有的人不理解这种准备，但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准备是针对谁的。早晨过去了，中午、晚上过去了，深夜过去了，人们等待着报纸，听着收音机发出的消息。一九一四年七月那一刹那又出现了，人们忧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着会谈是成功还是失败。

不久，消息突然传来了，它像一阵飓风把压在人们胸口上的乌云吹得无影无踪，使人的心里亮堂了，情绪轻松多了。张伯伦、达拉第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张伯伦成功地同希特勒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隐瞒了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一切冲突的办法。看起来，好像是一位并不显赫的、平淡无奇的政治家，凭着自己的坚韧不拔的和平意志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段最初的日子里，激动的人们都感激他。人们在收音机里首先听到的是题为“为了我

们时代的和平”的那篇消息，它向我们这些经过考验的一代人宣告：我们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再一次无忧无虑，可以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说真话，还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漂亮的言辞所迷惑。谁能相信，一个吃败仗的人竟会凯旋式的荣归？倘若伦敦的广大群众知道张伯伦从慕尼黑回来的那天早上的具体时间，一定会有几十万人到克罗伊敦机场迎接他，向他表示祝贺，向他欢呼；正如当时我们所有人相信的那样，是他拯救了欧洲的和平和英国的荣誉。报纸出版了，上面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十足地大笑着站在机舱口，手里挥动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向大家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张伯伦把这份文件当作送给他的人民的一件珍贵礼物。张伯伦的脸平时非常呆板，一种类似痛苦的表情，显得有点神经质。当晚电影院已放映了机场上的场面，看电影的观众从座位上站起来，欢呼，喊叫。他们相信世界将会出现新的和睦局面，怀着欣喜若狂的情感互相拥抱起来。当时的每个伦敦人，当时的每个英国人都经历过这个空前绝后的、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到大街上转转，以便更强烈地、更形象地去感受这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工人们停止了在公园里挖防空洞的工作，他们围成圈高兴地在聊天，因为有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已成了多余的东西。我听到两个小伙子用流利的伦敦话嘲笑说，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厕所，以弥补伦敦公共厕所的不足。每个人都高兴地跟着大家笑。所有的人都像雨后的花草，显得精神饱满、生气勃勃。他们走起路来腰板更直了，肩膀更轻松了；平时显得冷淡的英国人的眼睛，这会儿也闪烁着愉快的光芒。当

人们知道这些房子不会遭到轰炸，这些房子好像显得更漂亮了。公共汽车装饰得更好看了，太阳似乎更加灿烂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由于那些迷人的字眼显得更加美好更加丰富多彩了。我自己也感觉到异常的兴奋。我不知疲倦地走下去，越走越快，越走越轻松。一股新的信心浪潮有力地、欢快地推着我向前去。突然有一个人从皮克第利街拐角那边向我急促而来。他是一位英国政府官员。我们只是见面认识，他是一个感情不易冲动、非常内向的人。一般情况下，我们见了面只是礼貌地相互打打招呼，他从来不喜欢和我攀谈。可是现在他的眼里闪烁着光芒，一直向我走来。他说："您觉得张伯伦怎么样。没有人相信他，可是他做对了。他没有让步，他挽救了和平。"他高兴得神采飞扬。

他们大家都是那种感觉；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种感觉。第二天仍然是幸福的一天，报纸还是一片欢呼，交易所里行情猛涨。多少年来，从德国第一次传来友好的声音，在法国有人建议给张伯伦树立纪念碑。唉，可是那只是火焰最终熄灭以前的最后细小火苗。在以后的几天里，各种令人不安的细节透露出来了：向希特勒的投降是多么彻底啊，多么卑鄙地出卖了自己曾郑重答应援助和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过了一个星期，真相大白了。投降已不能满足希特勒的欲望了。条约上签字的墨迹还未干，希特勒就违反条约的所有条文。戈培尔肆无忌惮地公开吹嘘，他在慕尼黑会议上把英国逼得走投无路。张伯伦伟大的希望之光破灭了，它虽然只照亮了一两天的时间，可是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从我们真正知道慕尼黑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起，我在英国反而看不到几个英国人，这是悖理的。当然责任在我，因为我

回避他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避免和他们交谈，虽然我比以往更敬佩他们。他们对成群结队来的难民表现得慷慨大方，他们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但在他们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在这一方和那一方之间，内心产生了隔阂：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了解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却不愿去弄清——有一部分人是违心的——他们不顾一切现实，坚持自己的幻想：说出的话就是算数的，条约就是条约，只要理智地和希特勒谈，只要凭着人性同他谈，是能够同他谈下去的。数世纪以来，英国的领导人物由于民主传统，他们所干的工作都是正义的，站得住的。他们不可能承认或者不愿承认，一种欺世盗名、无视道德的新伎俩正在他们身边形成。那个新德国觉得那些准则、条约妨碍他们的话，在与各国打交道时就会践踏以前的一切准则。英国人对一切冒险行为视而不见，反而自认为清醒和高瞻远瞩，既然那个狂人那么快、那么容易、达到了那么多的目的，竟还要铤而走险，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始终相信和希望，那个狂人首先针对别的国家——最好针对俄国！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再与他达成某些谅解。可是我们反而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必将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照片上看到被打死的朋友，还有被拷打同伴的照片，这就使我的眼光深沉严厉，更加敏锐无情。我们这些被歧视、被驱逐、被剥夺了权利的人知道，关于对抢掠财物剥夺权力的事，不论采取何种借口去做都不显得过分或者虚伪。所以，我们这些经过磨难和正准备经受磨难的人——我们这些流亡者——说的话与英国人说的就不一样。如果我说，除了极少数的英国人之外，当时在英国我们这些人是唯一认识到全部危险和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人，我相信说这话绝不是夸大其词。正像当初

在奥地利那样，我在英国依然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锐目光极清楚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危险，只不过我在这里成了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被收留的客人，不能再向他们提出警告罢了。

所以，当我们的嘴唇预先尝到未来的苦味的时候，我们这些被命运打上犯人烙印的人也只不过在自己人中间说说罢了。我们为这个亲切收留我们的国家而忧虑，我们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不过，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能与一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大师一起谈话，也是一件极为欣慰的事，会给我带来无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舞。在灾难到来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有幸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度过了美好的数小时，使我终生难忘。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想着这位八十三岁、多病的弗洛伊德还留在希特勒占领下的维也纳。后来，他最忠诚的学生，智慧超群的玛丽亚·波拿巴公主成功地将这位住在被奴役的维也纳里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来，并送到伦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福的一天：当我在报上看到，他已踏上岛国。我原来以为我永远失去了我这位最尊敬的朋友，没想到，我又看到他从阴间回来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一位伟大的、严谨的学者，在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化和扩大了人的精神知识。我是在维也纳认识他的，他在那里被看作是一个固执己见、一板一眼、十分怪癖的人而受到敌视。他狂热地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他离开了大学和他那学院式的谨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动摇地勇敢地冲向至今没人涉足和胆怯回避的人世间最秘密的性冲动世

界，即当时被庄严宣布为“禁区”的领域。自由世界无意中觉察到，这位乐观主义的、毫不畏惧的学者以他的潜意识学说无情地破坏了自由世界所谓的通过“理智”和“进步”来逐渐控制性冲动的理论。这位学者无情地揭露了伪善者的面纱，使自由世界对这个既想回避又难堪的问题的研究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可是，不仅仅是大学、也不仅仅是老派的神经病医生行会，那些医生联合起来，一致反对这位令他们讨厌的“叛经离道者”。在这位善于揭开伪善者面纱的人面前感到无比恐惧的是整个世界、整个旧世界、旧思想、伦理的“常规”、还有整个时代。医生们开始慢慢地集体抵制他，使他失去了自己的诊所，可是他的理论和他提出来的那些最大胆的试验，那些医生在学术上又驳不倒他，他们没有办法，只有采取维也纳的方式：用讽刺、挖苦，或者使之变成庸俗的笑料，来扼杀他关于梦的理论。只有少数他的忠实信徒每星期都聚集在这位孤独者的周围，举行讨论晚会。神经分析学说这门新科学就是在这些讨论晚会上逐步形成的。早在弗洛伊德为写他的奠基性著作而准备在广阔思想变革的范畴内搜集材料之前，这位杰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动摇的坚强态度已经赢得了我对他的敬佩。他毕竟是一位科学家，年轻人都梦想以他为榜样。在他还没有最后证实和绝对有把握之前，他对该论断总是小心谨慎，从不早透露出去。但是，一旦他的假设得到证实，就是全世界都不接受这个理论，他也要为此奋斗。他个人非常谦虚，但是为自己学说的每一信条而战斗，却是十分执着。他捍卫自己认识的内在真理，始终不渝。恐怕想不出比他在思想上更无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随时都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这样清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会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但他还是要说。他从未想过用最小的——

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让步来改变自己孤立的处境。我今天可以断言，如果弗洛伊德谨慎地把他的理论粉饰一下，把“性欲”写成“情爱”、把“欲念”说成“渴望的追求”，还有，不要总是直截了当地说明那些最后结论，而是用婉转的象征手法写出来，他就不会受到学院派的任何抵制，反而能把他所发现的五分之四的理论发表出来。可是，凡是通用他的理论和学说的地方，他从不迁就。外界的抵制越强烈，他的决心就越大。如果我为道德勇气——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别人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概念寻找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我始终认定有一双安详、深邃的眼睛、具有男性清秀容貌的弗洛伊德。

他给他的祖国增添的荣誉是世界性的和超时代的，可是现在他却从祖国逃出来到了伦敦，看他的年龄，他早已是一个年迈、身患重病的人了。而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暗暗担心，他在维也纳一定经历了所有的苦难，现在见到他，想必他会义愤填膺或者心神不宁。可是我发现，他比以前更开朗，甚至精神更饱满。他领着我到伦敦郊区一栋住宅的一个花园里。“我住的地方更漂亮吧？”他问我，他非常严肃的嘴角边露出轻松的微笑。他把自己喜爱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给我看，那是玛丽亚·波拿巴帮他抢救出来的。“我不是又呆在家里了吗？”写字台上放着他的手稿大张对开纸，他已八十三岁高龄，每天仍用清楚的圆形字体写作，他那股精神劲头，跟他风华正茂的岁月不差上下。他坚强的意志战胜了一切，战胜了病魔、年迈和流亡。在他漫长的战斗岁月里从未外露的善良本性现在是第一次从他的身上迸发出来。只是年龄使他更温和，坎坷的磨练使他更加宽容。我现在发现，他有时候做出温顺的姿态，这是我以前在这个善于克制的人身上从未见到过的。现

在，他把一只胳膊搭在一个人的肩上，眼睛从镜片后面热情地望着你。这些年来，我和弗洛伊德的每次谈话，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学到不少东西，同时我也对他钦佩不已，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这位毫无成见的人所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种坦率的自白能使他吃惊，没有一种论断能使他激动。他教育别人要清楚地看待事物和以清楚的感觉分析问题，已是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年——进行的那次无可代替的长时间谈话。当我踏进他的房间那一刹那，外面世界的疯狂仿佛消失了；最残酷的事也抽象化了；最混乱的思想马上澄清了；眼前的急事愿意服从全局的指挥。我第一次体会到他是一位超脱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是自己的私事，而是把它们看作超越个人的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样，是一种道德上的伟大业绩。当时弗洛伊德已在重病之中，病魔很快就会从我们这里把他夺走。他带着一口假牙说话很困难，所以听者也很费力，因为他每吐一个字都要费很大劲。但是他一句话不说就不让朋友走。他对自己钢铁般的精神特别重视，他让朋友们看到：和他身体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为坚强。他的嘴巴由于病痛而扭曲了，他在写字台上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即使他由于病痛睡不着觉——他平时一直睡得深沉、安稳，这是他八十年来的力量的保证——他也绝不服用安眠药或注射麻醉剂。他不愿用这种方法来抑制自己蓬勃的精神，哪怕是只有一小时。他宁愿清醒地被病痛折磨，他宁愿在病痛中思考，而不是被麻木。他要当精神英雄，直到最后时刻。这场痛苦的战斗延续得越长，就越可怕，越说明他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的阴影越来越清楚地投在他的脸

上，死神使他的面颊枯瘪干瘦，使他的太阳穴从鬓角上突出来，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无法说话，可是死神对他的眼睛却无能为力，那是一座破坏不了的灯塔，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从这里观察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他最后的时刻依然是那么明亮和清醒。有一次，那是我最后几次看望的一次，我带着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里一起去的，我认为他是我们新的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画家，他对弗洛伊德也无限崇敬。我和弗洛伊德谈话时，他就在一旁速写。我从不敢把达里的速写拿给弗洛伊德看，因为他已经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画了下来。

这场最强烈的意志斗争，即我们时代的那位最敏感的思想家同死神的搏斗变得越来越残酷；直到他自己清楚地认识到——清楚对他来说是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他已不能再写作了，不能再工作了，他才像一位罗马英雄似的要求医生结束他的痛苦。这是一个伟大生命的壮丽结束；在这个凶杀成性的时代，在所有的死亡之中，他的死是值得纪念的。当我们这些朋友将他的灵柩埋进英国的土地时，我们知道我们把祖国的精华奉献给了那片土地。

在那个时候，我常常和弗洛伊德谈论战争和希特勒的残暴。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对此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残暴的行径一点也不觉得惊异。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观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野蛮残酷、根本上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至少

能压制那种本能的办法；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是轻易不会暴露的，就是加上必要的压力也不行。在他最后的几天，他还在关心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面临的悲剧。可是这位科学巨人在这方面也没找出什么解决的方案，他的头脑清楚，可没有找到答案。不久前，他发表了一本自己对摩西的研究著作。他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他用这种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论点，不仅大大伤害了那些虔诚的犹太教徒，也伤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识的犹太人。这本书恰恰是在犹太民族面临最险恶的时刻出版的，这使他深感不安。他说："现在有人夺走了犹太人的一切，我又把他们最优秀的人夺走了。"我必须承认他说得对，每一个犹太人现在都变得异常敏感，因为在这次世界大悲剧中，他们才是真正的牺牲品，不论在哪里，他们都是牺牲品。早在遭受这次打击之前，他们就已惶恐不安，谁都知道，所有的坏事首先落在他们的头上，遭殃最多的也是他们。谁都知道，当前那个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要凌辱和驱赶的也是他们，他要把他们赶到世界的尽头，赶进地狱。随着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过去，逃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后到的逃难者比先来的逃难者越来越悲惨，精神越来越颓丧。那些动作最快的、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救出衣服、箱笼和一些家什，有些甚至带了些钱。但是，有些人相信在德国的时代越长，越是舍不得离开可爱的家园，受到的惩罚就越大。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不让他们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不让犹太人研究者去图书馆。这些犹太人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因为惰性，有的由于胆怯，有的出于傲慢而留在家中；他们宁愿在国内受辱，也不愿流落他乡当乞丐受欺凌。不久，纳粹禁止他们用仆人，拆走他们家的电话机

和收音机，紧接着没收他们的住宅，最后让他们戴上大卫王①之星的标志，竭尽污辱之能事。带上这个标志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人们把他们看作是被扫地出门的人、无赖汉、像躲麻风病似的谁见谁就躲开，他们经常遭到嘲笑。他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任何摧残心灵、摧残肉体的暴行被看作是一种取笑的手段强加在他们身上。对第一个犹太人来说，那句古老的俄国民间谚语变成了严酷的真理："在讨饭袋和监狱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离开的犹太人统统被送到集中营。德国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后，纳粹把他们的衣服扒光，只剩下内衣内裤，钱袋里只给剩十马克，再把他们逐出家园，不管其去向。他们站在国界旁，再到领事馆苦苦哀求，可是几乎打动不了使馆人员的心，因为哪个国家要这些被抢得精光的人呢？有谁愿意要这些乞丐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当我有一次走进伦敦的一家旅行办公室，我一眼看到那番情景使我目瞪口呆；那里挤满了逃难的人，几乎全是犹太人。他们想，随便到哪里都行，哪个国家都一样，到北极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火一般的盆地，只要离开这里，只要继续逃难，因为他们逗留的期限已满。他们必须继续向前走，带着妻子、子女走到另一个陌生的星空之下，走到一个陌生语言的国度里，走到那些陌生人的人群中，走到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群中。我在这里碰到一个以前非常富有的维也纳工业家，同时他也是我们当中最有知识的艺术收藏家之一。刚开始，我还没认出他来，他的头发已经变得那么白，人已变得那么老，精神变得那么疲惫。

①大卫王，系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之王。大卫王之星是以色列的象征，纳粹强迫犹太人佩带六角星的标志，以辱其族。

他颤悠悠地用双手扶着桌子。我问他想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有谁还会问我们到哪里去。哪里允许我们去，我们就去哪里。有人向我说，这里的人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圣多明哥的签证。"我听到这些话心中不觉一震，一个带着儿孙的疲惫不堪的战战兢兢的老头居然希望到一个连他在地图上都没有好好看一眼的地方去，只是为了到那里继续去乞求，继续到异国他乡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在他旁边的一个人急切地问，怎样才能去上海，他听说中国想接受他们这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一个挨着一个，拥挤不堪地坐在一起；他们过去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商人、地主、音乐家；他们每一个都准备带着生活中可怜的破烂穿过大地越过海洋。他们什么活都干，什么都能忍受，只要能离开欧洲，永远地离开，越远越好！这是着了魔的一群人。突然有一个念头涌向我心，使我不胜震惊：这里五十个备受折磨的人不过仅仅是那支五百万、八百万甚至一千万犹太大军的零星先头部队，那支大军已经在他们后面出发，不久会蜂拥而至。所有那些被抢光，接着又在战争中遭受苦难的几百万人正等待着慈善机构的派遣，等待着当局的批准和一点路费，那巨大的人流如惊弓之鸟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仓皇出逃，聚集在欧洲各国边界站的周围和挤在监狱里。他们是一个完全被扫地出门的民族，纳粹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二千年来，这个民族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块歇脚的安静、和平的土地。

犹太人的悲剧在二十世纪里达到了最悲惨的地步，可是他们再也找不到他们所经历的悲剧意义何在，也无法找到自己错在何处。所有在中世纪被逐出家门的犹太人，我们的祖先至少知道为何被驱逐受难：是为了自己的信仰，为了自己的犹太法

律。他们对自己的真神①始终不渝的信仰看作是灵魂的守护神，今天的犹太人早就把犹太教丢到一边了。可是，我们的祖先在自豪的幻觉中生活和受难。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个优秀民族，命该注定会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圣经上预示的那些话语就是他们的准则和教规。要是有人把他们抛入火堆，他们就把圣经紧贴在胸口，由于胸口内心燃烧出来的热而感觉不到火堆里的热。要是有人把他们驱逐出境，他们身上还有一个最后的故乡，这就是唯一真神。没有一种世间的权力，没有一个皇帝，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间宗教法庭能把他们从真神身旁赶走。在宗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时间里，他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因而依然是一种力量。倘若有人驱逐或赶走他们，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而受到的处罚，他们就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以自己的风俗习惯，有意识地把自己和世界上的其他各民族隔离起来。可是二十世纪的犹太人早已不是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恰恰相反，他们感到的是一种负担，他们不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把自己神圣的书籍中的诫律抛到一边，他们再也不说古老的共同语言。他们已经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围各民族里；融合在普遍的生活中是他们越来越迫切的愿望，为的是面对种种迫害能得到和平，在不断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他们已经融化在其他民族里，他们已经是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俄国人，而早已不再是犹太人了，所以他们互相之间已不再理解，没有共同语言了。可是现在又把他们赶到一起来了，他们就像街上的垃圾被人扫在一

①真神，犹太教奉雅赫维为“唯一真神”。

起。他们有的是住在柏林豪华住宅里的银行经理和正统犹太教堂的执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学教授，有的是罗马尼亚的马车夫，有的是出殡时雇来的哭灵妇女，有的是洗尸体的人，有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的是音乐会上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酿酒工人；有的腰缠万贯，有的一贫如洗；他们中间，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诚的教徒，也有思想开朗的人，有高利贷者，也有贤哲之士，有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民族同化论者；有德意志犹太人，也有西班牙、葡萄牙犹太人，有正义者也有非法之徒。在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大群早已不知咒语是何事的无法确定自己该属哪个民族的人，还有改宗教的犹太人和混血的犹太人。现在，几百年以来第一次，又把犹太人自己早已觉得不再存在的一种共性重新强加在犹太人身上，那就是圣经上从“出埃及”开始的一再出现的共性，造成驱逐犹太人的口实。可是为什么这样的命运总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呢？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他们的身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迫害究竟原因何在？有何意义？又有何目的？把他们赶出各个国家，却又不给他们一块立足之地。有人说：别和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又不告诉他们：他们应该住在哪里。人们把罪责加在他们的头上，可是，又不让他们用任何方法去赎罪。所以他们在流亡的路上睁着焦急的眼睛注视着——我为什么要逃亡？你为什么要逃亡？你和我为什么一起逃亡？我既不认识你，又跟你毫无关系，又不懂你的语言，也不了解你的思想方法，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逃亡？为什么我们大家一起逃亡？没有人能解答出来。即便是那些日子里我常常与之交谈的弗洛伊德——我们那个时代头脑最精辟的天才——也不知道这种荒谬事有什么目的，又有什么意义。但是，也许这正是犹太教的最终教义：犹

太教居然谜一般地长期存在下去，由于重复《约伯记》中的向上帝提出那个永恒的问题，以便这个问题在世界上不致于全部被忘记掉。

当那些早已死去并已装入棺材的东西，突然又以相同的形式和姿态又重新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到了，慕尼黑协定连同它的短命的“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幻想早已过去。希特勒已经违背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袭击了残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并吞并了它，梅梅尔（今立陶宛的克莱佩达）已被德军占领；被煽动得忘乎所以的德国报纸大肆叫嚣要夺得但泽（今归波兰）和波兰走廊。英国也从真诚的轻信中痛苦地清醒过来。就连未受过教育的普通人，尽管只是从直觉上厌恶战争，而现在也开始对战争表示异常愤怒。任何一个平时十分矜持的英国人现在都会同另一个人攀谈起来。看守我们公寓的门房，开电梯的服务员，打扫房间的女仆都在谈论这件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地知道这件事，但每个人都记得这件事，那件不可否认、公共的事：英国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往德国拯救和平，但是他的曲意逢迎却没有使希特勒感到满意。人们曾经听到国会里强硬的声音：“停止侵略！”人们到处都觉得英国正在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或更确切地说为反对战争作准备）。浅色的防空气球又开始在伦敦的上空飘浮——看起来就像孩子们玩的大灰象玩具，纯洁无邪。人们又修筑防空掩体，对已经分发的防毒面具进行仔细的检查。局势像一年以前那么紧张，或许更紧张。因为这一次作为政府后盾的不再是那些老实和轻信的老百姓，而是坚决的、愤怒的人民。

我在那几个月里已经离开伦敦，隐居在巴斯① 乡间。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觉到自己对世界发生的事是那样的无能为力。在伦敦我是一个清醒的、有思想的、远离一切政治的人，我献身于自己的工作，静静地、坚持不懈地把自己的岁月变成作品。但是也有少许人，他们呆在一个看不见的秘密处，人们不认识他们，也未曾见过他们，他们只呆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巴黎的凯道赛、罗马的威尼斯宫，还有伦敦的唐宁街里。就这么十个或二十个人在为人们不知道的秘事会议、写信、打电话、订条约。他们其中只有极少数人特别的机智和有才干，大多数是平庸之辈。他们作出没有别人参与的决定；外人对那些决定的细节一无所知。可是他们却用这些决定左右每一个欧洲人的生活和我本人的生活。现在，我的命运不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而是由他们控制着。他们毁灭或者爱护我们这些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赐予我们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在千百万人面前决定战争还是和平。而当时我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似的不能自卫，像一只蜗牛似的没有力量。然而，他们决定的事，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内心最深处的我和我的未来，关系到我头脑里正在形成的思想，关系到已产生或尚未产生的计划，关系到我的起居，关系到我的意志、我的财产、我所有的一切。当时我像被判了刑的犯人坐在自己的囚室里一样，眼望着空室，面对四壁静候着，陷入毫无意义、百无聊赖的等待之中。我左右的那些同伴们在询问、在猜想、在闲聊，好像我们中间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他们是怎样和用什么来控制我们的。这时来电话了，一

①巴斯，英格兰西南部著名疗养地。

个朋友问我，我在想什么。报纸来了，它更使我心烦意乱。收音机响了，听到的都是些前后矛盾的话。这时我走进小巷，遇到的第一个人就向我这个一无所知的人打听，是否会发生战争。人们在不安中打听、闲聊、议论，虽然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多年以来积累的全部知识、所有的经验、一切的预见，在这十几个不认识的人决定面前毫无价值。他们心里明白，他们在二十五年之内是第二次对命运感到束手无策，无力掌握，他们也知道，让太阳穴嘭嘭胀痛的想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终于无法忍受大城市伦敦的一切，因为在那里的每个街角都贴满海报，那些熙攘刺耳的话语像疯狗似的向我扑来；因为我无意中在拥挤的人群中从每个人的脸上看出，他在想什么。原来我们想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战争会不会爆发，只是想在这次决定性的赌博中是输还是赢。在这次决定性的赌博中，我的整个生命、我最后几年的岁月、我那些尚未写成的书、我迄今感到我的使命以及我生命意义的一切，都成了赌注。

可是在外交的赌盘上，弹子慢悠悠地滚动着，慢得使人火烧火燎的难受，它滚过来滚过去，又滚过来滚过去；一会儿红一会儿黑，一会儿黑又一会儿红；希冀和绝望，好消息和坏消息，就是这样一直定不下来。我对自己说，忘掉这些吧！离开这里吧，逃避到我内心的丛林最深处，即躲进我的工作之中，躲进只有我一个人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不再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可怕赌博的筹码。在这个变得疯狂的世界上，我的智力只有躲在这个地方才能理智地发挥作用。

我不缺少工作任务。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写一部有关巴尔扎克及其作品两卷集的巨著积累素材。过去我根本没有勇气去写一部涉及范围如此广泛、时间跨度这么大的作品，现在恰恰

是烦恼给了我勇气去写这部巨著。我到巴斯去隐居，为什么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为英国光辉的文学中许多最优秀的作家，特别是菲尔丁，是在那里写作的。那座小城镇比英国任何一个城市更忠实、更强烈地反映出另一个世纪——十八世纪的静谧的面貌。但是，这种柔和、幽雅、秀丽的景色与世界正在产生的不安和我的思想形成了多么痛苦的对比呵！英国一九三九年的八月和奥地利一九一四年最美丽的七月在我的脑海里完全一样：迷人的美丽。天空又一次像柔软的湛蓝丝绸般的美丽，一望无际，像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阳光依然照耀着草地和森林，大地上盛开着绚丽多彩的鲜花，世界上同样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而人们却在加紧备战。面对着这些安静的、茁壮的、茂盛的草木，面对着巴斯山谷里令人陶醉的安谧气息，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一九一四年那时巴登娇媚的景色。相比之下，那种疯狂的冒险在当时显得多么不可思议啊。

我像过去一样，不愿相信战争是真的。我又一次准备夏季旅行。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周，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因为我这个两栖人不再代表任何国家，瑞典的同行们请我以贵宾的身份参加。后来的几周，中午、晚上的每个小时都被友好的东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订妥了船票，但是紧急动员的消息接踵而来。按常理，我应该马上把我的书籍、我的手稿捆扎好，尽快离开这个可能成为交战国的大不列颠岛，因为在英国我是一个外国人，一旦打起仗来，我便成了一个敌对的外国人，种种可以想象到的限制自由行动的法规就会落到我的头上。可是我心中有些无法解释的想法阻止我尽快离去。一半是固执，我不愿一次又一次地逃难，因为我的命运决定我四海为家；一半是已经疲乏。“我们的命运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

用莎士比亚的话对自己说。如果这样的时代降临在我的头上，我这个快六十岁的人就再也不能和它抗衡了！就是我尽最大的努力，用我的全部生命，也驾驭不了这样的时代。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国。我要尽可能安排好我的生活；同时，由于我打算第二次结婚，我不愿耽误时间，以免战争爆发会打乱计划，因为我属于敌方交战国的人而被扣留或者有意想不到的事件会使我和未来的生活伴侣长期分离。于是，我于九月一日，星期五的上午去巴斯民政局登记结婚。那位官员拿着我的证件，显得格外热情和友好。他像这个时代的每个人一样，理解我们要求尽快办理的愿望。结婚仪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员拿起笔，开始用漂亮的圆形字体把我们的名字写进他的登记簿里。

就在这一瞬间——大约是十一点钟——里面套间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位年轻的政府官员急促地走进来，一边走一边穿大衣，在安静的房间里大声叫嚷："德国人入侵波兰，战争爆发了！"这句话像重锤打在我的心上。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被冷酷无情的打击已习惯了，心也麻木了。"这不一定是战争吧！"我说，我也是这样想的。而那位官员怒不可遏。"不，"他高声喊了起来，"我们上当够多了！我们不能每六个月就受一次骗！现在该结束了。"

当时，那位已经开始为我们填写结婚证书的官员若有所思地搁下了笔。他思考一下说，我们毕竟是外国人，在交战的情况下，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敌对的外国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许在这种情况下登记结婚。他说，他很抱歉，他要向伦敦请示。——接着是一连两天的等待。希望、担心，那是心情极焦急的两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机宣布了英国向德国宣战的消息。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上午，我默默地从收音机旁走开，收

音机里传来了那一条将会经历数百年的消息。这条消息肯定会全面改变我们这个世界，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默默聆听这条消息的那些人中间，将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这条消息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悲哀不幸，绝望和危险，也许若干年后，那条消息还会具备另外创造性的意义。战争又降临了，比以前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一场战争都来得可怕，其范围更广泛。一个时代又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间突然变得鸦雀无声的房间里，互相回避着对方的目光。外面传来鸟儿不知忧愁的啾啾声，鸟儿在和煦的暖风里轻松愉快地做着各种亲昵的游戏，树枝在金色的阳光下轻轻摇动，树叶像嘴唇一样在轻柔地触吻。那么大自然，古老的母亲，同样不知道，她造万物时的辛劳。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我把东西装进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那位有地位的朋友对我说的话应验了，那么我们在英国的奥地利人应该算作德国人，所以各种限制会接连而来；也许当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地位又降了一级。自从那件惊人的消息传来一小时之后，我在英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外国人，而且还是一个"敌邦的外国人"，即一个敌对的外国人；我将被强行放逐到一个我搏动的心脏不愿呆的地方去。一个人早已被赶出说德语的国家，由于他的种族和反对德意志思想方式的缘故，现在居住在另一个国家，根据一项官僚主义的法令，坚持把他这个身为奥地利人硬划在从来不属于的集体里——划成德国人——如果是这样的处境岂不更荒唐?如果这样大笔一挥，我生命的全部意义岂不变得荒谬绝伦。我一直用德语写文章、想问题，但我头脑里想到的一切念头，我脑子里产生的一切愿望，都是属于为世界自由而战的国家。我过去的所有联系都被扯断

了，过去所有的一切，曾经有过的一切，都被粉碎了。我知道，这次战争过去，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我内心深处的愿望已成为泡影，四十年来，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贡献给了这个愿望：实现欧洲和平统一。我害怕人类之间互相厮杀的战争超过害怕自己的死亡，现在战争第二次发生了。我整个的一生热烈追求欧洲人民在人性和精神上团结一致，现在正处于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的时刻，由于我受到严重的排挤境地，而感到无能为力。我现在反而感到，我的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孤独。

为了最后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走向那座小城镇。这座小城静静地沐浴在中午温暖的阳光之下。在我看来，它与平时没有两样。那里的人仍然用自己的习惯步履走着自己习惯的路。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匆匆忙忙的神情，也看不见他们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在星期天仍然那么安详、泰然自若。在这一瞬间我问自己：难道他们到此刻还不知道发生了战争吗？不过，他们毕竟是英国人，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不需要大张旗鼓、不需要喧嚣和音乐来增强自己坚强的、刚毅的决心。这跟奥地利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那么不同呀！话又说回来，当时我还是一个毫无经验一身轻的青年人，而现在我被无数回忆压在心头，已是心事重重的老人，这两者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呵。我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当我看到热闹熙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时，我便在一片幻觉中重新看到一九一八年的景象：商店被抢劫得空空荡荡，好像它们凝视着我在求援。在幻觉中我又看到憔悴的妇女在食品店前排起长队；哀伤的母亲、伤员、残废者，和一切的恐惧不安像幽灵一般回到了今天阳光灿烂的中午。今天我又回想到当年的那些老兵，他们衣服褴褛、面容疲

惫，他们是如何从战场上回来的啊。我跳动的心经历了那次战争的全过程。但是，今天的战争远没露出它那可怕的惨象。而且我知道：过去的一切已全部过去了，所有的业绩早已化为乌有——欧洲，我们为它而活着的故乡，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连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有点不同的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但是，要达到这个新时代，还要经过像但丁写的很多地狱和炼狱啊。

骄阳普照着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面前的影子一样，我也看到了现在这次战争后面另一次战争的影子。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伴随着我日日夜夜产生的念头；也许这暗影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和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

[附录]

1. 绝 命 书

在我自愿和神志清醒地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一项最后的义务逼使我要去把它完成：向这个美丽的国家巴西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它对我是那样善良，给予我的劳动那样殷勤的关切，我日益深沉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说来业已沦亡和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

年过花甲，要想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得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斯蒂芬·茨威格

1942年2月22日于彼德罗保利斯

（高中甫 译）

2. 茨威格1936年用英文写的简历

我于1881年11月28日生于维也纳，后来我攻读哲学。但我真正的学习却始之于长时间欧洲、美洲和印度的旅行；我的内在的教育始之于与我同时代的著名人物——维尔哈伦、罗曼·罗兰、弗洛伊德、里尔克的友谊。我的固有的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这种好奇我首先试着在涉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性格化的短故事上加以运用（如《热带癫狂症》、《情感的迷惘》和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的文学性速描）。

直到战争的爆发——这对我既是最深刻的感情上的震动也是最重要的道德上的教训——我对世界历史才开始较为密切地加以关注。我着手重新去研读它，带着这样的目的：或许借此能更好地去理解我们当前的时代；特别是往昔中那些批判的反叛时代使我能同当代去加以类比（富歇、玛丽·安东内特、埃拉斯姆斯）。自从战争以来，完全遵循这样一个方针进行写作看做是我的道德义务，即有助于我们时代进一步积极的发展：通过对往昔的解释，通过对当代的警告——因为我相信，促进人

之间的联合和加深人民和民族间相互理解，为此所做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从一开始我的目光总是注视世界主义（das Kosmopolitische），我的思想远离开赤裸裸的民族主义。因此我认为——决不是自诩——我的著作的影响也超出了民族，这是一种特别幸运的机缘，甚至是生活所给予我的最伟大的祝福。正如我感到整个世界是我的家乡一样，我的书在地球上所有语言中找到友谊和接受。

（高中甫 译）

3. 茨威格年表

1881年11月28日　斯·茨威格生于维也纳，父亲莫里茨·茨威格（1845—1926）是纺织工厂主，母亲伊达·茨威格，娘家姓布莱陶尔（1845—1938）生于意大利，是一个银行家的女儿。斯·茨威格的父母均系犹太人。

1887年—1892年　茨威格在小学读书。

1892年—1900年　茨威格在中学读书，并开始创作，到中学毕业时他已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百余首诗歌。

1900年　茨威格进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和文学史。

1901年　他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在柏林出版。

1902年　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出游》；他翻译的保尔·魏兰诗集和波德莱尔诗文集分别在柏林和莱比锡出版。在这一年的夏天他前往比利时旅行，首次与艾米尔·维尔哈伦晤面。

1902年—1903年　他转入柏林大学。

1904年　他结束大学学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希波利特·泰纳的哲学》。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艾利卡·埃瓦尔德之恋》出版，内收有四篇小说：《雪中》（这是他1900年写就的）《出游》《艾·埃瓦尔德之恋》和《生命的奇迹》。他翻译的《维尔哈伦诗选》在柏林出版。他前往巴黎、伦敦，翌年又前往西班

牙和阿尔及尔旅行。

1906年　他的诗集《早年的花环》在莱比锡出版，同年他翻译的A·G·B·罗素的《威廉·布莱克的幻想的艺术哲学》在莱比锡出版。

1907年　他在莱比锡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这部诗剧翌年在德累斯顿和卡塞尔上演。

1908年—1909年　他在印度、锡兰、缅甸和尼泊尔旅行。

1911年　他前往北美和加勒比地区旅行。小说集《初次经历》出版，内收四篇小说：《夜色朦胧》《家庭女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

1912年　他的独幕剧《变换不定的喜剧演员》首次上演和悲剧《滨海之宅》在维也纳城堡剧院首演。与弗里德利克·玛丽亚·冯·温德尼茨（1882—1971）（他的第一个妻子）首次相遇。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自愿入伍，申请在军事资料部门服役。

1916年—1917年　他在萨尔茨堡购房定居。他的反战戏剧《耶利米》出版，他前往瑞士进行一次演讲旅行，在苏黎世观看《耶利米》的排练；拜访罗曼·罗兰。

1918年　他的戏剧《生活的传说》在汉堡上演。

1920年　与弗里德利克·冯·温德尼茨结婚，发表小说《桎梏》和《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此系他的《世界建筑师》一书的第一部分，同年底出版传记《罗曼·罗兰，其人和作品》。

1922年　发表小说《热带癫狂症》和传奇《永恒的目光》《日内瓦湖畔的插曲》。

1924 年　他的诗歌全集出版。

1925 年　《与精灵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出版，此系《世界建筑师》的第二部。

1927 年　他的小说集《情感的迷惘》出版，开始着手写《世界建筑师》的第三部《三诗人的生平》(卡萨诺瓦，斯丹达尔，托尔斯泰)。

1928 年　《三诗人的生平》出版；同年 9 月赴苏联参加托尔斯泰诞生百年纪念会。

1929 年　他的政治家传记《富歇，一个政治家的图像》出版，悲喜剧《穷人的羔羊》发表。

1930 年　去意大利旅行，在索伦托拜访高尔基。

1931 年　赴法旅行，写《玛丽·安东内特》和长篇小说《邮局小姐的故事》(这部长篇没有完成，根据遗稿整理，又名《青云无路》)。

1932 年　《玛丽·安东内特》出版。

1933 年初　希特勒上台，茨威格的作品被焚烧。

1934 年　茨威格在萨尔茨堡的住宅被搜查，他移居伦敦，《埃拉斯穆斯·封·鹿特丹的胜利和悲哀》出版；绿蒂·阿尔特曼成为他的秘书；着手写《玛丽亚·斯图亚特》。

1935 年　由里夏德·施特劳斯谱曲，茨威格编剧的歌剧《沉默的女人》在德累斯顿首演，三天后被禁。《玛丽亚·斯图亚特》出版。

1936 年　《埃斯泰里奥反对卡尔文——良知反对暴力》出版。同年 8 月前往巴西旅行，并参加在阿根廷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

1937 年　《蜡烛台记》出版；完成长篇小说《心灵的焦躁》第

二稿。同年 5 月与弗里德利克分手。

1938 年　茨威格在葡萄牙同绿蒂一起；《麦哲伦》出版。同年 2 月与弗里德利克离婚。申请加入英国国籍，在美国进行讲演旅行。

1939 年　长篇小说《心灵的焦躁》出版，获得成功；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同绿蒂结婚。

1940 年　3 月茨威格获英国国籍，他在巴黎、纽约和南美进行讲演旅行。

1941 年　他着手写自传，9 月乘船前往巴西，先在里约热内卢，后移居彼德罗保利斯；在这里完成《象棋的故事》；在 11 月他将自传《昨日的世界》的手稿寄给出版社。同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爆发。

1942 年　2 月 22 日茨威格与妻子一道自杀，在彼德罗保利斯公墓举行国葬。《象棋的故事》《昨日的世界》分别在阿根廷和瑞典出版。

（高中甫 编写）

后 记

编完了这部文集，虽然在序言里，在每卷的卷首语有些话已经说了，但还得饶几句舌，算是做个交待。

斯·茨威格的名字早在他在世时，就被介绍给中国读者了，那是1921年在茅盾先生的题为《两本研究罗曼·罗兰的书》一文中首次提到的，此后他的一些传记作品，如《罗曼·罗兰传》《巴尔扎克传》和个别小说，如《保姆》(即《家庭女教师》)《马来狂人》《一个女人一生中的廿四小时》等被译成中文。但直至70年代末期，在半个多世纪里，作为小说家、传记作家的茨威格，他的名字并没有为更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他的作品并没有更多地被介绍进来。直到扼杀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茨威格才同中国读者一道进入一个“文艺的春天”。自那以后，他的小说，他

的传记不断地被译成中文，至今的二十年里，茨威格作品出版可谓长盛不衰，粗略估计，他的各种作品的累计印数有百万册之多；在德语作家中，也许只有歌德超过了他。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茨威格热绝非夸张之词。这表明他是中国读者所喜爱的一个德语作家，他的作品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茨威格？这值得专文去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和分析，但这里我想指出一点，那就是对茨威格拥有大量读者而心怀嫉妒的胡戈·霍夫曼斯塔尔所说过的："它们（指茨威格的小说——笔者注）必定有某种确实能消除读者饥饿的东西，……"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就必然拥有大量的读者，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茨威格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说，在近二十年里得到中国读者的广泛喜爱，我以为道理也在于此。他们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了共鸣，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吸引人的感情世界，激发了自己想象力，满足了自己所期待的，也得到了艺术上的享受。

在今日的出版界，文集出版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部《茨威格文集》加入了进来，这倒不完全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一位在二十年来一直拥有大量读者的作家，理应享有的待遇。这部七卷本的文集头三卷收进了他的全部小说，无论是长篇、中篇还是短篇；四五两卷是他的传记作品，其中有那本著名的题为《世界建筑师》的九位作家的传记论述，它们是首次译成中文，——相信它会受到读者欢迎的——；第六卷是散文、游记、书信，第七卷是那部自传《昨天的世界》，这大抵包括了他的各种文学体裁的一些代表性作品。（由于篇幅和其他原因，他的诗歌和戏剧只能割舍。）我想，这部文集一方面是对茨威格的尊敬之情的表达，另一方面也可满足一个茨威格爱好者的需求了；这

不仅是编者的初衷，也是出版者的意愿。

这部文集能较为顺利地与读者见面，首先应归功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岑杰先生的策划和运作，感谢他们为此所做的努力，还要感谢参加这部文集翻译的诸位译者，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为这部文集构建了基础，增添了光彩。

由于编者的才学所限和时间上的紧迫，文集的篇目选择的安排上，定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高中甫

1997年8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茨威格文集　7　自传卷
作者=高中甫主编
页数=448
SS号=10471716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目录

前言
昨天的世界
安全世界
上世纪的学校
萌发爱情
大学生活
永葆青春的城市——巴黎
我的崎岖道路
走出欧洲
欧洲的光彩和阴暗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初期
为崇高的情谊而奋斗
在欧洲的心脏
回到祖国奥地利
又回到世界上
日落
希特勒的开始
和平的濒死状态
［附录］
１．绝命书＆（高中甫译）
２．茨威格１９３６年用英文写的简历（高中甫译）
３．茨威格年表＆（高中甫编写）
后记